

# 特殊的 童年

杨政怡

著

## Special Childhoods

Left-Behind and  
Boarding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农村留守儿童  
与寄宿儿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特殊的 童年

杨政怡  
著

## Special Childhoods

Left-Behind and  
Boarding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农村留守儿童  
与寄宿儿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特殊的童年：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研究

作者：杨政怡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04月

ISBN：9787522767284

字数：155千字

（本书fen享搜索'雅书）

# 内容简介

在快速城镇化与人口流动背景下，中国农村儿童的成长环境发生深刻变迁，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逐渐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特殊群体。本书立足家庭与学校双场域互动视角，系统分析父母缺位情境下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同伴网络结构与偏差行为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其对成年后就业质量与幸福感的长期影响。研究引入社会网络分析与生命历程理论，揭示同伴关系在弥补家庭功能缺失中的关键作用，并从非认知能力视角解释童年经历对个体发展轨迹的深远影响。本书在理论与实证层面回应农村儿童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并为相关公共政策与教育治理提供启示。

# 作者简介

杨政怡

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南民族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访问学者。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等10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公共管理学报》《青年研究》及*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等CSSCI、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入选2024年、2025年“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保障与养老保障。

本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网络与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基于整体网调查与干预实验的研究”（7220324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共同富裕视域下民族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公共政策供给创新研究”（CSQ25018）和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发展：当前困境与长期影响”（HBSKJJ20243313）的成果。

## 绪论

## 一 快速城镇化下的农村儿童

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儿童群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4177万人，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9%。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限制使得务工父母难以将子女带入城市，导致亲子分离现象十分普遍。农村儿童成长在资源匮乏、家庭功能弱化的环境中，其教育、健康和心理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图0.1显示，2010—2020年，农村儿童数量大幅下降，但留守儿童比例持续上升，凸显了问题的紧迫性。研究农村儿童在城镇化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路径，对推动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不仅仅是农村儿童的个人问题，也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问题，对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相关研究也极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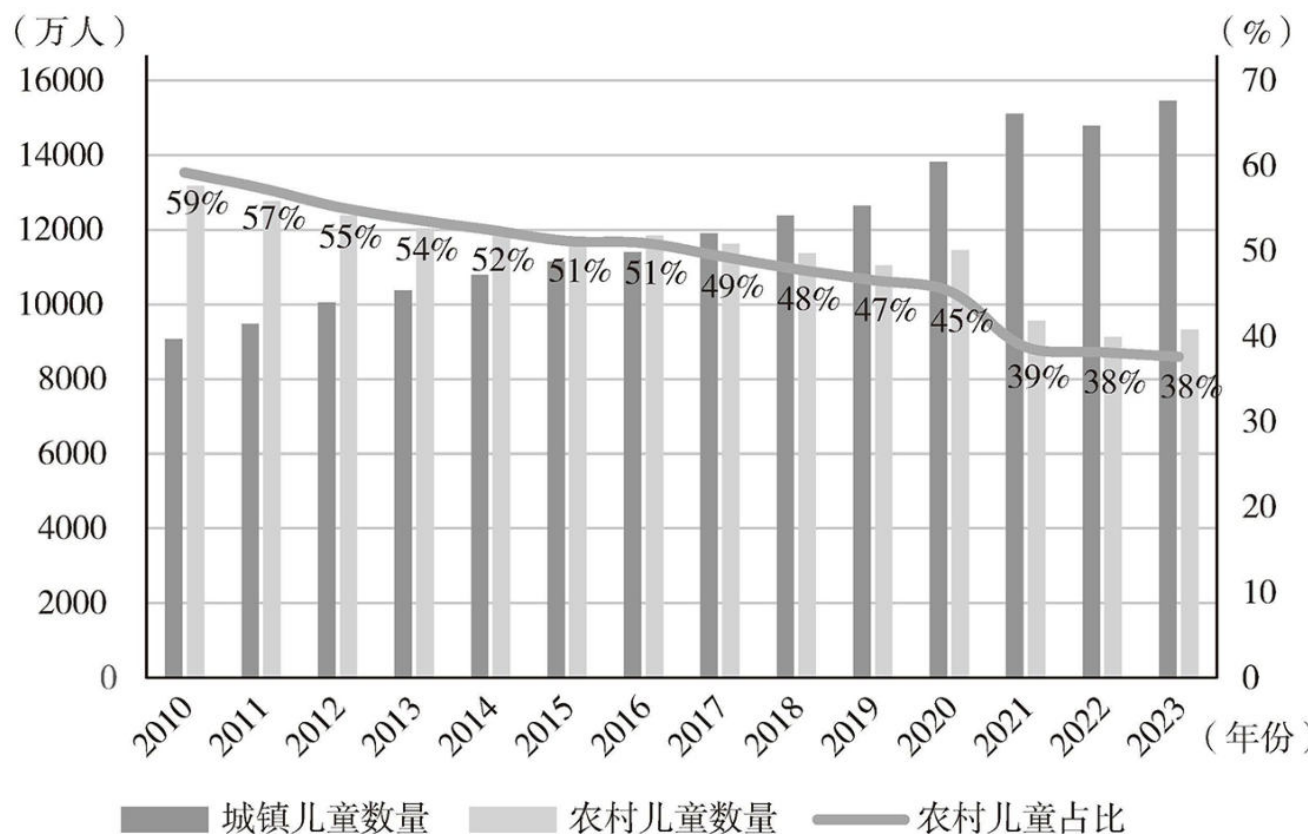


图0.1 中国城乡儿童数量变化趋势及农村儿童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说明：2010年和2020年分别为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余年份的数据由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推断而来。其中，2015年为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因数据精度与其他年份相差较大，故剔除2015年数据。

数据来源：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2023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 二 家校双场域中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

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受到家庭与学校双重场域的交互影响。在家庭场域，父母缺位往往导致情感支持不足和教育监督弱化，这一影响在留守儿童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学校场域，教育资源分布差异和寄宿制管理模式同样深刻影响着儿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人力资本研究多侧重于对认知能力（如学业成绩）的考察，而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非认知能力（如情绪管理、社交技能）对儿童长期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本书聚焦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这两类特殊群体，从家庭与学校双场域的互动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其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研究取向不仅能弥补现有研究对场域互动关系关注不足的缺陷，更能为制定更精准的教育支持政策提供较为全面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当前农村教育发展背景下，这种双场域互动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农村儿童发展面临的特殊挑战，并为破解这些困境提供新思路。

## 三 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同伴效应

同伴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父母缺位的留守儿童和农村寄宿儿童而言尤其如此。现有研究多聚焦个体层面的同伴互动分析，但这种方法存在明显局限：个体网络边界模糊、成员间缺乏系统性联系，难以全面反映儿童在家庭和学校多重社会网络中的真实互动状况。相较而言，整体网络分析能够更准确地刻画群体内部关系结构，揭示个体行为如何受到网络成员的系统性影响。

本书创新性地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班级和宿舍作为研究单元，深入考察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同伴网络特征。通过分析网络中心性、群聚性等结构指标，系统探讨同伴关系对儿童社会化过程的影响机制。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弥补了传统个体网络研究的不足，更为理解农村儿童在特殊成长环境下的社会化路径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揭示同伴网络在弥补家庭功能缺失方面的潜在作用，为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 四 家庭监督缺失下的农村儿童偏差行为

父母长期缺位可能导致家庭监督功能弱化，增加农村儿童出现偏差行为的风险。父母长期外出导致亲子分离，削弱了家庭对儿童行为的管理和情感支持，使其在同伴关系中更易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成为校园欺凌中的受害者。同时，偏差行为可能通过社会网络传递，进一步加剧问题的严重性。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家庭功能弱化对儿童行为的影响机制，还能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如加强学校心理辅导、优化同伴支持网络等，从而减少偏差行为，促进农村儿童健康成长。

本书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通过分析寄宿对农村儿童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和早恋行为的影响，揭示了家庭监督缺失如何通过削弱儿童的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和外向性等人格特质，进而增加其偏差行为发生的风险。同时，不良同伴交往会放大寄宿的负向影响，而教师支持和父母参与则能有效缓解这一效应。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农村儿童行为发展机制的理论认识，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实践角度看，研究强调了加强家校协同、优化寄宿学校管理以及完善农村家庭教育支持体系的必要性，从而为减少儿童偏差行为、促进其健康成长提供了科学参考。

## 五 生命历程视角下童年经历对成年工作—生活场域的长期影响

童年经历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前四个部分探讨的是父母缺位对儿童的即期影响，这一部分将探讨父母缺位的长期影响。生命历程理论强调，早期家庭环境、教育经历和社会支持会通过累积效应塑造成年后的就业、婚姻和心理健康。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而言，父母缺位是否会导致长期人力资本劣势？其影响机制是经济资源的限制，还是心理资本的削弱？本书基于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童年留守经历与成年后工作—生活质量的关联，不仅拓展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应用范围，也为相关政策（如教育支持、心理干预、就业帮扶）的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 六 内容与章节安排

本书主体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由来，第二部分是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第三部分是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的同伴网络，第四部分是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第五部分为工作—生活双场域下父母缺位的长期影响。第一部分包含一章，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均包含两章，第五部分包含三章。各章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父母缺位下农村儿童的两种类型。作为全书的开篇，本章将对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的由来展开讨论，并回答这两类儿童为何普遍又特殊。

第二章为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本章节分析了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的身心健康、教育期望等传统人力资本的影响和以大五人格、自尊、坚毅和学习动机等为代表的新人力资本的影响。

第三章为农村寄宿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本章首先比较了农村寄宿儿童和非寄宿儿童人力资本的差异，然后聚焦寄宿儿童的营养获得、孤独感消解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第四章为家庭—学校双场域下父母缺位与同伴网络的弥合。由于父母外出造成陪伴和监督的缺失，而同伴又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主体，本章将分析留守儿童和寄宿儿

童在班级整体网中更真实的同伴关系，并探讨同伴网络如何在家长与教师之间发挥弥合作用。

第五章为留守儿童与农村寄宿儿童的同伴网络。运用UCINET绘制了班级学习、八卦、玩耍、情感和好友网络等整体网络图，并分析了留守状态和寄宿状态对同伴网络入度（In-Degree）、出度（Out-Degree）、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紧密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和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这五种中心性的影响，发现留守儿童并没有出现群聚，但寄宿儿童出现了群聚。

第六章为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社会网络研究。本章系统考察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留守儿童面临的多重困境：留守状态本身不仅提升了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其在同伴网络中的边缘位置还导致“网络资源剥夺”，使其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研究还揭示了校园欺凌在社会网络中的传递特性，进一步加剧了留守儿童的弱势处境。值得注意的是，旁观者群体在欺凌事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消极态度往往助长欺凌持续，而积极干预则能有效遏制欺凌蔓延。

第七章为农村寄宿儿童的偏差行为。寄宿会增加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包括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和早恋行为。大五人格对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寄宿通过削弱其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和外向性来增加其攻击性行为和违纪行为。交往不良同伴、获得较少的教师支持和较低程度的父母参与也会增加其偏差行为的发生。

第八章为工作场域：童年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童年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父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是负向的。童年父母外出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关键期效应”和“时间效应”。同样以大五人格作为重要中介，父亲外出通过提升子女的尽责性和开放性来提高青年就业质量，而母亲外出则不利于儿童的情绪稳定性，从而对青年就业质量产生负向影响。

第九章为生活场域：童年父母外出、多维资本积累与成年幸福感——来自多维资本的解释。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后的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传统人力资本和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而新人力资本的影响并不明显。童年留守经历通过抑制身心健康、削弱子女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并进一步通过亲密关系的代际传递降低子女与配偶亲密度，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第十章为拥抱特殊童年。第一，优化家庭陪伴模式，减少亲子分离的负向影响。第二，完善寄宿制学校管理，提升教育质量与心理健康支持。第三，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形成教育合力。第四，推动政策创新与社会关注，实现长效保障。

## 第一部分

#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由来

# 第一章 父母缺位下农村儿童的两种类型

## 第一节 父母外出与儿童留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由于城乡经济差异等因素，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由于中国当时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制度的改革还未完成，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务工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农民身份。因其农民身份无法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和住房等，无力带子女一起流动，使得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只能将自己的子女留在家乡，由此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

### 一 农村家庭外出务工选择与留守儿童的由来

#### （一）大量父母外出务工的起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支持，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21世纪初，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定型。沿海地区经济持续繁荣，同时内地经济也开始崛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加速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与此同时，内陆地区经济的崛起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促使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距。

数据源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农村地区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生产效率低，收入有限，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非农就业机会稀缺。农民难以通过农业生产满足家庭的教育、医疗等需求。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农村劳动力只能流向城市。2010—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增加了1.54亿人。<sup>①</sup>这一时期，人口流动加速、城镇化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流动家庭，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出现了更多留守儿童。

#### （二）留守儿童的成因分析

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快速发展的伴生性社会问题，是多种结构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宏观国家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强大推力，也直接催生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从中观社会层面来看，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的壁垒，进一步限制了流动家

庭的完整化，使得部分家庭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加剧了留守儿童现象的持续与固化。从微观家庭层面而言，农村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与生存需求迫使父母外出务工，而户籍制度限制与城市生活成本等因素导致子女被迫留守，这种家庭结构的割裂成为留守儿童现象形成的核心机制。总体而言，留守儿童是城乡经济差异、城市公共服务壁垒以及家庭经济压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留守儿童产生的复杂背景。

### 1. 改革开放与城乡经济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但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及与之配套的劳动力流动管理政策的逐步放开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了重要保障。从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到逐步放宽并规范管理，打破了城乡之间的“高墙”，使农村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特别是2000年以后，国家逐步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更加重视流动过程中的公平与融合（张广胜、田洲宇，2018），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为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稀缺，高质量工作岗位更是匮乏（宋月萍，2024）。具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较高的收入水平和丰富的就业机会成为主要的拉力因素，而农村地区劳动力过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低、就业机会少则是劳动力外流的主要推力（吴方卫、卢文秀，202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需求层次的变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目标也从“维系生计”转向“追求发展”。这一转变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同时也对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 2. 家庭经济压力与外出务工

农村家庭普遍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源自家庭成员的生活、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支出需求。为了有效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往往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在许多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父母外出务工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而传统农业生产或其他本地就业机会所创造的收入，往往难以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因此，父母外出务工不仅成为许多家庭改善经济状况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亲子分离的情况日益普遍，进一步推动了留守儿童的产生。

### 3. 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壁垒

尽管父母外出务工能增加家庭收入，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壁垒却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将子女带在身边的可能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居住在单位宿舍或工

地工棚，条件较为简陋且缺乏稳定性，无法为子女提供适宜的成长环境。此外，城市教育资源和住房保障的不均等化问题，使得流动家庭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许多城市对流动儿童入学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包括严格的户籍限制和高昂的借读费等，这些制度性障碍使得部分家庭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农村（阮海波，2021）。即使一些城市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但由于供给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许多农民工仍难以享受到相应的福利。这种居住空间的边缘化和空间隔离现象，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工家庭融入当地社会的难度。这些因素也限制了流动儿童的教育发展，使得部分家庭在权衡成本后，最终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乡。

### （三）农民工的代际差异

#### 1. 第一代农民工

从出生年代来看，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指生于1970年之前，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进入城市务工的人群。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村劳动力。这一群体的出现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第一代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完整经历了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仇凤仙，2023）。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他们正好填补了这一需求，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从务工类型来看，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生计型务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家庭生计问题，他们的收入主要用于家庭经济开支，如子女教育、家庭建设和子女婚事。④他们的工作多集中在建筑工地、工厂等体力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工作虽然收入相对稳定，但劳动强度大，且工作环境较为艰苦。

从文化程度来看，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多为小学和初中文化。受限于受教育程度，他们主要从事一些低技能、高强度的工作，包括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保安、保洁等。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培训和教育背景，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往往处于劣势。

从乡土情怀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对家乡有较强的归属感，与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尽管长期在外务工，但他们仍然会在农忙时返乡，农闲时再外出打工，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乡之间。这种“候鸟式”的生活模式使得他们在城乡之间形成了独特的生存状态（仇凤仙，2023）。他们的生活轨迹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但他们在城市中始终难以完全融入，最终仍需回到农村。这种城乡往返的生活方式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家乡的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从家庭结构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多为多子女家庭，家庭责任较重。由于外出务工，他们的子女往往成为留守儿童，教育和生活多依赖隔代教养。这种隔代教养模式在农村地区尤为普遍，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首先，祖辈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难以在学业上为留守儿童提供有效指导；其次，祖辈的年龄较大，精力和体力有限，难以全面满足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情感与心理需求。此外，隔代教养还可能导致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使得留守儿童在行为规范、价值观塑造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引导。

## 2. 第二代农民工

从出生年代来看，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群体。这一代农民工的成长背景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差异，他们出生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和经济机遇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全新的社会环境。这种成长背景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就业选择、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呈现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征。

从务工类型来看，第二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动机不再局限于解决生计问题，而是更加注重追求体面的工作和生活质量，对生活品质有较高要求（孙敏，2023）。这种生活观念的转变同样体现在他们的消费行为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更接近城市居民，他们不再将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乡，开始重视个人发展和生活享受。例如，他们会购买时尚服装、使用智能手机，甚至通过网络金融平台贷款进行超前消费。这种消费行为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和对个人价值的追求。

从文化程度来看，第二代农民工普遍高于第一代，多为初中及以上文化，占93.8%（沈蓓绯等，2012；房彬，2014）。这种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在就业选择上更具优势，职业期望值也更高，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体力劳动。他们更倾向于技术含量较高、工作环境较好的行业，如制造业、服务业等（王宗萍、段成荣，2010）。教育水平提升的同时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从乡土情怀来看，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更强，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与家乡的联系相对减弱，且他们的收入不单纯用于家庭建设。由于大多没有务农经历，对土地缺乏深厚感情（房彬，2014），家乡的吸引力较弱，他们更愿意在城市中寻找发展机会。这种乡土情怀的淡化反映了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转变，从传统的“农村人”逐渐向“城市人”过渡。

从家庭结构来看，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成长于独生子女或二孩家庭，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多子女家庭背景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教育投入成为家庭支出的核心部分。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第一代农民工“候鸟式”往返城乡的模式不同，

第二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城市长期定居，努力融入城市生活。这种家庭结构的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改变了农民工群体的生活选择；另一方面，也对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对比如表1.1所示。

表1.1 第一、第二代农民工特征对比

特征	第一代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
出生年代	1970年前	1980年后
务工类型	生计型	发展型
文化程度	以小学及初中文化为主	以初中及以上文化为主
乡土情怀	较强	较弱
家庭结构	多子女家庭	独生子女或二孩家庭

## 二 父母外出类型、留守阶段与留守儿童特征

### （一）父母外出类型与留守儿童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模式经历了显著变化，对留守儿童的家庭安排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父亲外出务工为主，家庭安排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内”，即父亲外出挣钱养家，母亲在家照顾一家老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夫妻双方共同外出务工的现象逐渐增多。近年来，女性外出务工人员增加（石智雷、宁桃丽，2024），这种变化不仅是家庭经济策略的调整，也与社会结构和性别角色的演变密切相关。

#### 1. 父亲外出

在父亲外出务工的家庭中，母亲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情感陪伴和日常生活照料，但单亲抚养模式仍然存在明显的功能缺失。由于父亲在传统家庭中往往承担着权威支持和经济支柱的角色。尽管务工收入能够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使儿童的营养摄入有所提高，但父亲在健康管理方面的缺位可能导致疾病预防等关键环节被忽视，使得儿童的健康状况并未随经济改善而同步优化。此外，父亲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通常扮演着行为规范和社交引导的角色，其长期缺席可能导致儿童学习动力不足、社交能力发展滞后，甚至出现行为偏差。这种“经济条件改善但家庭功能弱化”的矛盾现象，使得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仍面临多维度的成长风险。

#### 2. 母亲外出

如课堂违纪、讲脏话等。  
如强迫、敌对等。

母亲外出务工对儿童心理的影响更为显著，与父亲相比，母亲外出务工更容易使留守儿童产生自我孤独感。留守儿童年龄越小，产生自我孤独感的概率越高（张婷皮美、石智雷，2021）。在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表现上，无论是外显行为<sup>④</sup>还是内隐心理问题<sup>⑤</sup>，由父亲单独抚养的儿童出现问题的概率普遍高于其他抚养方式。这或许反映出父亲在照看儿童时对问题行为的重视程度不足，管理方式较为宽松。此外，留守儿童在偏差行为类型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在内隐心理问题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而男生则在外显行为问题上更为常见（傅王倩、刘霏屿，2022）。母亲不在家对留守儿童健康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陈在余，2009），仅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其患病风险最高、就诊率最低，处于最为不利的境地（宋月萍、张耀光，2009）。

### 3. 双亲外出

双亲外出务工使留守儿童陷入更为严峻的成长环境，祖辈监护虽然能够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但在情感支持、教育引导和健康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局限。由于祖父母年龄较大、教育水平有限，他们往往难以满足儿童的情感需求，儿童更容易出现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甚至长期影响其自我认同感。在行为发展方面，父母的双重缺位使得儿童缺乏必要的规范和引导，非认知能力（如自律性、社交能力）的发展明显滞后，表现为学习动力不足、社交退缩等问题（崔颖、徐卓君，2021）。健康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双亲外出的儿童健康问题的发生率更高，且意外伤害风险增加，反映出祖辈监护在健康管理上的不足。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的双亲缺位可能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累积性负向影响，甚至延续至成年阶段，形成深远的成长劣势。

## （二）不同阶段留守儿童特征

### 1. 幼年阶段

幼年阶段留守儿童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情感需求与教育支持两个关键方面。在情感发展层面，父母陪伴的缺失使得儿童难以建立稳定的情感依恋，部分儿童可能表现出过度依赖监护人的行为，而另一些则可能呈现情感疏离倾向。这种情感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主要监护人的频繁变更密切相关——除祖辈外，亲戚、邻居等也可能参与照料，但都难以替代父母的角色。在教育支持方面，实际监护人往往受限于年龄、精力和教育观念，难以为儿童提供适龄的早期教育刺激，导致儿童在语言发展、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等基础能力的发展上可能滞后于同龄人。

### 2. 小学阶段

小学阶段留守儿童面临学习适应与心理发展的双重挑战。这一阶段的儿童开始系统接触正规教育，但由于缺乏父母的学习监督和学业指导，部分留守儿童表现出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方法不当等问题。与此同时，心理孤独感成为显著特征，长期缺乏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使得他们在同伴交往中往往表现出内向、自卑的特点。学习困难与心理孤独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状况进一步影响了儿童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能力（刘志军，2025）。

### 3. 初中阶段

初中阶段留守儿童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情绪波动与社会适应方面。正值青春期的留守儿童面临着更为突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在情绪表现上，女生往往呈现出更强的外向性和情绪不稳定性，而男生则更多表现出攻击性等行为问题（黎志华等，2014）。在社会适应层面，这一阶段的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社交焦虑和群体归属感缺失的问题，部分学生甚至出现明显的反社会倾向（张晓，2021）。这一阶段的情绪问题与社会适应障碍相互交织，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 4. 高中阶段

高中阶段留守儿童面临着学业压力与支持系统的双重困境。随着课程难度增加和学业竞争加剧，留守儿童因长期缺乏父母的直接学业指导和情感支持，在应对学习困难时往往力不从心。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积累的学习问题到高中阶段进一步放大。虽然通信技术为亲子联系提供了便利，但有限的沟通频率和深度难以满足青少年日益增长的情感需求。这种持续的家庭支持缺失，使得他们在面对学业压力和生活挫折时，更容易陷入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状态（潘黎君，2024）。

## 三 留守儿童的数量与区域分布

### （一）留守儿童的数量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年5月11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为4177万人，占农村儿童总人口的37.9%<sup>①</sup>，这一比例较十年前显著提升。在2010—2020年，全国留守儿童数量增加了1202万人（增长率为21.9%），但农村留守儿童仅增长207万人（增幅为5.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是发生在农村儿童总人口大幅缩减的背景下，也使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不降反升。数据表明，尽管城镇化进程加速带动了人口流动，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呈现出结构性加剧的

趋势。这种“总量微增、占比攀升”的态势，凸显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紧迫性和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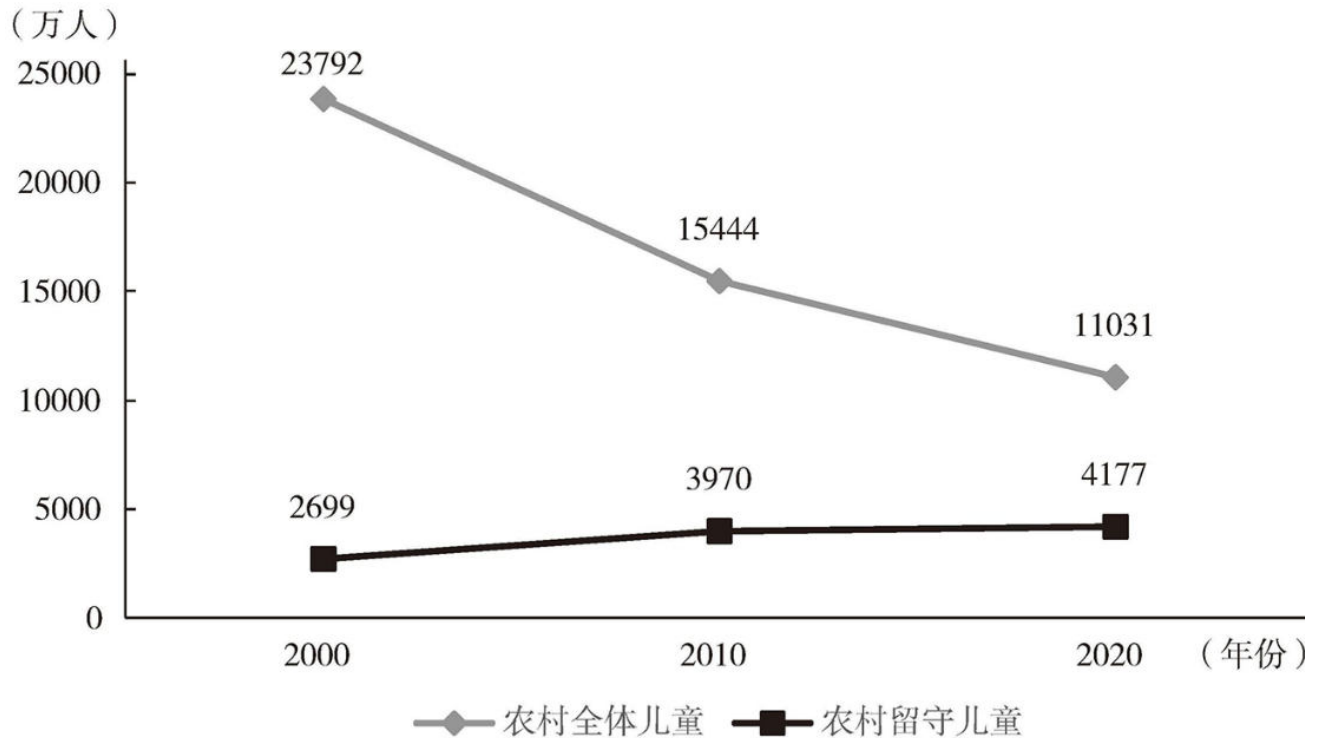


图1.1 2000—2020年农村全体儿童与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变化

## （二）留守儿童的区域分布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年5月11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澎湃新闻，2024年6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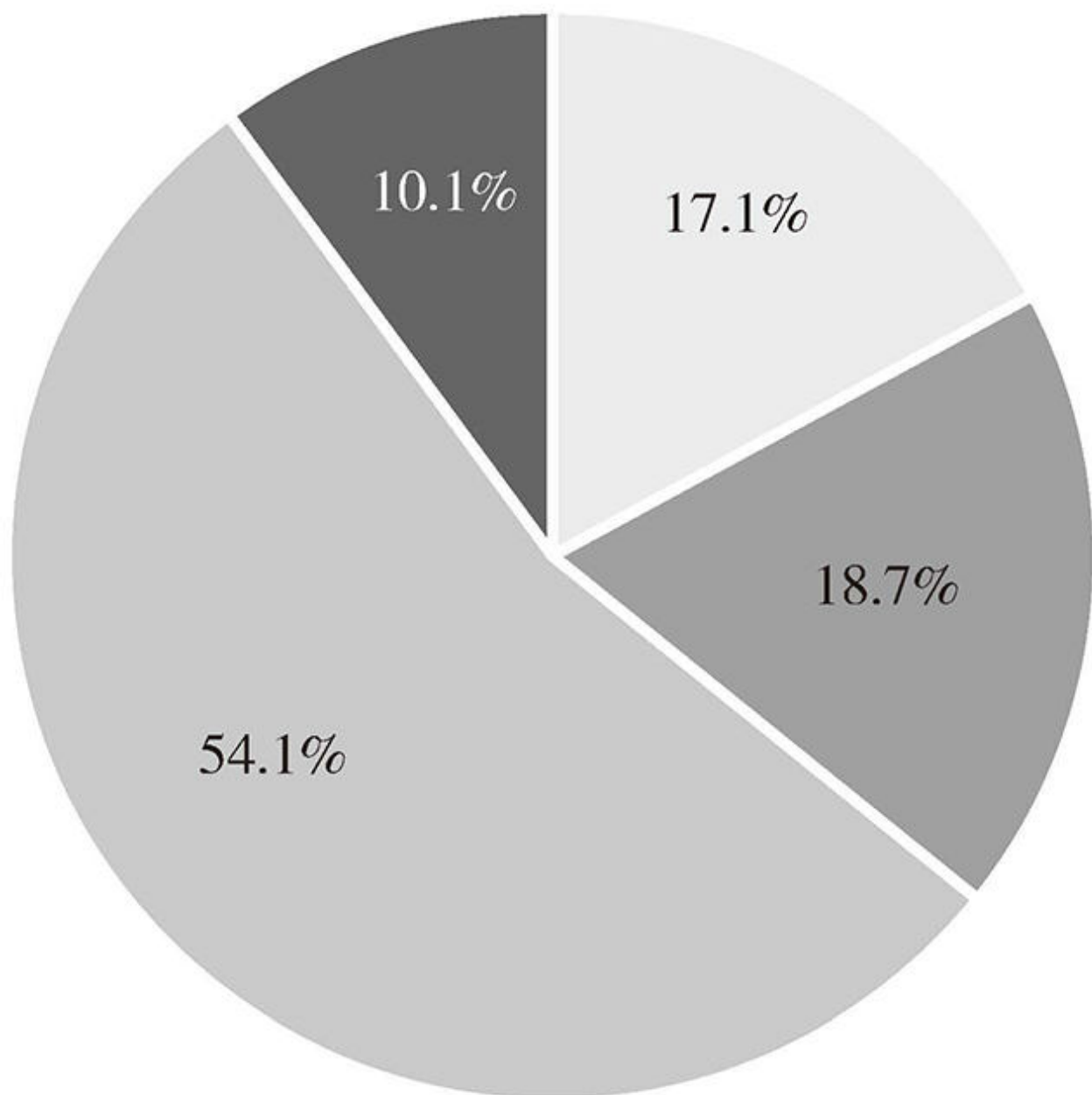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69346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693462)。

从整体分布来看，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务输出大省，同时在东部发达省份也有一定规模。具体来看，河南、四川、广西、湖南和广东等省份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较多。河南省的农村留守儿童占全国留守儿童的比例高达14.6%，超过600万人<sup>⑤</sup>，位居全国之首。此外，四川、广西、湖南和广东等省份的农村留守儿童占全国留守儿童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分别为8.5%、7.6%、7.1%和6.7%<sup>⑥</sup>，这五个省份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合计占全国留守儿童数量的44.5%。此外，安徽、贵州和江西等省份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也较为庞大，均超过200万人。

### （三）年龄和性别结构

从年龄结构来看，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分布特征（见图1.2）。数据显示，0—2岁的婴幼儿群体在农村留守儿童中所占比例为17.1%（714万人）。3—5岁学前教育阶段儿童占18.7%（780万人），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占比最高，达到54.1%（2262万人），15—17岁高中阶段儿童占10.1%（421万人）。在全体农村留守儿童中，0—2岁婴幼儿的占比不高，但该年龄段农村留守儿童占同年龄段农村儿童的比例高达46.6%，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反映出低龄儿童面临较高的留守风险。

从性别结构来看，农村留守儿童中男童为2216万人（53.1%），女童为1961万人（46.9%），性别比为113.0，略低于全部农村儿童的性别比（114.3），这显示出男女童中留守比例差异不大（吕利丹等，2024）。



■ 0—2 岁 ■ 3—5 岁 ■ 6—14 岁 ■ 15—17 岁

图1.2 农村留守儿童年龄结构

#### 四 留守儿童的政策保护

留守儿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其规模庞大、问题复杂且影响深远，亟须政府构建系统性、长效化的治理机制。在这一治理体系中，政策保护发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的关键作用。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不仅能够为留守儿童权益保

障提供制度支撑，更能通过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关爱服务体系。这种制度化的保障措施，是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具体政策演进如图1.3所示。

### （一）留守儿童政策的建立阶段（2004—2009年）

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中国正式迈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凸显，教育领域开始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留守儿童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国家政策和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王玉香、吴立忠，2016）。

2004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举办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研讨会，标志着留守儿童问题正式被纳入政府的工作议程。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要求输出地政府解决好农民工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同年5月，《教育部关于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发布，提出了建立寄宿制学校，完善教育和监护体系。同年7月，《全国妇联关于大力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的意见》出台，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这一阶段，留守儿童问题正式进入国家政策的关注范围，政策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善。在少年儿童相关保护政策中，特别强调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有了显著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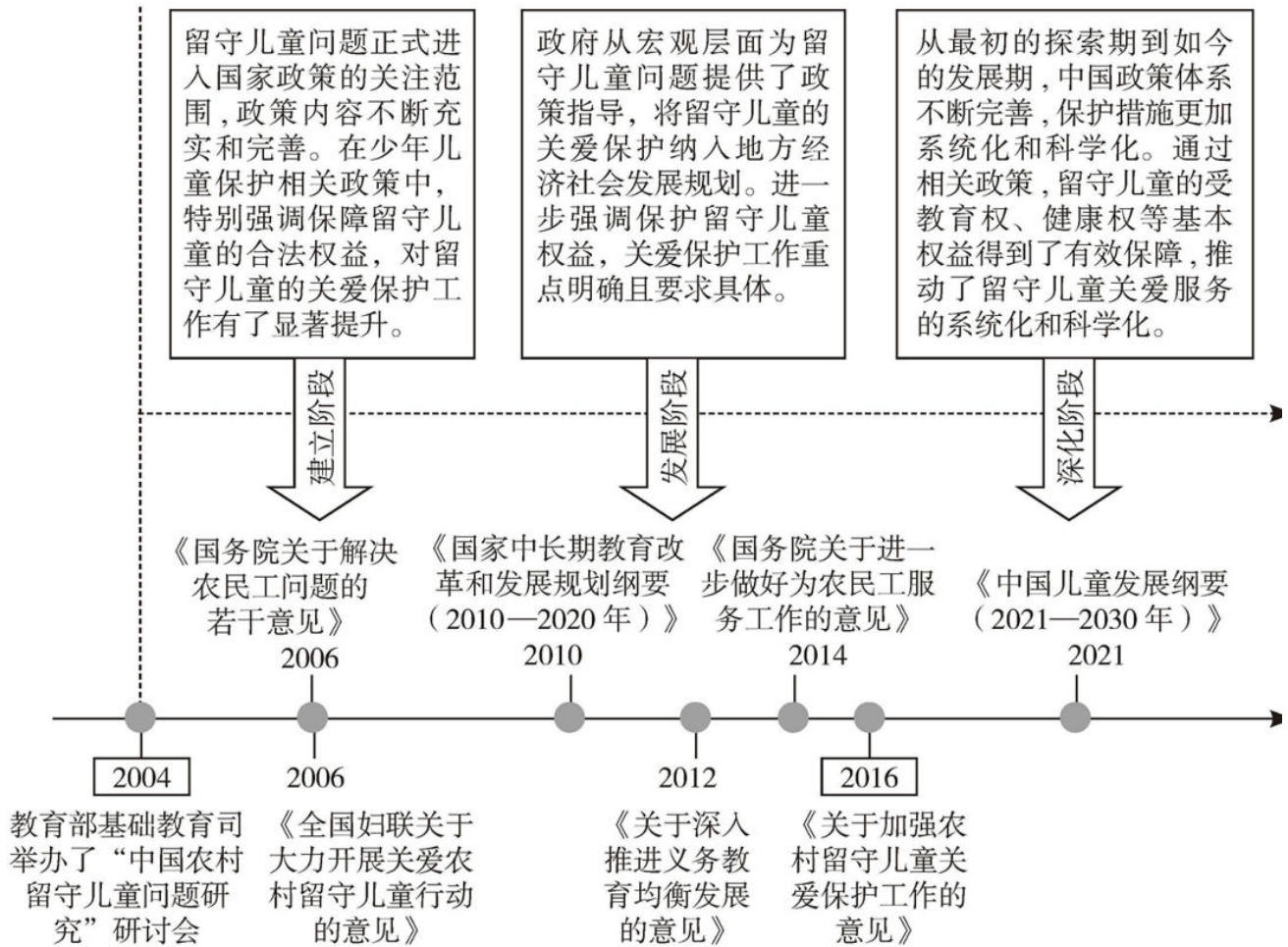


图1.3 留守儿童政策演进时间轴

## （二）留守儿童政策的发展阶段（2010—2015年）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不断增多。2010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达到6102.55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2010年教师节前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省张北县考察期间指出，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服务工作的力度。

2010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以确保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得到必要的关注和支持。2012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的内容。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出台，再次强调要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实施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等。

这一时期，政府从宏观层面为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政策指导，将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保护留守儿童权益，关爱保护工作重点

越发明确，要求更加具体。

### （三）留守儿童政策的深化阶段（2016年至今）

2016年至今，留守儿童政策的制定背景主要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加速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儿童数量增加，其教育、心理和监护问题日益凸显。国务院于2016年2月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系统性地回应了留守儿童问题，此后相关政策不断完善。

2016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出台，将留守儿童纳入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并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制，确保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教育和心理健康需求得到满足。2021年9月，国务院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把留守儿童作为专门对象加以论述，强调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包括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提高监护能力；强化县、乡级政府属地责任，落实关爱帮扶政策；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情感、行为和安全自护指导服务；倡导企业为务工人员与留守子女沟通提供支持；落实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政策，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等多项举措。

从最初的探索期到如今的发展期，中国留守儿童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保护措施更加科学。通过相关政策，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健康权等基本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推动了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系统化。但是留守儿童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性，仍需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政策执行力度，确保留守儿童得到更好的关爱和服务。

## 第二节 撤点并校与儿童寄宿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许多务工人员无法将子女带入城市就学，这些留守儿童通常由祖父母抚养，在乡村空心化和家庭监护缺失的双重困境中成长。与此同时，为优化乡村教育资源配置，2001年开始实施的撤点并校政策对乡村教育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村级小学和教学点被撤并，儿童就学地点从村内延伸至数千米外的乡镇中心学校。这一变化使得留守儿童的教育困境进一步加剧——年迈的祖父母难以承担每日长途接送，而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的监护缺位又使走读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寄宿制学校逐渐成为应对这一双重困境的制度化解方案：既通过集中办学保障教育供给，又通过提供住宿填补家庭监护空缺，从而为留守儿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教育机会。

### 一 撤点并校与农村寄宿儿童的源起

## （一）撤点并校政策的背景与实施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这一人口迁移现象对农村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农村地区的生源逐渐减少，许多偏远地区的小规模学校因学生人数不足及教学资源匮乏而面临生存困境。为应对这些挑战，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撤点并校政策。该政策旨在通过合并小规模学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学质量，从而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

根据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到2010年，全国农村学校数量从60多万所减少到不足30万所，这一变化反映了该政策的广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强调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区域公平性，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应缩小城乡和区域间的差距。然而，撤点并校政策在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加剧带来的问题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在一些偏远地区，学校合并后，学生上学的距离明显增加，交通成本和安全隐患成为家庭的新负担。

## （二）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兴起

数据源自教育部在2001年和2020年公开发布的基础教育统计文件。

从2001年至2020年，撤点并校政策实施20年来，全国乡村小学规模学校从491273所减少到162601所，缩减近三分之二。<sup>①</sup>如此一来，大批乡村学生不能在本村内就近上学。根据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在11个省市的调查显示，学校布局调整前后农村学生通勤距离从1.6千米延长至4.0千米（雷万鹏、徐璐，2011）。较长的通勤时间加之不发达的乡村交通，给乡村学生上下学带来了极大不便。

《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9年7月24日，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907/t20190724\\_392041.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907/t20190724_392041.html)。

在此背景下，农村中小学在布局优化过程中引入了寄宿制。截至2017年，中国农村小学寄宿生规模达930万人，占全国小学寄宿生总量的87.2%（王春超、孙曙涛，2023）。政府大力推动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主要目标是减少因上学距离过远而导致的辍学，以及为偏远地区学生提供更加公平、高质量的教育。目前，寄宿制教育已成为中国农村教育的重要办学模式，在农村地区得到广泛推广，寄宿生数量持续增加。据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农村寄宿生人数已超过1000万人<sup>②</sup>，寄宿制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住宿和基本生活保障，解决了家庭在交通和住宿上的后顾之忧。

## 二 围绕农村寄宿儿童教育的政策爬梳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教育资源的集中配置，农村地区的教育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寄宿制学校的普及意味着这些孩子需要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这不仅对他们的教育质量和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也对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保障他们在教育、心理和社会适应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政策文件及相关文本作为政府行为的反映，成为理解和分析政策意图及实施过程的重要依据（李钢，2007）。因此，全面梳理和分析现有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文本，探讨其实际效果和存在问题，已成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教育领域的关键实践。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而寄宿制模式正是破解偏远地区儿童就学难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更通过构建现代知识体系与乡土文化传承相融合的培养机制，为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注入可持续动力。

### （一）数据基础

本部分以国务院及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农村寄宿制儿童教育的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为确保数据的权威性，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政府网。具体检索步骤如下：首先，以“农村寄宿”“寄宿”为关键词进行信息搜索；其次，采用全局、模糊搜索，确保数据的全面性；最后，删除各类失效文件数据。基于上述步骤与原则，共筛选出2001—2023年相关政策文本91份。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以2001年作为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的分析起点，是基于以下考虑：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改革（简称撤点并校），这一改革标志着农村寄宿制儿童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开端。自此，相关政策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

### （二）分析方法

对农村寄宿儿童教育相关政策文本分析主要采用共词分析法。首先，运用内容分析软件ROST CM6对政策文本进行高频词提取，并结合政策文件内容筛选出符合该政策文本的主题词。其次，导入筛选后的政策文本进行词频分析，生成高频词共现矩阵。基于上述可视化分析结果，系统梳理各阶段政策文本的总体特征，从而直观呈现中央政府在农村寄宿制儿童教育政策上的导向及其演变过程。

### （三）分析结果

从政策文本的颁布时间和数量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可以分为摸索（2001—2009年）、建立（2010—2015年）、健全（2016—2020年）和完

善（2021年至今）四个阶段（具体政策文本见附录附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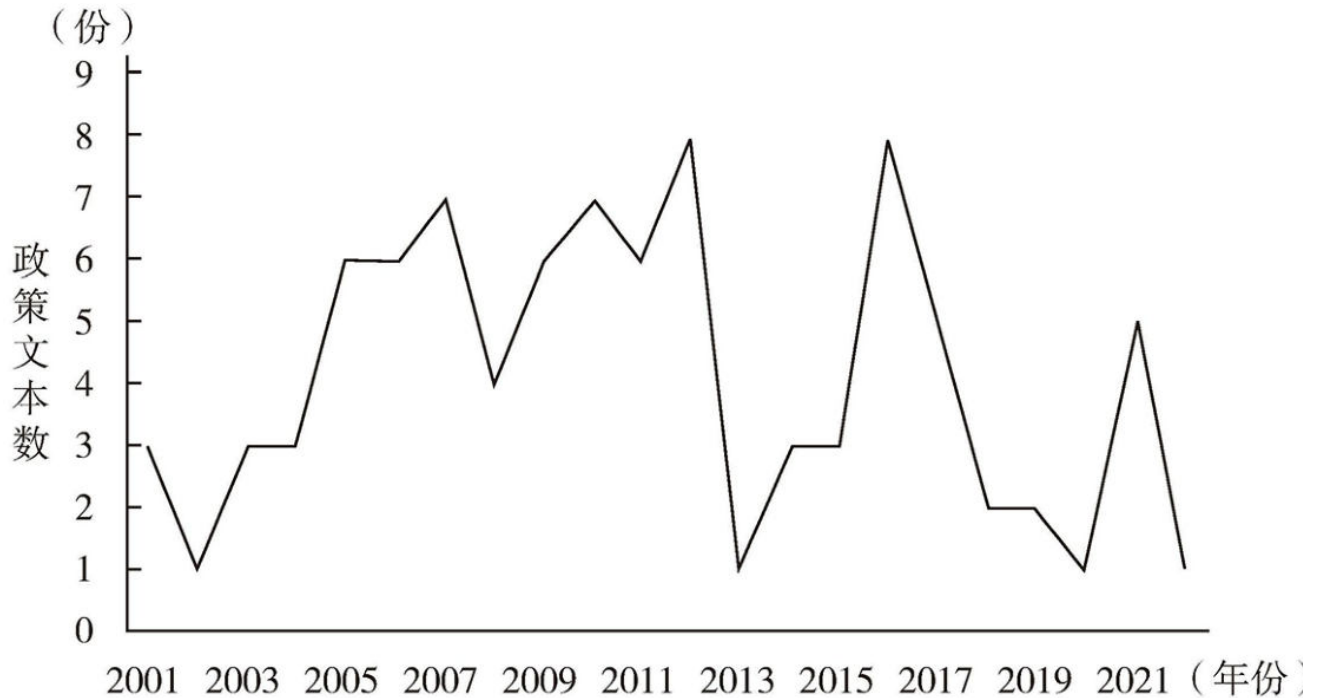


图1.4 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的年度变化

### 1. 摸索阶段（2001—2009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03年9月17日，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440.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440.htm)。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城乡教育差距逐步扩大，特别是在偏远农村地区，学生面临着学校距离远、交通不便等困难，部分学生还因此被迫辍学。为解决这一问题，寄宿制学校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被提出并逐步试验。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强调要加强中小学校舍和初中寄宿制学校建设，扩大初中学校招生规模。

①当时的政策主要集中于初步探索和试点实践，地方政府在条件较为困难的地区尝试建设简易寄宿设施，通过集中教育资源来提高教学效率。例如，一些地方学校将临时宿舍安排在教室或空置房屋中，虽然设施简陋，但为学生上学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中央开始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将寄宿制学校建设列入议事日程。尽管这一时期的政策尚处于萌芽状态，由于基础设施薄弱、教师数量不足等问题，寄宿教育尚未形成规模，但它为后续寄宿制学校的制度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 2. 建立阶段（2010—2015年）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3年12月31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1312/t20131231\\_161635.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1312/t20131231_161635.html)。

2010—2015年，政策进入了快速发展期，逐步建立起一个围绕农村寄宿儿童教育的政策体系。随着农村空心化的加剧，撤点并校成为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重要策略。但学校布局的集中化使更多学生面临上学路途过远等问题，促使寄宿制学校逐渐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寄宿制学校的建设目标和实施方向。<sup>④</sup>在基础设施方面，政策要求新建或改建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改善学生的住宿和用餐条件；在财政支持方面，国家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确保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在这一阶段，寄宿制学校逐渐从基础建设向综合管理过渡。许多学校开始配备生活辅导员和心理健康教师，努力为寄宿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关怀服务。同时，一些地区探索通过远程教育设备，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偏远学校，为提升教育质量创造条件。尽管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诸多挑战。部分学校因生源增加而面临床位不足的问题，而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限制了政策的实际效果。一方面，师资力量的差距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城市学校通常能够吸引更多高素质教师，而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困窘，难以吸引和留住优质师资。这种差距直接影响了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教育设施的不平等也加剧了城乡教育差距。城市学校配备了更先进的教学设备和更完善的教育基础设施，而许多农村学校甚至无法满足基本教学条件。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使得即便在撤点并校政策实施后，合并后的学校仍然难以赶上城市学校的发展水平。

## 3. 健全阶段（2016—2020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8年5月2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02/content\\_5287465.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02/content_5287465.htm)。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日益临近，教育公平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议题。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进入了健全阶段，政府开始从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师资培训等多个方面着手，推动寄宿制学校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首先，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在乡镇集中建设寄宿制学校，同时在偏远地区保留必要的村级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确保学生能够就近入学。<sup>⑤</sup>这一措施避免了因撤点并校过度集中带来的

教育资源失衡，也保障了偏远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权。其次，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对寄宿制学校的宿舍、食堂、浴室、供暖系统等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力求为学生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起系统的生活补助机制，明确补助标准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此外，政府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引入现代远程教育设备，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到更多的农村学校。大力推进师资力量建设成为政策重点，通过定向师范生培养、教师职称评定向农村学校倾斜等措施，吸引并留下更多农村优秀教师。同时，开展教师定期培训，提升教学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这一阶段的政策实施效果明显，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基础设施条件达到了较高水平，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得到了全面改善。然而，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一些地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资金落实不到位、管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 4. 完善阶段（2021年至今）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进入系统性完善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从“硬件均衡”转向“质量提升”，旨在弥合城乡教育深层差距，并满足农村儿童发展的多维需求。国家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将寄宿制学校定位为“乡村教育振兴枢纽”。通过《“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等政策，强化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分层分类支持，推动“一人一策”成长档案全覆盖。探索“县域教育共同体”模式，统筹乡镇寄宿学校与村级教学点的资源共享，形成“中心校辐射、多点联动”的服务网络。同时突破单一校内管理模式，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推进“周末亲情课堂”“线上家庭教育指导”等创新机制，弥补寄宿生亲情陪伴缺失。将劳动教育、乡土文化课程纳入寄宿学校必修体系，如开设现代农业实践基地、非遗传承工作坊，使学校教育 with 乡村产业和文化振兴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强调，各省（区、市）要适应城镇化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制定优化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指导意见，稳中有进地发展农村寄宿儿童教育。

回顾中国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从探索到建立，再到健全和完善的渐进式发展路径。从表1.2的高频主题词来看，政策的关注点从扩大规模到加大资金投入与教师编制的增加，再到教育信息化配套，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关注点。这一过程中，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针对性和科学性日益增强。农村寄宿制学校不仅在改善学生就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促进教育公平和推动乡村振兴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表1.2 分阶段农村寄宿儿童教育政策高频主题词

阶段	主题词（频次）
2001—2009年	规模（37）、补助（27）、贫困（25）、学杂费（21）
2010—2015年	专项资金（52）、教师编制（36）、教育扶贫（27）、撤点并校（20）
2016—2020年	信息化（59）、培训（39）、升级改造（8）

注：2021年至今政策文本相对较少，无法提取高频主题词。

### 三 农村寄宿制是基础教育均等化的有效途径吗？

#### （一）农村寄宿制的成效

近年来，寄宿制教育在中国偏远地区得到广泛推广，成为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集中教育资源和提供住宿保障，这一模式有效缓解了因地理阻隔、经济差异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在中央政策引导和地方政府的协同推进下，寄宿制学校已成为解决偏远地区学生就学难题的核心举措，尤其为贫困地区和交通不便区域的适龄儿童提供了稳定的教育支持，其积极作用日益凸显。

#### 1. 有效解决家校往返难题，保障就学权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8年5月2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02/content\\_5287465.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5/02/content_5287465.htm)。

寄宿制教育最直接的成效在于化解了偏远地区学生的通学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要保障适龄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农村学生往往因地理条件限制面临就学困难。部分学生需长途跋涉上学，恶劣天气更会加剧通学风险，这不仅增加辍学可能性，还影响学业表现和身心健康。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寄宿制学校通过提供安全住宿，显著减轻学生通勤负担，使其能专注学业。这种模式通过缩短就学物理距离，为偏远地区学生创造了平等的教育条件，切实缩小了因地域差异导致的教育差距。

#### 2.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教育公平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23年6月13日，

[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546/202306/content\\_6888957.html](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546/202306/content_6888957.html)。

寄宿制学校通过资源整合显著提升了教育供给效能。根据《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寄宿制模式能集中调配城乡教育资源，是缩小教育差距的重要抓手。<sup>①</sup>在实践层面，寄宿制学校不仅解决了学生住宿需求，更通过集约化办学实现了三大优化：一是整合师资力量，提升教师使用效率；二是共享教学设施，避免重复建设；三是依托远程教育等技术手段，使农村学生能接触城市优质课程和教学方法。这种资源集聚效应，既缓解了偏远地区教育资源分散的困境，又为农村学生创造了与城市同质化的学习环境，有力推动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 （二）农村寄宿制的问题

尽管寄宿制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 1. 基础设施条件亟待改善

不同地区的寄宿制学校硬件设施差异较大。董世华在《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部分地区的寄宿制学校住宿条件较为简陋，宿舍通风不良、卫生设施不达标等问题较为突出（董世华，2015）。这些基础设施的不足不仅影响学生的日常生活质量，还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学习状态产生负向影响。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床位不足、生活设施简陋等问题更为严重，如何为学生创造安全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 2. 师资队伍建设面临困境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20年8月28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3735/202009/t20200903\\_484941.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3735/202009/t20200903_484941.html)。

教师资源短缺是寄宿制教育发展的关键瓶颈。虽然《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已出台多项支持政策，但由于偏远地区经济条件限制，教师“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依然突出。<sup>②</sup>这种师资不足的状况直接制约了寄宿制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影响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稳定教师队伍、提升教师素质，是当前寄宿制教育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

### 3. 教育经费配置效率有待提升

教育经费的合理配置直接影响寄宿制学校的教学质量。尽管中国教育经费配置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但教育经费配置存在区域差异和不同教育层次的差异。东中西部地区规模效率依次增高，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效率依次降低（孙俊洁，2023）。如何确保教育经费的合理分配和高效使用，直接关系到寄宿制学校的教学环境改善和教育质量提升。特别是在当前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优化经费配置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虽然寄宿制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成效显著，但基础设施不足、师资短缺和经费配置等问题仍制约着其发展成效。要充分发挥寄宿制教育的优势，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协同努力，通过改善硬件条件、优化师资配置和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等系统性措施，切实提升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教育质量，为偏远地区学生创造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环境。

### 第三节 两类儿童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一 何以普遍？

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作为儿童中的特殊群体，其发展轨迹既遵循儿童成长的普遍规律，又因父母缺位和寄宿环境的双重作用，而面临独特挑战并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从普遍性来看，两类儿童的发展同样受家庭、学校和社会三重环境的影响，其身心发展、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均符合儿童发展的基本框架。

在身心发展方面，两类儿童与普通儿童一样，经历着从幼年到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和心理成熟过程。他们的身体发育依赖于营养摄入和健康管理，而心理发展则受到情感支持和社会互动的影响。尽管父母缺位可能削弱了部分家庭功能，但学校作为重要的社会化场所，依然为两类儿童提供了基本的教育资源和社交机会。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对所有儿童一视同仁，确保了两类儿童在认知能力发展上与其他儿童保持同步。

在非认知能力培养上，两类儿童同样需要通过社会互动和实践锻炼来培养责任感、合作精神和情绪管理能力。同伴关系、师生互动以及课外活动是塑造这些能力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虽然可能因家庭支持的不足而在自尊、坚毅和学习动机等方面面临更多困难，但其内在发展需求与普通儿童并无本质差异。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为儿童提供了更多同伴交往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其社交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

此外，两类儿童的发展同样受到宏观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教育均等化政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均为所有农村儿童（包括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成长创造了更为公平的外部条件。这些普遍性特征表明，

尽管两类儿童面临特殊挑战，但其发展仍遵循儿童成长的基本规律，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支持。

## 二 何以特殊？

尽管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发展具有普遍性，但其特殊性更为突出，这也是本书以“特殊的童年”为核心展开研究的原因。两类儿童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一）家庭功能的弱化与替代机制的不足

父母缺位是两类儿童最显著的特殊性。对留守儿童而言，亲子分离导致情感支持、行为监督和学业指导等家庭功能严重弱化。隔代监护或亲戚监护往往难以弥补父母角色的缺失，尤其是在儿童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方面。对寄宿儿童而言，虽然通过学校寄宿解决了监护问题，但家庭情感的缺失依然存在。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无法完全替代家庭的情感纽带，儿童可能长期处于“情感饥饿”状态，表现为孤独感、焦虑或自卑。这种家庭功能的弱化是两类儿童发展特殊性的根源。

### （二）成长环境的双重挑战

留守儿童面临“家庭空心化”与“乡村空心化”的双重困境。父母外出务工不仅减少了家庭支持，还可能因乡村资源匮乏而加剧儿童的发展劣势。例如，乡村教育资源的不足可能进一步拉大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的教育差距。寄宿儿童需适应“家庭—学校”场域的突然转换，而低龄寄宿儿童尤其面临生活自理能力不足、情感依赖难以满足等现实问题。寄宿学校的标准化管理可能忽视个体差异，导致部分儿童在集体环境中感到压抑或边缘化。

### （三）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独特路径

两类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路径与普通儿童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可能因缺乏父母引导而在情绪稳定性、尽责性等方面表现较弱，但也可能因早期独立而表现出更强的抗逆能力。寄宿儿童在集体生活中更早接触社会化规则，其合作意识与纪律性可能更强，但也可能因竞争或同伴压力而出现焦虑甚至抑郁。这些差异表明，两类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并非简单的“劣势”，而是需要针对性支持的独特路径。

### （四）长期影响的累积效应

从生命历程视角来看，两类儿童的特殊性还体现在童年经历对成年后的长期影响上。父母缺位可能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或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中断，进而影响其成年后的就业质量与幸福感。例如，留守儿童可能因早期情感缺失而在亲密关系中表现疏离，寄宿儿童则可能因集体生活的纪律性而更适应结构化的工作环境。这些长期效应凸显了童年特殊经历的深远影响。

两类儿童的特殊性并非静态标签，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其特殊性既源于外部环境的限制，也源于个体在与环境互动中的适应性调整。理解这种特殊性，有助于跳出“问题化”叙事，转而关注如何通过多元支持网络为两类儿童创造更有利的成长条件。这也契合了本书的主旨——在承认特殊性的基础上，探索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发展的有效路径。

## 第二部分

# 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

## 第二章 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

### 第一节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人力资本差异

赫克曼（Heckman）曾说：“人生早期的人力资本积累至关重要。”（赫克曼、罗斯高，2019）诚然，童年时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投资收益会随着个体的成长而不断累积和放大。然而，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童年时期所面临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发展轨迹。在非留守儿童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温暖的阳光，时刻照耀着他们成长的每一步。从牙牙学语时的耐心教导，到学习新知识时的悉心辅导，父母的参与为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对留守儿童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远赴他乡，他们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他们早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如同在风雨中摇曳的幼苗，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 一 人力资本的理论基础

简单来说，人力资本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或能力，包括他的知识、技能、健康、经验、创造力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人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和贡献。比如，一个医生的人力资本包括他的医学知识、临床经验、沟通能力等；一个艺术家的人力资本则包括他的创造力、审美能力和艺术技巧等。人力资本理论最初是由西奥多·舒尔茨（Schultz, 1961）和加里·贝克尔（Becker, 1962）提出，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个体通过教育、健康、技能和社会能力等积累的综合素质。后来，赫克曼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扩展。赫克曼（Heckman et al., 2006）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早期投资的回报率远高于后期补救。在他提出的赫克曼曲线（见图2.1）中，对弱势儿童的早期教育投资具有最高的社会回报率。此外，他还指出，非认知能力（如社交技能、情绪管理、自控力等）与认知能力（如语言能力、数学能力等）一样，对个体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人力资本差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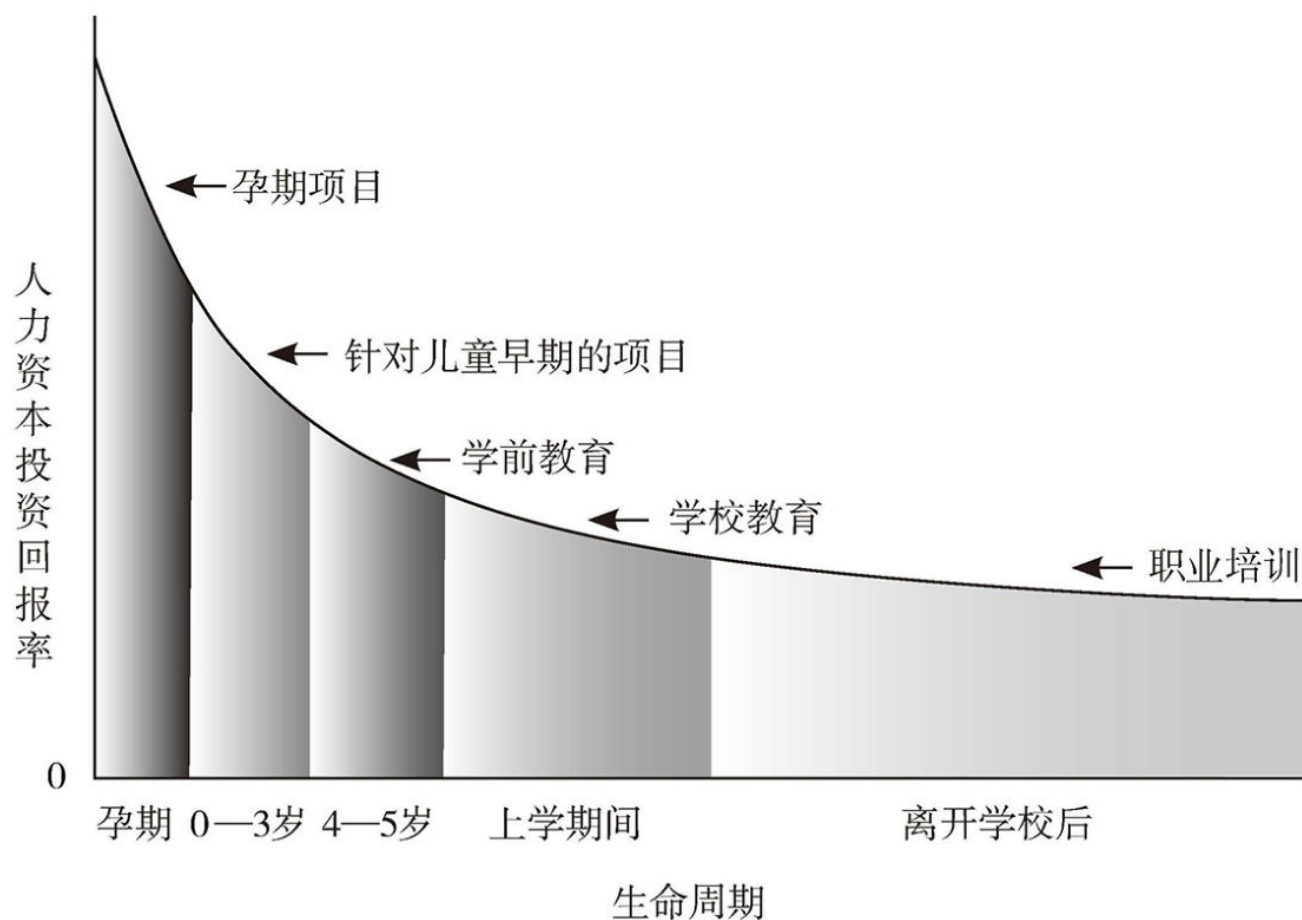


图2.1 赫克曼曲线

## 二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人力资本分析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健康、教育和非认知能力等多个维度。

### （一）健康差异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健康差异是人力资本研究的重要维度，而健康不仅涵盖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现有研究发现，童年时期经历过亲子分离的人，成年后在身体和心理健康上均处于劣势（刘浩，2023）。就身体层面而言，部分研究指出，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身体健康有负向影响（吴培材，2020）。一方面，抚养者需要承担外出父母的农业或家庭生产，照顾子女的时间大幅减少；另一方面，隔代抚养者文化程度和卫生健康意识较差，增加了留守儿童营养不良的概率。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对儿童身心健康的积极影响（孙文凯、王乙杰，2016）。家庭收入的增加可以改善饮食行为和营养状况，从而对留守儿童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主要缘于长期亲子分离导致的情感缺失和家庭教育缺位。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内向孤僻、自卑焦虑等心理特征，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刘玄彦等，2025）。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情绪问题上，更表现为突出的行为问题：一方面，他们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渠道，负面情绪易累积为抑郁倾向；另一方面，又往往通过攻击行为、网络成瘾等不良方式宣泄情绪（刘志军，2025）。这种心理状态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恶性循环，构成了留守儿童成长中的突出困境。

## （二）教育差异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教育差异可以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短期差异以学业表现为代表，而长期差异则体现为受教育年限。无论是从短期学业表现还是长期受教育年限来看，留守儿童的情况普遍低于非留守儿童（赵玉菡等，2017；姚嘉等，2016）。基于CLDS 2018数据，研究显示，有留守经历者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概率会下降5%，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概率会降低2.7%（谢勇、赵晓倩，2022）。究其原因，父母陪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在教育资源获取、学习支持以及情感陪伴等方面处于劣势。相比之下，非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完整，父母能够直接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为其提供更多的学习支持。

对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而言，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由（外）祖父母照料。但祖辈往往面临双重局限：一方面，其文化水平普遍有限，难以提供有效的学业辅导；另一方面，当祖辈健康状况不佳时，留守儿童反而需要承担照护责任，这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他们的学习时间，影响其受教育质量。现有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务工可以增加收入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从而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彭小辉等，2022）。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有助于改善留守儿童的教育条件，降低辍学率。然而，家庭教育功能的结构性缺失，最终仍会导致留守儿童在受教育年限和学业成就上处于相对劣势。

## （三）非认知能力差异

非认知能力是指个体在社会交往、情绪管理、自我控制、责任感、社交能力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与传统的认知能力（如学习成绩等）不同，但对个体的学业成就、职业发展和主观幸福感具有深远影响。近年来，非认知能力在教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被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表明，父母陪伴对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王春超、林俊杰，2021）。虽然父母的督导时间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有限，但对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明显，尤其有助于培养儿童的自律性和责任感。

在早期非认知能力的塑造阶段，由于缺少父母的日常陪伴和情感支持，留守儿童在情绪稳定性、社交能力和自律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劣势。他们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如焦虑、抑郁和孤独，其情绪稳定性低于非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能够从父母那里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安慰，从而表现出更强的情绪稳定性。在社交能力方面，非留守儿童在父母的陪伴下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家庭和社会活动，从而培养良好的社交能力；而留守儿童的社交范围相对狭窄，社交能力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且在同伴交往中可能面临更多挑战，如被同伴排斥或欺凌。此外，研究表明，班级内留守儿童比例的增加可能会对非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主要表现为社交能力和情绪稳定性下降（吴贾、吴莞生，2024）。自律和责任感的培养也因父母的监督而存在差异。非留守儿童在父母的引导下更容易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规范，而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直接监督，自律和责任感的培养相对不足。

## 第二节 留守儿童的身体与健康与心理健康

身心健康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基石，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不仅意味着没有疾病或虚弱，更是一种在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完满状态。这一理念提醒我们，对儿童健康的关注不能仅停留在身体层面，还必须重视其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在众多儿童群体中，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尤为突出。由于父母长期缺席，他们既缺乏情感支持和日常陪伴，又可能因监护不足而面临营养不良、疾病风险增加以及心理压力过大等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儿童的当前生活，更会对其未来的学习能力、社会适应力和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关注儿童身心健康不仅是对个体的关怀，更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投资。

### 一 留守儿童的身体与健康

#### （一）父母外出的双刃剑效应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父母进城务工，但因城市住房、教育等限制，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家乡由祖辈或亲戚照料。这种现象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父母缺席可能增加其健康风险，但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又可能带来积极影响。

##### 1. 负面效应：家庭照料缺失与健康隐患

父母外出所导致的家庭养育功能弱化，会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身体与健康。父母外出务工后，留守儿童多由年迈的祖辈照料。这些看护人往往缺乏科学的营养知识，日常饮食以简单饱腹为主，难以提供科学合理的饮食搭配和健康指导，这无疑会增加

留守儿童营养不良和患病的风险。现有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务工显著提高了留守儿童的患病概率与频率（赵晨晓、董志勇，2021）。与此同时，隔代抚养中常见的溺爱现象也比较普遍，由于看护人对儿童不良饮食习惯的约束力不足常引发留守儿童三餐不规律、挑食偏食等问题。研究表明，祖辈作为看护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溺爱会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非健康食物消费行为，从而对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刘贝贝等，2019）。

## 2. 正面效应：经济改善与健康投入增加

父母外出务工后，带来的最直观的益处就是可以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会对留守儿童的身体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可以直接增加家庭用于饮食方面的支出，弥补过去因经济困难导致的营养摄入水平不足的情况。父母可以通过汇款（如给留守儿童零花钱）等方式来增加子女的各项开支，留守儿童可以通过这些钱来解决温饱问题，同时提高了食品营养丰富度与多元化程度，从而有效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赵晨晓、董志勇，2021）。另一方面，更好的经济条件能改善居住环境，如完善卫生设施和修缮住房，降低疾病风险。此外，家庭更有能力为子女提供及时就医和医疗保障，确保健康需求得到满足。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家庭照料缺失可能增加健康风险；另一方面，经济改善又能提升健康保障水平。因此，在肯定务工增收价值的同时，必须重视留守儿童的健康问题。应着力减轻照料缺失的负向影响，充分发挥经济改善的积极作用，为留守儿童创造更有利的健康成长环境。

## （二）留守儿童的身体健评价

为了深入探析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本章基于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具体分析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通过问卷中“有哪些直系亲属目前不在家中与你同住？”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将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不在家的学生认定为留守儿童，而父母双方均在家中共同生活的学生则为非留守儿童。在评估儿童身体健康状况时，本章选择了身高、体重和体质指数（BMI）作为核心指标。身高作为长期生长发育的指标，能够反映儿童骨骼生长和长期营养状况的累积效应。体重则更直接地体现短期营养摄入和能量平衡状态，对急性营养变化较为敏感。BMI通过体重与身高的比值，有效综合了二者的关系，成为筛查超重、肥胖或营养不良的重要工具。这三项指标各具特点，能够从不同维度评估儿童健康状态。

表2.1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在身高、体重和BMI等关键健康指标上均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一结果表明，留守状态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产生负向影响。具体而言，非留守儿童的平均身高为162.212厘米，而留守儿童的平

均身高为160.519厘米，两组之间的均值差异为1.693厘米。t检验结果表明，这一差异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t=10.7$ ， $p<0.001$ ），表明非留守儿童的身高高于留守儿童。在体重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平均体重为100.582斤，而留守儿童的平均体重为96.971斤，均值差异为3.611斤。t检验结果同样显示这一差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t=8.75$ ， $p<0.001$ ），表明留守儿童可能存在营养摄入不足。在体质指数（BMI）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平均BMI为18.997，而留守儿童的平均BMI为18.689，均值差异为0.308。t检验结果显示这一差异显著（ $t=5.0$ ， $p<0.001$ ），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BMI都在合理范围（通常BMI在18.5—23.9之间为正常范围）。

表2.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对比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差值	标准误	t 值	p 值
身高	162.212	160.519	1.693	0.158	10.70	0.000
体重	100.582	96.971	3.611	0.413	8.75	0.000
BMI	18.997	18.689	0.308	0.061	5.00	0.000

注：其中非留守儿童样本为 13227 个，留守儿童样本为 3899 个。

## 二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如果我走了，就没有办法拥抱你；如果我不走，就没有办法养活你”这句话揭示了无数留守家庭的无奈与辛酸。在生活的重压下，许多农村父母被迫选择外出打工，大量儿童成为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后，家庭的物质生活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但留守儿童的精神需求却被漠视。但是再多的财富积累也无法替代亲子陪伴的情感价值，我们应当警惕将经济效益置于儿童发展需求之上的错误认知倾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就像隐藏在暗处的礁石，随时都可能使成长之舟倾覆。因此，在政策制定和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中，亟须建立经济支持与心理关怀的平衡机制，以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全面发展。

从“双减”政策实施到要求中小学按比例配置心理教师，这无疑都揭示出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严峻现实。在此背景下，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携手中国科学院于2021年3月开展了针对农村儿童心理健康的调查。调查涉及安徽、甘肃、四川等七省十六所小学，覆盖5—15岁的儿童（见图2.2），包括1172名男生和1277名女生。结果显示，农村儿童的总体抑郁检出率为25.2%，焦虑检出率为25.7%。其中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尤为严峻，其抑郁检出率高达28.5%，焦虑检出率为27.7%，均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背后，是家庭结构不完整和情感支持缺失。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并非短期困境，也可能对其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童年时期的留守经历不仅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造成长期的负向影响，包括降低心理韧性、增

加抑郁和焦虑的风险，甚至还可能会导致其成年后出现行为偏差和社会适应障碍，这些都会成为他们未来发展的“绊脚石”，影响其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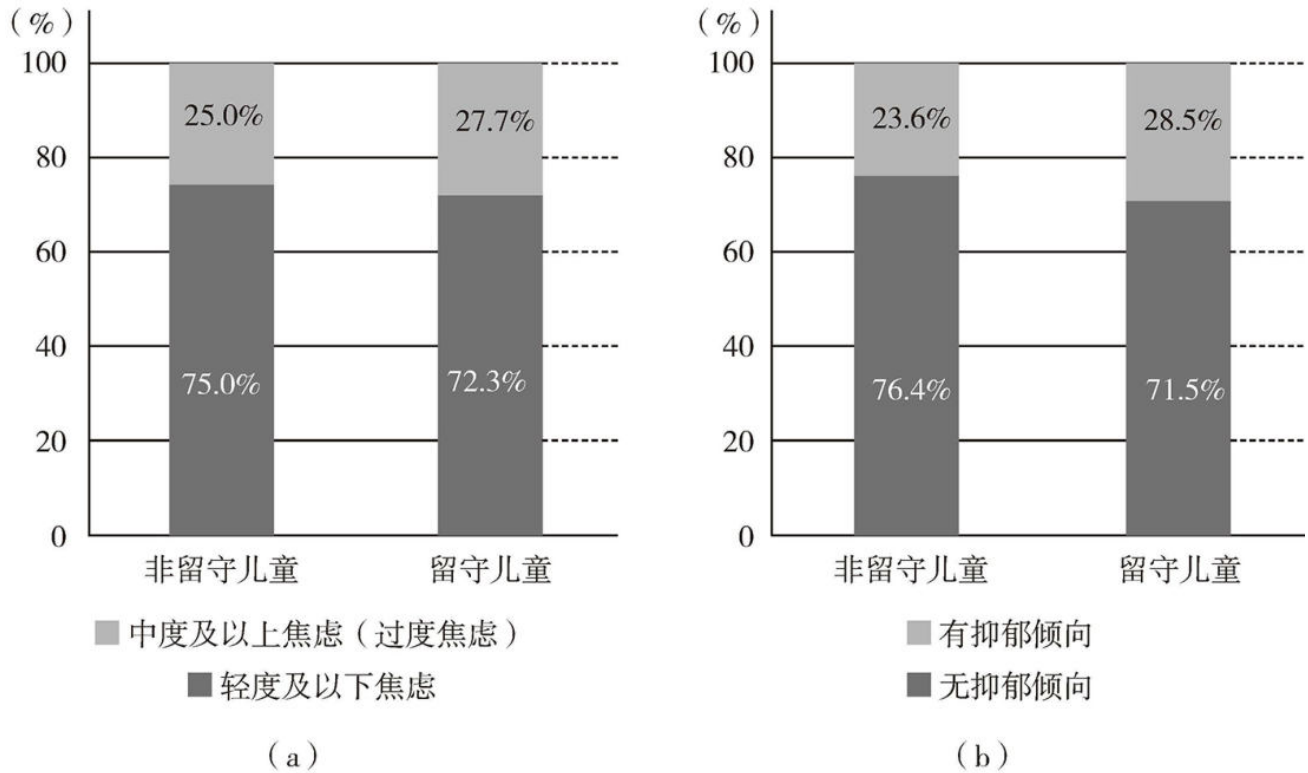


图 2.2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比较

资料来源：《全国首份〈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25.2%的乡村儿童存在抑郁风险》，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网站，2022年1月10日，<https://www.csaf.org.cn/content/1438>。

### 第三节 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教育期望分歧

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阶梯，是知识传承与个人成长的基石。对留守儿童而言，教育更是他们走出大山、摆脱贫困、融入现代社会的关键钥匙。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知识与技能成为衡量一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标准。接受良好教育的留守儿童，能够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更强的适应能力，从而在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发展空间上拥有更多机会。教育的目标是美好的，但是要达到教育目标却需要亲子的共同努力。

#### 一 “读书无用论” 还是 “再穷不能穷教育” ？

在探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便是“读书无用论”与“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碰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同两股力量，在许多家庭中展开

拉锯战，深刻影响着留守儿童的教育抉择与未来走向。

## （一）“读书无用论”的滋生土壤与影响

近年来，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中“读书无用论”思潮盛行。这一现象的形成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方面，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失衡是导致该观念蔓延的关键因素。留守儿童家庭普遍面临经济困境，父母外出务工所得收入有限，而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教育支出呈现刚性增长特征，包括学杂费、生活费等直接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在内的教育总成本已超出许多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农村教育回报周期较长，使得部分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产生怀疑，进而动摇其教育信念。另一方面，部分家长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他们目睹身边一些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凭借早年进入社会积累的人脉、资源等早早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便认为读书并非获取成功的唯一途径，不如让孩子早早辍学打工来得实在。这种观念无疑打击了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失去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许多留守儿童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早早地放弃学业、进入社会，从事一些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陷入贫困的代际传递困境。同时，这种观念也阻碍了农村地区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不利于乡村人才的培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 （二）“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价值坚守与意义

“读书改变命运”这一社会共识在留守家庭中催生出“教育优先”的资源配置逻辑，“再穷不能穷教育”，尽管面临经济压力，许多家庭仍将教育支出置于消费首位，甚至不惜压缩基本生活开支。这种选择源于家长通过务工经历形成的双重认知：既深刻理解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关键作用，又清醒认识到城乡差距下教育突破的现实必要性。教育投入对留守儿童产生了多维度的积极影响。首先，在心理层面，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有效缓解了亲子分离带来的情感缺失，使子女感受到家庭期望，从而增强自我认同感和抗逆力；其次，在学业发展方面，物质资源的倾斜配置强化了子女的学习动机，促使其珍惜教育机会并提升学业表现；最后，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来看，这种教育投入为留守儿童提供了突破结构性贫困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育先行策略既反映了底层家庭对结构性困境的积极应对，也凸显了当前社会流动通道的现实特征。

## 二 留守家庭内部的教育期望分歧

### （一）父母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分歧

教育期望是指对未来教育成就的希望和期待。教育期望主要涉及两个主体：期望发出者与被期望者，期望发出者与被期望者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当期望发出者与被

期望者为同一个体时，称为自我教育期望（见图2.3）。当期望发出者为父母而被期望者为其子女时，称为父母教育期望。教育期望长期以来被用于解释个体的学习行为和学业表现。具有较高教育期望的个体在学业上更有动力，也更有可能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在实际生活中，父母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并非总是相同，当父母的教育期望与子女的自我教育期望之间存在差异时即为家庭内部的教育分歧。然而这种教育分歧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总是消极的吗？答案并非如此。研究表明，与教育期望一致组相比，当实际的父母教育期望高于子女教育期望时，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好；反之，当实际的父母教育期望低于子女教育期望时，学生的成绩更差（李佳丽、胡咏梅，2021）。那么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教育期望分歧又会对其产生什么影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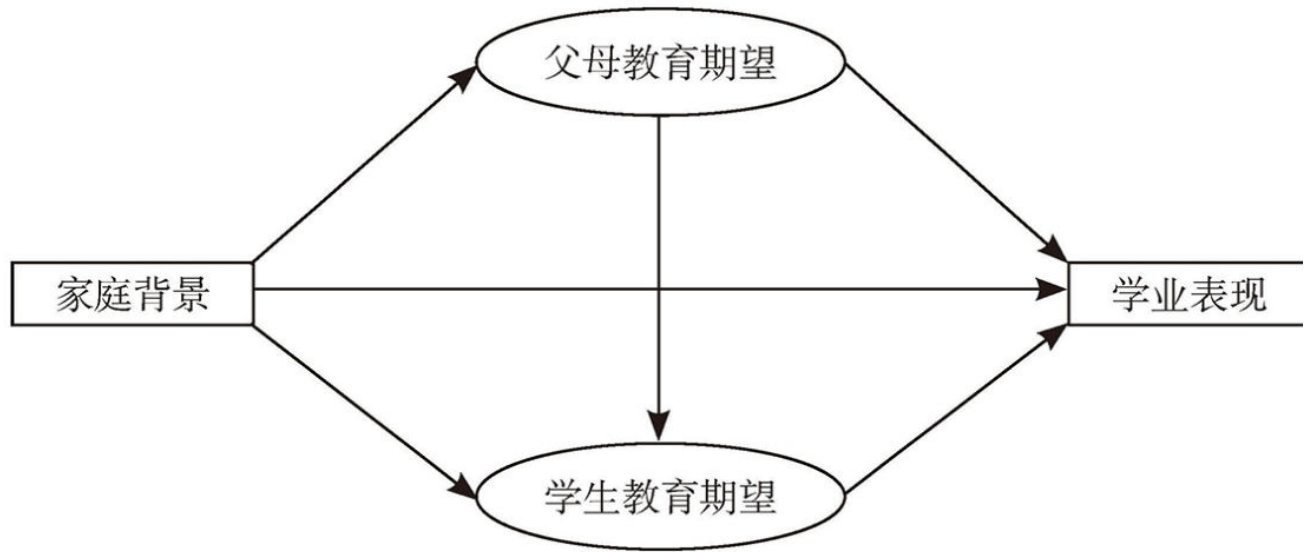


图2.3 教育期望作用机制

## （二）留守儿童教育期望分歧的特殊性

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与普通家庭存在明显差异。家庭内部教育期望的分歧可能对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节基于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描述留守儿童家庭内部教育期望分歧及其对应的学业成绩的表现。通过数据清理和变量处理，关键变量包括学业成绩综合表现和教育期望分歧，最终保留了3685个有效样本。

笔者通过计算父母教育期望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的差值来衡量家庭内部的教育期望的分歧程度。差值是由父母的教育期望值减去子女的教育期望值得到的。当差值为0时，定义为教育期望一致；当差值不等于0时，定义为教育期望分歧。更进一步，我们将教育期望分歧细分为三个类别：父高于子（差值大于2，表示父母期望显著高于子女期望）、低分歧（差值在-2到2之间，表示差异较小）、子高于父分歧（差值小于-2，表示子女期望显著高于父母期望）。

教育期望分歧的具体分布如图2.4所示，父高于子占比13.97%，低分歧占比79.56%，子高于父占比6.46%。结果显示，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的父母与孩子的教育期望较为接近，即低分歧占比最高，但仍有部分家庭存在显著的希望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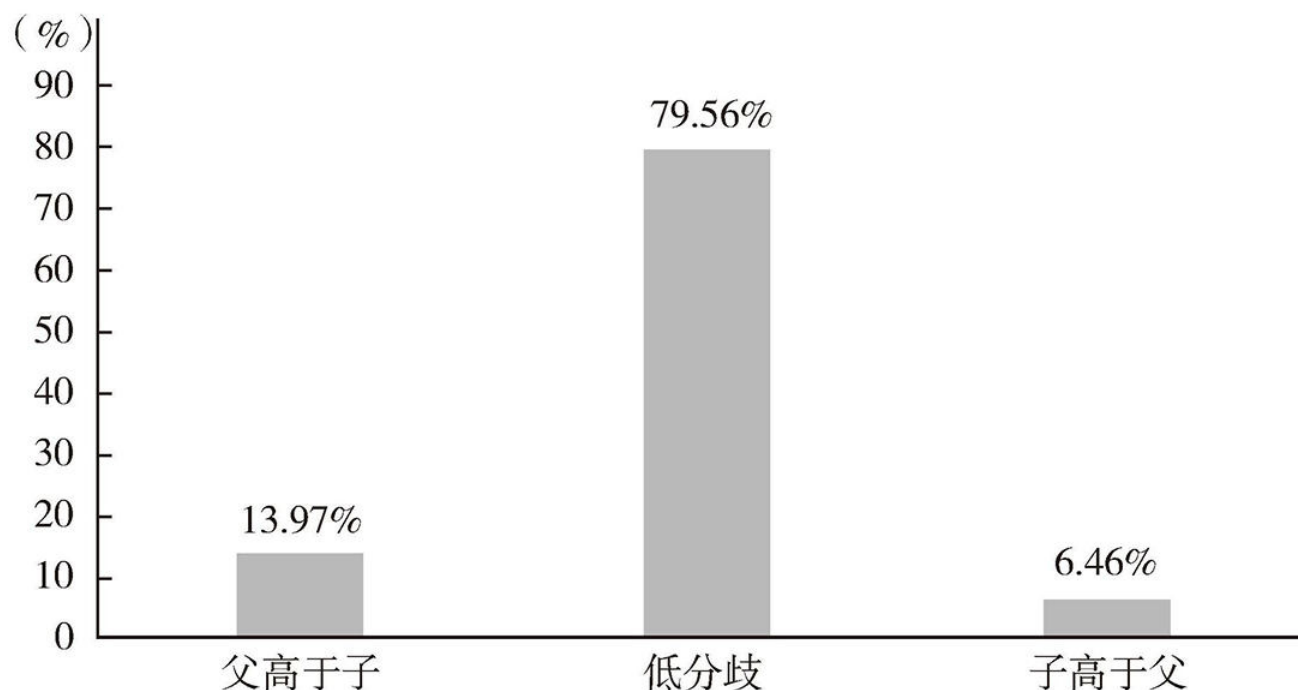


图2.4 留守儿童教育期望分歧的具体分布

为了探究教育期望分歧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笔者对不同教育期望组的学业成绩进行了分组描述，见表2.2。结果显示，教育期望一致组的平均学业成绩最高（70.70），低分歧组的平均学业成绩次之（69.78），而父高于子组和子高于父组的平均成绩相对较低（分别为66.10、66.73）。这表明在父母与孩子的教育期望较为一致时，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相对更好；而期望分歧较大时，无论是父母期望过高还是子女期望过高，孩子的学业成绩都受到一定的负向影响。这一研究发现揭示了家庭内部教育期望一致性在留守儿童学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表2.2 不同教育期望情况的学业成绩表现

变量	教育期望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学业成绩	期望一致	1674	70.70	8.28	20.27	89.08
	父高于子	281	66.10	9.29	39.94	89.10
	低分歧	1600	69.78	8.55	33.00	91.22
	子高于父	130	66.73	10.45	37.45	90.09

## 第四节 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发展

大五人格理论，作为现代心理学中极具影响力的性格模型，涵盖了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这五个关键维度。它如同一个密码本，能够帮助我们解锁留守儿童内心世界的复杂密码。在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中，家庭结构的特殊性、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以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都在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塑造。本节将深入探讨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发展情况，从留守儿童的生活背景出发，分析他们在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五个关键维度上的特点，并分析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大五人格上的差异。

### 一 何谓大五人格？

大五人格（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是心理学中用于描述人格特质的一种理论模型。它将人格归纳为五个主要的维度，每个维度都代表了一系列相关的人格特质。这五个维度分别是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见图 2.5）。

#### （一）开放性（Openness）

开放性反映了一个人对新事物、新体验和新思想的接受程度。高开放性的人通常好奇心强，喜欢探索未知，对艺术、文化和创造性活动感兴趣，更愿意接受新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低开放性的人则更倾向于传统的、熟悉的事物，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弱。

#### （二）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

尽责性是指一个人的自律性、组织性和可靠性。高尽责性的人通常目标导向性强，有条理，能够很好地管理时间和任务。他们认真负责，遵守规则，注重细节，通常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而低尽责性的人相对随意，缺乏计划性，容易拖延。

#### （三）外向性（Extraversion）

外向性是指一个人在社交场合中的活跃度和对社交的偏好。高外向性的人通常热情开朗，善于社交，喜欢与人互动，能够从社交中获得能量。他们在群体中表现自信，善于表达自己，喜欢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低外向性的人则更倾向于独处，从独处中获得能量，可能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比较安静。

#### （四）亲和性（Agreeableness）

亲和性反映了一个人的合作性、友善性和同情心。高亲和性的人通常善良、友好，愿意帮助他人，善于合作，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通常比较温和，不太容易与人发生冲突。而低亲和性的人可能更具竞争性，有时会显得比较强硬，甚至可能表现出攻击性。

### （五）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

情绪稳定性是指一个人情绪的的稳定程度，以及对负面情绪的敏感性。高情绪稳定性的人通常情绪平稳，能够较好地应对压力和挫折，比较乐观，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性。而低情绪稳定性的人则更容易感到焦虑、担忧或沮丧，情绪波动较大，对压力的耐受性较差。



图2.5 大五人格模型

## 二 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特征

为了深入探究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特征，笔者仍选取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以及留守儿童自身的特点，本节采用学生问卷中的以下问题来测量各人格维度，具体如表2.3所示。

表2.3 大五人格的测量方式

人格维度	测量问题	赋值方式
开放性	1. 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 2. 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	正向赋值 (1—4)
尽责性	1. 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我仍会尽量去上学 2. 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 3. 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	正向赋值 (1—4)
外向性	1. 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 2. 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	正向赋值 (1—4)
亲和性	1. 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 2. 我对学校的人感到亲近	正向赋值 (1—4)
情绪稳定性	1. 过去七天是否觉得沮丧 2. 过去七天是否觉得抑郁 3. 过去七天是否觉得不快乐 4. 过去七天是否觉得悲伤	反向赋值 (1—5)

为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大五人格特征上的差异，本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以“是否为留守儿童”作为分组变量，分别对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五个维度进行t检验，检验两组在各维度上的均值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t检验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大五人格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 $p < 0.01$ )，具体结果如表2.4所示。

表2.4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大五人格比较

人格维度	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	均值差异	t 值
开放性	3.260	3.201	0.059***	5.116
尽责性	3.323	3.286	0.037***	3.117
外向性	3.001	2.838	0.163***	11.822
亲和性	3.140	2.998	0.142***	10.705
情绪稳定性	3.865	3.721	0.144***	9.557

注：其中非留守儿童样本为 13583 个，留守儿童样本为 4038 个，\*\*\* $p<0.01$ 。

首先，留守儿童在开放性（均值差异=0.059）和尽责性（均值差异=0.037）上的得分均略低于非留守儿童，但差异相对较小。这表明留守儿童在知识接受能力、探索新事物的兴趣以及学习自主性方面略逊于非留守儿童。其次，在外向性（均值差异=0.163）、亲和性（均值差异=0.142）和情绪稳定性（均值差异=0.144）三个维度上，留守儿童的得分低于非留守儿童。这意味着留守儿童可能在社会交往、人际交流以及情绪管理方面面临更多挑战，表现出较低的外向性、亲和性以及情绪不稳定性。

## 第五节 留守儿童的自尊、坚毅与学习动机

### 一 自尊还是自卑？

#### （一）山间幼苗的“向阳”与“背阴”

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双相特征。部分个体展现出较强的心理韧性，能够积极适应环境挑战；而另一些个体则表现出明显的心理脆弱性。这种分化现象本质上是自尊与自卑心理机制动态博弈的结果。在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其自尊水平呈现“情境敏感性”特征——在获得正向反馈时，其自我效能感显著提升；而在遭遇挫折时，自卑倾向会削弱其心理韧性。这种“向阳”与“背阴”的心理状态，反映了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复杂性。他们既渴望被关注、被认可，又害怕被忽视、被嘲笑；既努力展现自己的独立和坚强，又在内心深处渴望父母的陪伴和呵护。他们的自尊与自卑，如同山间的幼苗，在阳光与风雨中摇摆，既需要外界的呵护，也需要自身的坚韧。

#### （二）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分析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SES）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莫里斯·罗森伯格（Morris 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的经典心理测量工具，用于量化评估个体的整体自尊水平。

为了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本节选取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年数据。参照罗森伯格自尊量表，选取了以下四个指标（见表2.5）来衡量学生的自尊水平。在样本处理过程中，依据问卷中“有哪些直系亲属目前不在家中与你同住？”这一问题的回答，将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不在家的学生界定为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在家中共同生活的学生界定为非留守儿童。最终共有9165个有效样本，其中留守儿童2124个，非留守儿童7041个。为消除量纲影响、提高数据可比性，本节采用Z-score方法对表2.5中四个指标的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每个指标的得分减去其均值后除以标准差。随后，将标准化后的得分加总，构建出一个综合的自尊水平变量，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其取值范围在-10.557到6.678之间。

表2.5 自尊水平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自尊水平	测量题项	变量赋值
对未来的信心	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信心？	1= 根本没有信心，2= 不太有信心，3= 比较有信心，4= 很有信心
外貌的自我评价	你觉得自己的长相怎么样？	1= 很丑，2= 比较丑，3= 一般，4= 比较美，5= 很美
应对压力的能力	即使情况很糟糕，我也能保持镇定。	1= 完全不同意，2= 不太同意，3= 比较同意，4= 完全同意
完成任务的自信心	对于需要完成的任务，我通常很有信心。	1= 完全不同意，2= 不太同意，3= 比较同意，4= 完全同意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非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平均值为0.126，显著高于留守儿童的-0.419。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t=8.131$ ， $p<0.01$ ）证实了这一差异的统计显著性，表明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低于非留守儿童。图2.6进一步揭示了两组在自尊水平上的分布特征及差异。两组样本的中位数均接近零，但留守儿童组的中位数更接近上四分位数（Q3），而非留守儿童组的中位数则更接近下四分位数（Q1）。这种分布特征显示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可能呈现左偏态，即大部分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集中在较高值；而非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分布则可能呈现右偏态，表明大多数非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集中在较低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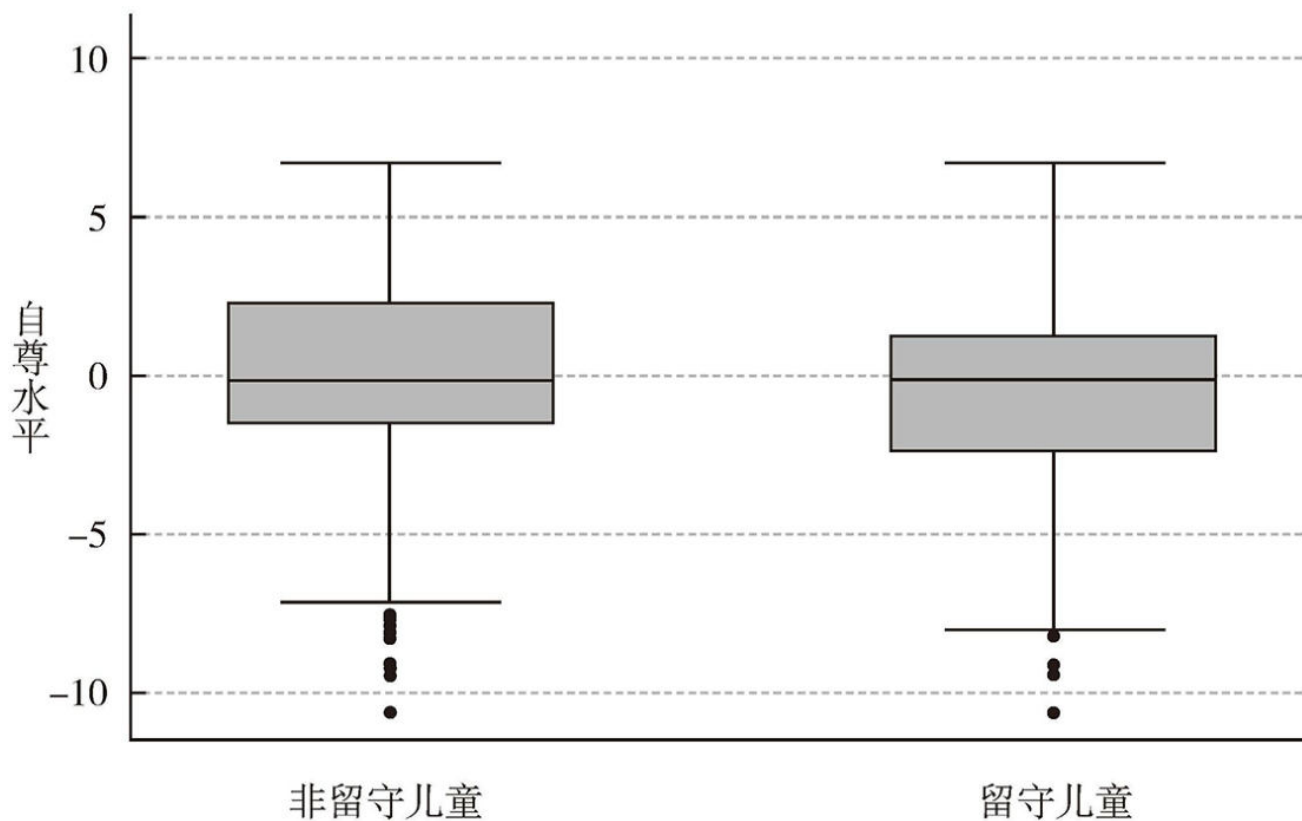


图2.6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分析

## 二 坚毅的背后是什么？

### （一）留守岁月里的“野蛮生长”

在成长道路上，不同的孩子有着不同的境遇。有些孩子在精心呵护的温室中茁壮成长，而另一些孩子则在风雨中“野蛮生长”。或许正是那段艰苦的留守岁月塑造了一群留守儿童的坚毅品质，但在缺乏父母陪伴与引导的成长环境中，留守儿童也很容易出现偏差行为。在现实的图景中，留守儿童普遍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这背后是留守儿童家庭监护缺失带来的过早独立。他们深知，生活不会因为他们的无助而停下脚步，只有自己变得强大，才能在这片荒芜中开出希望之花。

### （二）留守儿童的坚毅水平分析

在心理学领域，坚毅是指个体对长期目标的热爱与坚持，是预测长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与短期的自我控制不同，坚毅更强调在较长时间内对重要目标的持续追求和努力。Grit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Angela Duckworth等人于2007年编制，用于评估个体在追求长期目标时的坚毅程度，并帮助其预测学业成就、职业成功以及个人成

长等方面的潜力。该量表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努力持续性和兴趣一致性。2009年，Duckworth和Quinn进一步简化编制了Grit-S量表。

为了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坚毅水平，本节选取2014—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借鉴Grit量表，选取了以下四个指标（见表2.6）来综合测量学生的坚毅水平。这四道题目在CEPS问卷中明确体现了“坚持”和“热情”两个维度，与坚毅量表核心理念高度一致。通过样本的处理，最终保留9396个有效样本，其中留守儿童2184个，非留守儿童7212个。由于测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1—4分）进行评分，所以直接对每个维度的得分进行加总，构建坚毅总分变量。

表2.6 坚毅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坚毅维度	测量题项	变量赋值
坚持	1. 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我仍然会尽量去上学； 2. 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	1. 完全不同意； 2. 不太同意； 3. 比较同意； 4. 完全同意
热情	1. 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 2. 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能够坚持下去。	

本节对坚持、热情以及坚毅总评的得分都进行了比较。在坚持维度上，非留守儿童的平均得分为6.40，略高于留守儿童（6.15）。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 $p < 0.01$ ）。在热情维度上，非留守儿童的平均得分为6.49，同样略高于留守儿童（6.26），t检验结果显著。非留守儿童的坚毅总分平均值为12.89，高于留守儿童（12.41），t检验结果表明组间差异显著（ $p < 0.01$ ）。

图2.7显示，在坚持和热情两个维度上，非留守儿童组的中位数均略高于留守儿童组，表明非留守儿童在这两个维度上整体表现更佳。然而，在坚毅总分上，两组的中位数接近，说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总体坚毅水平差异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非留守儿童组的中位线明显靠近Q1，说明数据的大部分集中在较小的数值范围内，较大的数值相对较少但分布较分散。此外，非留守儿童组的四分位距较小，表明他们在坚毅总分上的得分更为集中，波动性较小，而且该组中也存在更多的异常值，这表明该组中有一部分儿童的坚毅得分异常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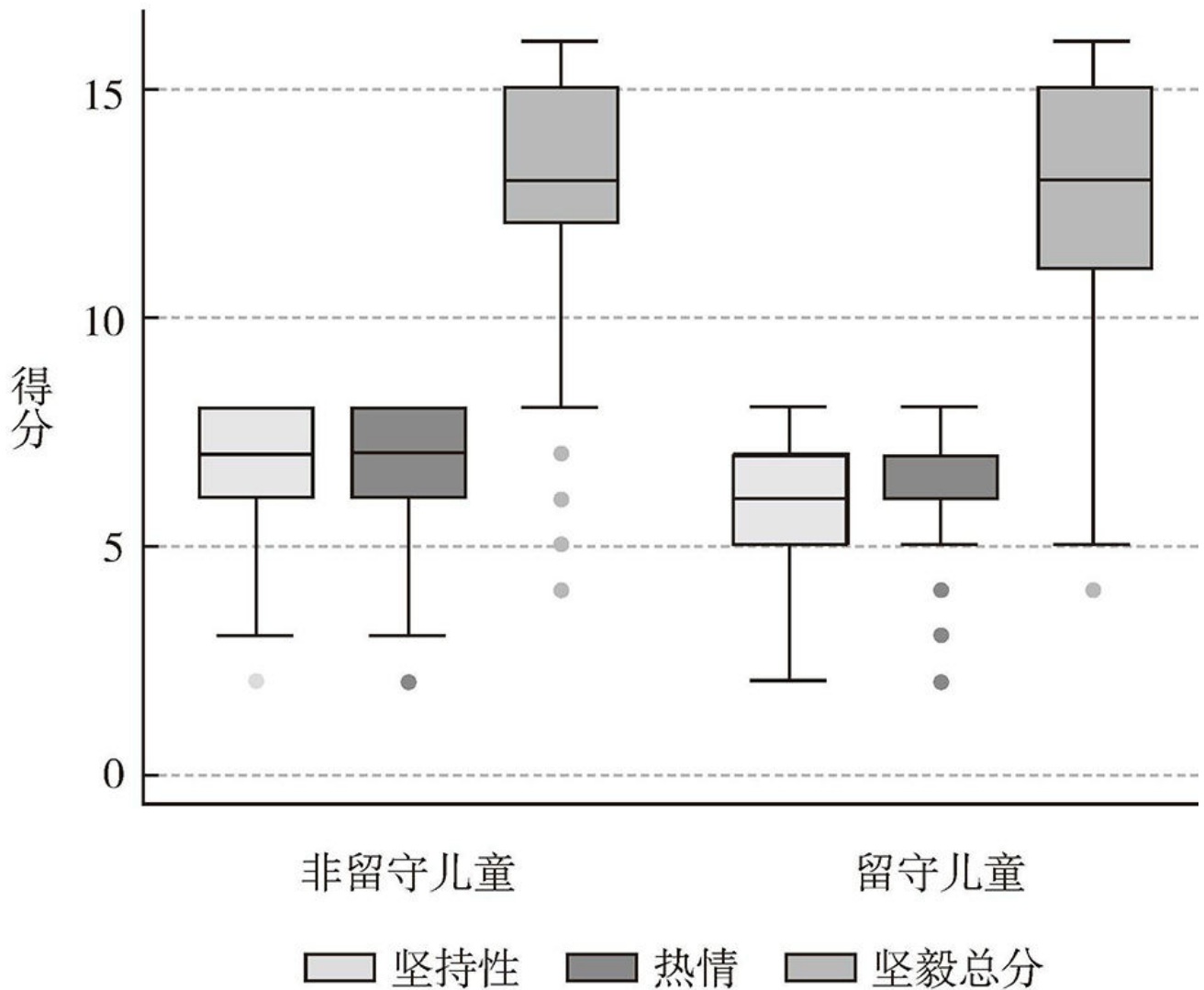


图2.7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坚毅比较

### 三 学习动机的强与弱

#### (一) 毁掉学习动机的“幕后黑手”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智能手机成为侵蚀留守儿童学习动机的隐形推手。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监护，许多留守儿童将手机作为情感寄托，这种依赖虽能短暂缓解孤独感，却埋下更深的教育隐患。留守儿童尚未成熟的认知能力和薄弱的自制力，使其极易陷入手机沉迷的泥沼。智能手机通过即时满足的娱乐功能重塑了孩子的奖赏机制，让需要长期投入的学习活动相形见绌，逐渐形成“学习无用”的认知偏差。更严重的是，过度使用不仅挤占学习时间导致学业下滑，还会因挫折感进一步强化对手机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而碎片化的网络内容也在悄然削弱孩子们深度思考的能力。面对这一问题，隔代监护的家庭往往力不从心，学校教师的劝导在手机诱惑面

前也收效甚微。“毁掉一个孩子只需要给他一部手机”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当下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 （二）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分析

在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学习动机现状时，笔者看到了手机沉迷对他们的学习动机产生了严重的侵蚀作用。这种现象不仅令人痛心，也引发了笔者对留守儿童学习动机更深层次的思考。为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本节基于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分析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动机方面的差异。在数据清理过程中，笔者保留了与学习动机相关的变量，包括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学习毅力、学习耐力、学习好奇心、家庭学习资源、学习投入时间以及自我教育期望。经过处理，最终样本包含17295名学生，其中非留守儿童13339名，留守儿童3956名。

为了综合评估学习动机，本节采用了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首先进行了KMO测度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以确保主成分分析法的适用性。KMO测度结果为0.696，表明变量之间有很强的共线性，适合主成分分析法。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卡方值为15863.842，自由度为21，p值为0.000，表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主成分分析法。通过主成分分析，笔者将学习责任感、学习毅力、学习耐力、学习好奇心、家庭学习资源、学习投入时间以及自我教育期望等变量的方差分解为多个主成分，并提取了前两个主成分作为学习动机的综合指标。表2.7展示了主成分分析的载荷矩阵。

表2.7 主成分分析的载荷矩阵

学习动机因子	主成分 1	主成分 2
学习责任感	0.4703	-0.1004
学习毅力	0.5364	-0.1341
学习耐力	0.5423	-0.1166
学习好奇心	0.3678	-0.1356
家庭学习资源	0.1345	0.7025
学习投入时间	0.0108	0.1450
自我教育期望	0.2087	0.6522

通过主成分分析，笔者提取了两个关键维度来综合衡量学习动机。由表2.7可知，主成分1在“学习责任感”“学习毅力”“学习耐力”“学习好奇心”上具有较高

的载荷，反映了学生的内在学习驱动力，即主动投入学习的意愿和坚持性。主成分2在“家庭学习资源”和“自我教育期望”上载荷较高，可解释为家庭支持与教育期望维度。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两组之间的差异，本节绘制了条形图，如图2.8所示。图2.8中展示了两组儿童在两个主成分得分上的均值差异。就主成分1而言，非留守儿童得分为0.03，高于留守儿童的-0.10。就主成分2而言，非留守儿童的劣势更为明显，非留守儿童得分为0.08，而留守儿童为-0.26。进一步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差异的统计学显著性。统计检验显示，留守儿童在内在学习动力（ $t=4.85$ ， $p<0.01$ ）和家庭支持与教育期望（ $t=17.42$ ， $p<0.01$ ）两个维度上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这一系列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在学习动机方面整体弱于非留守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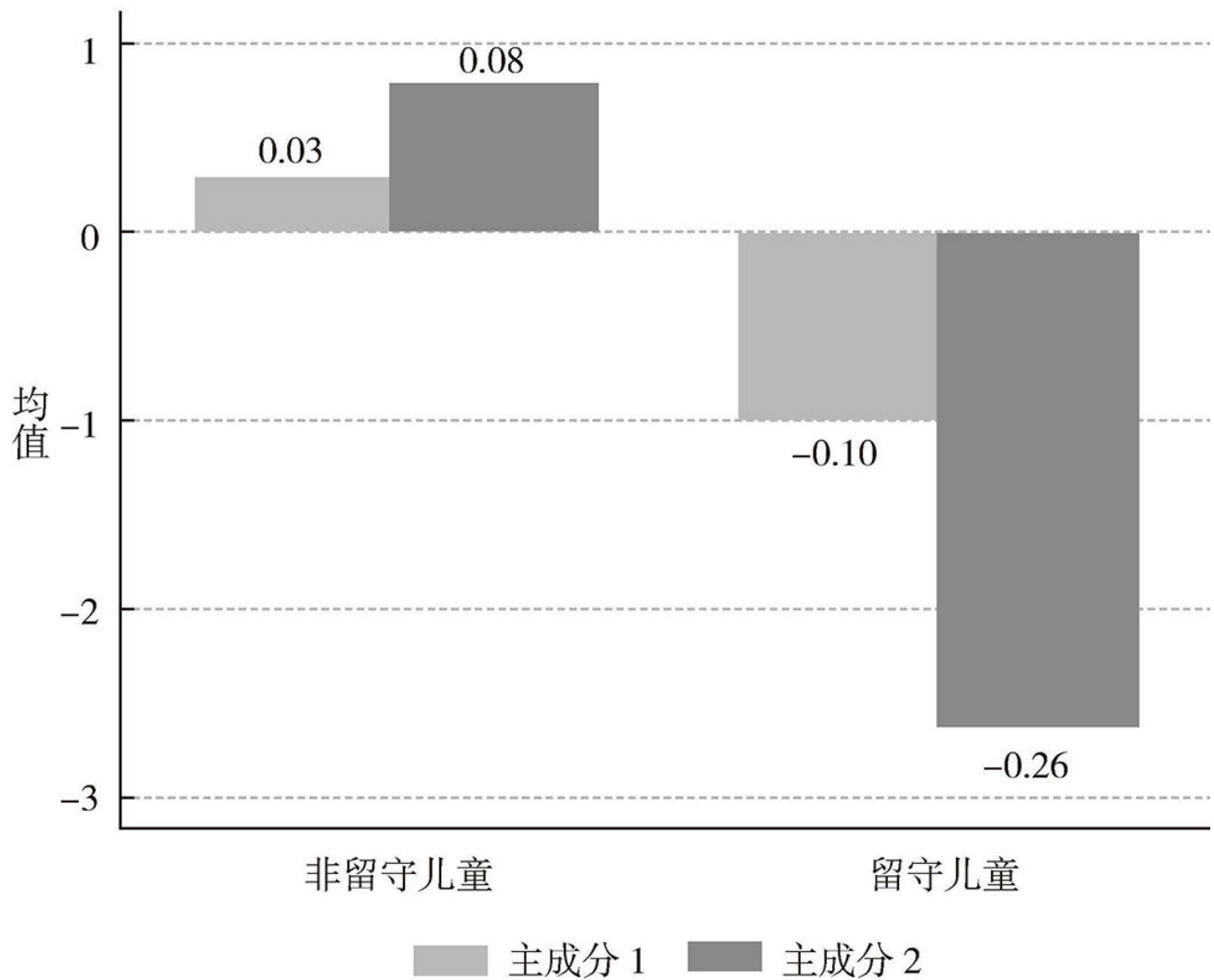


图2.8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主成分比较

# 第三章 农村寄宿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

## 第一节 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人力资本差异

### 一 认知重构与情感困境：农村儿童人力资本发展的双重叙事

农村寄宿儿童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撤点并校政策形成的制度性教育弱势群体，即因家庭居住地与学校距离较远，或因学校布局调整等原因，无法每天往返学校与家庭之间，而选择在学校内住宿的农村地区学生群体。这些儿童通常需要在校内完成学习、生活和休息等活动，由学校提供住宿、餐饮等基本生活保障，并接受学校的统一管理和教育。非寄宿儿童则是指居住在家庭环境中，每天往返学校上学的儿童，家庭环境对其成长的影响更为直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儿童因社会流动、家庭结构变化或教育政策导向而被动或主动进入寄宿环境。这一经历不仅影响儿童短期技能学习（如学业能力、生活独立性），更深刻的在于对其认知方式、情感联结与社会适应能力的系统性重塑，对农村寄宿儿童未来发展所需关键素质的形成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提升儿童人力资本质量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亦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焦点。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因不同成长环境，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发展存在差异。本章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梳理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在认知能力、营养获得、孤独感消解和非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以期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制定精准帮扶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 （一）传统人力资本维度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蕴藏于人体中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它涵盖了个人接受教育、职业培训的所有投资，以及这些过程中产生的机会成本（Schultz, 1961）。贝克尔在其著作《人力资本》中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强调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显性投资对个体生产力的积极影响（贝克尔，2016）。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主要聚焦认知能力（如教育年限）对经济回报的影响，却忽视了对非认知能力（如毅力、责任心及团队精神等）的系统考察。该理论盲区在寄宿儿童群体中尤为典型：尽管学校资源的集中配置可能提升其认知资本，但家庭情感支持的长期缺失不仅影响心理健康发展，更可能通过削弱情绪调节、抗压能力等非认知维度影响健康资本

（罗仁福等，2010）。在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教育资本有正负两种效应。正向效应体现在寄宿儿童通常享有更长的学习时间和标准化管理。负向效应体现在家庭监督的缺失可能弱化学习动机。在健康资本方面，寄宿儿童普遍面临营养不均衡与心理健康风险，农村寄宿生贫血率显著高于非寄宿生（Wang et al., 2016）。同时，寄宿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1.7%，显著高于非寄宿生（罗仁福等，2016）。

## （二）新人力资本维度

新人力资本理论在21世纪初逐渐兴起，以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为代表。赫克曼提出了“二分法”命题，强调人力资本不仅包括认知能力，还应涵盖非认知能力。他认为，非认知能力在个人的职业成功和社会适应中同样重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认知能力更为关键。与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不同的是，新的人力资本理论革新性地摒弃了“黑箱”式的认知，构建了一个以多元能力为支撑的全面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姜欣悦，2024）。在当前的新人力资本理论中，“能力”被视为核心要素，关注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动态积累，并纳入家庭环境、社会资本等隐性因素。此外，新人力资本理论还关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如社会网络和家庭背景对个体能力形成的影响（见图3.1）。在新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寄宿儿童可能因脱离家庭环境而在非认知能力（如社交技能、情绪管理）上处于劣势。周金燕和徐妮娜（2021）认为，寄宿显著降低了农村寄宿学校学生的情绪稳定性。梁文艳和叶晓梅（2018）认为，持续寄宿3年以上的儿童，其情绪稳定性不如非寄宿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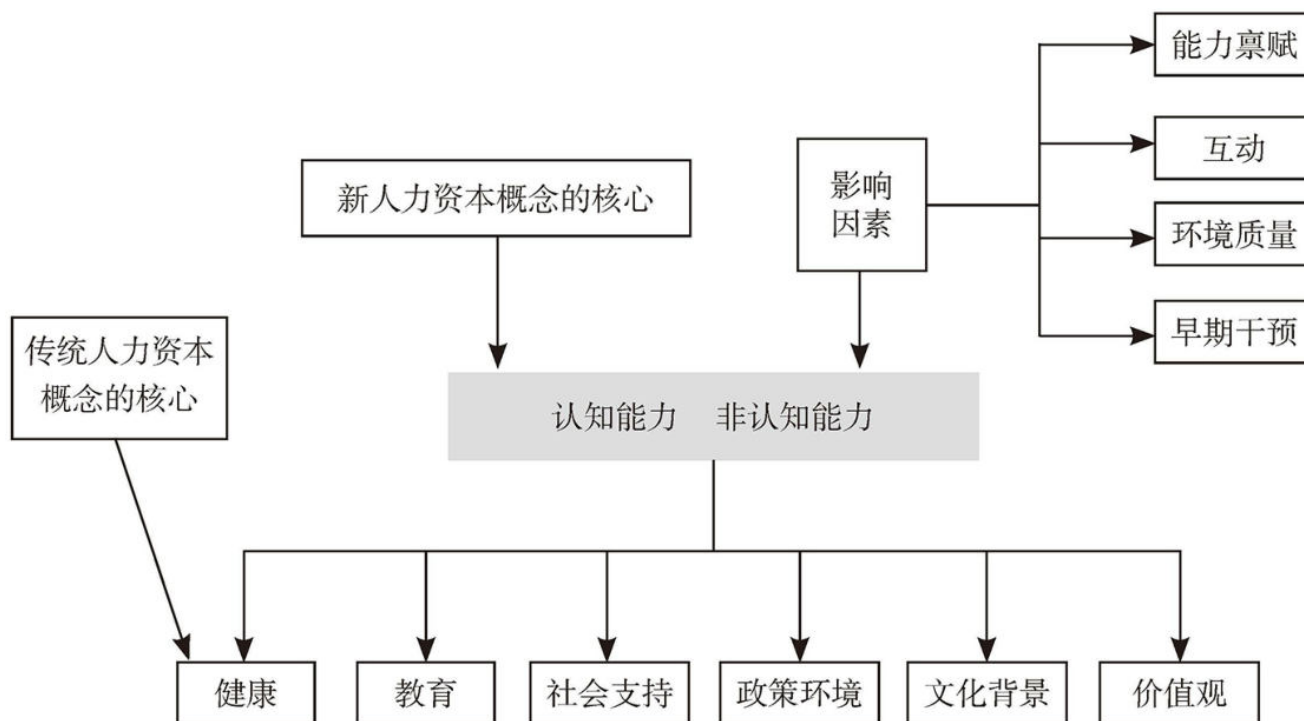


图3.1 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更多关注教育与健康对个体经济收益的普遍影响，而新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凸显非认知能力的关键作用。部分研究认为寄宿通过标准化管理弥补了家庭资源不足，王春超和孙曙涛（2023）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家庭教育资源匮乏，而寄宿学校提供了统一的教育和生活管理，帮助这些学生在学业上获得更好的表现。而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可能抵消学业收益，庞浩（2023）研究发现寄宿生活减少了亲子互动，增加了校园欺凌风险，导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等显著上升。现有研究多聚焦寄宿儿童的学业表现或心理健康问题，却较少从动态视角剖析其在技能积累、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及人格特质形成间的交互作用，亦缺乏对发展资本（涵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系统性重构的机制探讨。

## 二 寄宿生活双面镜：农村寄宿儿童的健康代价与学业增益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被视为构建人力资本的关键要素。本节将探讨农村寄宿儿童的认知能力，而非认知能力将在本章第四节进行探讨。身体健康是认知能力的基础指标，学业成绩是反映儿童学龄阶段认知能力的直观指标。已有研究讨论了学校寄宿对儿童教育结果、身体健康的影响，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寄宿对儿童的负向影响来源于亲情关爱的缺失，住宿环境的不理想，以及集体环境中不良行为的传播等（Wang and Mao, 2018）。此外，部分研究认为寄宿对儿童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寄宿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与老师沟通交流的机会，有助于学生利用学校的基础设施，而统一的时间和生活管理便于老师引导和教育学生（Behaghe et al., 2017; Martin et al., 2014）。既有研究多局限于区域性调研数据，且指标选取与定义缺乏标准化，这使得已有研究结论不一，给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困扰。本节将运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从农村寄宿儿童的身体健康、学习成绩这两个变量来度量其认知能力，探究寄宿对农村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 （一）数据与变量

#### 1. 数据来源

本章中的第一、第二、第四节使用的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将基线调查（2013—2014年）与追踪调查（2014—2015年）两期数据合并，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并保留户口类型为农业户籍的学生，共得到5466个样本，其中寄宿学生有2441名，占总样本的44.66%。

#### 2. 变量定义与赋值

本节的被解释变量为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使用学生的自评健康来度量其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健康用学生问卷中“你现在的整体健康情况如何？”这一问题来衡量，

每个问题取值1—5表示从不健康到非常健康，分值越高，表明学生身体越健康。

学习成绩是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寄宿儿童的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作为认知能力的测度指标（Behrman et al., 2024）。学业成绩来源于CEPS提供的学生期中考试的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虽然不同学校及年级的考试难度和评分标准存在差异，跨校、跨年级成绩缺乏可比性，但通过标准化处理即可对分数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因此，本节首先对三科成绩进行了1%水平上的双边缩尾处理，然后参考协天紫光和张雪凯（2024）的做法对以上三门课程的成绩分别按学校、年级计算标准化分数，并调整为均值为70、标准差为10的分数。

本节的解释变量为农村儿童的寄宿情况。我们根据CEPS 2013—2014年学生问卷中“周一到周四的晚上，你是否在学校寄宿？”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当学生在校寄宿时，赋值为1，反之为0。

控制变量分为四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和学校特征。其中，儿童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独生子女、留守情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班级特征包括班级规模和班级在学校的排名；学校特征即学校在全县的排名。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1所示。

表3.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寄宿	0= 非寄宿, 1= 寄宿	0.446	0.497	0	1	5454
自评健康	1—5 表示从很不健康到很健康	4.038	0.918	1	5	5395
语文	取值范围 0—100	70	9.896	13.572	97.737	5327
数学	取值范围 0—100	70	9.896	29.156	97.109	5322
英语	取值范围 0—100	70	9.896	9.450	93.495	5326
性别	0= 男, 1= 女	0.467	0.499	0	1	5323
民族	0= 少数民族, 1= 汉族	0.914	0.280	0	1	5435
年龄	按周岁算	14.656	0.767	13	17	5331
独生子女	0= 非独生子女, 1= 独生子女	0.267	0.442	0	1	5454

续表

变量名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留守儿童	0= 非留守, 1= 留守	0.140	0.347	0	1	5454
家庭经济状况	0= 贫困, 1= 中等, 2= 富裕	0.940	0.490	0	2	5152
母亲受教育水平	母亲受教育年限	8.424	2.940	0	19	5359
父亲受教育水平	父亲受教育年限	9.228	2.437	0	19	5365
班级规模	1=30 人以下, 2=30—40 人, 3=40—50 人, 4=50—60 人, 5=60 人以上	3.480	1.056	1	5	5454
班级排名	1= 差, 2= 中等, 3= 好	1.880	0.503	1	3	5454
学校排名	1= 差, 2= 中等, 3= 好	1.911	0.623	1	3	5454

## （二）寄宿对农村儿童人力资本影响的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为：

$$Y_{it} = a_0 + \beta_1 Boarder_i + \gamma_1 X_{it} + \delta_j + \varepsilon_{it} \quad (3.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_{it}$  为农村儿童  $i$  的认知能力（包括健康状况、学业成绩两个维度）；核心被解释变量  $Boarder_i$  为农村儿童  $i$  的寄宿状态， $Boarder_i=1$  代表该农村儿童在学校寄宿， $Boarder_i=0$  代表该农村儿童未在学校寄宿， $X_{it}$  为其他控制变量， $\delta_j$  表示班级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寄宿对儿童的身体健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影响，但该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表3.2第（1）列汇报的回归结果可知。这可能是因为寄宿儿童年龄较小，生活自理能力和抵抗疾病的能力较差，同时还没有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也可能是由于长期在学校生活，缺少亲情关爱和家庭照料，无法很好地适应寄宿生活，增加了生病的可能性（姜楠、续竞秦，2020）。

寄宿对学习能力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3.2第（2）、（3）、（4）列分别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和学校特

征后，相较于走读的农村儿童，寄宿儿童的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更好，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3.2 农村儿童寄宿对其人力资本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身体健康	语文	数学	英语
寄宿	-0.006 (0.028)	0.637*** (0.291)	0.704*** (0.303)	0.712*** (0.283)
性别	-0.060*** (0.026)	5.685*** (0.270)	0.842*** (0.285)	5.828*** (0.267)
民族	0.077 (0.051)	-0.990** (0.554)	-0.921 (0.594)	-1.601*** (0.536)
年龄	-0.031* (0.019)	-0.984*** (0.190)	-1.415*** (0.205)	-1.503*** (0.192)
独生子女	-0.013 (0.031)	-0.685*** (0.326)	-0.445 (0.337)	-0.347 (0.324)
留守儿童	-0.039 (0.040)	-0.574 (0.412)	-0.824* (0.427)	-0.796*** (0.400)
班级排名	1.066*** (0.266)	1.438*** (0.283)	1.234*** (0.270)	0.022 (0.026)
学校排名	-0.320 (0.217)	-0.398** (0.231)	-0.495*** (0.221)	0.002 (0.021)
截距项	77.953*** (2.959)	88.167*** (3.141)	86.139*** (3.007)	4.324*** (0.288)
样本量	4698	4693	4698	4759
调整后的 R <sup>2</sup>	0.107	0.026	0.121	0.038

注：\* p<0.1, \*\* p<0.05, \*\*\* p<0.01。

## 第二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获得

儿童成长关键期的营养状况是其未来发展的基石，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储备。充足的营养摄入不仅是生理发育的基石，更是提升认知能力与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然而，农村寄宿学校普遍存在的设施简陋、膳食结构失衡、监管缺位等问题，正在悄然侵蚀这一群体的健康权益，成为儿童营养供给的“最后一公里”断裂带。经费掣肘下的粗放配餐、地域文化衍生的饮食偏好、家校协同的薄弱链条，共同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困境之网。本节试图以营养为切入口，还原农村寄宿儿童的生存图景。

## 一 营养获取现状的三维诊断

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获取并非单一维度的供给问题，而是深嵌于膳食结构、供餐系统与营养教育的三重张力之中。当前，膳食的粗放搭配暴露出了蛋白质与微量元素的结构性短缺，供餐链条的季节性断档折射出物流与经费的制度性梗阻，而营养知识的代际断层则加剧了“吃得饱”与“吃得对”之间的认知鸿沟。三者交织，既制约了政策效能的靶向释放，更模糊了儿童健康的成长基线。唯有系统解决表里矛盾，方能在“碗中餐”中厘清公平与发展的深层博弈。

### （一）吃饱不意味着吃好：膳食结构失衡带来的“隐形饥饿”困境

农村寄宿儿童的膳食结构呈现“高碳水、低蛋白、微量元素失衡”的典型特征。在农村寄宿儿童的膳食中，以米、面为主食，碳水化合物占比通常较高。虽然总摄入量基本达标，但依赖主食会造成蛋白质来源单一（以植物蛋白为主，动物性蛋白占比少），且微量营养素存在显著缺口。部分偏远农村寄宿学校午餐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如甘肃陇西县仅26.77%的学生达标，且优质蛋白不足（王文惠等，2023）。宁夏、广西等地寄宿生的钙、铁、锌摄入量低于推荐量的20%，维生素C甚至接近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组，2012）。可见，农村寄宿儿童动物性食物摄入不足，普遍缺乏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领导小组办公室，2013），饮食结构并不合理。

这一失衡格局根植于多重结构性矛盾：食堂供餐因成本压缩倾向选择廉价耐储食材（如土豆、白菜），导致绿叶菜与优质蛋白供应不足；地域饮食文化中“主食优先”的惯性思维，加剧了膳食多样性匮乏；而冷链物流短板则限制新鲜食材的稳定输送。更隐形的危机在于，微量营养素长期短缺不仅抑制儿童体格发育，还与免疫力下降、认知迟缓等问题密切相关。要破解这一困局，需从“数量供给”转向“营养均衡”，重构底层膳食逻辑。

## （二）供餐系统评估：从厨房到餐桌的链条分析

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供餐系统是一个由多个环节构成的链条，系统评估食材采购、加工、储存、分配及食用的全链条，揭示当前供餐体系中的关键瓶颈与潜在风险。首先，供应链上游的食材采购与储存环节是基础保障。农村地区物流条件有限，食材的多样性、新鲜度及存储条件易受制约，可能导致营养流失甚至安全隐患。厨房设施的现代化程度与卫生管理标准亦是关键变量——部分学校因设备陈旧或操作流程不规范，难以实现均衡膳食的标准化生产。此外，烹饪环节的营养知识普及不足，可能导致维生素、蛋白质等关键营养素在加工过程中被破坏或分配不均，进一步削弱供餐的营养价值。

近年来，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健康问题被纳入国家民生工程的重点项目。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衔接点，供餐系统不仅是保障儿童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更承载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意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启动实施以来，国家通过专项资金支持、标准化供餐模式推广及营养监测体系构建，逐步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管理。对供餐的形式、食品、食谱这三方面精细把控，成效日益显现，具体可见表3.3。

表3.3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的相关措施

类别	具体要求与措施	数据支持 / 备注
供餐形式		
午餐 (热食)	原则上应提供完整午餐；暂时无法提供的地区可先提供加餐或课间餐，并逐步改善条件实现完整午餐	截至2022年，50.3%中小學生每周摄入畜禽鱼肉类不少于5次
加餐 或课间餐	过渡性措施，需确保营养补充（如鸡蛋、面包、水果等）	学生在校时间长，能量消耗大，加餐和课间餐能有效补充能量和营养，防止饥饿，帮助学生保持良好学习状态

续表

类别	具体要求与措施	数据支持 / 备注
学生奶计划	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学生奶饮用计划”，每日提供一包牛奶	截至2022年，32.8%中小學生每日饮用奶制品（含牛奶、酸奶等）
供餐食品		
食品标准	必须提供肉蛋奶、新鲜果蔬、谷薯类等营养食品；禁止保健食品、含乳饮料、火腿肠等深加工食品	截至2022年，33.3%中小學生每日摄入不少于3种新鲜蔬菜，30.8%中小學生每日吃新鲜水果
农校对接	建立学校直供农产品基地，推动本地食材供应	多地试点“一日一供”模式，确保食材新鲜
供餐食谱		
制定标准	参照《学生餐营养指南》（WS/T 554—2017），结合地方营养健康状况制定	标准要求蛋白质、钙、铁等营养元素日均摄入量达标
制定主体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学校根据食材供应制定带量食谱	使用“学生电子营养师”等膳食分析工具优化搭配
公示要求	食谱须公开，确保膳食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部分学校通过公众号或食堂公示栏展示食谱及营养参数

资料来源：教育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报告（2022年）》。

### （三）知易行难：营养健康实践中的困局

在保障基础膳食供给的前提下，开展系统性的营养教育可作为改善农村寄宿儿童营养摄入质量的突破口。农村寄宿儿童的营养教育虽被纳入政策范围，但常面临“知行鸿沟”的挑战。学校通过课程、宣传海报等方式普及膳食均衡知识，但学生对营养素的认知率（如维生素、蛋白质作用）仍然较低，转化为主动选择健康饮食的态度比例也不容乐观。这种转化落差与基层营养师资匮乏、教育形式单一（如缺乏实践互动）及家庭传统饮食习惯的惯性密切相关。食堂餐饮选择有限，部分寄宿制家庭的饮食结构存在盐分摄入过量、精制碳水化合物比重过高等问题，导致即便儿童具备基础营养认知，也难以建立持续的健康膳食习惯。此外，部分农村地区寄宿儿童的监护人营养知识水平相对有限，在膳食搭配科学性方面有待提高。当教育过程不够系统，学生学到的知识就难以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

《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调查报告》，应届毕业生网，2020年12月10日，  
<https://www.yjbys.com/diaochabaogao/594917.html>。

从态度到行为的转化则更为复杂。即便儿童认同营养均衡理念，实际行为仍受制于供餐系统的可及性、经济成本及同伴环境。若食堂长期供应廉价但低营养的重复菜谱，学生会因缺乏替代选项而被迫形成固化饮食模式；在零食选择上，低价高糖食品的易得性正在压缩健康零食的选择空间。在部分贫困地区，学生的饮食习惯会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偏好高糖饮料和零食。孩子们喜欢吃在他们看来比较“稀罕”和“潮流”的食物，比如巧克力、炸串、奶茶、汽水等<sup>④</sup>，但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可能会带来肥胖问题。

本节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年的学生调查数据，用问卷中的“现在的户口类型”和“周一到周四的晚上，是否在学校住宿？”这两个问题来区分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用“你是否经常吃油炸、烧烤、膨化、西式快餐食品？”这一问题来衡量儿童高油食物摄入，用“你是否经常喝含糖饮料（如奶茶）或者碳酸饮料（如可乐）？”这一问题来衡量高糖饮料摄入。对这两类儿童的高油高糖食物的摄入频率进行统计再比较。

通过卡方检验分析了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在油炸、烧烤、膨化、西式快餐等食品的摄入频率上的差异。将“经常”和“总是”视为两个高频率层次，农村寄宿儿童在这两个高频层次中摄入频率共400次，明显高于农村非寄宿儿童的共353次，说明农村寄宿儿童和非寄宿儿童在高油食物的消费习惯存在差异，农村寄宿儿童比非寄宿儿童对高油食物的偏好更强（见表3.4）。

表3.4 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高油饮食摄入频率卡方检验结果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总是	总和
寄宿儿童	132	846	963	369	31	2341
非寄宿儿童	153	1001	1093	305	48	2600
总和	285	1847	2056	674	79	4941
$\chi^2 = 18.9859$	$df=4$		$p=0.01$			

表3.5分析了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在含糖饮料或碳酸饮料等食品的摄入频率上的差异。结果显示农村寄宿儿童和非寄宿儿童在高糖饮料的消费习惯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3.5 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高糖饮料摄入频率卡方检验结果

	从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总是	总和
寄宿儿童	80	784	981	447	49	2341
非寄宿儿童	109	887	1059	478	67	2600
总和	189	1671	2040	925	116	4941
$\chi^2 = 4.0477$	$df = 4$		$p = 0.400$			

在农村寄宿儿童节假日离校期间，不排除他们会有“暴饮暴食”、“报复性”摄入高油高糖类食物的可能性。因此，提升行为转化率需强化家校协同机制，借助“示范性供餐窗口”“营养积分奖励”等行为助推策略，同时将教育内容与食堂供餐改革深度绑定，缩小认知与实践的断层。

## 二 营养支持政策体系

营养支持政策不仅关乎儿童个体福祉，更是透视城乡资源分配、教育公平与社会治理的棱镜。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农村寄宿儿童营养支持体系正经历系统性重构。过去因资源匮乏导致的膳食单一、营养失衡问题，在政府专项投入、社会公益介入及校园餐标规范化的合力下逐步改善。这一进程不仅体现了公共服务向弱势群体倾斜的价值取向，还彰显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对推进城乡公平的深远意义。

### （一）营养改善计划的政策演进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历时十余年的政策调适与制度创新，展现了从政策响应到系统建构的完整演进路径。该计划于2011年作为应急性民生工程启动以来，逐步实现了三个关键转变：在政策定位上，从临时补贴转向立法保障；在实施机制上，从中央单一投入发展为财政分级保障与动态监测相结合的体系；在治理模式上，通过地方试点创新、多元主体协同及数字化管理工具的引入，推动营养支持向精准化、系统化转型（见附录附表2）。这一制度演进过程不仅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儿童营养政策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的可能路径，更为理解中国情境下政策试验与制度建构的互动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 （二）区域政策创新比较

作为国家营养干预政策的微观试验场，区域政策创新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中国东部地区依托县域经济优势，探索“中央厨房+食育课程”的技术整合模式；中西部地区则倾向激活乡土资源，以“家校联动的营养菜园”降低供给成本（见表3.6）。政策工具的选择折射出地方财政能力、社会组织发育与文化惯习的深层博

弈。通过比较区域差异化路径，探寻“因地制宜”的实践智慧，为破解政策标准化与地方适配性张力提供借鉴，进而重塑更具韧性的儿童营养供给网络。

表3.6 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的区域性政策比较

地区 (代表省份)	创新 维度	政策文件	核心创新措施
东部地区 (浙江)	技术驱 动型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浙政办发〔2012〕30号)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建立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资助对象的精准识别与动态调整，确保营养改善政策精准落地。</li> <li>2. 通过“农校对接”机制+数字化采购平台来优化供应链，推动学校食堂与农产品基地直接对接，减少中间环节，保障食材新鲜、价格稳定。</li> <li>3. 开发食堂财务成本核算系统，实现每日食材消耗收支情况、成本结构的自动统计与公开，支持财务审计与监督，防止资金浪费或挪用。</li> </ol>
中部地区 (河南)	资源整 合型	河南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建立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由教育、财政、农业、卫健、市监等七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整合行政资源，形成“政府主导、分级负责、部门协同”的管理体制。</li> <li>2. 资金与项目整合改善供餐条件。将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薄弱学校改造、中西部初中校舍改造等多项专项资金整合，优先用于营养改善计划食堂建设，避免重复投入。</li> <li>3. 通过集中采购+农户协议供应方式，整合本地农业资源，既保障食材新鲜安全，又带动本地农业产业链发展。</li> </ol>

续表

地区 (代表省份)	创新 维度	政策文件	核心创新措施
西部地区 (云南)	本土适 配型	《通海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通政办发〔2023〕34号)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依托本地职业学校(如通海职中、玉溪烹饪学校)组建营养食谱制定指导团队,结合云南地方饮食文化,制定科学、营养的本地食谱。</li> <li>2. 因地制宜的供餐模式组合。根据学校食堂能力和学生年龄段营养需求,灵活采用“食堂供餐+企业供餐+混合供餐”模式。</li> <li>3. “营养改善+双减”融合机制,试点为非寄宿制小学提供午餐,减少学生回家频次,提升在校学习效率。</li> </ol>
东北地区 (黑龙江)	问题导 向型	《黑龙江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黑龙江省富裕县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情况纪实》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针对部分地区存在营养膳食补助资金被截留、克扣等问题,明确禁止将补助资金用于非营养改善用途,并强化市县财政、教育部门的申报与监管责任。</li> <li>2. 针对供餐条件不足问题,推动食堂建设与企业供餐相结合。富裕县等地采取“企业供餐+课间加餐”模式,解决无食堂学校的供餐难题。</li> <li>3. 针对营养结构不均衡问题,制订个性化营养补充方案。富裕县根据学生营养状况,制订“每天1枚鸡蛋+1盒牛奶”的营养补充方案,重点补充优质蛋白质。</li> </ol>

东部地区的创新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技术驱动特征。以浙江省为例,凭借其经济优势,通过引入现代化供应链模式实现了营养餐的高效供应与管理,并依托数字化技术构建学生营养动态监测平台,显著提升了营养管理的科学性与精准度。更具特色的是,该省创新性地将营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形成了技术应用与教育干预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有力推动了营养改善计划的系统性实施。

中部地区的创新实践呈现出显著的资源整合特征。以河南省为例,该省通过系统整合家庭与学校的资源网络,既有效降低了营养餐供给成本,又促进了乡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在营养管理方面,通过引入专业营养指导团队,显著提升了供餐质量与科学性。此外,该省创新性地将传统饮食文化与现代营养标准相融合,开发出兼具地方特色与营养均衡的餐食方案,实现了资源整合与文化传承的协同创新。

西部地区的创新实践体现为本土适配特征。以云南省为例,该省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和跨境资源,通过联动本地农业合作社确保营养餐稳定供应。同时试点学生参与食材种植模式,既增强社区参与感,又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此外,通过建立跨境合作

的营养援助基金，实现了本土适配与跨境合作的有机结合，有效推动了营养改善计划的可持续发展。

东北地区的创新实践呈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黑龙江省针对极寒气候对营养餐供应的特殊影响，采取了一系列差异化措施：通过提供高热量食品和建立保温配送系统，有效保障学生在寒冷天气中的营养摄入；与国有粮企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确保食材供应质量与数量；开发针对寒冷气候的营养补充剂，形成季节性营养干预方案。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基于区域特殊需求的针对性创新路径。

### 三 从“填饱肚子”到“滋养生命”：寄宿学校的厨房突围战

随着营养政策的不断优化和完善，农村寄宿儿童面临隐性饥饿与发育滞后风险显著降低。构建科学化、本土化的营养健康干预路径，仍需整合政策支持协同机制、优化膳食供给及普及营养教育等板块。

#### （一）政策优化：基于循证决策的营养补助机制

尽管中国农村寄宿儿童营养补助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政策红利仍没有完全释放，面临资金配置粗放、补助标准单一、动态监测缺位等现实掣肘。科学制定补助标准，应先做好实地调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食材价格季节变化和儿童身体发育的具体情况，建立灵活调整的补助方案。例如，针对贫血高发地区强化铁元素供给，对生长发育迟缓群体实施蛋白质定向补充。同时，建立“营养补助包+现金补贴”的动态调整机制，依托智能化管理平台跟踪资金流向与营养改善成效，并通过第三方评估检验干预有效性。此类改革将推动政策从“普惠覆盖”向“精准适配”转型，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破解“供给—需求”错配难题，为农村寄宿儿童健康公平提供制度性保障。

#### （二）技术创新：智慧供餐系统的应用场景

智慧供餐系统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与AI技术重构农村寄宿学校的营养供给模式。在食材管理端，部署温湿度传感器与智能仓储设备，实现农副产品采购溯源与损耗预警；在膳食设计端，基于区域性营养监测数据与膳食指南，AI算法可生成成本约束下的最优食谱，动态适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营养缺口。通过人脸识别取餐系统采集个体摄入数据，结合可穿戴设备追踪生理指标，构建“摄入—代谢—健康”评估闭环。家校联动App同步推送营养报告，引导家庭膳食补充。此类技术集成不仅提升供餐精准度，更为政策实施提供实时数据支撑，形成“技术赋能+制度保障”的双轮驱动格局。

#### （三）家校协同：营养素养的代际传递模式

农村寄宿儿童营养问题的核心困境缘于家庭营养知识匮乏与学校教育实践的脱节。为此，需建立“家校协同”的双向赋能机制：学校层面，通过开设家长营养课堂、建立膳食日志共享平台等方式，向家庭传递科学营养知识，逐步改善传统膳食结构；学生层面，设计“今天我掌勺”等实践课程，促进校园营养知识向家庭饮食行为的转化。实施“学生参与式食谱设计+家庭实践”项目，通过让学生参与食谱制定，增强其将健康饮食理念带入家庭的主动性，进而提升家庭成员蔬菜摄入频率。学生作为营养知识传播媒介是推动家庭行为改变的关键因素，由此形成“学校教育干预—家庭饮食改善”的良性循环。配套建立“营养素养积分奖励制度”，借助家校联动数字化平台记录膳食改善成效并兑换实物奖励，有效维持代际营养教育的持续性。这一创新模式通过知识传递与行为示范的双重路径，阻断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将健康理念深植农村文化土壤，为农村寄宿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构建认知基础。

### 第三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孤独感消解

农村寄宿儿童学习生活“两点一线”，因长期家校分离与亲子互动的缺失，面临情感真空。居住空间封闭化、课余活动同质化及心理支持资源匮乏，使其孤独感呈现隐蔽性与累积性特征，易诱发自我认同危机与社交退缩行为。传统干预多聚焦物质供给，忽视情感系统的修复。由孤独感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政策设计应着力将孤独消解转化为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从“生存保障”向“心灵丰盈”进阶。

#### 一 为何身在集体依然孤单？——拆解寄宿生的孤独感形成

在集体生活的表象下，农村寄宿儿童的孤独感呈现出复杂样态。校园管理的模式化掩盖了情感支持的不足，其机械化运作难以填补情感关怀的空缺。亲子情感隔阂与家庭结构在流动社会中的瓦解相互交织，最终形成顽固的情感空洞。当群体的功利性生存逻辑掩盖个体的情感诉求时，物理空间的共处不仅未能弥合心理距离，反而成为加剧心理疏离的隐匿力量。这种结构性孤独凸显出农村教育里儿童精神世界荒芜化的危机，需借助系统视角剖析其生成机制。

##### （一）情感剥夺的心理病理学分析

农村寄宿儿童的孤独感本质是长期情感剥夺引发的心理发展性创伤。依恋理论指出，儿童早期与主要照料者的稳定关系是情绪调节与安全感的基石，而父母缺位导致的情感联结断裂，使其陷入“存在性孤独”——即便身处群体，仍因缺乏深层回应而难以建立信任联结（李梦楠，2016）。情感被长期忽视后激活了慢性应激反应（Zeffferino et al., 2021），皮质醇水平异常不仅损害前额叶执行功能，还加剧

情绪调节障碍，表现为社交退缩或矛盾性依恋行为（Jentsch et al., 2019）。由于特殊的办学模式和较为封闭的环境，寄宿制学生更容易产生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包括自我怀疑、自我封闭、自卑抑郁、人际关系不良、生活习惯差等（刘俊珍，2022）。其深层心理机制在于归属感剥夺导致的依恋系统损伤：持续的情感忽视会促使儿童形成“创伤性自我表征”——在认知层面固着于“被抛弃”的自我意象，继而表现为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模式（既恐惧亲密又过度索求）。这种机制表明，仅改善物质条件无法修复情感系统的功能性损伤，必须通过重建稳定的情感应答系统（如建立替代性依恋关系）进行结构性干预。

## （二）社交生态的场域特征诊断

农村寄宿学校的社交生态呈现“高密度低质量”的悖论。制度化的集体生活让寄宿群体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统一作息与标准化管理压缩了个体情感表达的空间，层级化的师生关系与竞争性同辈文化可能会进一步抑制亲密联结的生成。家庭功能持续性失调导致儿童被迫学会“怎么让自己不被冷落”，可能是刻意隐藏真实的性格，比如明明不喜欢打游戏，却假装和同学一起玩；想哭的时候硬憋着笑，只为融入集体；甚至可能怕被排挤而过度讨好别人。这种用“自我工具化”换取群体接纳，会形成防御性社交面具。宿舍的公共性、教室的功能化规训、家庭关爱的缺失，让寄宿儿童难以找到情绪的释放口。

## 二 孤独感何以消解？——心理健康支持体系的递进式建构

农村寄宿儿童的孤独感是物质保障与情感供给断裂的副产品，集体生活掩盖了个体在制度化中的孤独感。现有的干预多聚焦物质帮扶，却未触及孤独感背后的深层次结构原因——家庭缺位、社交异化与自我认同破碎的共生困境。破解困局需要跳出“心理治疗”的单维视角，以“关系—技术—制度”协同重构情感系统，通过数字媒介的补偿性联结、关系网络的重建以及公益服务的供给，为孤独感消解提供系统化的解困路径。

### （一）从孤岛到群岛：朋辈互动模式缓解寄宿儿童孤独感

优质的同伴关系能够有效缓解孤独感，建立朋辈成长小组是提升寄宿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途径。该模式通过组织多样化活动，构建朋辈支持网络以改善寄宿儿童的社交状况，使其在互动中获得情感共鸣并建立群体归属感。孤独感较强的农村寄宿儿童普遍存在社交困境：部分因性格敏感而惧怕被拒绝，另一些则受限于人际交往或情绪调节能力的不足。针对这一现状，建立专属的亲密朋辈网络可为儿童提供情感安全感（滕兵，2020）。具体实施中，通过开展协作式手工、主题讨论等团体任务打破班级界限，促进跨年龄互动；借助角色扮演、情感日记分享等非评判性交流机制，帮助儿童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形成稳定的情感支持系统。这种创新模式将

“成长型关系”引入封闭式校园环境，不仅能够缓解分离焦虑，更能通过共同叙事重构寄宿儿童的自我认知，为农村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提供了可推广的低成本干预方案。

## （二）双轨支持系统的构建：学校配备专业力量与“心理委员”

农村寄宿学校应推行“专业教师+学生心理委员”协同干预模式。首先，引入专职心理教师，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定期开展孤独情绪筛查。面向农村寄宿儿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主题讲座及团体辅导工作坊，及时化解寄宿儿童的孤独感、郁闷心理等。其次，培训高年级学生担任心理委员，经考核后实行“观察—倾听—转介”三步工作法：每日记录同伴情绪波动，组织课间信任游戏，发现严重问题及时联动教师。学生心理委员的“同龄人语言”能有效打破防御机制，如通过“秘密树洞”收集匿名烦恼，配合教师的沙盘治疗针对性疏导（王妮妮，2023）。通过培训师生实现低成本运作，既弥补农村心理服务人力缺口，又以低成本推动心理健康服务常态化，为寄宿儿童提供持续稳定的情感支持。

## （三）多方共建“暖心链”：社会化支持网络的形成

社会公益活动形式多样（见表3.7），通过构建结构化社交场景来缓解农村寄宿儿童孤独感。城乡结对活动（如共同劳作、研学交流）打破地域隔阂，建立平等友谊；心理团辅课程（戏剧疗愈、绘画表达等）提供情感释放出口；“童伴妈妈”“睡前故事”等持续性陪伴弥补亲情缺失。这些干预措施以同伴互动、代际联结为载体，在团体协作中重建归属感，并通过外部资源注入激活儿童社会化能力，最终将孤立个体嵌入支持性关系网络，从而实现孤独情绪的群体性疏解与身份认同重塑。

表3.7 农村寄宿儿童的社会公益活动梳理

活动名称	发起机构	主要内容	实施范围	效果数据 / 成果
免费午餐·童伴计划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除提供营养午餐外，招募“童伴妈妈”定期开展心理团辅活动，组织生日会、读书会等集体社交	全国 23 省欠发达地区	截至 2022 年，覆盖 1200 所学校，儿童孤独情绪发生率下降 22%
梦想课程·心灵魔法盒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开发情绪管理课程，通过戏剧疗愈、绘画表达等活动促进寄宿生交流；建立“校园信箱”连接城市志愿者笔友	中西部 10 省农村学校	截至 2023 年，参与学生社交焦虑降低 35%，85% 的儿童表示“交到跨年级朋友”
童缘·周末微家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会	改造闲置校舍为活动空间，周末组织城乡家庭结对；城市亲子与寄宿儿童共同烹饪、种植，开展“影子伙伴”持续性陪伴	河北、河南试点县	2021—2023 年，累计服务 5000 人次，75% 的寄宿生反馈“周末不再孤单”
睡前故事灯塔计划	阿里巴巴公益&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	每晚通过广播播放 15 分钟心理故事，配套“故事日记本”促进寄宿生情感表达；建立城市志愿者音频库实现跨区域声音陪伴	全国农村寄宿制学校	截至 2021 年，覆盖 80 万名儿童，孤独感量表得分降低 19%，噩梦发生率减少 27%
寄宿制学校焕新计划	马云公益基金会	改造学生宿舍公共空间，设立“家庭式客厅”；培训生活教师开展“睡前 10 分钟谈心”，建立同伴支持小组解决冲突	江西、四川 30 所学校	截至 2023 年，学生归属感提升 32%，同伴暴力事件减少 45%
留守娃娃合唱团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在寄宿学校组建合唱团，通过音乐排练建立团队信任；定期举办跨校巡演，联结城市儿童开展“合唱信使”云音乐会	湖南、广西 18 县	95% 的成员表示“在团队中找到家人般的感觉”，3 支队伍登上央视舞台（2019—2023 年持续开展）

## 第四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展

非认知能力，通常是指代表一个人的态度、行为、情绪、动机和其他社会心理倾向的广泛的个人属性、技能和特征（Lee and Stankov, 2018）。作为涵盖情绪管理、人际交往、抗逆力及目标感等维度的核心素养，非认知能力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与社会融入具有深远影响。非认知能力采用国内外学者公认的大五人格模型来测量，此模型被认为是较为全面的人格分析框架，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因。

### 一 非认知能力发展现状

伴随社会对个体综合素质发展的关注度持续提升，情绪调控、协作能力、抗压能力等非认知能力，日益成为影响个体社会化进程与终身发展的关键要素。寄宿制学校通过提供结构化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却较为复杂。

#### （一）寄宿对农村儿童大五人格的影响

##### 1. 变量定义与赋值

结合2013—2014年CEPS的问卷信息，共选取13个问题（详见第二章第四节的大五人格测量题项和具体指标描述，表2.3）测量学生的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

性、情绪稳定性五类人格。对情绪稳定性的每个问题进行反向赋值，每个问题取值1—5分别代表“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对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这四类，每个问题取值1—4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值越高，儿童该维度以及整体的人格特征水平越高，代表学生非认知能力越强。

## 2. 方法与结果

按农村儿童的寄宿情况对样本进行分类，若学生在校寄宿则取值为1，反之为0，分为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分组计算五个性格维度（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的描述性统计量，包括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能够了解每组数据的基本分布情况。同时，对每个性格维度的寄宿儿童和非寄宿儿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判断两组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表3.8显示，农村非寄宿儿童在开放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上都要优于寄宿儿童，其中亲和性、情绪稳定性、外向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寄宿儿童在尽责性上高于非寄宿儿童，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来说，农村寄宿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水平比农村非寄宿儿童略弱，寄宿状态可能对非认知能力有负向影响。

表3.8 农村寄宿儿童与非寄宿儿童大五人格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	寄宿儿童	非寄宿儿童	均值差异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 值
开放性	6.424	6.443	-0.019	1.165	2	8	-0.759
尽责性	10.017	10.012	0.005	1.845	3	12	0.137
外向性	5.719	5.879	-0.159	1.469	2	8	-4.939***
亲和性	6.058	6.167	-0.109	1.402	2	8	-3.524**
情绪稳定性	15.131	15.428	-0.296	3.028	4	20	-4.404***

注：\* p<0.1, \*\* p<0.05, \*\*\* p<0.01。

## （二）寄宿对农村儿童心理弹性水平的影响

农村寄宿儿童的心理弹性是指这些孩子在面对留守生活、家庭分离、集体寄宿等逆境时，通过内在力量和外部支持适应压力、克服困难并保持心理健康的能力（李永鑫等，2008）。这种能力不仅体现为承受孤独的忍耐力，更包括在宿舍规则、学业竞争与情感真空的交织挑战中，灵活调用身边资源（如探索自然、同伴互助）重构生活意义，甚至将分离焦虑转化为独立意识的特殊生存智慧。农村寄宿儿童因家庭情感支持减弱（吴要武、侯海波，2017）及学业竞争压力加剧，其应对逆境的能力

普遍下降 (Lei and Chae, 2024)。“00后”寄宿儿童的焦虑水平较“90后”群体上升,而“00后”“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的比例较“90后”下降,在亲子关系中依赖性有所上升,表现出自主决策能力的下降,或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方式改变 (张旭东等, 2017)。代际差异亦体现在策略适应性上,“90后”更依赖地缘关系纽带缓解压力,而“00后”因社交虚拟化倾向导致现实问题解决能力不足。未来需构建“家庭—学校—社区”联动机制,以阻断心理弹性的代际衰弱风险。

## 二 非认知能力受何影响?

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特殊性,既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制约,又源于寄宿制教育模式与多重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家庭关爱的缺失、学校环境的差异以及同伴关系的复杂等因素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农村寄宿儿童的性格塑造、情绪管理与社交技能的培养。这些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不仅关乎儿童个体的成长轨迹,更在宏观层面上影响着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走向。深入探究这些影响因素的根源与作用机制,对于改善农村寄宿儿童的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平以及推动农村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 (一) 家庭资本的作用机制

家庭资本在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中起到多维度的驱动作用。根据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资本理论,家庭资本主要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这三类 (Bourdieu, 1986)。经济资本作为基础性要素,通过物质条件直接影响儿童的生活稳定性与资源可及性。具体而言,家庭收入水平决定了儿童能否获得课外学习工具、营养保障及心理辅导服务,经济匮乏可能加剧儿童的生活焦虑,抑制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文化资本表现为父母的教育理念与互动模式,高教育背景的家庭更注重通过日常对话、榜样示范传递社交规范与深层思维,帮助儿童建立目标导向的行为模式。社会资本则通过亲属网络和社区联结发挥作用,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不仅为儿童提供实践交往机会,还能缓冲亲子分离带来的情感缺失。三类资本的交织作用形塑儿童的心理韧性、合作意识与自我效能感,其中经济资本奠定发展基础,文化资本构建能力框架,而社会资本则通过关系网络实现资源的动态转化。这种作用机制揭示了提升非认知能力需从家庭资本的系统性培育着手,突破单一维度干预的局限性。

### (二) 学校环境的双重效应

学校作为农村寄宿儿童成长的重要替代性场域,在家庭监护缺位的情况下发挥着关键补偿功能。学校环境对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规范的作息制度和集体生活有助于培养自律品格,丰富的同伴互动网络为情绪管理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过度强调安全管控的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可能异化为限制儿童自主

性的制度约束。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在教师情感投入充分的学校中，这种持续的情感支持形成的“情感护盾”能有效保护寄宿儿童免受负面因素侵扰；而人文关怀缺失的环境则可能导致儿童陷入社交退缩的困境。这种兼具“庇护所”与“压力源”双重特性的环境格局，正在深刻影响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轨迹，对其社交技能、情绪调节等软性能力产生决定性作用。学生的非认知特质具有可塑性，通过恰当的学校教育干预能够实现有效改善（Lee and Shute, 2010）。

### 三 外部因素对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农村寄宿儿童群体日益庞大，其非认知能力发展备受关注。外部因素如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同伴网络等对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是否有影响及如何影响，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 （一）变量定义

在2013—2014年CEPS的问卷中，用“你有几个最好的朋友？”来衡量同伴网络。用“班主任经常表扬我”“语文老师经常表扬我/提问我”“数学老师经常表扬我/提问我”“英语老师经常表扬我/提问我”的问题分数相加来衡量教师支持程度；用“我在这个学校里感到很无聊”来衡量学校压抑感；用“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来衡量班级文化。用“你妈妈的教育水平是？”“你爸爸的教育水平是？”两个问题分数相加衡量父母教育水平；用“目前你家经济条件如何？”衡量家庭经济条件；用“你的父母在以下事情上（作业、考试，在学校表现，每天上学，每天几点回家，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的时间）管你严不严？”问题分数相加衡量父母严格程度；用“你父母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学校发生的事情，你与朋友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情，你的心事或烦恼）？”各方面问题分数相加衡量亲子交流；用“你和父母的关系怎么样？”衡量亲子关系；用“你父母对你的未来是否有信心？”衡量父母期望。非认知能力依旧采用大五人格的题项来衡量。非认知能力的外部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如表3.9所示。

表3.9 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外部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同伴网络	10.83	14.29	0	20
教师支持程度	17.32	4.69	7	28
学校压抑感	1.76	0.88	1	4
班级文化	3.12	0.82	1	4
父母教育水平	6.30	2.29	2	18
家庭经济条件	2.82	0.53	1	5
父母严格程度	18.75	2.95	8	24
亲子交流	20.03	4.94	10	30
亲子关系	5.35	0.90	2	6
父母期望	3.08	0.67	1	4

注：农村寄宿儿童样本共有 3476 个。

## （二）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模型为：

$$Y_i = \beta_0 + \beta_1 X_p + \beta_2 X_s + \beta_3 X_c + \gamma Z + \varepsilon_i \quad (3.2)$$

其中，被解释变量 $Y_i$ 为农村寄宿儿童 $i$ 的非认知能力各维度得分（包括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五个维度）；解释变量 $X_p$ 指的是同伴网络相关影响因素；解释变量 $X_s$ 指的是学校因素，包括学校压抑感、教师支持、班级文化等因素；解释变量 $X_c$ 指的是家庭因素，包括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条件、父母严格程度、亲子交流、亲子关系、父母期望； $Z$ 是控制变量，控制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

表3.10展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同伴网络对开放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影响不显著，而对农村寄宿儿童的外向性和亲和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为农村寄宿儿童提供情感支持、社交榜样和合作机会，从而促进其外向性和亲和性的发展。教师支持和班级文化对所有非认知能力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学校环境因素对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至关重要，学校作为儿童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场所，教师的支持和班级文化的营造对于培养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条件对非认知能力各维度存在不同程

度的影响，亲子关系、父母期望显著正向影响外向性、亲和性、情绪稳定性，父母严格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和亲和性，亲子交流显著正向影响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和亲和性，揭示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合理的父母期望、适度的严格程度以及积极的亲子交流对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为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提供了实证依据。

表3.10 外部因素对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变量		(1) 开放性	(2) 尽责性	(3) 外向性	(4) 亲和性	(5) 情绪稳定性
同伴 因素	同伴 网络	-0.001 (0.001)	-0.004 (0.002)	0.004*** (0.001)	0.006*** (0.001)	-0.001 (0.003)
学校 因素	学校 压抑感	-0.028 (0.078)	-0.205 (0.122)	0.131 (0.091)	0.032 (0.094)	-0.902*** (0.062)
	教师 支持	0.042 (0.004)	0.067*** (0.007)	0.076*** (0.005)	0.056*** (0.004)	0.035*** (0.011)
	班级 文化	0.133 (0.049)	0.298*** (0.078)	0.828*** (0.059)	0.898*** (0.060)	0.299*** (0.061)

续表

变量		(1)	(2)	(3)	(4)	(5)
		开放性	尽责性	外向性	亲和性	情绪稳定性
家庭因素	父母教育水平	0.023*** (0.009)	-0.028** (0.014)	0.036*** (0.010)	0.015 (0.010)	0.040 (0.022)
	家庭经济条件	0.063 (0.014)	-0.275*** (0.064)	0.167*** (0.049)	0.142*** (0.044)	0.306*** (0.101)
	父母严格程度	0.028*** (0.007)	0.078*** (0.012)	0.036*** (0.009)	0.025** (0.009)	-0.025 (0.020)
	亲子交流	0.011** (0.005)	0.015** (0.007)	0.034*** (0.006)	0.030*** (0.006)	0.021 (0.012)
	亲子关系	-0.035 (0.025)	0.061 (0.041)	0.098*** (0.032)	0.118*** (0.030)	0.351*** (0.067)
	父母期望	0.136*** (0.032)	0.271*** (0.050)	0.279*** (0.040)	0.270*** (0.037)	0.414*** (0.084)
	截距项	3.652*** (0.486)	9.295*** (0.756)	-1.988*** (0.610)	0.088 (0.575)	12.818*** (1.267)
样本量	3381	3381	3381	3381	3381	
调整的 R <sup>2</sup>	0.062	0.136	0.144	0.139	0.123	

注：\* p<0.1, \*\* p<0.05, \*\*\* p<0.01。

#### 四 提升非认知能力的策略：“家校社”三位一体支持网络

现有研究充分证实，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对个体生命历程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经济层面能够显著提升未来收入水平（乐君杰、胡博文，2017）；职业发展层面有助于获得更好的职业地位（刘森林、李海灵，2022）；教育成就层面则与学业表现呈正相关（雷万鹏、李贞义，2021）。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阶段作为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窗口期（秦英哲，2022），其培养成效直接取决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同作用。基于此，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支持网络，成为提升农村寄宿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必然选择。

家庭作为情感联结的基础场域，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家校互动弥补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学校应建立“家校共育工作坊”和定期家访制度，同时开发“线上家长学校”等远程参与机制，帮助外出务工家长通过每周视频沟通、“亲情留言本”等方式保

持情感联结。寒暑假期间可开展“亲子共读计划”“家庭劳动日”等活动强化亲子互动，并重视家庭文化资本传承，鼓励家长通过田间劳作、手工艺制作等日常活动传递勤劳、互助等价值观，系统培养儿童的情绪管理能力和坚韧品格。

学校需超越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构建全方位的非认知能力培养体系。通过建立“非认知能力成长档案”，引导教师在寄宿管理中关注学生的社交技能发展。课程设置上应融入生活技能训练和团队合作活动，如果蔬种植小组、公益服务小队等实践项目，同时设计阶梯式心理辅导课程，通过“逆境模拟”角色扮演、“乡村微改造”等项目培养学生的抗逆力、责任感和同理心，实现知识教育与品格培养的有机统一。

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需要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可持续的陪伴机制。依托乡镇文化站、农村少年宫等平台引入公益组织开展艺术教育、职业体验等项目，动员返乡青年、退休教师等志愿者建立“1+N”结对陪伴制度，确保每月至少两次深度交流。同时，组织寄宿儿童家庭成立“村社互助网络”，通过周末共育小组开展集体观影、田间运动会等活动，构建社区层面的支持系统，有效弥补家庭监护的不足。

最终形成的“家校社”联动机制，旨在构建“情感浸润—能力培养—社会融入”的闭环生态系统。家庭传递的价值观念通过学校课程转化为实践能力，再经由社会公益项目内化为社会责任感，形成完整的育人链条。通过建立三方联合评价机制持续追踪能力发展轨迹，确保农村寄宿儿童在情感浸润、能力培养和社会融入等方面获得系统性发展支撑，实现非认知能力的全面提升。

### 第三部分

## 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的同伴网络

# 第四章 家庭—学校双场域下父母缺位与同伴网络的弥合

## 第一节 父母外出的陪伴与监督缺失

伴随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向城市务工时选择将子女留在农村由祖辈或亲戚看管，进而形成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在长期分离与代际抚育的作用下，家庭结构呈现出“空间离散化”特征。父母角色缺位与儿童情感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缺乏亲密互动会加剧儿童的孤独感与不安全感，部分儿童甚至出现社会迟滞与心理适应障碍等问题。家庭结构空心化带来了情感淡化与家庭功能弱化的双重困境，正在消解家庭作为初级社会群体的保护功能，导致儿童在社会化进程中面临家庭监护体系失效的风险。

### 一 亲子关系疏离引发的儿童成长困境

#### （一）依恋理论视角下的情感支持危机

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见图4.1）揭示，早期亲子互动是儿童建立安全型依恋的核心机制（Bowlby, 1973）。安全型依恋儿童能够通过父母稳定的情感回应构建起“我是被爱的，世界是安全的”认知，这种由“情感安全基地”（Bowlby, 1982）支撑的主体感知，使其既保有探索的主动性，又能维持亲密与独立的动态平衡。持续的情感支持能为儿童积累关键性的心理资本（如第九章所述的安全感、自尊与社会适应能力）——这类资本恰是成年幸福感的心理基质，而父母的长期缺位直接影响心理资本的积累和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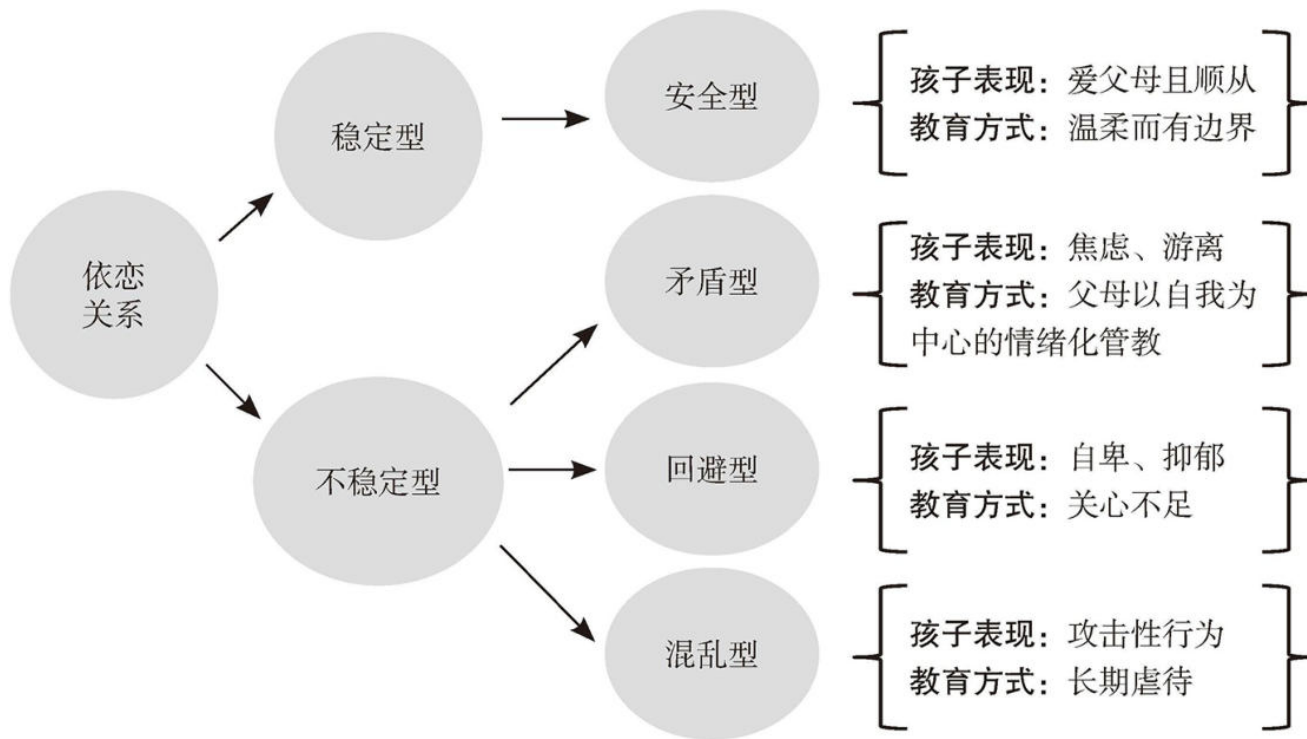


图4.1 亲子依恋关系表现及成因分析

当父母无法满足儿童的依恋需求时，儿童会形成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包括回避型和混乱型（张莹莹等，2022）。不安全依恋的儿童，由于早期情感需求未得到满足，在成年后更易出现各种心理与精神问题，如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过度焦虑或回避，常在面对亲密关系时感到不安或无法信任他人（杨雨露，2019）。儿童与主要抚养者之间形成的情感纽带，会深刻影响其日后的人际关系模式与人格发展（叶铭姗、刘颖，2022）。频繁更换养育者（如父母、祖辈、亲戚轮替监护）也会造成情感回应连续性中断，导致儿童陷入长期情感忽视状态，由此带来心理创伤和社会适应障碍（黄欣欣等，2023）。依恋理论强调情感纽带对人格发展的形塑作用，与童年经历影响人生轨迹（见第九章）形成逻辑闭环。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Delivering Support for Children to Navigate Adolescence with  
 Greater Resilience”, UNICEF China Office, 2025,  
[https://www.unicef.cn/media/20766/  
 file/Delivering%20Support%20for%20Children%20to%20Navigate%20Adolescence%20with%20Greater%20Resilience.pdf](https://www.unicef.cn/media/20766/file/Delivering%20Support%20for%20Children%20to%20Navigate%20Adolescence%20with%20Greater%20Resilience.pd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中国有至少3000万名17岁以下儿童面临情绪或行为问题。<sup>④</sup>因此，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温暖、敏感且有回应的养育环境，对他们形成安全型依恋至关重要。建立稳定养育环境，本质上是通过修复儿童的情感支持系统

来重建心理资本积累路径，这正是从个体心理发展到社会整体福祉提升的关键所在。

## （二）情感缺失带来的自我认知偏差

长期的情感空白和孤独感可能导致留守儿童自尊心的缺失，许多留守儿童可能会自我怀疑，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负面评价（朱颖，2024）。在成长关键期，父母关爱的缺位可能导致个体情感联结弱化，难以建立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基础，表现为自我评价偏低或矛盾。有的儿童因情感需求未被及时回应产生“被遗弃感”，易形成消极自我认知，或通过过度讨好、攻击性行为等扭曲方式寻求认同（陈慧敏，2023）；有的儿童存在“能力劣势”的自卑认知，在学习和社交中表现出持续性的自信匮乏与低自我效能感；还有的儿童遭遇挫折时易将失败过度归因于自身，选择性忽视优点并聚焦于自身缺陷，形成自我否定倾向（高凯，2024）。这种情感缺失如果得不到有效补偿，可能导致其成年后持续面临自我同一性建构的挑战。

## 二 父母缺位弱化家庭功能

### （一）父母长期外出削弱有效监护

《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23年4月19日，  
[https://www.stats.gov.cn/zs/tjwh/tjkw/tjzl/202304/t20230419\\_1938814.html](https://www.stats.gov.cn/zs/tjwh/tjkw/tjzl/202304/t20230419_1938814.html)。

家庭监护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这一核心主体的角色履行效能。父母的监护功能主要包括对未成年子女的生存发展保障、人身安全监护与教育引导职责，涵盖基本生活照料、身心健康成长保障、教育资源获取、合法权益维护等。2010—2020年，中国留守儿童从5491万人增至6693万人，增长了21.9%，大多数农村儿童的留守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见图4.2）。<sup>④</sup>当父母离开孩子外出务工时，核心的监护功能被动地向祖辈或亲戚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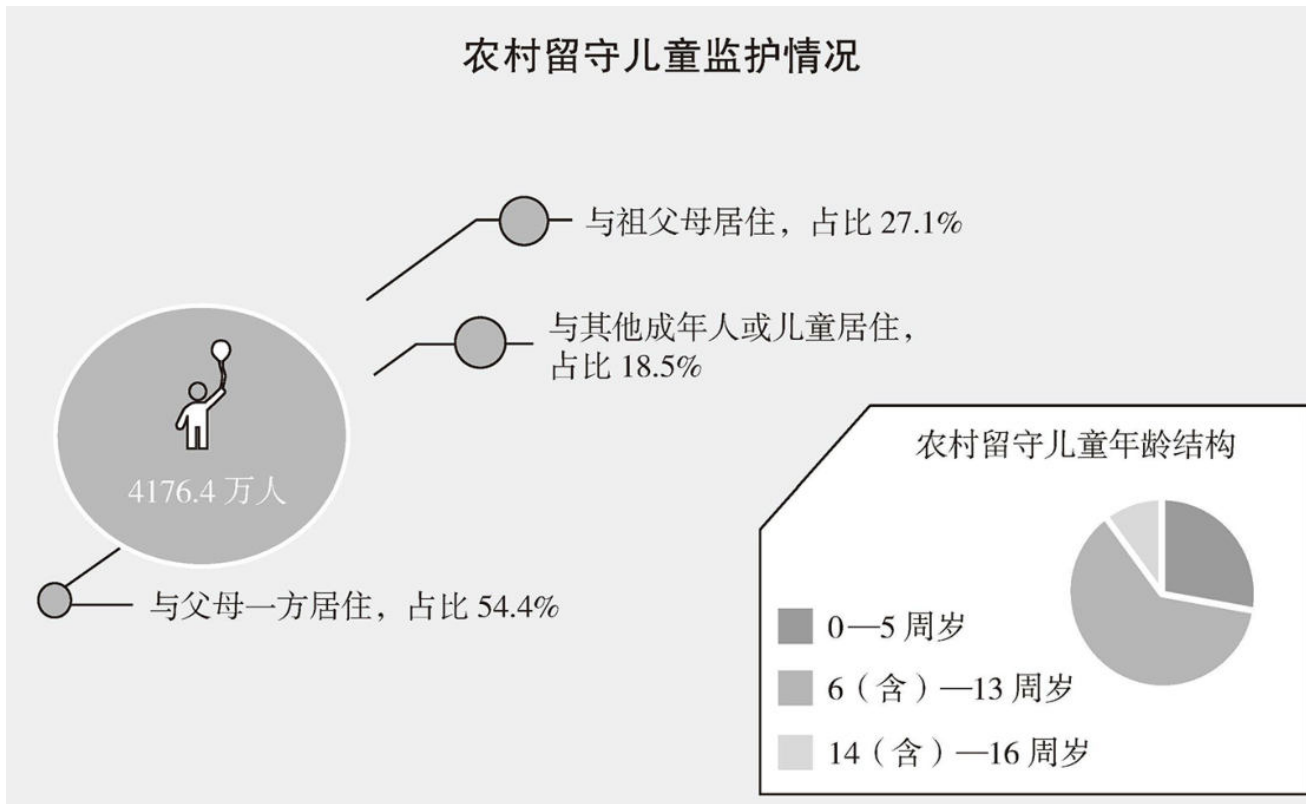


图4.2 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

老年监护群体因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健康资源有限，在教养能力上呈现明显断层（李燕平等，2023）。祖辈往往只能确保基本生活照料，在课业辅导、心理支持等需要较高教育投入的关键领域存在辅导空白，无法对孙辈进行全面且有效的监护。在亲戚代为监护的家庭中，部分儿童面临监护风险。留守儿童与亲戚共同生活时，“寄人篱下”的处境可能会诱发压抑情绪，因时刻需察言观色而形成自卑心理（焦钰雅，2023），在这种家庭关系中，儿童通常难以获得足够的温暖体验和亲密情感支持。同时，相比于亲戚家的孩子，他们在资源分配上往往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种处境容易造成儿童自我价值感的弱化和归属意识的淡薄。当前留守儿童家庭的养育模式普遍存在“重物质供给、轻情感培育”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仅能满足儿童的基本生存需求，而缺乏必要的情感回应与心理支持。这种养育方式的异化不仅违背了儿童发展的本质需求，更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造成了深层次的制度性发展缺陷。

## （二）替代性养育加大儿童行为管理的难度

父母监护缺位时，替代性养育将加剧儿童行为管理的难度，尤其是处于青春期或叛逆期的儿童。留守儿童的代际养育难题集中表现为：祖辈监护人的粗放型管理模式难以满足现代化培育需求，难以有效地沟通和引导，对儿童情绪调控与价值判断造成了负向影响。同时，祖辈对孙辈的无限宽容也容易削弱儿童对规范的敬畏感。学校虽承担着行为规训的公共职能，但面对大规模留守群体时，对儿童行为规范的教育会因缺乏家庭的配合而流于表面。儿童在校时被动遵守纪律，回家后则在监管松弛的环境中表现出行为失序倾向，这种虚假性的“场景化服从”，容易导致儿童养成散漫态度和反叛性行为。

布迪厄的“惯习传递”机制中的“惯习”是指将家庭的日常互动行为内化形成自身的行为倾向，本质上是以父母为中介的社会规则传授。父母的言传身教会在子女社会化过程中形塑其惯习（habitus）——通过长期内化而形成的一套关于文化认知、社会行为及未来发展的持久性倾向系统（朱红、张文杰，2020）。家庭关系中隐含的资本结构，通过日常互动的细节和方式等途径被内化到家长和子女的身上，从而使得家长和子女都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心态结构（Quick et al., 2021）。在青春期这一关键的价值形塑期，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中普遍缺乏父母的行为示范和正向价值观引导，导致其更易受到不良网络信息和认知偏差的影响。这种监护缺位状态往往诱发逃学、早婚等非理性行为选择，而承担代监护职责的祖辈或亲戚由于代际隔阂和认知局限，通常难以及时觉察并纠正这些行为偏差。

### （三）父母缺席对学业成就的间接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中获得的学业支持普遍不足。研究表明，父母作为学习监督者和激励者的角色至关重要：当父母积极参与子女教育活动时，能够显著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内在动机（Guballa et al., 2025）；父母对教育的关注度会直接影响子女的学习专注度和自我效能感（张竞月、刘志发，2024）。然而，在父母长期缺位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往往面临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由于缺乏直接的情感支持和正向激励，容易产生学习倦怠（李金娥，2012），甚至发展出学业逃避倾向。这种监护真空状态还使留守儿童更易受到电子游戏沉迷、不良社交活动等外界负面因素的干扰，这些行为不仅分散其学习注意力，还会导致学业成绩下滑（孟亚男、张璨，2022）。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期亲情缺失引发的自卑、孤独等心理问题，会进一步损害留守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邵锋，2024）。

父母缺席还导致了留守儿童在社交活动和资源获取中的弱势地位。农村地区本身教育资源不足，加之缺乏父母引导，孩子在课外辅导、兴趣班等拓展性学习机会的选择上更为受限。部分家庭虽因父母外出务工获得经济改善，但在教育投入方面仍有不足，难以全方位支持子女的学业发展，导致留守儿童的学业竞争力持续弱化，不利于其未来的发展。

## 第二节 同伴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主体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的同伴对于儿童社会化的过程至关重要。中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孟母三迁。在孟子小时候，孟母为了让他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曾经三次搬家。第一次，孟母把家安在了墓地附近，不料孟子竟模仿丧葬仪式玩耍。于是，孟母把家搬到了市场附近，可是孟子又模仿商人叫卖。最后，孟母把家搬到学校附近，孟子便开始模仿周围的学生读书。正是学校氛围和良好的同伴，培养了孟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他日后成为儒家代表人物奠定了重要基础。同伴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主体，他们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与同伴的互动，帮助儿童学习社交技能，获得情感支持，并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 一 同伴互动：儿童社会技能的“训练场”

儿童的社会化过程表现为初始社会化和预期社会化两种形式，这是儿童为适应当前及未来社会生活而进行的学习过程（李婧怡，2010）。同伴互动为儿童社会技能的习得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训练场”，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儿童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学习和掌握社会交往的基本技能。

#### （一）游戏中的技能学习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指出：“游戏创造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在游戏情景中，儿童的表现往往超越其实际年龄水平，展示出高于他日常行为的发展潜能。”（维果茨基，2005）研究表明，游戏作为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其社会互动属性与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合作能力及亲社会行为发展呈显著正相关（井卫英等，2002）。游戏是儿童发展社会能力的关键媒介。通过角色扮演和互动，儿童在游戏中自然地习得合作、分享和冲突解决等社会规则。这种体验式学习为儿童后续复杂的社会适应奠定了基础，其获得的社会技能将持续影响他们在学校和社区环境中的人际互动质量。

#### （二）冲突中的技能提升

同伴冲突是儿童社会互动中的常见现象。作为一种具有挑战性的人际情境，其有效解决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曹亚杰，2008）。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冲突情境能够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和能力发展，特别有助于社会认知水平的提升。冲突处理过程不仅能够推动认知发展，更能培养合作能力与社交技巧（李安，2002）。通过持续的冲突应对与解决实践，儿童得以逐步发展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会交往策略，从而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维持平衡。从儿童同伴冲突的整体变化趋

势来看，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自控能力和观点采择能力逐渐发展，同伴冲突解决能力也呈现积极的演进趋势（黄胜梅，2008）。儿童在解决冲突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其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 （三）合作中的技能深化

合作作为同伴互动的重要形式，为儿童社会性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社会化情境。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儿童通过社会互动获得超越其原有认知水平的新知，并通过内化过程实现认知重构和意义建构（孙贺群、王小英，2009）。研究表明，同伴合作不仅能促进认知发展，也能提升儿童的社会行为能力，具体表现为亲社会行为增加与攻击性行为减少的双向改善。更重要的是，合作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网络，这种支持性人际关系既为儿童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又创造了持续的社会学习机会，从而形成“合作—关系强化—技能提升”的良性循环，进一步促进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 二 同伴关系：儿童社会情感的“试金石”

基于群体成员对特定个体的情感倾向，同伴关系可划分为同伴接纳与同伴拒绝两种基本类型。前者反映个体在同伴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后者则表征个体遭受群体排斥的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同伴接纳程度与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呈显著正相关：被同伴接纳的儿童往往处于更有利的学习环境中，其在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及共情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相反，遭受同伴拒绝的儿童则普遍在情绪调节和情绪控制等维度呈现发展滞后的特点（邓宇泽等，2025）。

### （一）同伴关系与情感认同

同伴接纳作为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个体心理适应具有重要影响。社会认同理论指出，儿童通过获得群体认同来满足归属需求，这种心理机制具体表现为：当儿童获得群体认同时，其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水平显著提升；反之，持续遭遇同伴排斥则可能导致自卑情绪和社交焦虑的发展。研究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不仅为儿童情绪理解和情绪表达提供实践场域，更能显著增强其心理韧性（谢桂华等，2022）。

### （二）同伴关系与情绪调节

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能力与个体社会行为发展与心理健康存在双向影响关系。有效的情绪调节能够促进个体社会行为的发展并且维持稳定的心理健康。反之，不良的情绪调节可能成为导致个体社会行为的障碍，并引发心理健康的不稳定。同伴是儿童学习情绪表达的重要对象（苏林雁，2019），在同伴交往中，儿童

通过观察和模仿同伴的情绪反应，学习如何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此外，同伴之间的积极互动能够提供情绪支持，帮助儿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同伴支持能够降低儿童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同伴排斥则可能导致情绪问题的加剧。因此，良好的同伴关系不仅有助于儿童情绪的积极表达，还能促进他们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同伴关系发挥着成年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而不良的同伴关系会导致儿童产生适应困难，甚至可能对成年后的社会适应带来消极影响（郑杨婧、方平，2009）。

### 三 同伴影响：儿童行为规范的“塑造者”

儿童的社会行为包含一般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它们是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亲社会行为的习得有助于儿童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而反社会行为的习得会影响其人格的形成，进而阻碍其社会化的顺利发展。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观察学习是儿童社会行为习得的重要途径（Bandura et al., 1986）。儿童在融入同伴群体的过程中，会观察同伴的行为，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 （一）同伴榜样与行为模仿

列宁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接触不同类型的同伴，而不同类型的同伴对其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通过观察和模仿良好同伴的行为，有助于促进和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使其更快地学习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反之，不良同伴的持续影响可能导致儿童习得反社会行为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班杜拉将行为的习得与行为的表现区分开来。他认为行为的习得是一种认知进程，而行为的表现是一种动机过程。具体来说，是否执行已习得的反社会行为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果儿童看到不良同伴受到惩罚，那么就有可能不会执行已习得的反社会行为（杨彩霞，2001）。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同伴，都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儿童社会行为的形成。

#### （二）群体压力与行为内化

同伴群体压力是指当个体与群体的意见或规范不一致时，为维持群体和谐关系而被迫遵循群体的规则所产生的潜在心理压力（甘红缨、苏焕，2011）。同伴群体通常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规范，儿童在融入过程中，受群体压力影响会逐渐内化这些行为规范。因此，群体压力并非完全负面，它能够促使儿童更好地适应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例如，在注重团队合作的群体中，儿童会习得合作技巧与规则遵守，这正是群体压力积极作用的体现。然而，如果群体规范与社会规范相悖，儿童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不良影响。特别是由行为失范同伴构成的群体环境，对其成员的健康成长构成严重威胁。

## 第三节 班级—宿舍整体网中更真实的同伴

在儿童的活动场域中，家庭、班级和宿舍是三个主要的活动场所，它们共同构成了儿童的核心生活圈。对留守儿童来说，尤其是寄宿的留守儿童，班级—宿舍场域又是其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与家庭场域相比，班级—宿舍整体网提供了一个更加平等、自由、亲密的社交空间。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社交模式和互动场景，儿童有机会建立起更加真实的同伴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父母缺位带来的影响。本节将深入探讨班级—宿舍整体网的特点，并揭示为何在班级—宿舍整体网中能够孕育出更真实的同伴。

### 一 班级与宿舍：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

班级与宿舍是儿童除家庭以外最重要的成长环境，可视为其“第二家庭”。儿童在其间度过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时光，完成日常学习与生活活动。这两个场域为儿童提供了稳定、持续的同伴互动环境，使他们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建立深厚的同伴关系，并经历成长的喜怒哀乐。班级与宿舍的独特环境，使其成为儿童形成和发展同伴关系、进行社会化学习的关键场所。

#### （一）班级中的同伴关系

班级作为儿童学习知识、发展能力的主要场所，也是其社会化进程中接触的第一个“小社会”。在班级中，儿童通过课堂互动、课后讨论等方式进行思考交流，潜移默化地了解并认同同伴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面对学习中的挑战，同伴间倾向于结成互助合作的小团体，共同解决问题，参与竞争，这些共同经历有助于增进彼此的亲密感。此外，班级也是儿童兴趣和潜能得以展示的舞台。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儿童提供了发现同伴特长和兴趣的机会。在班级这个大集体中，儿童得以在相对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展现自我，促进其个性发展。

#### （二）宿舍中的同伴关系

相较于班级，宿舍为儿童提供了更为私密的生活空间，是培养其独立生活的实践场所。在宿舍中，儿童进行着大量的非正式社交，彼此展现更为真实的状态。脱离父母的日常照料，儿童需独立处理个人事务，如洗漱、洗衣、整理床铺及清洁卫生等。这一过程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宿舍生活也使儿童有机会深入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如作息规律和卫生习惯等。在宿舍的日常相处中，儿童展现出正式社交场合中难以观察的一面，如睡眠状态和个人仪态。此外，宿舍作为相对平等自由的互动场域，为儿童提供了充分的自主交流机会，使其能够就学习、生活等议题展

开广泛讨论。特别是对寄宿的留守儿童，相似的留守经历创造了丰富的共同话题，这种同质性的生活背景促进了同伴间的深度交流。

## 二 真实同伴关系的形成机制与特点：基于班级—宿舍整体网视角

班级与宿舍构成了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也是其结识真实同伴的关键环境。在这里，儿童通过频繁互动增进了解；因共同经历产生情感共鸣与归属感；并在平等的身份关系中展现真实自我，从而建立起真实且深厚的同伴关系。

### （一）频繁互动：同伴关系建立的基石

在班级—宿舍整体网中，空间邻近为儿童之间频繁互动提供了天然契机，而频繁互动正是形成真实同伴关系的起点。这种互动超越了表面了解，使儿童能够深入彼此的内心世界，建立起真实而深厚的情感联系。在班级中，儿童共同参与学习活动小组讨论和任务完成；在宿舍中，他们朝夕相处，从日常起居到课余闲谈，这些互动为他们提供了充分了解彼此性格、兴趣和习惯的机会。

### （二）共同经历：情感共鸣与归属感的纽带

对于留守儿童，尤其是寄宿的留守儿童，共同经历是建立真实同伴关系的重要基础。相似的家庭背景，特别是父母的缺位，成为他们情感的纽带，容易引发情感共鸣。这种共鸣不仅能够缓解父母缺位带来的情感压力，也让他们在同伴群体中获得归属感和情感支持。在班级—宿舍整体网中，儿童通过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彼此认同，感受到对方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建立起基于信任与理解的真实同伴关系。

### （三）身份平等：真实自我展示的保障

在班级—宿舍整体网中，儿童拥有平等的学生身份。相较于家庭和师生关系中长幼尊卑，这种平等关系为儿童提供了更加自由的表达空间。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即使产生分歧，也能通过平等的讨论和争辩来解决问题。例如，在班级中，同学们可以就某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在宿舍中，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分享彼此的兴趣爱好。这种平等且自由的交流方式，使得儿童能够更加真实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和想法，从而促进真实和深厚的同伴关系的形成。

## 第四节 家长与老师之间：同伴网络的弥合作用

家长与教师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中很难形成有效的联动。外出务工的家长，不仅缺席课业辅导、兴趣发展等教育支持的关键环节，还缺席了家校沟通中必要的实践指导。而教师在大班额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下，难以做到对每个孩子的细致关注和个性化引导。尤其是家校沟通的断层，更加大了共育的难度。但同伴网络作为社会支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位。

## 一 家校沟通断层：家长与教师的隐性责任冲突

多数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仅限于通过期末成绩单来了解其学业情况，而教师与家长的沟通往往也只限于成绩的通报与在校表现的反馈。现实中，农村教师与外出家长间的沟通往往会陷入“有事找不到人，无事无须打扰”的消极循环。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隔阂，本质上是家校双方陷入了功能主义的认知误区。部分教师倾向于将工作场域限定于校园内部，面对留守儿童的特殊需求时，往往采取“重点帮扶对象”的单一化标签，并以标准化方式回应个体差异，未能充分关注其个性化需求。外出务工的家长则被经济理性主导，简单地将教育责任货币化为经济补偿。这种工具化思维消解了教育共同体的精神内核，使家校互动沦为发通知、填表格等日常琐事，类似于打卡完成任务。更深层的系统性障碍在于，农村学校尚未建立适应人口迁移特征的专业家校沟通机制——传统的家访制度在外出务工潮中形同虚设。

家校沟通断层使教师既不能精准掌握学生情绪波动的家庭诱因，也难以判断学生成绩下滑背后的环境干扰。教育介入的精准性，因家庭视角的缺失而大打折扣，暴露出教育支持系统的缺陷，导致家长与老师都难以完全理解孩子的成长困境。而这一问题在留守儿童群体中则更为严峻——他们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家校沟通与协作不仅尤为重要，更构成了其健康成长的基础保障。这种沟通联结的本质并非单纯的信息传递，而是构建以学生为核心的情感支持网络与成长资源平台，其效能取决于双方的信任浓度与协作智慧。

## 二 家校共育合力难——难在何处？

首先，家校教育之间存在责任断层。农村留守儿童的家校共育问题长期受到社会关注，其困境源于家庭与学校在角色、资源及协同机制上的失衡。家长常年外出务工导致家庭教育的天然缺位，成为家校共育的重要挑战。传统家庭结构中，家长是子女情感支持与行为监督的直接来源，而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往往转交给教育资本薄弱的祖辈或其他亲属。他们虽能承担基本的监护责任，但难以响应学校的育人要求。因此，学校被迫成为承接留守儿童家庭辅导与心理培育的“代偿性家庭”（董磊明、李欣灿，2024），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就会出现责任断层。

其次，教育支持的有效性往往受限于师生比例的失衡。农村教育资源紧缺，教师往往身兼多职，既要应对繁重的教学任务，还需兼顾留守儿童的日常照料与心理疏

导。当一名教师需要应对几十名儿童的全天候需求时，管理效果必然会下降。家校共育所需的个性化沟通、家访及活动组织等配套措施常因人力不足而被搁置。此外，农村家庭居住分散，交通距离进一步增加了教师与监护人互动的成本，导致信息传递滞后或失真，难以达成教育共识。

最后，家长与学校之间存在认知差异。在一些农村地区，教育观念仍较为传统，家长的教育理解更多集中在学业成绩上，而忽视了孩子情感和心理健康的成长。这种观念的偏差使得家长往往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而忽略了孩子的整体发展。这种误区进一步加大了家校合作的难度，导致家校共育无法形成合力。

### 三 家校缺位何以补？——同伴网络的弥合作用

现代教育系统中，家庭与学校被赋予“双主体”的监护使命：家庭以情感联结为纽带承担培育人格的责任，学校以知识传承为核心承担教育培训的责任。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剧以及教育竞争异化，家庭结构松散化与学校教育功能窄化已成为普遍困境。父母的长期缺位持续弱化了家庭情感支持与行为引导功能，教师也在心理健康干预与价值观引导层面有所欠缺。在家校合作缺位的教育环境下，同辈群体构建的同伴网络凭借其社会性与情感支持功能，展现出独特的弥合价值。这类群体不仅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缓冲与替代作用，更通过情感联结填补其成长空缺，成为家校教育空缺中的重要支持系统。

#### （一）情感支持的即时弥合效应

缺少家庭情感支持导致留守儿童陷入认同焦虑与孤独困境，而教师群体在处理儿童的情绪问题时也会受到时滞和“代沟”的阻碍。同伴间的情感网络不同于权威式的家长关怀，凭借平等交往的特性和天然具备的接纳异质个体的能力（Veenstra and Laninga, 2023），在同龄人之间快速搭建起重要的情感支持平台。这种对等式的交流更能让同伴敞开心扉，使儿童能够通过分享情绪、玩笑互动等行为建立信任纽带，并在其中寻找认同感与归属感（叶佳滢、曹晓君，2019）。当儿童面临学习压力或情感困惑时，来自同伴的鼓励与支持不仅能缓解孤独感与焦虑（吉玉芳，2024），更能帮助他们及时调整心态。在非结构化场景中的即时回应远比教师办公室的定时谈话更能发挥情绪疏导作用。因为年龄相仿且经历相似，彼此的同理心让安慰突破了语言技巧层面升华为精神共鸣。虽然同伴支持无法替代父母关爱，但这种类似家庭的情感依赖通过互助与陪伴正悄然填补着情感空缺。

#### （二）同伴网络中的学业支持

同伴网络在知识传递与学习支持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和家长往往受时间与精力的限制，对儿童的直接关注较少，而同伴之间的互动则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多维度

的学习平台。在学校中，同伴间的讨论与合作能够促进知识的传播，激发学习兴趣并提供解题思路。这种由同伴驱动的学习氛围，既补充了家长与教师无法完全覆盖的教学空白，也增强了儿童的学习动力和自主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认知冲突是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在同伴之间的互动中，这种冲突能够促进儿童重新组织自己的认知结构，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认知发展（Piaget, 1950）。维果茨基则强调“最近发展区”的概念，认为儿童通过与能力更强的同伴合作，能够突破自身的认知限制，从而达到更高的认知水平（Vygotsky, 1978）。具体而言，校园中的知识共享不仅表现为解题思路的传递，更延伸至学习策略优化、批判性思维培养以及学习焦虑纾解。这种依托同伴网络的学习模式增强了儿童的学习主体性和积极性。

### （三）同伴关系与儿童社会化的联结

建立同伴关系有助于塑造基础的社交技能，深入培养情感觉察与调控能力。在家庭支持缺失的情况下，儿童可能长期处于社交孤立状态，容易在同理心发展、情绪管理、矛盾解决能力等维度出现滞后，并难以应对同伴竞争、资源分配等实际场景中的复杂问题。而健康的同伴则为儿童社会化提供了天然的练习场，如在团队协作中理解分工价值，在游戏规则的协商中学会妥协与坚持，在调解冲突的过程中掌握话语技巧……通过与他人接触和认知发展，能逐渐提升儿童的非语言沟通解读能力（如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王道阳、殷欣，2015）。在与同伴的交往中，儿童能够体验到友谊的快乐、失去朋友的悲伤以及被拒绝的失落等。在大量社交实践中获得的情感体验不仅促进了儿童的情感智力发展，还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理解和表达情绪（姚志莉，2024），从而形成良性的情感反馈机制。具有稳定同伴支持的儿童在青春期更易建立健康的自我认同，其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情绪调节区域活跃度显著高于社交孤立者，这种生理层面的差异将持续影响成年后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式（Somerville et al., 2013）。因此，同伴网络既是社会适应的训练场，更是心理韧性的培育温床。

## 四 从管理到引导：家校赋能同伴网络

同伴互动作为一种双向社会化机制，对儿童发展产生着多维度的影响：积极的同伴互动能够促进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和亲社会行为的形成；而消极的互动模式则可能引发偏差行为，包括攀比、排斥甚至欺凌，这些行为不仅会阻碍学业发展，更可能导致情绪调节障碍和社会适应困难。尽管同伴网络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但其自发性和非正式性特征决定了其功能存在局限性。因此，需要通过家校协同机制的创新性重构，实现教育主体角色从传统管理者向现代引导者的范式转换，通过系统化的干预策略将同伴互动纳入发展性教育框架，构建家庭情感支持、学校规范引导与同伴群体影响三者互动的支持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同伴

网络的积极效应，抑制其负向影响的扩散，为儿童提供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的成长支持。

## （一）教师角色：从学生管理者转向同伴网络的协调者

在“家校赋能”框架下，教师角色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上，教师主要承担学生管理者职能，聚焦于学业督导与行为规范；而在赋能范式下，教师需要转变为同伴互动的系统性协调者。这种角色重构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教师需超越传统的课堂管理范畴，通过识别和培养同伴领袖，建立生生互助的支持网络；其二，通过赋权策略激发学生在社交场域中的主体性，使其在同伴互动中既获得情感支持又增强学习内驱力；其三，构建制度化的班级互动规范，包括制定同伴互助公约、实施轮值领导制度等结构化措施，系统培育尊重、合作的正向互动模式。此外，教师还应整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通过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干预方式，提升学生应对社交困境的元认知能力，从而在班级生态中形成具有情感支持功能和行为调节作用的动态网络系统。这种角色转型本质上是从单向管控到多维协调的教育范式跃迁，其核心在于通过社会性赋权实现同伴网络的育人价值转化。

## （二）家长远程介入：提供情感支持与社交引导

在留守儿童的教育中，父母的缺席往往导致孩子在情感和行为上的空缺。“家庭赋能”强调家长在重要时间节点的远程介入，而非常规的面对面教育。家长可以通过远程参与孩子的特殊事件（如生日宴会、节假日等）来加强与孩子的情感联系。例如，家长可以通过视频通话或录制祝福视频的方式，邀请孩子的同伴一同参与，增强孩子在同伴群体中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种介入不仅帮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同时也促使家长关注孩子的社交网络，避免孩子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中成长。家长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也要在与儿童的远程交流过程中，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友谊观和社交观，帮助儿童在社交中学会如何选择同伴，鼓励他们与积极、乐观的同伴建立深厚的友情关系。

总的来说，家校赋能同伴网络是将家校共育深化为一种互动式、协同式的教育干预策略，不仅强化了教师在同伴网络中的引导作用，还鼓励家长远程参与孩子在同伴网络中的情感教育和行为引导过程。通过这些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校教育缺失的问题。

## 第五章 留守儿童与农村寄宿儿童的同伴网络

### 第一节 留守儿童更愿意与留守儿童交朋友吗？

同伴选择效应指出，个人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在行为、人格特质和态度方面相似的人建立友谊（Montoya and Horton, 2013），他们通过选择相似的同伴来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选择也会导致群体内部的内质性增加（Kandel, 1978）。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会对同伴产生更强的依赖。他们在选择同伴时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和自己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如和同样是父母外出务工的个体做同伴。这主要是源于他们在相似的成长环境中共同的情感体验。二是和自己有相似的人格特征，如留守儿童有长期的独立生活经历，情绪相对稳定，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情绪稳定的个体做同伴（吴贾、吴莞生，2024）。因此，留守儿童更愿意选择留守儿童做朋友。

在研究同伴效应时，现有研究多测量学生个体网络，对于班级整体的同伴网络研究尚且不足，这导致测量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即便有个别研究涉及班级整体网，也仅仅简单地测量了一般意义上的好友网络，并没有测量不同功能的好友网络，因此无法刻画班级整体的多功能网络结构。本章首次基于儿童在校交友功能测量了儿童学习、玩耍、八卦和情感等班级整体网络，扩展了现有文献对好友网络的定义，能够更准确地观测到留守儿童的多功能好友网络。

本章的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2019年4—5月在四川省进行的整体网调查，在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和九年级中共抽取38个班的1602名学生参与调研，最终收集有效问卷1598份。以班级为单位，让学生写出平时和自己一起做功课、分享八卦、玩耍和诉说心事的对象，这四项选择均不限数量，也没有关系强弱之分，根据学生问卷形成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同时，我们让学生按照关系的密切程度从高到低依次写出最好朋友的姓名（最多5个），从而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好友网络。

我们利用班级内学生两两关系数据来检验留守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ln\left(\frac{Friend_{cij}}{1-Friend_{cij}}\right)=\beta_0+\beta_1LB_{cj}+\beta_2X_{ci}+\beta_3\Delta X_{cij}+\pi_c+\varepsilon_i \quad (5.1)$$

其中,  $Friend_{c_{ij}}$ 表示班级 $c$ 中学生 $i$ 与学生 $j$ 是不是好朋友(有连接), 由于该变量是二分变量, 我们选用Logit模型。此处有学习、八卦、玩耍、情感和好友五种好友网络, 我们分别观察五种网络中学生 $i$ 和学生 $j$ 是否有连接, 如在学习网络中, 学生 $i$ 和学生 $j$ 是一起学习的好友即有连接, 赋值1; 如果没有一起学习即无连接, 赋值0。学生 $i$ 为社会网络源节点, 学生 $j$ 为社会网络的目标节点。

两两关系数据中我们只控制了学生的个体特征及两个学生个体特征的差异。

$LB_{c_j}$ 表示班级 $c$ 中学生 $j$ 的留守状态,  $X_{c_i}$ 为班级 $c$ 中学生 $i$ 的个体特征<sup>④</sup>,  $\Delta X_{c_{ij}}$ 为学生 $i$ 和学生 $j$ 个体特征的差异,  $\pi_c$ 为班级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

留守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按照学生 $i$ 的留守状态分为两组, 当学生 $i$ 为留守儿童时,  $\beta_1$ 表示留守儿童作为源节点, 其与留守儿童成为朋友的概率和与非留守儿童成为朋友的概率差; 当学生 $i$ 为非留守儿童时,  $\beta_1$ 表示非留守儿童作为源节点, 与留守儿童成为朋友的概率与非留守儿童成为朋友的概率差。

表5.1显示, 当源节点为留守儿童时, 目标节点的留守状态对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好友网络的连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他与非留守儿童分享班级八卦信息的发生比比和留守儿童分享八卦信息的发生比要高9.4%, 他与非留守儿童一起玩耍的发生比比和留守儿童一起玩耍的发生比高出7.1%, 他和非留守儿童成为好朋友的发生比比和留守儿童成为好朋友的发生比高13.6%, 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我们还发现, 留守儿童更可能和留守儿童共同学习和交流烦心事, 但这一结果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推断, 在班级中并没有出现留守儿童间的群聚现象, 而是呈现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一起玩耍、八卦、交友。也就是说, 留守儿童并不是更愿意和留守儿童交朋友。

从源节点和目标节点之间的差异变量来看, 性别相同、班干部身份相同对社会网络连接影响为正, 意味着同性别、同为班干部的同学在网络中连接的可能性更高。零花钱数量相近的同学更有可能在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连接。该结果与既有文献一致, Campigotto et al. (2022) 也发现同性别相近的中学生更容易成为好朋友。

表5.1 目标节点留守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结果(源节点为留守儿童)

变量	被解释变量：源节点到目标节点间是否存在连接				
	学习网络	八卦网络	玩耍网络	情感网络	好友网络
目标节点留守状态	0.024 (0.041)	-0.094** (0.044)	-0.071* (0.038)	0.010 (0.056)	-0.136*** (0.051)
源节点个体特征：	0.086**	0.218***	-0.113***	0.208***	0.036
性别	(0.040)	(0.043)	(0.038)	(0.056)	(0.050)
身高	-0.007*** (0.003)	0.015*** (0.003)	0.019*** (0.003)	-0.004 (0.004)	0.003 (0.003)
体重	0.017*** (0.003)	0.012*** (0.004)	-0.003 (0.003)	0.004 (0.005)	0.008* (0.004)
寄宿	0.014 (0.053)	0.157*** (0.060)	-0.067 (0.051)	0.240*** (0.074)	-0.042 (0.067)
独生子女	0.035 (0.054)	-0.070 (0.057)	-0.055 (0.049)	-0.078 (0.074)	0.014 (0.064)
班干部	0.308*** (0.042)	0.301*** (0.046)	-0.038 (0.040)	0.167*** (0.058)	0.034 (0.053)
学业表现	0.059*** (0.020)	0.021 (0.022)	0.043** (0.019)	0.056** (0.028)	0.042* (0.025)
零花钱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续表

变量	被解释变量：源节点到目标节点间是否存在连接				
	学习网络	八卦网络	玩耍网络	情感网络	好友网络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 的差异：性别	0.788 <sup>***</sup> (0.042)	0.940 <sup>***</sup> (0.045)	1.468 <sup>***</sup> (0.042)	1.466 <sup>***</sup> (0.067)	1.737 <sup>***</sup> (0.064)
身高	-0.004 (0.004)	-0.012 <sup>***</sup> (0.004)	-0.013 <sup>***</sup> (0.003)	-0.011 <sup>**</sup> (0.005)	-0.014 <sup>***</sup> (0.005)
体重	-0.011 <sup>***</sup> (0.003)	-0.004 (0.004)	0.002 (0.003)	-0.012 <sup>**</sup> (0.005)	-0.002 (0.004)
寄宿	-0.369 <sup>***</sup> (0.058)	-0.357 <sup>***</sup> (0.063)	-0.208 <sup>***</sup> (0.057)	-0.057 (0.084)	-0.078 (0.076)
独生子女	-0.017 (0.048)	-0.077 (0.051)	0.010 (0.044)	-0.029 (0.065)	-0.084 (0.058)
班干部	0.554 <sup>***</sup> (0.040)	0.300 <sup>***</sup> (0.042)	0.130 <sup>***</sup> (0.038)	0.189 <sup>***</sup> (0.055)	0.203 <sup>***</sup> (0.049)
学业表现	-0.094 <sup>***</sup> (0.020)	-0.049 <sup>**</sup> (0.021)	-0.081 <sup>***</sup> (0.019)	-0.043 (0.027)	-0.136 <sup>***</sup> (0.025)
零花钱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常数项	-1.590 <sup>***</sup> (0.319)	-4.916 <sup>***</sup> (0.348)	-4.578 <sup>***</sup> (0.309)	-3.360 <sup>***</sup> (0.454)	-3.766 <sup>***</sup> (0.402)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20946	20946	20946	20946	20946
R <sup>2</sup>	0.048	0.065	0.086	0.069	0.088

注：1. 被解释变量为源节点到目标节点间是否存在连接，即源节点是否认为目标节点是他（她）的好朋友。2.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差异中性别、寄宿、班干部的取值规则为源节点与目标节点相同为1，不同为0；例如，源节点和目标节点都寄宿或者都不寄宿则赋值1，其中一个寄宿、一个不寄宿赋值0。3.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差异中身高、体重、学业表现定义为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取值之差并取绝对值，0说明两者相同，值越大说明差距越大。4. \* p<0.1, \*\* p<0.05, \*\*\* p<0.01, 括号中为标准误。5. 回归数据为两两关系数据，是有向网络数据，即班级内部任意两个学生中间会形成两个观测值。

我们进一步观察非留守儿童的交友情况，表5.2显示，当源节点为非留守儿童时，他和留守儿童一起学习的发生比比与非留守儿童的发生比高7%，该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他和留守儿童一起玩耍的发生比比与非留守儿童的发生比高9.1%，和留守儿童成为好朋友的发生比比与非留守儿童的发生比高6.9%。这与表5.1的结果基本相符，非留守儿童更可能和留守儿童一起玩耍和成为好朋友。结合表5.1和表5.2的结果我们发现，留守儿童之间并没有形成群聚，非留守儿童间也没有形成群聚，也没有发现非留守儿童“孤立”留守儿童的证据，与预设不同的是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多个班级整体网中更容易连接在一起，形成交融状态。

表5.2 目标节点留守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结果（源节点为非留守儿童）

变量	被解释变量：源节点到目标节点间是否存在连接				
	学习网络	八卦网络	玩耍网络	情感网络	好友网络
目标节点留守状态	0.070** (0.032)	0.032 (0.032)	0.091*** (0.029)	0.025 (0.043)	0.069* (0.039)
常数项	-2.621*** (0.235)	-4.831*** (0.240)	-4.705*** (0.217)	-3.524*** (0.318)	-4.553*** (0.300)
源节点的个体特征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的差异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40275	40275	40275	40275	40275
R <sup>2</sup>	0.044	0.061	0.096	0.061	0.097

注：1. 被解释变量为源节点到目标节点间是否存在连接，即源节点是否认为目标节点是他（她）的好朋友。2.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差异中性别、寄宿、班干部的取值规则为源节点与目标节点相同为1，不同为0；例如，源节点和目标节点都寄宿或者都不寄宿则赋值1，其中一个寄宿、一个不寄宿赋值0。3.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差异中身高、体重、学业表现定义为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取值之差并取绝对值，0说明两者相同，值越大说明差距越大。4. \*p<0.1, \*\*p<0.05, \*\*\*p<0.01, 括号中为标准误。5. 回归数据为两两关系数据，是有向网络数据，即班级内部任意两个学生中间会形成两个观测值。

## 第二节 多维网络中留守儿童的网络中心性

本节首先分别给出留守儿童在社会网络中位置的图像证据，再用个体数据检验留守状态和各网络中心性的关系。

## 一 图像证据

本节以LJ学校六年级学生为例，展示五种班级整体网。总体而言，学习网络、八卦网络和玩耍网络密度较高，其中八卦网络密度最高，说明学生间分享班级八卦信息频繁；而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密度较低，说明学生遇到烦心事时有相对固定的倾诉对象，班级内部好友关系也相对稳定。

图5.1可以看出在五种网络中留守儿童占据中心位置较少，多处于边缘位置。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入度更小，特别是在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体现得更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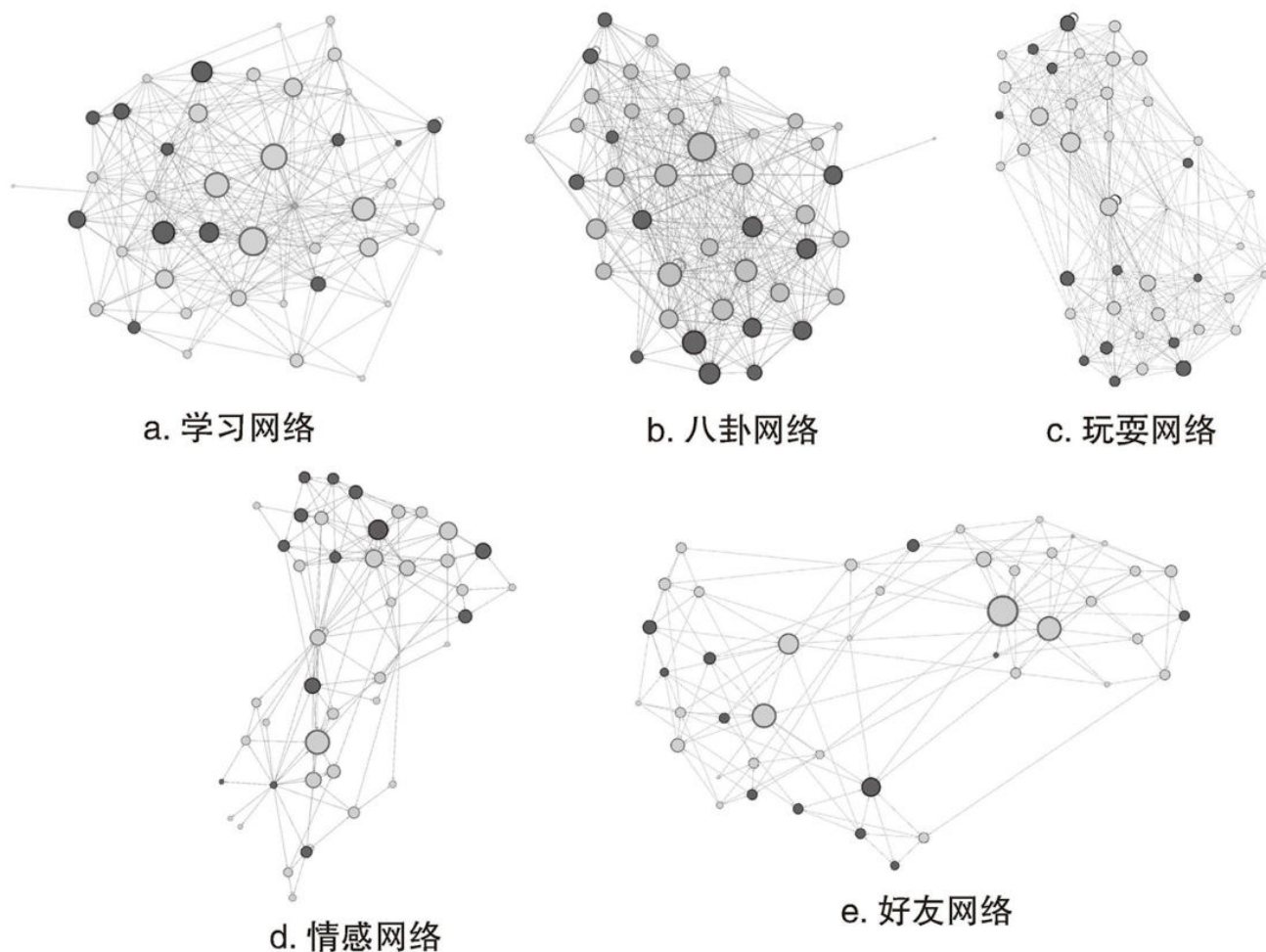


图5.1 LJ学校六年级班级整体网络

注：图中深灰色点代表留守儿童，浅灰色点代表非留守儿童；点的大小说明了入度大小，点越大，入度越大。

## 二 留守儿童的网络中心性

笔者以个体为基本观测值，计算了入度（In-Degree）、出度（Out-Degree）、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紧密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等（Freeman, 1977; Freeman, 1978; Bonacich, 1972）5种中心性指标。这5种中心性指标均为社会网络分析中度量节点中心性的常见指标（Borgatti, 2005）。在有向网络中，学生*i*的出度是指从*i*出发的边的条数，入度是指向*i*的边的条数。将入度和出度除以班级人数，就得到了入度中心性和出度中心性。学生*i*的中介中心性是指*i*到班上其他所有学生的最短距离均值的倒数。紧密中心性是指学生*i*在网络中给其他人“做桥”的频率，即任意两个学生间的最短距离经过*i*的平均比例。特征向量中心性则同时考虑节点*i*连接的节点数量和被连接节点的中心性，与*i*连接的节点中心性越高，则节点*i*的中心性就越高。五种网络中心性数据如表5.3所示，留守样本的入度、出度、中介中心性和紧密中心性均低于全样本均值，而非留守样本这四个维度的中心性均高于全样本均值，说明留守儿童在班级整体网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表5.3 网络中心性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名称	定义	全样本	留守	非留守
入度	节点入度除以班级人数	0.152	0.146	0.161
出度	节点出度除以班级人数	0.152	0.143	0.167
中介中心度	节点到其他所有节点最短距离均值的倒数	0.033	0.032	0.336
紧密中心度	两节点最短路径经过该节点的比例	0.364	0.353	0.380
特征向量中心度	相邻节点特征向量中心性之和除以比例常数	0.125	0.125	0.126

注：表格中仅显示学习网络五种中心性数据，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心性数据如需要可联系笔者索要。全样本、留守样本和非留守样本观测值分别为1582、987和595。

### 三 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

表5.4显示，学习网络中留守儿童有更高的中介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但紧密中心性比非留守儿童低。留守儿童在学习网络中部分指标呈现出比非留守儿童更紧密的特征，这与既有研究结论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留守儿童在校时间与非留守儿童相比更长，更容易和班级同学结成写作业的伙伴（王天宇、周晔馨，2023）。留守儿童在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紧密中心性更低。说明留守儿童在这三种网络中都不处于几何中心位置，相对边缘。同时，由于留守儿童的紧密中心性较低，他们更容易受到其他节点的控制。在好友网络中，个体留守状态对节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往研究仅显示留守儿童在学习网络的中心性

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差异，且研究结论有争议，Li et al. (2020) 发现留守儿童社会网络入度低于非留守儿童，但王天宇、周晔馨 (2023) 发现留守儿童学习网络的入度、紧密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均高于非留守儿童。本研究的结果与这两项研究结论有相同之处，既发现了留守儿童在学习网络的部分中心性上优于非留守儿童，也发现了在其他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留守儿童的紧密中心性不如非留守儿童。

表5.4 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入度	出度	中介中心性	紧密中心性	特征向量中心性
学习网络	0.251 (0.204)	-0.414 (0.361)	0.006** (0.003)	-0.015** (0.006)	0.010** (0.005)
八卦网络	-0.037 (0.166)	-0.125 (0.364)	-0.002 (0.002)	-0.014*** (0.005)	-0.006 (0.004)
玩耍网络	-0.060 (0.190)	-0.136 (0.370)	-0.001 (0.002)	-0.010** (0.005)	-0.005 (0.004)
情感网络	0.096 (0.108)	0.007 (0.220)	-0.003 (0.003)	-0.013*** (0.005)	-0.003 (0.005)
好友网络	0.064 (0.125)	0.059 (0.069)	-0.004 (0.003)	-0.007 (0.005)	0.002 (0.00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注：表格中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的观测值分别为1452、1459、1463、1430、1458。

### 第三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群聚效应

当源节点为寄宿儿童时，他们与寄宿儿童连接的概率要远高于与非寄宿儿童连接。如表5.5所示，源节点为寄宿儿童时，他与寄宿儿童一起学习、八卦、玩耍的概率比他与非寄宿儿童一起学习、八卦、玩耍的概率分别高出1.8%、4.5%和1.1%，他选择与寄宿儿童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朋友的概率比他与非寄宿儿童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朋友的概率高0.7%。这些差异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寄宿儿童几乎在所有功能性网络中都出现了群聚现象，这再次印证了社会认同理论

(Hornsey, 2008)。只有在情感网络中，寄宿儿童与寄宿儿童的连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5.5 目标节点寄宿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结果（源节点为寄宿儿童）

变量	被解释变量：源节点到目标节点间是否存在连接				
	学习网络	八卦网络	玩耍网络	情感网络	好友网络
目标节点寄宿状态	0.018 <sup>***</sup> (0.005)	0.045 <sup>***</sup> (0.003)	0.011 <sup>**</sup> (0.006)	0.006 (0.004)	0.007 <sup>*</sup> (0.00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9182	39182	39182	39182	39182
R <sup>2</sup>	0.042	0.047	0.082	0.034	0.057

注：1. 被解释变量为源节点到目标节点间是否存在连接，即源节点是否认为目标节点是他（她）的好朋友。2.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差异中性别、独生子女的取值规则为源节点与目标节点相同为1，不同为0；例如，源节点和目标节点都为男性或者都为女性则赋值1，其中一个男性、一个女性赋值0。3.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差异中年龄、身高、体重、身体健康相貌定义为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取值之差并取绝对值，0说明两者相同，绝对值越大说明差距越大。4.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括号中为标准误。5. 回归数据为两两关系数据，是双向网络数据，即班级内部任意两个学生中间会形成两个观测值。

表5.6显示，当源节点为非寄宿儿童时，他们在学习网络和八卦网络上更愿意与非寄宿儿童产生连接，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非寄宿儿童在学习和八卦功能性网络中也呈现出群聚状态。在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非寄宿儿童也更愿意选择非寄宿儿童做朋友，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5.6 目标节点寄宿状态对社会网络连接的影响回归结果（源节点为非寄宿儿童）

变量	被解释变量：源节点到目标节点间是否存在连接				
	学习网络	八卦网络	玩耍网络	情感网络	好友网络
目标节点寄宿状态	-0.010 <sup>*</sup> (0.005)	-0.014 <sup>**</sup> (0.006)	0.004 (0.006)	-0.005 (0.004)	-0.007 (0.00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21826	21826	21826	21826	21826
R <sup>2</sup>	0.027	0.060	0.086	0.025	0.048

注：1. 被解释变量为源节点到目标节点间是否存在连接，即源节点是否认为目标节点是他（她）的好朋友。2.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差异中性别、独生子女的取值规则为源节点与目标节点相同为1，不同为0；例如，源节点和目标节点都为男性或者都为女性则赋值1，其中一个男性、一个女性赋值0。3. 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差异中年龄、身高、体重、身体健康相貌定义为源节点与目标节点取值之差并取绝对值，0说明两者相同，绝对值越大说明差距越大。4.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中为标准误。5. 回归数据为两两关系数据，是有向网络数据，即班级内部任意两个学生中间会形成两个观测值。

## 第四节 农村寄宿儿童的网络中心性

在本节中，我们首先分别给出寄宿儿童在社会网络中位置的图像证据，再用个体数据检验寄宿状态和各网络中心性的关系。

### 一 寄宿的同伴网络图像

我们以YJ学校四年级一班为例，展示整个班级的五种社会网络。从图5.2中可以看出寄宿儿童（深灰色点）入度并不比非寄宿儿童（浅灰色点）小，甚至在部分网络中其入度更大，比如好友网络，寄宿儿童更多地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但这仅仅是未控制任何其他特征的图像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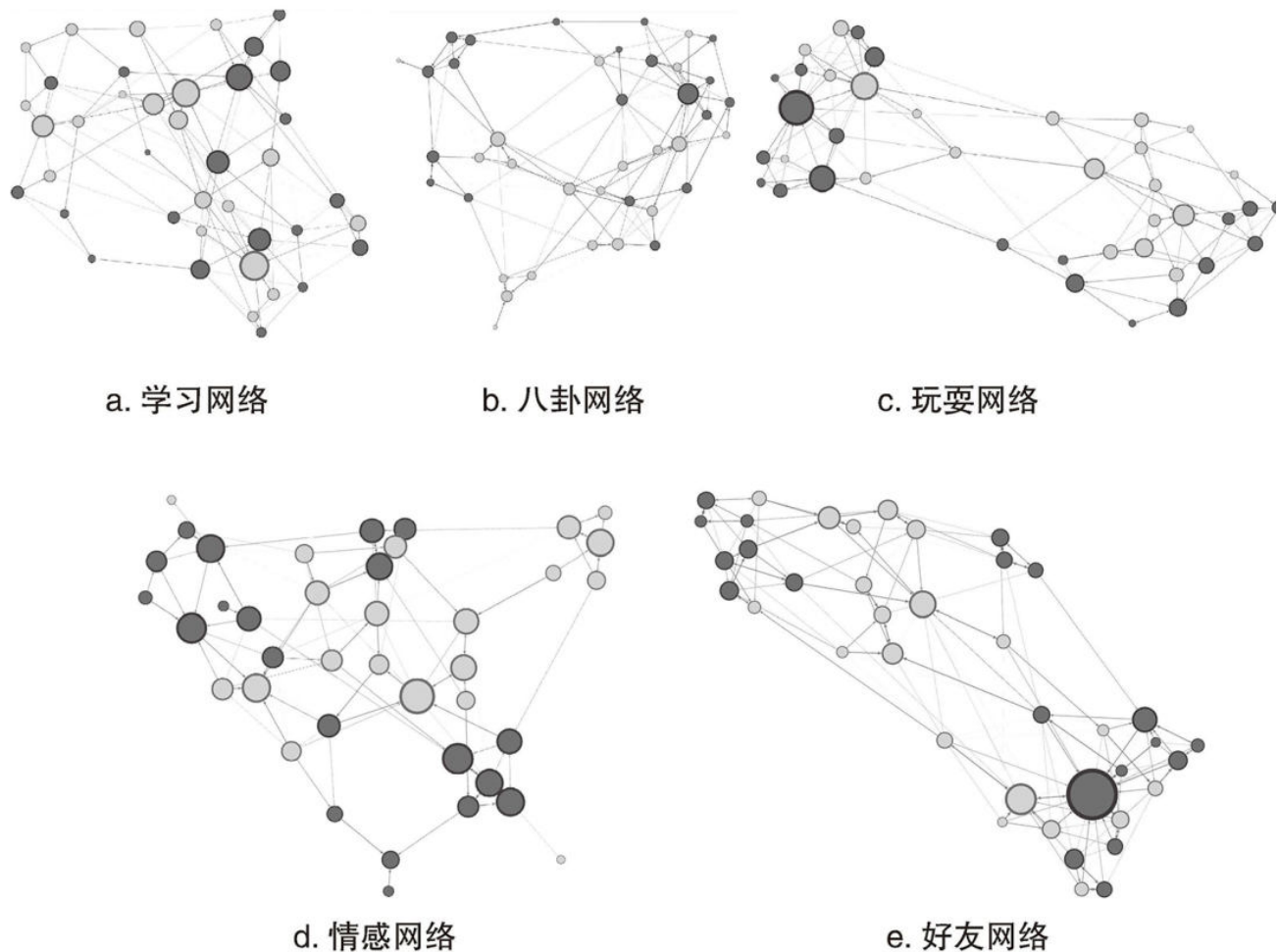


图5.2 YJ学校四年级寄宿网络

注：图中深灰色点代表寄宿儿童，浅灰色点代表非寄宿儿童；点的大小说明了入度大小，点越大，入度越大。

## 二 寄宿儿童的网络中心性

与留守儿童的中心性相似，本节以个体为基本观测值，计算了寄宿儿童的入度、出度、中介中心性、紧密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等5种中心性指标。这五个核心指标各自有不同的侧重：出度和入度是中心性最传统的度量，高入度中心性是集体中声望的标志，高出度中心性是集体中有影响力的标志；中介中心性反映了到网络中所有节点的平均距离，衡量了一个节点传播信息的能力；紧密中心性则反映了个体为他人做桥的能力和 control 他人的能力；特征向量中心性则反映了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与网络中的“关键人物”有联系。

五种网络中心性数据如表5.7所示，在学习网络中，寄宿儿童在入度、出度和紧密中心性这三个维度上高于整体均值，说明寄宿儿童在班级中更受欢迎，并且更愿意

与班里其他同学交朋友，也有更强的做桥能力。也进一步说明寄宿儿童在学习网络中处于重要位置，并没有被“边缘化”。

表5.7 班级整体网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名称	定义	全样本	寄宿	非寄宿
入度	节点入度除以班级人数	0.152	0.156	0.144
出度	节点出度除以班级人数	0.152	0.157	0.145
中介中心性	节点到其他所有节点最短距离均值的倒数	0.033	0.032	0.035
紧密中心性	两节点最短路径经过该节点的比例	0.364	0.369	0.355
特征向量中心性	相邻节点特征向量中心性之和除以比例常数	0.125	0.122	0.131

注：表格中仅展示学习网络五种网络中心性数据，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心性数据如需要可联系笔者索要。全样本、寄宿样本和非寄宿样本观测值分别为1582、1012和570。

### 三 寄宿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

表5.8显示了回归结果，从入度来看，寄宿对学习网络的入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八卦网络和玩耍网络的入度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寄宿儿童在学习网络中更受欢迎，而在八卦网络、玩耍网络中不太受欢迎。从出度来看，寄宿儿童更不愿意在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与其他儿童产生连接，即在这两种网络中寄宿儿童并不活跃，没有努力与他人建立联系，交际性和积极性都较弱。从中介中心性来看，寄宿儿童在好友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较高，说明班级很多同学之间连接的最短路径经过寄宿儿童，寄宿儿童处在其他节点连接的捷径上，起到了连接作用。从紧密中心性来看，寄宿儿童在学习网络、八卦网络和玩耍网络的紧密中心性更低，说明在这三个网络中寄宿儿童离其他同学都较远。最后，在寄宿对五种网络特征向量中心性的影响均不显著。

综合来看，寄宿儿童的中心性并不都呈现出低水平的状态，而是有高有低，特征明显。寄宿儿童出度低，更不愿意与班级同学产生连接；中介中心性高，说明他们在多个网络中处于连接其他节点关键位置，具有更大的“权力”。寄宿儿童的紧密中心性低说明他们不处于整体网络的几何中心位置。

表5.8 寄宿对网络中心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入度	出度	中介中心性	紧密中心性	特征向量中心性
学习网络	0.014** (0.006)	-0.013 (0.010)	-0.002 (0.003)	-0.021*** (0.006)	-0.009 (0.005)
八卦网络	-0.015*** (0.004)	-0.009 (0.011)	0.000 (0.003)	-0.025*** (0.005)	-0.003 (0.005)
玩耍网络	-0.021*** (0.006)	-0.020* (0.011)	-0.001 (0.002)	-0.022*** (0.006)	-0.008 (0.004)
情感网络	-0.003 (0.003)	-0.007*** (0.002)	-0.001 (0.006)	0.001 (0.009)	-0.006 (0.006)
好友网络	-0.005 (0.004)	-0.003 (0.002)	0.012*** (0.003)	-0.005 (0.007)	-0.004 (0.00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注：表格中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的观测值分别为1574、1582、1586、1550、1578。

## 第四部分 父母缺位与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

## 第六章 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社会网络研究

### 第一节 留守儿童更容易受欺凌吗？

研究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需要聚焦留守儿童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的缺位；二是同伴的互动。从父母的缺位来看，长期的亲子分离会造成孩子孤独、焦虑等，这些情绪会增加其遭遇欺凌的风险；另外留守儿童无法得到父母的保护，社会支持较弱，欺凌者的机会成本低，致使其更容易成为长期被欺凌对象（贾洪勇、吴恩慈，2022）。从同伴的互动来看，留守儿童可能因父母外出造成自卑，致使其难以融入同伴群体中，也可能促进他们更积极地与同伴交流以弥补父母缺位带来的孤单情绪。如果能与好的同伴互动，可能对留守儿童产生积极影响；如果遭遇不良同伴，也可能遭遇欺凌或成为施暴者。

#### 一 理论层面的探究

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分别从家庭场域和学校场域解释了为何留守儿童更容易受欺凌。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人们遵守社会规范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社会建立了积极联系。当这些社会联系和信念较弱时，个体更可能从事反社会和犯罪行为

（Hirschi, 1969）。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在依恋维度上有缺失，缺乏与父母的情感联系，造成其发生校园欺凌的概率更高。而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不是通过直接经验，而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来学习。在观察学习中，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获得行为的范例，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参考（Bandura et al., 1977）。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同伴往往成为其重要的参照群体。研究表明，在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尤其是农村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率较高（陆伟等，2017）。由于留守儿童大多处于寄宿状态，他们既可能成为欺凌的施害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遭遇校园欺凌的风险相对更高。

社会生态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受周边生态系统环境影响，个体发展是在相互作用的多个环境系统中进行。从社会生态系统出发，校园欺凌可以从宏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微观系统来解释。宏观系统主要是文化、社会结构等社会环境，如暴力文化的影响、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会促使校园欺凌发生（乔东平、文娜，2018）。中观系统为系统之间的关系，如家庭与学校间的互动。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参与的环境，如学校和家庭。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学校发生的事情无法及时与家长交流，出现校园欺凌征兆时父母也无法监督与陪伴，因而相比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遭遇欺凌的可能性更大。

#### 二 现实层面的考量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规模为4177万人，占农村儿童人口的37.9%，意味着平均每3名农村儿童就有1名留守儿童。《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留守儿童受欺凌的概率明显高于普通儿童，这一结论在研究中也证实（滕洪昌、姚建龙，2018）。近年来，在多起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的恶性犯罪事件中，大部分有留守背景。

《保护青少年系列调查之一：校园欺凌背后》，央广网，2024年4月24日，  
[https://news.cnr.cn/dj/20240424/t20240424\\_526679006.shtml](https://news.cnr.cn/dj/20240424/t20240424_526679006.shtml)。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调查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sup>①</sup>。校园欺凌危害极大，它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让他们因恐惧而产生厌学逃学的想法；还会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让他们有更高的抑郁和自杀风险（Juvonen and Graham, 2001），更严重的可能直接威胁生命。欺凌经历的影响可能持续到成年，让受欺凌者职业发展受阻，心理健康问题持续（Copeland et al., 2013）。由此，关注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分析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成因，并提出有效的防治方案尤为重要。

## 第二节 校园欺凌的网络传递是留守儿童特有的吗？

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而导致的监护缺位和情感缺失，会直接增加其遭遇校园欺凌的风险。但因父母外出引起的学生同伴网络的变化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整体网数据的缺乏，无法刻画班级整体的多功能网络对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本节利用笔者团队于2019年4—5月在四川省的调研，收集了38个班级学生的学习、玩耍、八卦和情感等班级整体网络数据，并测量了每位学生遭遇欺凌的情况与类型，探讨社会网络如何在留守儿童校园欺凌中发挥作用。

同伴影响效应是两个好朋友间的相似性会进一步增加（Veenstra and Steglich, 2012），被欺凌行为也有沿着社会网络关系扩散的趋势（Sentse et al., 2013; Shin, 2019）。与受欺凌水平高的人成为朋友，其自身受欺凌的可能性也会随着时间推移提高。当两个受欺凌的孩子建立友谊后，其中一个孩子也会被朋友的欺凌者欺凌（Rambaran et al., 2020）。受欺凌程度低的孩子之间成为朋友并相互影响，他们在下一个时间点上受欺凌水平会更低；受欺凌程度高的孩子之间成为朋友并相互影响，他们可能越陷越深，影响效应会朝着两个极端发展（张云运等，2022）。由此可见，受欺凌会通过网络传递，不仅在儿童整体中传递，也在留守儿童内部传递。

运用同班级内学生两两关系数据来检验社会网络在校园欺凌中的传递，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ln\left(\frac{Victim_{ci}}{1-Victim_{ci}}\right) = \theta_0 + \overline{Victim_{j \in g_{si}}} + \theta_1 X_i + \pi_c + \varepsilon_i \quad (6.1)$$

$\overline{Victim_{j \in g_{si}}}$

其中， $Victim_{ci}$ 表示班级*c*内学生*i*遭遇欺凌（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由于该变量是二分变量，我们选用Logit模型。 $\overline{Victim_{j \in g_{si}}}$ 表示网络*s*中学生*i*遭遇欺凌的均值，系数 $\theta_1$ 表示在网络*s*中学生*j*遭遇欺凌对学生*i*是否遭遇欺凌的影响。 $X_i$ 为学生*i*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 $\pi_c$ 为班级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

以源节点是否受欺凌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其与网络节点的平均被欺凌状态的关系。结果显示（见表6.1），在五种社会网络中，向外节点受欺凌的平均值越高，源节点学生受欺凌的可能性越大，所有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五种网络中都存在受欺凌的社会网络传递现象。具体来看，向外节点被欺凌的平均值（好友受欺凌的状况）在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每提高一个单位，儿童受欺凌的概率分别提高至13.2%、20.5%、19.7%、14.6%和14.1%（见表6.1 Panel A），这一结果印证了同伴影响效应，即和受欺凌的学生做朋友，自身受欺凌的概率也更大。

表6.1 社会网络被欺凌状态传递的估计结果

变量	学习网络	八卦网络	玩耍网络	情感网络	好友网络
Panel A : 全样本					
向外节点被欺凌的平均值	0.132 <sup>***</sup> (0.053)	0.205 <sup>***</sup> (0.057)	0.197 <sup>***</sup> (0.061)	0.146 <sup>***</sup> (0.050)	0.141 <sup>***</sup> (0.05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356	1333	1438	1254	1448
R <sup>2</sup>	0.054	0.058	0.048	0.051	0.047
Panel B : 留守样本					
向外节点被欺凌的平均值	0.218 <sup>***</sup> (0.080)	0.311 <sup>***</sup> (0.089)	0.365 <sup>***</sup> (0.091)	0.294 <sup>***</sup> (0.079)	0.302 <sup>***</sup> (0.07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484	420	510	406	515
R <sup>2</sup>	0.013	0.030	0.032	0.035	0.028

注：\*p<0.1, \*\*p<0.05, \*\*\*p<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我们将样本限定为留守儿童后，向外节点被欺凌的平均值（好友受欺凌的状况）在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每提高一个单位，儿童受欺凌的概率分别提高至21.8%、31.1%、36.5%、29.4%和30.2%（见表6.1 Panel B），我们发现，与全样本相同，说明在五种网络中留守儿童都存在受欺凌传递。更重要的是，在留守儿童样本中，好友受欺凌状况对留守儿童受欺凌的影响更大，即留守儿童的五种社会网络都有更强的欺凌传递性。

校园欺凌的网络传递并不是留守儿童特有的，而是存在于全体儿童中。由于留守儿童的特殊性，留守儿童的网络传递性与全体儿童相比更强。

### 第三节 社会网络是促进还是消解了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不仅受个体特征影响，也与社会网络密切相关。对留守儿童而言，父母长期缺位导致其情感支持不足和社会化过程受阻，他们在班级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可能与非留守儿童存在系统性差异，进而影响其遭遇欺凌的风险。社会网络在校园欺凌中可能同时发挥保护作用 and 加剧边缘化的双重效应。

从保护性角度来看，紧密的社会网络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情感支持和同伴保护，从而降低其遭受欺凌的可能性。Holt和Espelage（2007）发现，拥有广泛好友网络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同伴支持，从而降低成为受害者的风险。Batanova等（2014）指出，高网络中心性的个体往往掌握更多社会资本，能够通过非正式调节机制化解冲突，从而避免校园欺凌的升级。

然而，留守儿童的社会网络特征也可能致使其更容易成为欺凌目标。家庭监护缺失，留守儿童在社会能力和行为上可能与非留守儿童存在差异，导致其在班级社会网络中被边缘化。在层级分明的结构中，边缘化个体更容易遭遇群体排斥或攻击。贾勇宏和吴恩慈（2022）发现，留守儿童的班级活动低参与可能导致其被社交孤立，从而更容易成为被欺凌的目标。

我们采用中介法（三步法）来检验社会网络在留守儿童校园欺凌中发挥的作用，实质上是看网络中心性是否充当了留守儿童对校园欺凌影响的中介。首先，我们观察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方程（b.1）中， $Victim_i$ 表示学生*i*是否遭遇欺凌

（成为受害者）， $LB_i$ 表示学生*i*是否为留守儿童， $X_i$ 为学生*i*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控制变量， $\pi_c$ 为班级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 为扰动项。系数 $a_1$ 表示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总效应。其次，测量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式（b.2）是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其中 $SN_{sci}$ 表示在网络*s*中班级*c*的学生*i*的网络中心性，网络中心性包括入度、出度、连接中心度、紧密中心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 $LB_{sci}$ 表示在网络*s*中班级*c*的学生*i*的留守状态。式（b.3）将留守状态和网络特征都纳入方程中，考察留守状态和网络中心性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lambda_1$ 为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直接效应，即控制网络中心性后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gamma_1 \lambda_2$ 为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间接效应，即留守状态通过网络中心性对校园欺凌产生的影响。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即 $a_1 = \lambda_1 + \gamma_1 \lambda_2$ 。我们先看 $\gamma_1$ 和 $\lambda_2$ 是否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果通过则说明它们是留守状态影响校园欺凌的网络中心性路径，再根据系数的符号判断影响的方向。回归方程如下：

$$\ln\left(\frac{Victim_i}{1-Victim_i}\right) = a_0 + a_1 LB_i + a_2 X_i + \pi_c + \varepsilon_i \quad (6.2)$$

$$SN_{sci} = \gamma_0 + \gamma_1 LB_{sci} + \gamma_2 X_i + \pi_c + \varepsilon_i \quad (6.3)$$

$$\ln\left(\frac{Victim_i}{1-Victim_i}\right) = \lambda_0 + \lambda_1 LB_i + \lambda_2 SN_i + \lambda_3 X_i + \pi_c + \varepsilon_i \quad (6.4)$$

### 一 留守状态增加了受欺凌的可能性

表6.2中第（1）列为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3）列逐步加入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留守状态的系数为正并显著稳健。从第（3）列结果来看，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成为受害者的概率要高6.0%。与男性相比，女性受欺凌的可能性更低，这与既有研究结论一致（凌辉等，2022；贾勇宏、吴恩慈，2022）。笔者还发现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家庭经济状况与其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呈显著负相关——成绩越好、零花钱越多的学生，受欺凌的概率越低。从家庭特征来看，与父亲沟通频率较高的学生受欺凌的可能性较低，而与父母顶嘴频率较高或父母经常吵架的学生，其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则显著增加。

表6.2 留守状态对校园欺凌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留守状态	0.057** (0.023)	0.058** (0.024)	0.060** (0.024)
女性		-0.056** (0.022)	-0.050** (0.022)
寄宿		0.038 (0.028)	0.026 (0.028)
独生子女		-0.003 (0.024)	0.000 (0.024)
身高		-0.001 (0.002)	0.000 (0.002)
体重		-0.000 (0.002)	-0.001 (0.002)
寄宿		0.023 (0.029)	0.017 (0.02))
学习成绩		-0.037*** (0.011)	-0.026** (0.011)
班干部		-0.021 (0.024)	-0.021 (0.023)
零花钱		-0.000*** (0.000)	-0.000*** (0.000)
家庭年收入			0.009 (0.016)
与父亲沟通频率			-0.021* (0.012)

续表

变量	(1)	(2)	(3)
与母亲沟通频率			-0.005 (0.013)
与父亲顶嘴频率			0.034** (0.014)
与母亲顶嘴频率			0.025* (0.014)
父母吵架频率			0.038*** (0.012)
父母体罚频率			0.001 (0.001)
常数项	0.226*** (0.013)	0.370 (0.232)	0.497** (0.253)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594	1466	1433
R <sup>2</sup>	0.053	0.054	0.089

注：\*p<0.1, \*\*p<0.05, \*\*\*p<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二 社会网络对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影响

根据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方法，第二步检验的结果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三部分已展示，从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结果来看，学习网络中留守儿童有更高的中介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但紧密中心性比非留守儿童低。在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留守儿童紧密中心性更低。说明留守儿童在这三种网络中都不处于几何中心位置，相对边缘。由于留守儿童的紧密中心性较低，他们更容易受到其他节点的控制。

第三步检验，笔者来确定网络中心性是否为留守状态影响校园欺凌的中介，以及留守状态是如何通过网络中心性来影响校园欺凌的。表6.3中依次呈现了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五个维度对校园欺凌的影响。首先比较表6.2和表6.3中留守状态的系数，我们发现表6.3中留守状态的系数与表6.2第

(3)列相比变小了，这说明社会网络机制的净效应为正（ $\gamma_1$ 、 $\lambda_2$ 均为负， $\gamma_1$

$\lambda_2$ 为正)，即提高了留守儿童受欺凌的概率。具体来看，观察社会网络中心性对校园欺凌的间接效应，表5.4中学习网络的中介中心性、紧密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八卦网络、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的紧密中心性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接下来观察表6.3中的这几个维度的具体情况。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的紧密中心性系数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越紧密，儿童受欺凌的可能性就越低。结合表5.4的结果，发现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的紧密中心性是留守状态影响校园欺凌的中介。留守儿童的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与非留守儿童相比更松散，而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又能有效地抑制校园欺凌的发生。因此，留守儿童在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中处于不利位置，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和分享烦心事的同学更少，从而增加了他们受欺凌的可能。

表6.3 留守状态、网络中心性与校园欺凌

被解释变量	学习网络	八卦网络	玩耍网络	情感网络	好友网络
留守状态	0.058** (0.024)	0.058** (0.024)	0.056** (0.024)	0.053** (0.024)	0.057** (0.024)
入度	-0.009* (0.005)	-0.009 (0.006)	-0.013** (0.006)	-0.005 (0.009)	-0.013 (0.009)
出度	0.001 (0.002)	0.002 (0.002)	-0.000 (0.002)	-0.004 (0.003)	-0.002 (0.009)
中介中心性	0.374 (0.305)	-0.147 (0.352)	0.580 (0.406)	0.572** (0.240)	0.284 (0.219)
紧密中心性	-0.221 (0.159)	0.091 (0.205)	-0.361* (0.209)	-0.343* (0.188)	0.036 (0.143)
特征向量中心性	-0.047 (0.182)	-0.410* (0.215)	-0.066 (0.259)	-0.190 (0.137)	-0.365* (0.18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420	1427	1430	1399	1425
R <sup>2</sup>	0.107	0.100	0.114	0.097	0.104

注：\*p<0.1，\*\*p<0.05，\*\*\*p<0.01，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在留守儿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研究结果表明，留守状态不仅直接增加儿童受欺凌的可能性，还通过影响其在关键社会网络中

的位置间接放大这一风险。虽然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对校园欺凌有消解作用，但留守儿童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的紧密中心性低，这种“网络资源剥夺”意味着尽管社会网络本身具有消解校园欺凌的潜力，但留守儿童难以利用社会网络这一工具，避免校园欺凌。因此，化解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的重要路径是提升留守儿童的社会网络中心性。

## 第四节 社会网络中“沉默的大多数”

### ——旁观者的作用

在本章第二节分析中，可以发现校园欺凌在留守儿童中有明显的社会网络传递效应，不同类型的网络（如学习、八卦、玩耍、情感、好友网络）均表现出明显的欺凌状态扩散趋势。这说明校园欺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儿童之间的交互网络中被放大或减弱，网络结构成为理解发生欺凌与延续的重要切入点。

然而，在欺凌关系的传播与演变中，除了欺凌者与受害者这两个角色外，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旁观者（Salmivalli et al., 1996）。研究显示，绝大多数校园欺凌事件中都有旁观者的身影（O’Connell et al., 1999），他们的态度与行为可能直接对欺凌事件的走向造成影响，旁观者的沉默会强化欺凌者的行为模式（Salmivalli et al., 2010），旁观者的积极干预会制止欺凌行为（Hawkins et al., 2001; Pozzoli & Gini, 2010）。现有旁观者相关研究较多，但从整体网分析旁观者行为的研究较少。这一节从整体网视角探讨社会网络中旁观者的作用。

#### 一 班级整体网中旁观者的类型

在校园欺凌中有五类角色，分别是欺凌者、受害者、消极防御者、积极防御者和旁观者，其中前两类是校园欺凌中的直接参与者，而后三类均属于广义上的旁观者，未直接参与到欺凌中。这些角色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常以复合身份出现，笔者将有广义上旁观者参与的角色进行组合，共形成九种实际存在的复合行为身份，分别是消极防御者、消极防御者+欺凌者、消极防御者+受害者、消极防御者+欺凌者+受害者、积极防御者+受害者、积极防御者+欺凌者+受害者、旁观者、旁观者+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受害者。根据这九种身份的特征，笔者进一步将其归纳为三类典型的结构性角色画像。

沉默边缘型包括消极防御者、消极防御者+受害者、消极防御者+欺凌者+受害者、消极防御者+欺凌者，多数为“消极防御者+受害者”群体。中心调解型包括积极防御者+受害者、积极防御者+欺凌者+受害者、旁观者。游移桥梁型包括旁观者、旁观者+受害者、旁观者+欺凌者+受害者。笔者按照这三种类型绘制了XJ中学九年级某班级整体网络图（见图6.1），节点灰白度与大小分别表示学生在欺凌事件中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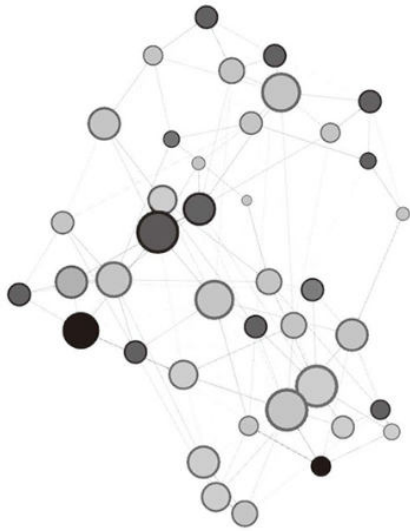
扮演的角色类型与其在网络中的结构嵌入程度。节点大小表示入度中心性，用以反映个体被提及、被连接的频率，间接体现其结构声望与影响力。

从整体图6.1中，可以看出不同角色类型在网络结构中的分布呈现出显著差异。这一分布特征揭示出个体行为不仅由心理特质决定，更深刻地受其所处网络结构位置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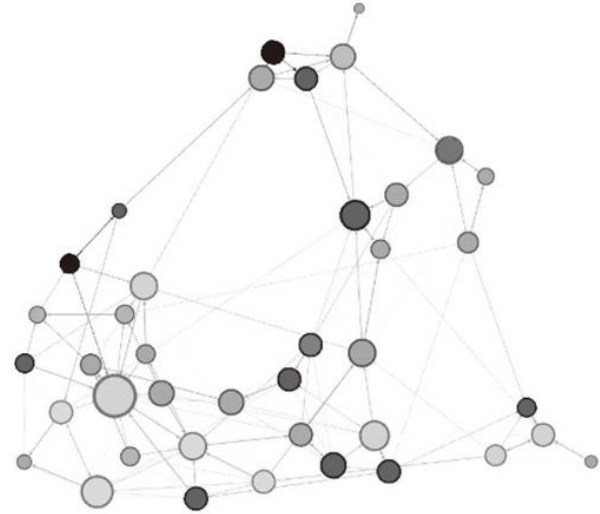
沉默边缘型常见于八卦网络的结构边界，他们聚集在网络外围或次要聚合点，呈现出“弱连接—低能动”结构特征，其连接稀疏、影响力低，日常互动中易被忽视。缺乏社会支持，是最易失声的风险群体，也是校园欺凌中最脆弱的群体。

中心调解型在学习网络中具有高中心性，结构位置突出，往往受到集体规范和结构声誉的双重牵引，更可能承担干预责任，是推动校园生态良性演化的重要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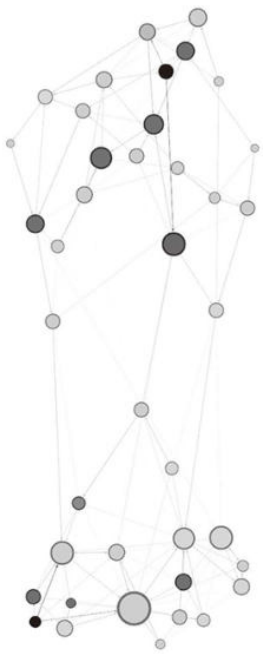
游移桥梁型在八卦、情感网络中表现出较强的结构穿透性与信息控制能力，常处于桥梁型通道节点位置，是不同群体之间的连接者。他们具有较高的连接度，但在信息与关系拉扯中表现出行为不稳定性，易受同伴压力和舆论影响，其干预意愿易随情境波动，具有外溢风险。



a. 学习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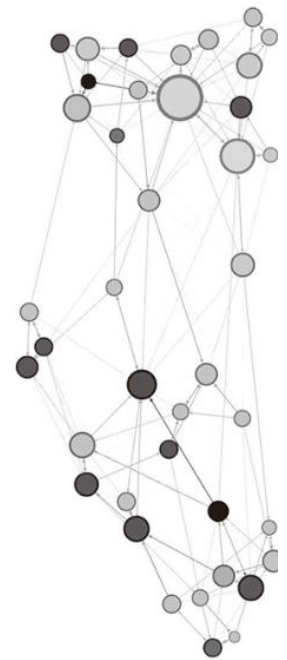
b. 八卦网络



c. 八卦网络



d. 玩耍网络



e. 情感网络

图6.1 XJ中学九年级班级整体网络

注：黑色节点代表游移桥梁型，深灰节点代表中心调解型，浅灰节点代表沉默边缘型；点的大小说明了入度大小，点越大，入度越大。

## 二 不同网络类型中旁观者的行为与干预路径

不同网络类型对个体行为机制的塑造亦展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学习网络中，中心位置的个体更倾向于积极干预，其背后机制可解释为“声誉约束”与“规范驱动”，即网络中心个体更在意公共评价，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符合群体期待的行动。相反，在八卦网络中，信息压力与情绪张力叠加，使得位于桥梁位置的个体更易因“结构性麻木”或“敌意迁移”选择冷漠、顺应甚至附和欺凌行为。

图6.1不仅揭示了“谁沉默、谁游移、谁关键”的结构，也为识别高风险行为、设计差异化干预路径提供了切实依据。今后的干预策略可从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激活“中心调解型”学生，赋能其角色转化为“积极干预者联盟”；二是关注“边缘沉默型”个体，通过社交融合项目改善其结构位置；三是引导“游移桥梁型”个体重构自我认知，提升其社会责任感，避免因“网络模糊地带”滑向旁观冷漠或行为失范。

## 第七章 农村寄宿儿童的偏差行为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01年5月29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20.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20.htm)。

《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7年7月10日，[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707/t20170710\\_309042.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707/t20170710_309042.html)。

农村寄宿学校是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由于生育率下降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生源数量减少（孙志军、郑磊，2021），且以往分散办学、校点广布、低重心的教育格局凸显出师生比不合理、规模效益差等问题（梁超、王素素，2020）。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sup>①</sup>，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此背景下农村地区开始推行“撤点并校”，寄宿制学校成为农村地区常规办学形式。2016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国农村地区（含镇区和乡村）义务教育寄宿生人数已达到2608万人，占农村地区在校生总数的27.5%。其中，农村小学、初中寄宿生总数分别达到942.5万人和1665.7万人，寄宿率为14.2%和58.6%。<sup>②</sup>寄宿制学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同时其特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可能会增加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

一方面，寄宿儿童的偏差行为影响其学习成绩和升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长期来看，会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另一方面，寄宿儿童偏差行为不仅影响其生长发育和社会化过程，还可能导致其成年阶段无法适应社会，以及违法犯罪和精神疾病（Ndugwa et al., 2011），所以有偏差行为儿童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无偏差行为的儿童。鉴于儿童偏差行为可能的消极后果，考察其形塑机制进而减少其偏差行为的发生有着重要意义。

本章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本章的研究需要对样本进行整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766个。

### 第一节 寄宿学校、儿童人格与偏差行为的社会认知框架

行为主义创始人J. B. Watson（1913）认为行为受刺激源的影响，主张环境决定人的行为模式，人的行为就是刺激—反应的结果。环境决定论未考虑个体自身因素且不能有效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基于此，班杜拉提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认为个体活动既不完全受内部力量的驱使，也不完全受环境

刺激的支配，而是由个体行为、个体认知以及其所处的环境三种要素交互作用决定的（Bandura & Walters 1997）。所以，需要将外界环境和个体内在因素同时纳入理论模型中来讨论行为问题。

社会认知理论多被用于儿童问题行为、情绪问题、身体活动行为等问题的研究（Alulis & Grabowski, 2017）。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逻辑，个体所处环境和自身内在因素的差异，便会展现不同的行为风格。基于这一理论，不少学校试图搭建学校管理框架，改善儿童的健康状况（如营养摄取、肥胖等）（Roche et al., 2012），也有大量文献根据此理论构造研究框架，从而分析行为发生的机制。例如，Wentzel（2005）发现，学校是独特的外在环境因素，当学生在学校中学习有效的社交互动时，对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Bektas et al.（2010）也发现，儿童是根据环境对其吸烟行为提供的反馈做出反应，并与之相互作用而决定是否吸烟。Espelage et al.（2018）通过追踪数据研究发现，人内在冲动和作为外在环境的同伴犯罪的变化都会增加关系攻击的可能性。

社会认知理论在解释外在环境对个体行为影响时，强调认知过程的中介作用，而该理论中的认知过程侧重于探讨个体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期望，但未将更基础的人格因素纳入模型作为中介来考察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研究个体人格的理论模型中，大五人格模型（The Big-Five Model）被认为是较为全面的人格分析框架并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因（Goldberg, 1992）。因此，本节参考Nieuwenhuis et al.（2021）将大五人格模型纳入分析，据此，构造本章理论框架（见图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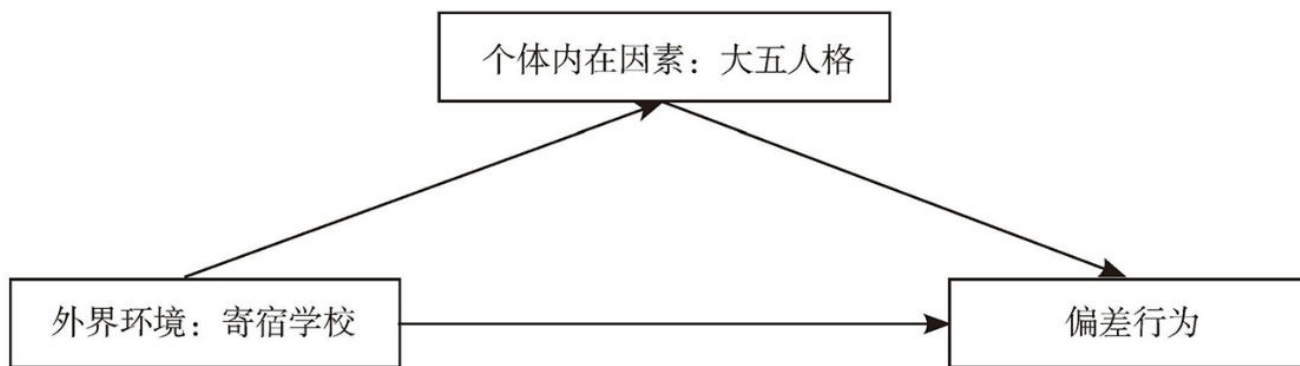


图7.1 研究框架

## 一 寄宿与农村儿童偏差行为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定义，本章将偏差行为界定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由外部环境导致的与主流价值观不符，偏离正常行为规范，从而产生违反学校规章制度、不利于自身以及他人健康成长、不被社会认可的行为。

社会认知理论指出个体行为受到环境影响，学校作为寄宿生的主要生活环境对其行为的影响不言而喻，现有不少研究关注到寄宿学校独特的住宿环境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与寄宿儿童相比，非寄宿儿童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可缓解情绪低落、焦虑抑郁、信心缺失等消极心理，对学校适应能力、同理心均较高，而反社会行为较低（Monteoliva & Martinez, 2007）。反之，寄宿儿童面临社会化困境，不易形成稳定的人格特征，导致寄宿儿童冲动控制困难、注意力缺陷和社会关系困难等，影响儿童行为发展。再者，寄宿学校的性质增加了儿童与同伴的相处时间，学生隐私空间较小，无人监督时间较多，导致寄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行为（White, 2004）。更为直接地，Mander和Lester（2017）通过纵向调查，对比儿童寄宿前后情绪和行为的差异，发现与非寄宿时儿童自报告相比，寄宿状态下儿童情绪症状、多动症以及反社会行为显著增加。Friborg et al.（2020）发现，寄宿儿童呈现出歧视、暴力、不健康的行为方式等特征。国内也有研究发现，与非寄宿状态相比，寄宿儿童发生抑郁自责、依恋等行为的倾向性更高（Ma, 2013）。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7.1:

H7.1: 寄宿会增加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

## 二 人格特质效应

首先，我们分析寄宿环境对农村儿童人格发展的影响。Satici et al.（2016）指出社会归属感与外向性相关，长期营养缺乏对情绪产生负向影响（Kaplan et al., 2007），即当寄宿儿童社会归属感越强、获得更优质的营养供给，其外向性以及积极情绪水平越高。但寄宿儿童因长期在校生活且大部分农村寄宿学校在硬件设施、学生营养状况等方面存在问题（胡伶、万恒，2012），所以寄宿生外向性等人格特征发展欠缺。周金燕和徐妮娜（2021）也发现寄宿降低了农村儿童的情绪稳定性、学校归属感和未来信心。同样地，朱志胜等（2019）发现寄宿显著提高了农村儿童的抑郁水平，降低了其抗逆力水平，寄宿生也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以及人际交往问题。若用情绪智力衡量学生人格，结果同样显示寄宿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且在学校寄宿条件不佳的情况下，其负向影响更大（姚松、高莉亚，2018）。

接下来，本节分析儿童人格特征对偏差行为的影响。人格特质已被证明是各种外化行为（包括品行问题、反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Miller & Lynam, 2001）。攻击行为会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冲动型人格、低自我控制是攻击行为发展的危险因素，而情绪调节能力可能会降低攻击行为（Lone & Albotuaiba, 2022）。在寄宿学校中，儿童因家庭教育疏忽、难以适应学校环境等，极易形成依恋型人格，寄宿儿童为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容易陷入早恋状态（Schaverien, 2011；刘录护、李春丽，2015）。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指向良好的学习态度、遵守学校纪律的优良行为，严谨性和开放性对抄袭等违纪行为有负向影响（张要要，2023）。同样地，

违纪行为受自控能力的影响，在外界监督力度较为薄弱、儿童自控能力较差时，便会提高违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贾丽凤等，2009）。由此提出假设7.2：

H7.2：儿童人格特征在寄宿对偏差行为的形成中起到中介作用，且寄宿抑制儿童人格发展，从而增加其偏差行为。

### 三 同伴、教师、父母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以上探讨影响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外界环境因素中，将其主要限定为寄宿学校。但实际上，儿童社会化的关键主体，如同伴、教师、父母也会对其偏差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这三类主体会对儿童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笔者讨论同伴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在寄宿学校中存在一种情况，家长将问题儿童送往学校，期望老师对其偏差行为进行管理，导致寄宿学校内问题儿童数量增加，从而提高了寄宿儿童结交不良同伴的概率，而与不良同伴交往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偏差行为（Benson & Buehler, 2012）。国内研究也发现，寄宿会显著降低儿童同伴交往质量，如果同伴带有不良习惯，则可能对学生个体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周金燕、徐妮娜，2021）。其次，讨论教师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教师的交往支持程度越高，学生的消极情绪就越低，这可以正向预测学生学习投入度，降低学习性违纪行为（陈继文等，2015）。最后，讨论父母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父母是儿童社交互动的主要来源，是儿童家庭社会化的重要主体（Yang et al., 2023），当儿童表现出偏差行为迹象时，父母有效参与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Coley et al., 2009）。而寄宿儿童普遍存在亲子沟通不畅、父母参与缺位的情况，会增加寄宿儿童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假设7.3：

H7.3a：寄宿儿童交往不良同伴增加会增加其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H7.3b：寄宿儿童获得的教师支持降低其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H7.3c：寄宿儿童的父母参与会降低其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 第二节 农村儿童的寄宿与偏差行为

### 一 农村儿童的寄宿情况

本章的解释变量为农村儿童的寄宿情况。本节以CEPS 2013—2014学生问卷中“周一到周四的晚上，你是否在学校寄宿？”这一指标来衡量。当学生在校寄宿时，赋值为1，反之为0。在4766个农村儿童样本中，有2133名儿童寄宿，占总样本的

44.75%。由于CEPS考察的是七年级至九年级学生，即初中生，寄宿率接近50%，说明农村初中学生寄宿较为普遍。

## 二 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

本章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参考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NCL）并结合CEPS数据库，用学生的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早恋行为三个变量度量其偏差行为。在学生的攻击性行为方面，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杨钊、颜芷邑，2022），本节选取“在去年一年中，学生骂人、说脏话，吵架，打架，欺负弱小同学，脾气暴躁的频率”五个问题，每个问题取值1—5分别代表“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分值越高，攻击性行为频率越高。其中，学生骂人、说脏话的频率相对较高，欺负弱小同学的频率相对较低。在学生的违纪行为方面，包括“在去年一年中，注意力不集中，逃课、旷课、逃学，抄袭作业、考试作弊，抽烟、喝酒，上网吧、去游戏厅的频率”五个问题，每个问题取值1—5分别代表“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分值越高，违纪行为频率越高。其中，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的频率较高，逃课、旷课、逃学的频率相对较低。在学生的早恋行为方面，选取问卷中的“你有没有对身边的某位异性同学或朋友产生过浪漫情感？”这一问题，若学生产生过浪漫情感，赋值为1，反之为0（见表7.1），有42.6%的受访者曾经有过早恋行为。

表7.1 偏差行为的测量题项与各题项均值

偏差行为	均值	测量题项	各题项均值
攻击性行为	13.020	1. 过去一年中，骂人、说脏话行为的频率	2.278
		2. 过去一年中，吵架行为的频率	1.882
		3. 过去一年中，打架行为的频率	1.371
		4. 过去一年中，欺负弱小同学行为的频率	1.164
		5. 过去一年中，脾气暴躁行为的频率	1.894
违纪行为	11.026	1. 过去一年中，注意力不集中的频率	2.303
		2. 过去一年中，逃课、旷课、逃学的频率	1.103
		3. 过去一年中，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的频率	1.563
		4. 过去一年中，抽烟、喝酒的频率	1.110
		5. 过去一年中，上网吧、去游戏厅的频率	1.246
早恋行为	0.426	你有没有对身边的某位异性同学或朋友产生过浪漫情感?	0.426

进一步运用因子分析提取儿童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的综合指标。具体而言，将上述衡量儿童攻击性行为的五个问题以及违纪行为的五个问题分别纳入因子分析，KMO值分别为0.774和0.768，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 $p=0.000$ ），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累积贡献率大于0.75，从测量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的问题中均提取三个因子，并根据各因子所占比例与累计贡献率的比值计算最终得分，得到测量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的综合指标。为保证各指标在同一量纲可进行比较，对其归一化处理，并将其转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指标，分值越大，表明攻击性行为及违纪行为发生的频率越高。最终得到攻击性行为和违纪行为的平均值分别为13.020和11.026。

### 三 农村儿童的个体、家庭与学校特征

使用问卷中“家庭经济条件如何”衡量家庭经济状况。问题的回答从1—5表示“非常困难”到“很富裕”，将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合并为一项，表示家庭条件贫困；将比较富裕和很富裕合并为一项，表示家庭条件富裕；中等表示家庭条件中等。

使用问卷中“妈妈/爸爸的受教育水平”衡量父母受教育水平，将“没受过任何教育”取教育年限为0年；“小学”取值为6年；“初中”取值为9年；“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高中”取值为12年；“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取值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取值为19年。

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吴要武、侯海波，2017），本章还控制了其他可能会影响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因素，具体包括：儿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和学校特征。其中，儿童个人特征包括儿童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独生子女、留守情况、自评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sup>①</sup>、父母受教育水平<sup>②</sup>，班级特征包括班级规模、班级在学校的排名，学校特征包括学校在全县的排名以及学校不良行为发生频率。具体变量及描述性统计见表7.2。

表7.2 全样本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名	变量含义与赋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攻击性行为	取值 0—100, 分值越高, 表明攻击行为越多	4766	13.020	13.381	0	100
违纪行为	取值 0—100, 分值越高, 表明违纪行为越多	4766	11.026	11.763	0	100
早恋行为	0= 无早恋行为, 1= 有早恋行为	4766	0.426	0.495	0	1
女性	0= 男, 1= 女	4660	0.475	0.499	0	1
年龄	周岁, 连续值	4658	14.615	0.742	13	17
汉族	0= 少数民族, 1= 汉族	4752	0.919	0.273	0	1
独生子女	0= 非独生子女, 1= 独生子女	4766	0.278	0.448	0	1
健康状况	1= 很不好, 2= 不太好, 3= 一般, 4= 比较好, 5= 很好	4713	4.045	0.909	1	5
家庭经济状况	0= 贫困, 1= 中等, 2= 富裕	4510	0.949	0.487	0	2
母亲受教育水平	0= 没受过教育, 6= 小学, 9= 初中, 12= 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高中, 16= 大学专科、本科, 19= 研究生及以上	4688	8.476	2.904	0	19
父亲受教育水平	0= 没受过教育, 6= 小学, 9= 初中, 12= 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高中, 16= 大学专科、本科, 19= 研究生及以上	4693	9.258	2.410	0	19
留守儿童	0= 非留守, 1= 留守	4766	0.133	0.340	0	1
班级规模	1=30 人以下, 2=30—40 人, 3=40—50 人, 4=50—60 人, 5=60 人以上	4766	3.487	1.044	1	5

续表

变量名	变量含义与赋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班级在学校的排名	1= 差, 2= 中等, 3= 好	4766	1.880	0.501	1	3
学校在全县的排名	1= 低, 2= 中, 3= 高	4766	1.919	0.622	1	3
学校不良行为发生频率	1= 从未发生, 2= 频率较低, 3= 频率较高	4766	1.768	0.650	1	3

### 第三节 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

#### 一 寄宿增加了农村儿童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和早恋行为

本章主要考察农村儿童寄宿对其偏差行为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text{Behaviors}_i = \alpha_1 + \beta_1 \text{Boarding}_i + \gamma_1 X_i + \delta_j + \varepsilon_i \quad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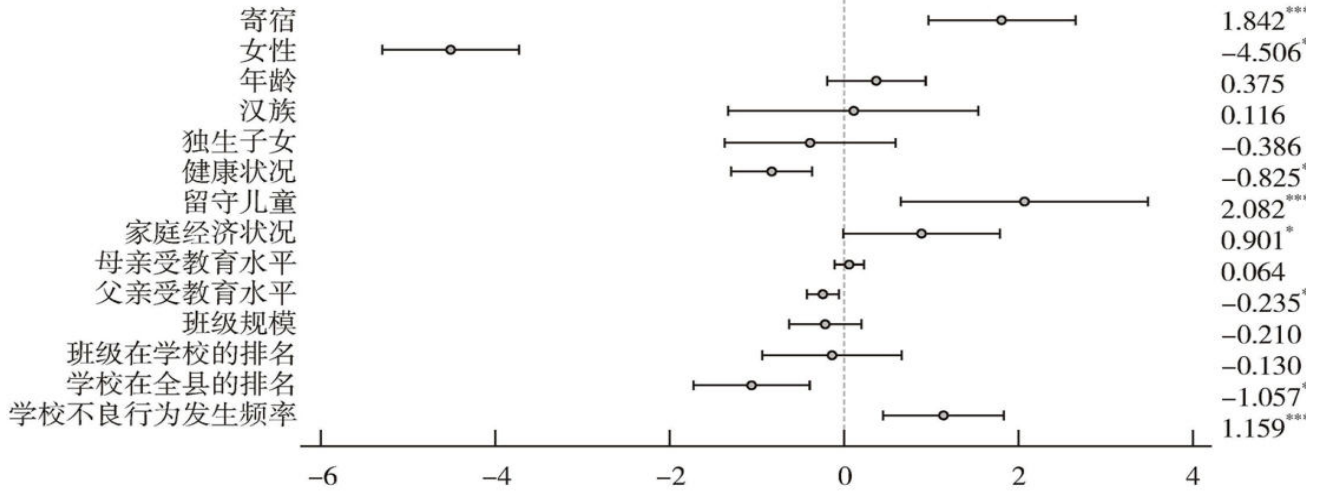
其中，被解释变量 $\text{Behaviors}_i$ 为农村儿童 $i$ 的偏差行为发生情况（包括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早恋行为三个维度），核心解释变量 $\text{Boarding}_i$ 为农村儿童 $i$ 的寄宿情况， $X_i$ 为其他控制变量， $\delta_j$ 表示班级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其中学生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是连续变量，采用OLS模型进行估计；早恋行为是二分类变量，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

笔者首先研究了农村儿童寄宿对其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图7.2（a）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和学校特征后，寄宿儿童比非寄宿儿童发生攻击性行为的频率增加了1.842个单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与国内外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寄宿增加了儿童与同学的相处时间，且寄宿学校生活老师的管理缺位以及相对简陋的住宿环境是同学之间产生矛盾的重要诱因，增加了住校儿童发生欺凌行为或遭遇被欺凌的可能性（陆伟等，2017）。

笔者进一步分析了寄宿对农村儿童违纪行为的影响。图7.2（b）汇报了寄宿对其违纪行为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和学校特征后，寄宿儿童比非寄宿儿童发生违纪行为的频率增加了1.146个单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大多农村寄宿学校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有限，对学生仅停留在“看管”层面，缺少老师监督与引导，增加了住校儿童违纪行为的可能性（贾丽凤等，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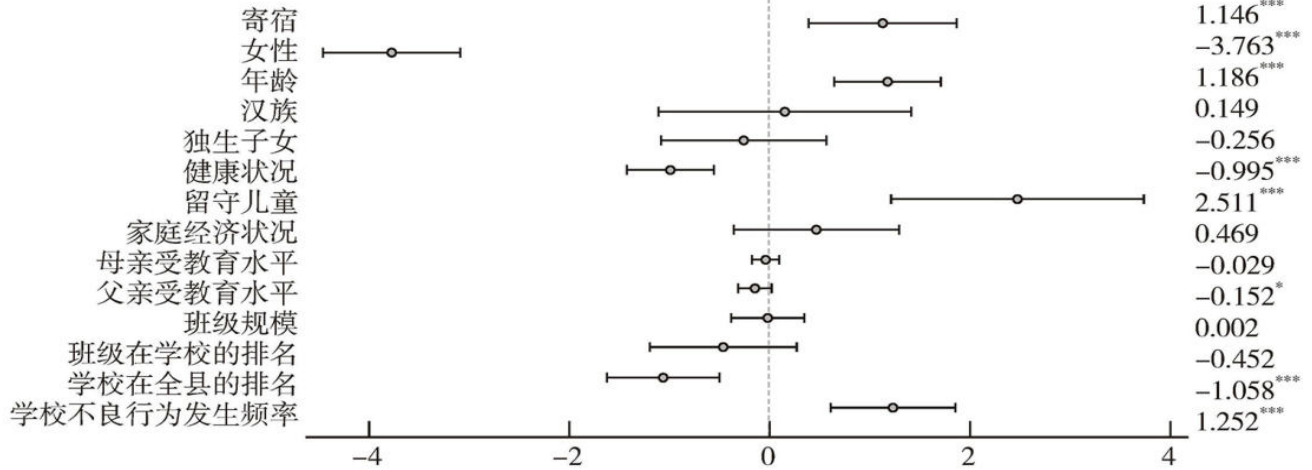
图7.2 (c) 汇报了寄宿对农村儿童早恋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与非寄宿儿童相比，寄宿导致农村儿童早恋发生的可能性提升6.9%，可能的解释是，儿童在寄宿学校中生活，容易形成强烈的孤独感，从而更渴望在同学中寻求情感支持，导致早恋现象普遍（褚卫中、张玉惠，2012）。综合上述分析，假设7.1得到支持。

农村儿童寄宿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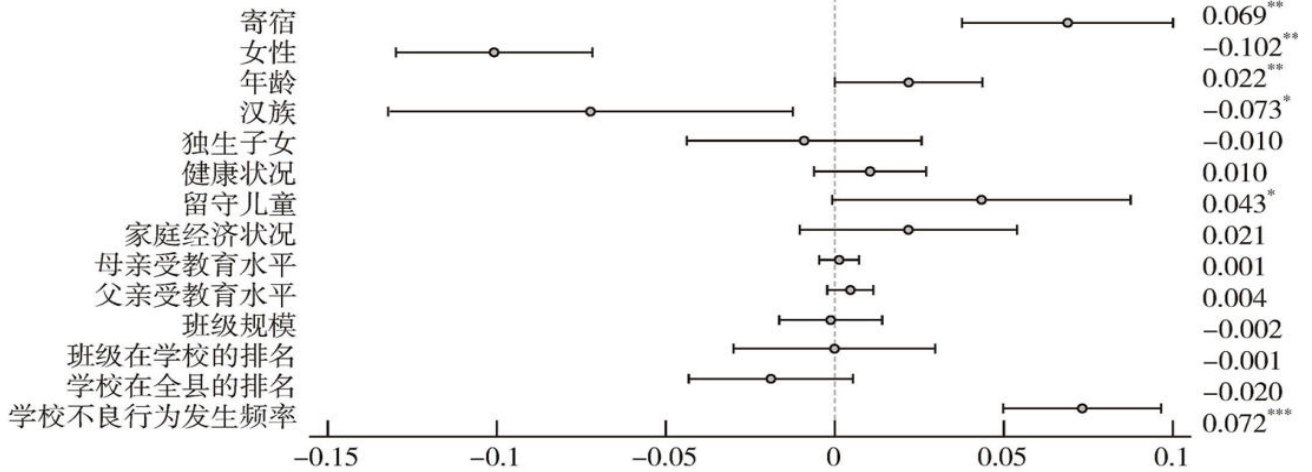
(a)

农村儿童寄宿对违纪行为的影响



(b)

农村儿童寄宿对早恋行为的影响



(c)

图7.2 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的回归结果

## 二 内生性问题讨论

### （一）倾向得分匹配

寄宿是否会使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高于非寄宿儿童，即寄宿是不是导致农村儿童偏差行为的原因，需要做进一步检验。农村儿童是否寄宿是其自选择结果，这会导致方程的估计结果产生偏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估计农村儿童寄宿对其偏差行为的“处理效应”。匹配估计的基本思路是，将其他特征相似，仅在寄宿状态上存在差异的农村儿童进行匹配，通过匹配后的样本识别寄宿对其偏差行为的影响。

寄宿的农村儿童为实验组，非寄宿的农村儿童为控制组。为确保其基本特征相似，笔者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之前，首先对协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都大幅度减小，且绝对值均小于10%，说明匹配之后的样本基本通过了平衡性检验，有效地解决了样本自选择带来的估计结果有偏的问题。

表7.3第（1）—（4）列分别报告了寄宿对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早恋行为采用马氏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及一对一匹配后的估计结果，即农村儿童寄宿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估计值。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寄宿的农村儿童而言，农村寄宿儿童攻击性行为和违纪行为发生频率更高，早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总体而言，PSM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较为接近，说明基准回归中控制变量选择恰当，实现因果推断的目标，结果稳健（见图7.3、表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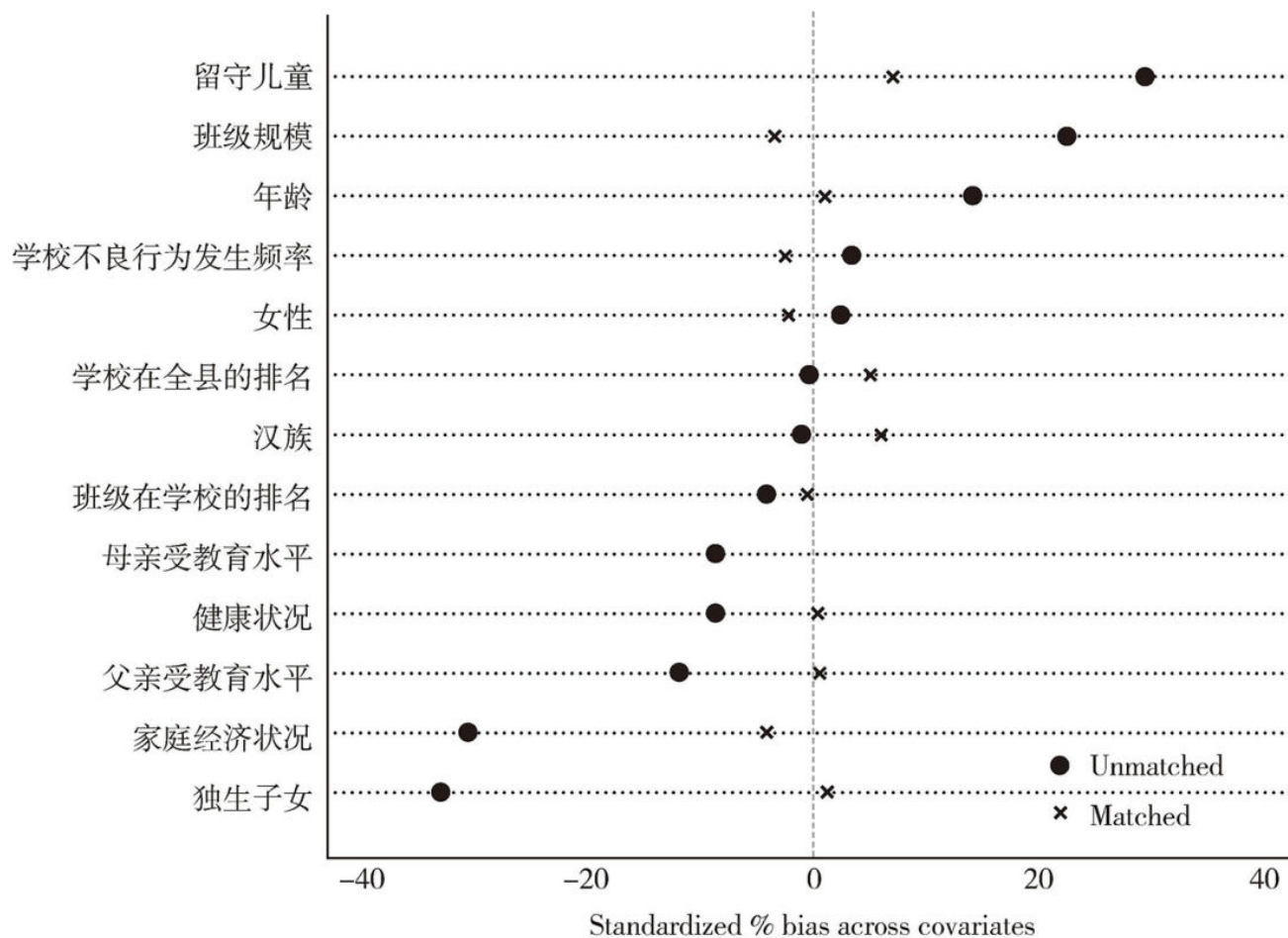


图7.3 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7.3 倾向得分匹配的处理效应

因变量 / 估计方法	(1)	(2)	(3)	(4)
	马氏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一对一匹配
攻击性行为	2.123 <sup>***</sup> (0.512)	1.603 <sup>***</sup> (0.460)	1.618 <sup>***</sup> (0.456)	1.920 <sup>***</sup> (0.632)
违纪行为	1.213 <sup>***</sup> (0.472)	1.008 <sup>**</sup> (0.406)	1.008 <sup>***</sup> (0.403)	1.400 <sup>***</sup> (0.555)
早恋行为	0.072 <sup>***</sup> (0.020)	0.067 <sup>***</sup> (0.017)	0.068 <sup>***</sup> (0.017)	0.072 <sup>***</sup> (0.023)
样本量	4169	4169	4169	4169

注：\* p<0.1, \*\* p<0.05, \*\*\* p<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二）工具变量法

农村儿童寄宿与其偏差行为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农村儿童的偏差行为可能会对其选择寄宿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儿童偏差行为较多，家长无力管理，选择送子女住宿让老师管理。针对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借鉴已有研究，使用家校距离作为农村儿童寄宿与否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学生是否寄宿会受到学校与家里距离远近的影响，如果学校离家太远，学生家长为解决上学通勤时间过长的问题可能会选择寄宿，如果学校离家较近，学生寄宿的可能性便会降低；另一方面，学校离家的距离不会对儿童发生偏差行为产生影响，满足外生性的假定。

本章采用Dubin-Wu-Hausman test来检验内生性问题是否存在，检验结果显著拒绝原假设（ $p=0.002$ ），说明模型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可以有效解决内生性带来估计结果有偏差的问题。表7.4汇报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的估计结果。第（1）列为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家校距离对农村儿童寄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学校离家越远，农村儿童寄宿的可能性越大。表7.4第（2）、（3）、（4）列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发现农村儿童寄宿对其偏差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即农村儿童寄宿会提高其发生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的频率，增加其早恋的可能性。进一步对家校距离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检验结果（ $F=255.157$ ， $p=0.000$ ），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即本模型选取的家校距离不是弱工具变量。

表7.4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寄宿	攻击性行为	违纪行为	早恋行为
寄宿		5.091*** (1.790)	5.822*** (1.576)	0.111* (0.067)
家校距离	0.005*** (0.000)			

续表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寄宿	攻击性行为	违纪行为	早恋行为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946	3946	3946	3946
调整的 R <sup>2</sup>	0.170	0.038	0.034	0.038

注：\*p<0.1，\*\*p<0.05，\*\*\*p<0.01，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第四节 大五人格如何影响农村寄宿儿童的偏差行为？

### 一 农村儿童的大五人格

本节对测量情绪稳定性五个问题均进行反向赋值处理。

本节对测量尽责性中“我经常迟到”“我经常逃课”两个问题进行反向赋值处理。

本节对测量外向性中“我很害羞”“我常自己一个人坐着，而不愿与别人在一起”两个问题进行反向赋值处理。

本节的中介变量为大五人格，主要包括亲和性、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外向性和开放性五大维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王春超、林俊杰，2021），并结合CEPS的问卷信息，共选取18个问题测量学生的亲和性、情绪稳定性<sup>①</sup>、尽责性<sup>②</sup>、外向性<sup>③</sup>、开放性<sup>④</sup>五类人格。通过因子分析生成大五人格各维度指标以及总指标，由于各维度指标间存在量纲差异，本节分别对其进行因子分析并做归一化处理，生成取值为0—1的连续型变量，分值越大，表明儿童该维度以及整体的人格特征水平越高。具体测量题项与指标描述见表7.5。

表7.5 大五人格测量题项与指标描述

大五人格	描述	测量题项	均值
亲和性	个体具有体贴友好、合作、宽恕等特质	1. 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 2. 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	0.722

续表

大五人格	描述	测量题项	均值
情绪稳定性	个体显示出喜怒无常、紧张、焦虑、容易担心等特质	1. 在过去的七天内,我感到消沉得不能集中精力做事 2. 在过去的七天内,我感到紧张 3. 在过去的七天内,我担心过度 4. 在过去的七天内,我预感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5. 在过去的七天内,我感到精力过于旺盛,上课不专心	0.693
尽责性	个体关于努力程度、自律和责任感等特质	1. 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有其他理由可以留在家里,我仍然会尽量去上学 2. 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 3. 我经常迟到 4. 我经常逃课	0.837
外向性	个体显示出社交、热情、健谈、充满活力等特质	1. 我很害羞 2. 我常自己一个人坐着,而不愿与别人在一起 3. 你自己或与同学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的频率 4. 你自己或与同学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	0.448
开放性	个体关于好奇、创造性、想象力、智慧等特质	1. 我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 2. 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 3. 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 4. 我对新事物很好奇	0.710
大五人格总指标	反映个体性格倾向	对上述测量题项进行加权处理	0.561

本节参考温忠麟等（2004）的做法，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大五人格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通过对以下方程的估计探究农村儿童寄宿对偏差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具体估计模型为：

$$\text{Behaviors}_i = \alpha_1 + \beta_1 \text{Boarding}_i + \gamma_1 X_i + \delta_j + \varepsilon_i \quad (7.2)$$

$$\text{Noncognitive}_i = b_0 + b_1 \text{Boarding}_i + \gamma_1 X_i + \delta_j + \varepsilon_i \quad (7.3)$$

$$\text{Behaviors}_i = c_0 + c_1 \text{Boarding}_i + d_1 \text{Noncognitive}_i + \gamma_1 X_i + \delta_j + \varepsilon_i \quad (7.4)$$

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思路：第一步，首先估计方程（7.1），基于变量*Boarding*系数 $\beta_1$ 的取值及其显著性，判断寄宿与非寄宿的农村儿童在偏差行为的发生上是否存在差异（具体系数在图7.2中展示）。第二步，进一步估计方程（7.2），其中*Noncognitive*为本书的中介变量，基于系数 $b_1$ 的取值及其显著性，判断寄宿与非寄宿的农村儿童在大五人格的发展上是否存在差异（具体系数在表7.6中展示）。第三步，通过比较方程（7.3）中*Boarding*系数 $c_1$ 相较方程（7.1）中*Boarding*系数 $\beta_1$ 在绝对值上是否有所缩小（具体系数在表7.7中展示），如果 $c_1$ 绝对值缩小且不再显著，则说明大五人格在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形成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如果 $c_1$ 绝对值缩小但仍然显著，则说明大五人格在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形成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逐步回归法对结果的分析非常直接，但存在精度不够的问题，因此使用Bootstrap方法进一步检验。

## 二 大五人格的中介效应

基准回归报告三步法回归方程中的第一步结果，即农村儿童寄宿对偏差行为的影响。表7.6展示方程（7.2）的估计结果，即寄宿对农村儿童人格特征的影响。对大五人格特征总体指标而言，解释变量寄宿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农村寄宿儿童的大五人格发展水平低于非寄宿的儿童。其中，亲和性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村寄宿儿童在亲和性上优于非寄宿儿童，这可能是因为，儿童在集体环境中生活，为了更好地融入集体，需要体贴友好地对待同学，因而寄宿会提高儿童的亲和性。而寄宿对于农村儿童的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外向性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农村寄宿儿童在情绪稳定性、尽责性和外向性三方面的人格特征显著低于非寄宿儿童。这可能是因为，寄宿儿童通常与家人分离，与父母和亲人的亲密联系较少，这种分离可能会引起情感上的不稳定和分离焦虑，这种焦虑可能导致他们更为内向；而在寄宿环境中，儿童可能过于依赖学校满足其学习和生活的需求，这种依赖可能会减少他们发展独立性和责任感的机会，从而削弱其尽责性。开放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7.6 农村儿童寄宿对其人格特征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大五人格总指标	亲和性	情绪稳定性	尽责性	外向性	开放性
寄宿	-0.014 <sup>***</sup> (0.005)	0.014 <sup>*</sup> (0.008)	-0.018 <sup>***</sup> (0.007)	-0.012 <sup>**</sup> (0.005)	-0.020 <sup>***</sup> (0.005)	0.003 (0.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648	4124	4103	4150	3975	3900
调整的 R <sup>2</sup>	0.113	0.064	0.024	0.037	0.079	0.068

注：\*p<0.1, \*\*p<0.05, \*\*\*p<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通过估计方程 (7.1) 和方程 (7.2)，我们已完成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因此，通过对方程 (7.3) 的估计，即比较控制儿童人格特征后学生寄宿对偏差行为的影响[见表7.7第 (1)、(2)、(3) 列中寄宿变量的系数]相对于控制人格特征变量前寄宿对学生偏差行为的影响的变化程度来判断大五人格的作用。

结果显示，在控制儿童人格特征后，寄宿对偏差行为的系数变小：由寄宿造成儿童发生违纪行为的频率从1.146下降到0.582，且解释变量寄宿的系数不再显著，说明大五人格对于违纪行为的发生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寄宿儿童发生攻击性行为的频率从1.842下降到1.454、发生早恋行为的可能性从6.9%下降到6.5%，显著性未变，这说明大五人格在农村寄宿儿童的攻击性行为 and 早恋行为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表7.7 控制儿童人格特征：农村儿童寄宿对偏差行为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攻击性行为	违纪行为	早恋行为
寄宿	1.454 <sup>***</sup> (0.421)	0.582 (0.373)	0.065 <sup>***</sup> (0.017)
亲和性	-1.721 <sup>*</sup> (0.902)	-0.785 (0.767)	0.040 (0.033)
情绪稳定性	-21.521 <sup>***</sup> (1.364)	-16.702 <sup>***</sup> (1.150)	-0.306 <sup>***</sup> (0.041)

续表

变量	(1)	(2)	(3)
	攻击性行为	违纪行为	早恋行为
尽责性	-13.544 <sup>***</sup> (1.690)	-18.098 <sup>***</sup> (1.660)	-0.060 (0.055)
外向性	3.034 <sup>**</sup> (1.421)	-0.069 (1.246)	0.040 (0.052)
开放性	2.180 <sup>*</sup> (1.217)	-0.455 (1.124)	0.106 <sup>**</sup> (0.0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 <sup>2</sup>	0.183	0.214	0.042
样本量	3648	3648	3648

注：\*p<0.1, \*\*p<0.05, \*\*\*p<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三 基于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效应分析

上文通过逐步回归法得到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为进一步验证当效应较弱而难以识别的中介效应，本部分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获得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Bootstrap方法要求重复抽样次数在1000次及以上（Preacher and Hayes, 2008），本部分通过迭代1500次以获取结果，结果见表7.8。

以寄宿作为自变量，人格特征综合指标作为中介变量，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早恋行为作为因变量，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变量检验，结果表明人格特征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370、0.364、0.003，三类行为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

（LLCI=0.112, ULCI=0.655; LLCI=0.106, ULCI=0.630; LLCI=0.001, ULCI=0.007），其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8.9%、33%、4.2%。综合上述分析，儿童自身人格特征是寄宿影响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和早恋行为的重要机制，假设7.2得到支持。

表7.8 基于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间接效应	标准误差	中介效应占比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寄宿→大五人格→攻击性行为	0.370 <sup>***</sup>	0.136	18.9%	0.112	0.655
寄宿→大五人格→违纪行为	0.364 <sup>***</sup>	0.134	33%	0.106	0.630
寄宿→大五人格→早恋行为	0.003 <sup>**</sup>	0.001	4.2%	0.001	0.007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第五节 同伴、教师、父母对农村寄宿儿童偏差行为的调节

### 一 不良同伴的增强效应

本节测量不良同伴的题目为“学生提到的好朋友有没有如下行为”，包括“逃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经常上网吧、游戏厅，谈恋爱”五个问题，每个问题答案均取值1—3分别代表“没有这样的”“一到两个这样的”“很多这样的”（见表7.9），将五个问题答案得分进行分组赋值处理，对所有问题都回答“没有这样行为的好朋友”取值为0，只要有一个回答“有一到两个以及很多这样行为的好朋友”取值为1，分别代表无不良同伴和有不良同伴。

表7.9 不良同伴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不良同伴测量题项	变量赋值
你的好朋友有没有逃课、旷课、逃学的情况？	
你的好朋友有没有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的情况？	
你的好朋友有没有打架的情况？	1= 没有这样的，2= 一到两个这样的， 3= 很多这样的
你的好朋友有没有经常上网吧、游戏厅等情况？	
你的好朋友有没有谈恋爱的情况？	

表7.10展示了农村寄宿儿童是否交往不良同伴对其偏差行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当寄宿儿童交往不良同伴时，其发生攻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的频率以及早恋行为的可能性大于未交往不良同伴的儿童。这可能是由于寄宿学校的生活加强了与同伴的联系，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若身边有不良同伴，他们会观察和模仿同伴偏差行为（Bandura et al., 1986），从而增加自身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假设7.3a得到支持。

表7.10 农村寄宿儿童是否交往不良同伴对其偏差行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攻击性行为		违纪行为		早恋行为	
	无不良同伴	有不良同伴	无不良同伴	有不良同伴	无不良同伴	有不良同伴
寄宿	1.333 <sup>***</sup> (0.474)	3.013 <sup>***</sup> (0.935)	0.782 <sup>**</sup> (0.389)	2.022 <sup>**</sup> (0.914)	0.064 <sup>***</sup> (0.019)	0.078 <sup>***</sup> (0.0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 <sup>2</sup>	0.026	0.052	0.034	0.072	0.025	0.026
样本量	3022	1147	3022	1147	3022	1147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二 教师支持的阻断效应

本节对测量教师情绪支持中“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会冷漠孤立我、当众批评我或者私下批评我”三个问题进行反向赋值处理。

本节用学业支持、情绪支持综合度量教师对学生的支持程度，学业支持包括分别询问学生“数学、语文、英语三科老师是否在课堂上常常注意我”三个问题，情绪支持包括询问学生“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是否会想办法帮助我”“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是否找家长一起帮助我”“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会冷漠孤立我”“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会当众批评我”或者“出现消极情绪时，老师会私下批评我”

⑤ 五个问题，具体赋值见表7.11，由于第4、5、6三个问题的变量赋值是反向的，我们进行了正向处理。通过因子分析生成教师支持的综合指标，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生成取值为0—1的连续型变量，分数越高，表明教师支持越高。此外，为讨论当教师支持程度不同时，寄宿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本节参考张骞（2023）的处理方法，将连续变量教师支持转化为分类变量，分别为教师支持程度较高（前30%）和较少（后70%）。

表7-11 教师支持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教师支持	测量题项	变量赋值
学业支持	1. 你是否同意数学老师在课堂上常常注意我	1= 完全不同意, 2= 比较不同意, 3= 比较同意, 4= 完全同意
	2. 你是否同意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常常注意我	
	3. 你是否同意英语老师在课堂上常常注意我	
情绪支持	4. 你是否同意出现消极情绪时, 老师会冷漠孤立我	1= 完全同意, 2= 比较同意, 3= 不太同意, 4= 完全不同意
	5. 你是否同意出现消极情绪时, 老师会当众批评我	
	6. 你是否同意出现消极情绪时, 老师会私下批评我	1= 完全不同意, 2= 不太同意, 3= 比较同意, 4= 完全同意
	7. 你是否同意出现消极情绪时, 老师会想办法帮助我	
	8. 你是否同意出现消极情绪时, 老师会找我的家长一起帮助我	

表7. 12展示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影响的教师支持程度异质性分析。笔者发现，当儿童获得了较多的教师支持，寄宿对其偏差行为的负向影响会降低。这可能是由于，教师通过正面的激励和引导方式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且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的良好关系，也为学生提供了安全和支持性的环境。所以，儿童获得较多的教师支持可以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行为模式和适应性社交技能（叶晓梅、曹晓婕，2023），从而抑制偏差行为的发生。假设7. 3b得到支持。

表7. 12 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影响的教师支持程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攻击性行为		违纪行为		早恋行为	
	教师支持高	教师支持低	教师支持高	教师支持低	教师支持高	教师支持低
寄宿	1.184 (0.812)	2.414*** (0.490)	0.877 (0.789)	1.585*** (0.399)	0.063** (0.028)	0.075*** (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 <sup>2</sup>	0.027	0.057	0.046	0.064	0.025	0.033
样本量	1338	2831	1338	2831	1338	2831

注：\*p<0.1，\*\*p<0.05，\*\*\*p<0.01，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三 父母参与的保护效应

参考吴帆、张林虢（2018）的做法，我们用认识参与、行为参与综合度量父母参与程度。对认知参与的衡量是根据询问学生“你和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大概是？”和“你和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大概是？”两个问题，对行为参与的衡量是询问学生“你和父母一起吃晚饭的频率大概是？”这一个问题，以上三个问题答案均取值1—6，分别代表“从未做过”到“每周一次以上”（见表7.13）。通过因子分析生成父母参与的综合指标，然后进行归一化处理，生成取值为0—1的连续型变量，分数越高，表明儿童父母参与程度越高。为讨论当父母参与程度不同时，寄宿对儿童偏差行为的影响，本节参考张骞（2023）的处理方法，将连续变量父母参与转化为分类变量，分别为父母参与程度越高（前30%）和较少（后70%）。

表7.13 父母参与的测量题项与变量赋值

父母参与	测量题项	变量赋值
认知参与	你和父母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大概是？	1= 从未做过， 2= 每年一次， 3= 每半年一次，
	你和父母一起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大概是？	4= 每个月一次， 5= 每周一次，
行为参与	你和父母一起吃晚饭的频率大概是？	6= 每周一次以上

表7.14展示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影响的父母参与程度异质性分析。笔者发现，若寄宿儿童父母参与较多，其偏差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会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在儿童成长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能教育和引导孩子的行为，并帮助他们适应社会环境。但当父母缺位时，使得儿童无法得到足够的情感支持和安全感，他们会试图与同伴或者其他关系人建立关系填补内心空缺，从而增加发生偏差行为的可能性（Wu et al., 2018）。假设7.3c得到支持。

表7.14 寄宿对农村儿童偏差行为影响的父母参与程度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攻击性行为		违纪行为		早恋行为	
	父母参与较多	父母参与较少	父母参与较多	父母参与较少	父母参与较多	父母参与较少
寄宿	0.766 (0.649)	2.629*** (0.594)	0.436 (0.617)	1.530*** (0.492)	0.052** (0.024)	0.088*** (0.0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班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的 R <sup>2</sup>	0.041	0.052	0.062	0.057	0.03	0.028
样本量	1857	2312	1857	2312	1857	2312

注：\*p<0.1, \*\*p<0.05, \*\*\*p<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第五部分

# 工作—生活双场域下父母缺位的长期影响

# 第八章 工作场域：童年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

——来自非认知能力的解释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移，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大数量的人口迁移。受限于城市落户的高门槛（魏东霞、谌新民，2018），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无法享受与流入地市民同等待遇，他们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家乡，从而产生了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早在2010年，农村留守儿童就达到6102.55万人，超过了全国儿童的1/5，当第一批留守儿童已成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成为中坚力量，留守儿童研究的关注点也从“留守状态”转向“留守经历”（叶敬忠，2019）。童年留守经历会产生多重影响，比如对成年健康和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并存在代际传递（Zheng et al., 2022），而在劳动力市场上主要表现为加剧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不平等，影响劳动者的收入（韩保庆等，2021），降低就业质量（唐宁、谢勇，2019；Liu et al., 2020）。

就业是民生之本，实现高质量就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目前青年就业压力巨大，实现青年充分高质量就业是就业领域的重中之重。影响就业质量的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如城镇化、数字经济、生育政策的调整等（张广胜、王若男，2023；盛亦男，2019），也包括微观层面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刘涛、王德政，2021；杨政怡、杨进，2021）。值得注意的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因素往往是交织而不是单一地产生影响，童年留守经历既兼具了个体特征的微观元素，又能反映时代变迁的宏观要素，或许能更深入地解释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童年阶段是整个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父母外出不仅对留守儿童童年时期产生影响，也会对成年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成年后参加工作是重要事件，就业质量是检验成年后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依据。那么，童年父母外出这一生命中重要事件如何影响青年就业质量？这是本章试图解答的问题。

在解释就业质量中最重要的指标工资差异时，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将能力近似等同为认知能力，教育被视为其代理变量（周金燕，2015）。但新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对个人职业发展及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Heckman et al., 2006），能够预测个体的工资收入表现（Heckman and Rubinstein, 2001），由此揭示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与认知能力相比，非认知能力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更具可塑性，应成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

(Heckman, 2000; Kautz et al., 2014)。个体早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不仅能够微观上促进个体在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更有助于缓解中国结构性失业、贫困和犯罪等诸多宏观现实问题(李晓曼、曾湘泉, 2012)。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非认知能力角度寻找童年留守经历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路径。

## 第一节 童年父母外出、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的文献爬梳

### 一 父母外出务工与留守儿童的人力资本

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主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父母单方外出或双方外出和留守时长(周福林、段成荣, 2006)。现有研究普遍采用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即为留守(吴霓, 2004; 胡枫等, 2009),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只有父母双方均外出才算留守(朱科蓉等, 2002)。关于留守时长也有不同的界定,根据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四个月为一学期的特征,有学者采用四个月以上的标准(叶敬忠、詹姆斯·莫瑞, 2005; 刘红艳等, 2017),而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课题组统计留守儿童数量时均采用“半年以上”的标准,还有研究以一年以上作为界定标准(Zhou et al., 2022)。综合以上定义,结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孙文凯、王乙杰(2016)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本章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六个月以上,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儿童。

家庭环境在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春玲、郭亚平, 2021),父母作为家庭中儿童照料和教育的主要责任人,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最微观环境,父母的就业状况直接影响到子女发展(吴晓刚、李欣, 2023)。大量研究关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即期影响,包括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营养状况、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Lei et al., 2018; Zhu et al., 2014),一方面,父母外出到城市务工会产生汇款效应,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让留守儿童在生活条件、教育、营养等方面得到改善,甚至往往优于非留守儿童(杨菊华、段成荣, 2008; 谢贝妮、李岳云, 2013; 梁在、李文利, 2021; 彭小辉等, 2022)。父母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自身的健康意识和认识水平也会得到提升,进而传递给留守儿童(Resosudarmo & Suryadarma, 2011),促进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父母外出务工会导致亲子分离,童年缺乏父母照料将不利于留守儿童身心发展(刘靖, 2008; 范兴华等, 2017; Gao et al., 2010)。由于缺乏父母的指导和监督,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方面往往落后于非留守儿童(李云森, 2013),也更容易发生网络成瘾(Ye & Lu, 2011)。陶然和周敏慧(2012)的研究发现分离效应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汇款效应带来的积极影响,即总体上父母外出务工不利于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

父母在子女的抚养过程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母亲提供的是生理性抚育，父亲则承担着社会性教育的责任（费孝通，1988），“双系抚育”最适合儿童成长（吴愈晓等，2018）。既有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导致的父亲缺位和母亲缺位会对留守儿童人力资本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就儿童的学业成就而言，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数学和英语成绩的影响大于语文成绩，因为母亲扮演着比父亲更重要的育儿角色（李庆海等，2014；许琪，2018；张瑶、陈伟，2018），父亲外出、由母亲监护的留守儿童语文成绩具有明显的优势（梁在、李文利，2021）。从教育获得来看，父亲外出不仅能显著改善农村儿童的教育获得（袁梦、郑筱婷，2016），还能提高农村儿童成年后的受教育水平（韩保庆等，2023），而母亲外出和双亲外出影响不显著。从儿童健康来看，母亲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负向影响最大，父亲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最小（陈在余，2009；宋月萍、张耀光，2009；郝明松，2022）。也有研究发现只有双亲外出对儿童健康产生负向影响，单亲外出的影响不显著（苏华山等，2017）。梳理现有文献我们发现，母亲外出务工会带来照料与监督缺失，对儿童的学业成绩和健康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而父亲外出务工则会通过汇款效应对儿童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儿童当期和长期人力资本的积累。

## 二 童年留守经历与非认知能力

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五种途径实现，即医疗和保健投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学习和劳动力迁移等（舒尔茨，1990）。后续研究指出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教育、健康等传统人力资本不能完整地解释劳动力市场结果，Heckman et al.（2006）提出了“新人力资本模型”，将非认知能力引入经济模型，认为非认知能力是有价值并可投资的，并对非认知能力的经济价值和投资特征进行了探讨。在此影响下，留守对人力资本影响研究的关注点开始从子女教育、健康等传统人力资本转向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上。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主要通过影响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来影响其非认知能力。父母外出务工会通过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有助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增加父代对子代的经济投入，进而提高子代的非认知能力（王慧敏等，2017；李丽等，2017）。但父母外出也会减少子女成长阶段父母的监护和陪伴，父母时间投入的减少会产生挤出效应，特别是忽视型教养方式会对子女非认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黄超，2018）。

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净效用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挤出效应绝对值的大小。李乐敏等（2020）通过亲子共餐的准实验，发现父母陪伴频率的降低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总水平及其分维度情绪稳定性、亲和性和尽责性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崔颖和徐卓君（2021）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自尊和亲和性有积极影响，但对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有消极影响。而周春芳等（2023）发现留守经历显著降低了农村儿童的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我们无法从逻辑

上判断父母外出务工对非认知能力的总效应是正还是负，这是因为混杂了多种留守类型对非认知能力的不同影响。在劳动力和家庭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双重影响下，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可能不同。与父亲分离显著不利于子女的人际交往、自我控制、领导力等非认知能力（李波、尹璐，2019），但父亲长期外出使子女在开放性和外向性方面的表现更佳。母亲外出务工不利于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因为母亲外出务工带来的分离效应会降低留守儿童的情绪稳定性，同时母亲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效应较小，发挥作用有限（Liu et al., 2021）。也有研究表明，父亲外出会提升留守儿童的顺同性、外向性和开放性，而母亲外出会降低留守儿童的严谨性和外向性（韩保庆等，2023）。

童年留守经历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会持续到成年阶段，郭亚平（2020）发现童年留守经历会对大学生的社会交往、社会支持、自我控制和情绪稳定性等非认知能力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刘志军（2019）在研究留守经历对“80后”外来工精神健康的长期影响时，发现长时间的留守生活可能增强个人的抗逆力。

### 三 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

在解释明瑟方程残差时传统人力资本理论遇到了挑战，当控制人力资本的认知属性、人口学特征和家庭特征后，仍有60%左右的收入差异无法解释（Solon, 1992），而这部分收入差异要归因于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差异。

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上。基于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差异，非认知能力有两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在调查研究中通常用量表来测量，最常用的是大五人格，而在实验研究中通常用偏好实验来测量，如风险偏好。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运用大五人格测量非认知能力，发现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认知能力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对其影响强度下降。李晓曼和曾湘泉（2012）认为非认知能力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经济社会表现，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收入有决定作用，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收入

（Bowles et al., 2001; Almlund et al., 2011）。其中，人格特征中的开放性、严谨性对工资收入有促进作用，且其对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作用超过受教育年限（乐君杰、胡博文，2017；程虹、李唐，2017）。许多多（2017）发现贫困大学生在大学教育中非认知能力增长速度更快，且对初职收入的影响更大，可以改变寒门学子的命运。也就是说，家庭经济背景处于劣势地位的寒门学子大学期间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会带来其在劳动力市场上更高的回报。风险偏好可以表征为进取心，高风险偏好也是进取心强的表现，或许能促进其取得工作方面的成就，从而提升就业质量。

### 四 研究假设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范式是将个体生命历程看成社会结构的产物，童年阶段是人生发展最重要的阶段，童年时期的经历将对整个生命历程产生持续影响（Elder, 1994；埃尔德，2002）。根据“童年逆境经历”测量（AC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童年留守经历属于逆境经历的一种，童年父母外出不仅会影响子女当期人力资本的发展，这种影响也会持续到子女成年。留守经历既会对成年人的健康和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Zheng et al., 2022），也会降低成年人的主观福祉（刘志军等，2022）。童年留守经历不仅会降低大学生的学业成就（胡建国、鄢雨，2020），还会让大学生感到自卑、缺乏安全感，从而产生更强的攻击性（张春阳、徐慰，2020）。留守经历会让农民工形成自卑又自立的性格，造成社交困难（刘志军、徐芳，2020），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郑晓冬等，2022），也会造成犯罪率上升（Zhang et al., 2019）。以上研究结论均表明，留守经历作为一种逆境经历，会对成年人持续产生消极影响。

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对的是“逆境成才论”，其主张逆境能够造就人才。正如孟子所言，人的品德、智慧、本领、知识往往是在忧患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强调逆境在个人成才道路上的作用，增益其所不能去应对不利环境从而获得成功。在寒门出贵子这一经典问题的讨论中，文化流动理论认为，文化不总是通过代际传递获得的，寒门要想获得升迁式的社会流动，就需要获取优势文化资本来弥补家庭背景的不足（谢爱磊等，2018），寒门学子的法宝是改变命运的内驱力，强烈的自我奋斗意识和自制力（余秀兰、韩燕，2018），这正是个体在逆境中调节自我、应对压力并获得较好发展的“抗逆力”。

留守经历作为一种逆境经历与抗逆力有着密切关系。刘志军（2019）研究发现长时间留守生活反而会增加个人的抗逆力。李永鑫等（2008）发现母亲不仅能够给予儿童细致的生活照料，而且能够满足儿童的情感支持需求，而父亲的照料在生活和情感上都有所欠缺。由母亲照料的儿童抗逆力最优，而由父亲照料的留守儿童抗逆力最低。抗逆力是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超过了智商和认真程度（Duckworth et al., 2007）。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父亲外出母亲在家的儿童成年后事业更容易成功，而母亲外出父亲在家的儿童成年后事业更难成功。就业质量是一个相对全面综合的指标，可以测量事业成功与否，就业质量越高意味着事业越成功，由此提出假设8.1：

H8.1：父亲外出有利于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而母亲外出会降低青年就业质量。

童年留守经历可能因留守阶段和留守时长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影响。儿童能力形成的阶段性理论指出儿童能力形成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的生命时期形成不同的能力，一旦错过这个时期，后期补偿的代价是高昂的（Cunha et al., 2010）。依托该理论产生了能力形成的“关键期”的说法。“关键期”指某些能力只有在这个阶段才能形成，后期难以弥补（周金燕，2015）。已有研究表明，3岁前是自我意识

形成的“关键期”，3岁时儿童的自我意识基本形成（Rochat, 2018）。0—3岁母亲护理和照料婴幼儿，为其建立安全感，这一关键时期父亲外出可能从客观上刺激了子女自主能力的发展。如果是主要负责抚育性工作的母亲外出会让子女因缺乏照料而缺乏安全感，进而削弱其自主探索能力，并可能会影响其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虽然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的影响方向不同，但在0—3岁“关键期”父母外出都可能会强化其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8.2：

H8.2：父母在子女0—3岁“关键期”外出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影响有强化作用。

能力的自强化理论认为，儿童能力形成具有自我增强性，当期能力的形成可以提高下一期能力，能力和能力之间具有相互增强的作用（Cunha et al., 2010）。已有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对认知能力的负效应会随着留守时间的延长而递增（周春芳、苏群，2023），那么留守时间越长，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越大，对儿童当期能力存在增强效应，并持续影响到成年后的发展，由此提出假设8.3：

H8.3：父母外出时间越长，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影响越大。

结合前文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笔者发现父亲外出务工可能对儿童非认知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而母亲外出会对儿童非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非认知能力发展有利于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进而提升就业质量。综合童年留守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和非认知能力对就业质量影响这两个阶段的研究，由此提出假设8.4：

H4：童年父亲外出通过促进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提升青年就业质量，而童年母亲外出则不利于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而降低青年就业质量。

## 第二节 童年留守经历与青年就业质量

### 一 数据来源

由于本书研究的是童年留守经历，故排除由于2010年父母去世或离异等原因造成的被访者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

本书想尽可能用最新数据、最优数据和多期数据，但CFPS 2020数据没有涉及非认知能力相关问题，而CFPS 2016及以前相关数据虽然涉及非认知能力相关数据，但每期数据问题差异大且相比之下都没有CFPS 2018数据完善（CFPS 2018数据明确了大五人格的测量），故最终决定使用CFPS 2018数据中非认知能力和就业质量相关问题。

本节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年和2018年数据。CFPS 2010问卷中有关于童年时期父母缺位<sup>①</sup>的相关问题，2018年问卷中有关于非认知能力<sup>②</sup>和就业质量的相关问题，本节运用2010年调查并且在2018年追访成功的样本研究童年留守经历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及非认知能力影响机制。

留守儿童是针对农村儿童提出的，因此笔者限定3岁时为农业户口。根据CFPS 2018问卷，对工作类型的划分有4类，分别是自家农业生产经营、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农业打工和非农受雇。笔者将非农受雇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不考虑农业打工的就业质量，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一类型所占比例很小，仅为1.75%；二是农业打工通常具有季节性，是分散的，也没有工资收入数据。

中国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因此笔者只保留1980年后出生样本（年龄在38周岁以下），以排除198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人口迁移的混杂影响（Zheng et al., 2022）。又因为本书研究的是童年留守经历与青年就业质量，笔者只保留“3岁时户籍为农业户口”<sup>③</sup>，且调查时满18周岁、工作类型为受雇群体的样本<sup>④</sup>，样本年龄在18—38岁。对重要变量进行识别，剔除无效样本后，获取有效样本1469个，其中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样本为127个。

## 二 指标测度

### （一）如何衡量就业质量？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中最主要的两个险种，与其他社会保险险种相比，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大、惠及面大、缴费率相对较高，更能衡量就业质量的好坏。这里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指雇主单位为员工缴纳的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

国外学者对就业质量指标有较为成熟的客观评价体系。例如，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工作指标体系（ILO, 1999）、欧盟委员会的工作质量指数、欧洲基金会的四维度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等（Schroeder, 2007）。本书借鉴Leschke和Watt（2014）的多维就业质量指数（multi-dimensional job quality index）以及明娟和曾湘泉（2015）对就业质量测量维度的选择，结合CFPS数据的特点，选择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四个维度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四个分指标分别为：①工作收入，是衡量就业质量最重要的指标，用平均每月税后工资（扣除五险一金）来衡量；②工作强度，用每周平均工作小时数来衡量；③工作稳定性，用是

否签订劳动合同来衡量；④社会保险，用是否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来衡量。

对就业质量总指数的测量，本书先对各分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X_{ij}^{nor} = \frac{X_{ij} - \min_j}{\max_j - \min_j} \quad (8.1)$$

$X_{ij}^{nor}$

其中， $X_{ij}^{nor}$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 $i$ 代表劳动力个体， $j$ 代表就业质量的四个分项指标。 $\max_j$ 和 $\min_j$ 分别表示个体就业质量分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需要注意的是，工作强度与就业质量呈负相关，本章用1减去标准化处理后的工作强度的差来进行正向化处理。

就业质量指数的计算还需要明确各分项指标的权重，本书采用等权平均法（简单平均法）来计算就业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 $Q_i$ 计算公式如下：

$$Q_i = \frac{1}{4} \sum_{j=1}^4 X_{ij}^{nor} \times 100 \quad (8.2)$$

劳动力就业质量指标的选取及描述性统计见表8.1。

表8.1 就业质量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指标	赋值及含义	全样本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双亲外出	非留守
就业质量	取值0—100，分值越高，表明就业质量越好	41.450	46.731	36.011	40.193	41.271
工作收入	每月平均工资（元）*	4029.493	4126.388	3950.333	4111.111	4027.116
工作强度	每月平均工作小时数	51.875	51.388	61.556	47.427	52.004

续表

指标	赋值及含义	全样本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双亲外出	非留守
工作稳定性	签订劳动合同 =1；无 =0	0.606	0.701	0.667	0.588	0.601
社会保险	同时享受养老和医疗保险 =2	0.441	0.552	0.222	0.373	0.440
	享受其中一种 =1	0.049	0.045	0.111	0.039	0.049
	均不享受 =0	0.510	0.403	0.667	0.588	0.511

注：（1）工作收入均值根据原始月平均收入数据进行双边缩尾（1%）处理后的样本计算；工作强度均值根据原始月平均工作小时数据进行双边缩尾（1%）处理后的样本计算。（2）表中报告的均为均值，均值差异等于有留守经历样本均值减没有留守经历样本均值。（3）\*\*\*、\*\*、\* 分别代表两组样本均值差异的 t 检验结果在 1%、5%、10% 统计水平上显著。

\* 工作收入在这里展示的具体数额，但在就业质量的测算中，笔者采用了对数工资并进行标准化。

表8.1显示了全样本、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双亲外出和没有留守经历的样本就业质量各项指标的基本情况。童年父亲外出的青年就业质量最高，高于没有童年留守经历青年人，双亲外出的青年就业质量低于没有留守经历青年人，母亲外出的就业质量最低。具体来看，父亲外出在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险四方面都优于非留守，而母亲外出与非留守相比，收入和社会保险拥有率更低，工作强度更大，工作稳定性更高。双亲外出与非留守相比，工作收入更高，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享有率都更低。

## （二）如何界定童年留守经历？

有童年留守经历的参照项为没有童年留守经历，考察的均为农村儿童的情况，不涉及流动儿童（随迁儿童）。因为流动儿童并没有与父母分离。

童年留守经历<sup>④</sup>。笔者根据CFPS 2010问卷中的四个问题“您3岁以前（含3岁时），您父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最长为几周”“您3岁以前（含3岁时），您母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最长为几周”“您4—12岁时，您父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最长为几周”“您4—12岁时，您母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最长为几周”对童年留守经历进行界定。已有研究中对留守儿童的界定通常是父母进城务工，导致孩子与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分开6个月以上（Zhou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8）。本书排除了由于父母去世或离异等原因造成的被访者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即删除了2010年被访者父母去世或者父母婚姻状况为非在婚的样本，以确保样本均为因父母外出而形成的留守状态。借鉴留守儿童的界定，结

合问卷中的四个问题，区分三种类型的童年留守经历：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双亲外出。同时还可以获得另外两个维度的变量，分别是留守时段和留守时长。留守时段分为0—3岁留守、4—12岁留守和两个阶段都留守。留守时长分为半年到一年、一年到两年、两年到三年和三年以上。

根据数据部分的界定，为了研究需要，我们保留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样本，由于主要使用CFPS 2018数据，所以样本均为38岁以下，又因为要研究青年就业质量，故样本的年龄范围在18—38岁。

总体来看，如图8.1所示，年龄在18—38岁的青年人中，有童年留守经历的占8.65%。从留守类型来看，母亲外出的样本占0.62%，父亲外出的样本占4.56%，父母双亲外出的样本占3.47%。可见父亲外出务工和父母双亲外出务工是主要形式。从留守时段来看，4—12岁留守的比例最高（4.60%），0—3岁留守所占比例最低，仅为1.09%，两个阶段（0—3岁和4—12岁）均留守的占2.66%。0—3岁婴儿期更需要父母照料，因而父母外出比例较低。从留守时长来看，一到两年留守经历的受访者所占比例最高，为2.86%；其次是三年以上留守经历占2.45%；再次是两到三年留守经历的（1.70%）；最后是半年到一年留守经历的（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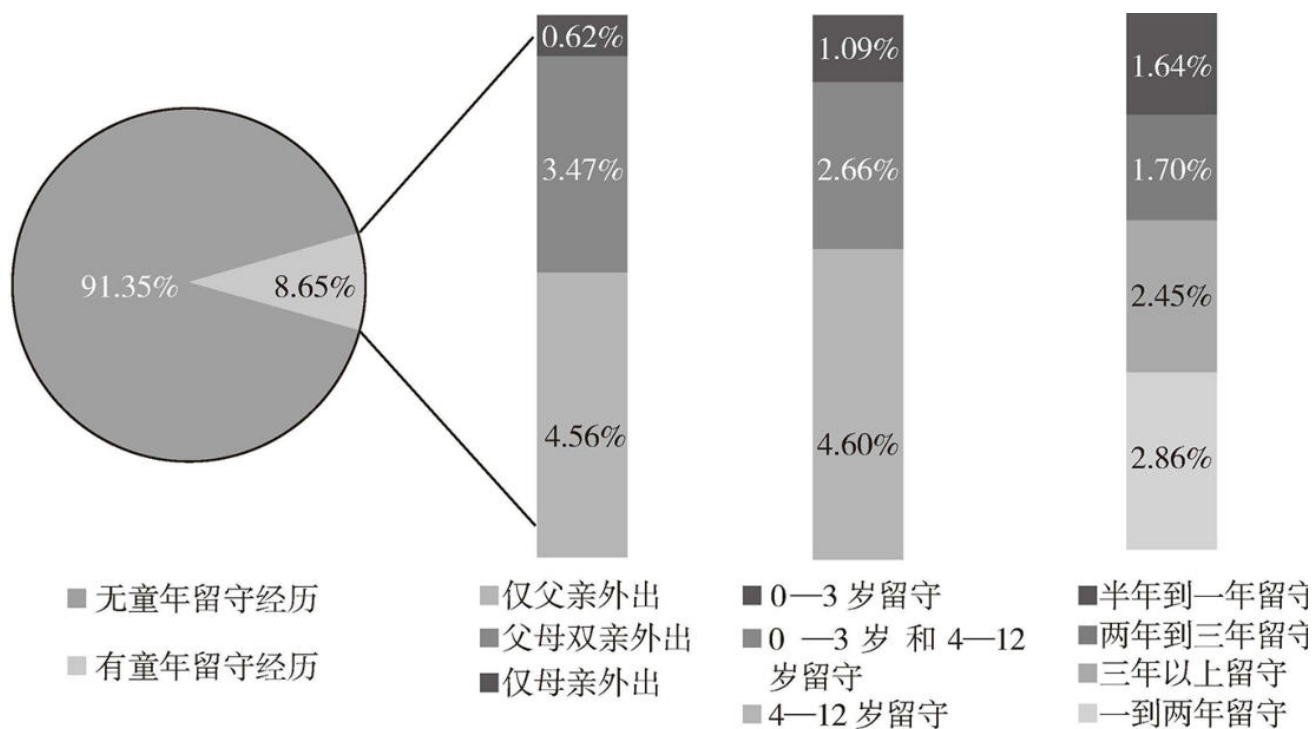


图8.1 童年留守经历的描述

### (三) 其他指标的衡量

非认知能力指个体和他人和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行为、情感和思想（Almlund et al., 2011; Glewwe et al., 2017）。大五人格模型是现有国际上不同学科之间测度非认知能力公认的工具，国内学者也认为大五人格能够较好地阐释中国人的非认知能力（王孟成等，2010）。本节采用大五人格来测量非认知能力，Costa和McCrae（1992）提出的大五人格分类法将非认知能力分为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参照CFPS 2018问卷的问题，本章构建五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每个维度由3个问题组成（见表8.2），每个问题的回答对应1—5分，将被访者对每个维度3个问题的回答所对应的得分加总得到一个取值在3—15分的连续变量。

表8.2 CFPS中对应的大五人格问题与均值

大五人格	细分人格特征	CFPS对应的问题	全样本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双亲外出	非留守
尽责性	能力	1. 做事有效率	11.240	11.701	11.222	11.157	11.220
	责任感	2. 做事严谨认真					
	自律	3. 往往很懒惰（反向）					
外向性	乐群	4. 开朗、善社交	9.814	9.925	9.556	9.706	9.814
	热情	5. 爱说话					
	寻求刺激	6. 含蓄、保守（反向）					
亲和性	利他	7. 为他人着想	11.291	11.373	12.333	11.353	11.277
	同理心	8. 天性比较宽容					
	谦逊	9. 有时对别人粗鲁不客气（反向）					
开放性	思辨	10. 具有独创性，会产生新点子	9.711	10.224	9.779	9.706	9.678
	审美	11. 重视艺术和审美的体验					
	想象力	12. 想象力丰富					

续表

大五人格	细分人格特征	CFPS对应的问题	全样本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双亲外出	非留守
	心态平静	13. 经常会担心（反向）					
情绪稳定性	松弛感	14. 容易紧张（反向）	9.220	9.448	9.111	9.255	9.208
	抗压力强	15. 是放松的，能很好地应付压力					

注：在 CFPS 调查中，关于大五人格这 15 个问题的选项为：1. 完全不符合；2. 不太符合；3. 一般（不读出）；4. 比较符合；5. 完全符合。其中问题 3、问题 6、问题 9、问题 13 问题 14 为反向表达，笔者对其回答进行了正向化处理。

比较童年父亲外出和没有留守经历的样本的大五人格各项值，本书发现父亲外出的青年人在大五人格的各个维度上均高于非留守样本。母亲外出在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上不如非留守样本。双亲外出在尽责性和外向性上不如非留守样本（见表 8.2）。参照以往研究的做法（韩保庆等，2021；Zheng et al., 2022），控制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等，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户口、居住地、受教育年限、认知能力、风险偏好、父亲的最高学历、母亲的最高学历、父亲的职业声望、母亲的职业声望和被访者的兄弟姐妹数以及省份固定效应、职业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等。表 8.3 给出了具体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8.3 其他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具体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年龄	按周岁算	30.302	4.287	18	38	1469
男性	男性 =1；女性 =0	0.538	0.499	0	1	1469
健康状况	自评身体健康状态，1—5 表示从不健康到非常健康	3.353	0.975	1	5	1457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1；未婚（无配偶）=0	0.711	0.454	0	1	1469
户口	非农户口 =1；农业户口 =0	0.240	0.427	0	1	1467
居住地	城市 =1；农村 =0	0.609	0.488	0	1	1438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年）	12.214	3.436	0	22	1451

续表

变量名	具体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测试的分数	1.857	1.935	0	5	1449
认知能力	综合字词能力和数学能力	64.729	17.400	0	100	1469
字词能力	34 个字词测试的得分	26.641	5.815	0	34	1469
数学能力	24 道数学测试题的得分	12.265	5.345	0	24	1469
字词能力标准化	$(cizu - \min) / (\max - \min)$ , Z 值法	0.784	0.171	0	1	1469
数学能力标准化	$(maths - \min) / (\max - \min)$ , Z 值法	0.511	0.223	0	1	1469
父亲的最高学历	父亲受教育年限 (年)	7.871	2.968	3	16	1390
母亲的最高学历	母亲受教育年限 (年)	6.537	2.966	3	16	1376
父亲的职业声望	父亲的 SIOPS 打分*	38.445	7.787	13	70	1469
母亲的职业声望	母亲的 SIOPS 打分	38.812	5.738	13	63	1469
兄弟姐妹数	个	1.259	0.974	0	8	1468
职业固定效应	职业虚拟变量: 分为 6 类	-	-	-	-	-
行业固定效应	行业虚拟变量: 分为 20 类	-	-	-	-	-
省份固定效应	省份虚拟变量	-	-	-	-	-

注: (1) 风险偏好基于 CFPS 问卷风险偏好测试的问题, 构造个体风险偏好水平, 0—1 表明风险偏好依次增加。(2) 职业分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六大类。未考虑军人及不方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3) 行业虚拟变量按照 CFPS 中已有分类设置虚拟变量, 共 20 类, 包括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等。

\*SIOPS 是国际职业声望指标, 是通过一份职业清单, 被访者根据职业清单上各职业的受欢迎或赞许程度打分。不同于 ISEI 根据教育和收入水平来测量。

### 三 方法

本章所研究的因变量就业质量为连续变量，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采用OLS回归，公式如下：

$$Jobquality_{ij} = a_1 + \beta_1 LBE_{ij} + \gamma_1 X_{ij} + \delta_j + \delta_i + \delta_p + \varepsilon_{ij} \quad (8.3)$$

其中， $Jobquality_{ij}$ 为位于省份 $j$ 的劳动者 $i$ 的就业质量， $LBE_{ij}$ 为位于省份 $j$ 的劳动者 $i$ 在童年留守经历， $X_{ij}$ 为其他控制变量， $\delta_j$ 、 $\delta_i$ 、 $\delta_p$ 分别表示职业、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j}$ 为随机误差项。

LBE为Left-Behind Experience。

①

### 第三节 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

#### 一 童年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的“不对称性”

本节将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父母双亲均外出放入回归方程中，考察不同童年留守类型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表8.4第（1）列汇报了结果，父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是正向影响，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为负向影响，童年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

童年时父亲外出务工对青年就业质量呈正向影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比于没有童年留守经历青年人，父亲外出的青年就业质量提升2.974个单位。性别分工决定了父母在童年时期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童年时父亲外出为整个家庭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而母亲在家陪伴能够满足儿童的照料需求，确保子女童年时期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会与非留守儿童拉开差距。从家庭决策来看，父亲外出务工是最有利于整个家庭发展的安排。

童年时母亲外出务工对青年就业质量呈负向影响，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比于没有童年留守经历青年人，母亲外出的青年就业质量降低2.074个单位。一方面，母亲外出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但母亲务工的收入不如父亲务工的收入高。另一方面，母亲缺位造成儿童照料缺失，父亲的照料难以替代。已有研究表明母亲不仅能够给予儿童细致的生活照料，而且能够满足儿童的情感支持需求，而父亲的照料在生活和情感上都有所欠缺（李永鑫等，2008）。综合来看，母亲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效应低，而照料缺失损失大，是不利于家庭发展的安排。

我们观察到童年双亲外出务工对青年就业质量有负向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童年时母亲缺位可能让孩子因缺乏照料导致健康和教育方面的

状况不理想，从而对其就业质量产生消极影响；父亲缺位带来收入的提升可以增加孩子的营养和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升青年就业质量。即双亲外出时母亲缺位带来的消极影响抵消了父亲外出、母亲留在身边的积极影响。当然，双亲外出的影响并不是父亲缺位和母亲缺位影响的简单相加，这里只是从父母不同分工的视角为童年父母均缺位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提供一种解释。

已有研究结论表明，童年留守经历总体上对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完全留守的负向影响更大（唐宁、谢勇，2019；Liu et al., 2020），并没有细分父亲外出、母亲外出和双亲外出三种具体类型，因而无法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留守的差异化影响及内在机制。本节细分类型后发现了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的不对称性，假设8.1得到支持。

## 二 童年父母外出的“关键期效应”

按照儿童能力形成的阶段性理论，由于父母外出，留守儿童早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父母对其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造成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表现不佳。笔者进一步考察父母在子女不同时段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表8.4第（2）—（4）列汇报了三种不同童年留守时段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第（2）列中父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父亲外出和留守时段（0—3岁）交互项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父亲在子女0—3岁时外出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更大。第（3）列中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母亲外出与留守时段（0—3岁）的交互项为正，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母亲在子女0—3岁时外出务工对子女成年后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更大。

已有研究表明，3岁前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3岁时儿童的自我意识基本形成（Rochat, 2018），0—3岁母亲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护理和照料婴幼儿，为子女建立安全感。这一关键时期父亲的缺席可能从客观上刺激了子女自主能力的发展，而主要负责抚育性工作的母亲缺席会不利于子女的自主能力的提升。虽然父亲缺席或母亲缺席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的方向不同，但父母在子女0—3岁这一关键期外出对子女就业质量影响更大，这符合生命历程理论中“时机和关键期效应”，即特定的经历发生在个体不同的年龄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George, 2014）。刘志军等（2022）在研究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提出了“关键窗口效应”，即尽管童年期各个阶段的留守经历都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但不同留守阶段产生的影响大小和持久性是不同的，其中，学前阶段是“关键窗口期”，与其他留守阶段相比，学前留守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最大。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似的是，儿童早期是个体生命发展的敏感期（Cunha & Heckman, 2007），这一时期的经历将对其成年后产生更大影响。0—3岁是父母外出对子女青年就业质量影响的“关键期”，这一阶段父母外出会产生“关键期效应”。假设8.2得到支持。

### 三 童年父母外出的“时间效应”

表8.4第(5)一(7)列汇报了父母外出时长不同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父亲外出与留守时长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与童年时父亲未外出的青年人相比,童年时父亲外出,外出的时间越长,对青年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越大。一方面,父亲外出,子女需要帮助母亲承担部分家庭任务,随着留守时长的增加可能培养留守儿童的抗压能力和抗逆能力,最终有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留守儿童从小目睹父亲为了家庭生计放弃离家近的工作,选择外出务工,这种观念和拼搏精神可能会传递给孩子,这些孩子成年后也会努力追求工作上的成功,因而就业质量更高。而母亲外出与留守时长的交互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童年时母亲外出的时长越长,对青年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就越大。可能的解释是母亲的缺位造成子女在婴幼儿时期某些能力未形成,随着留守时间的增加,这些能力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发展。双亲外出与留守时长的交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在进一步支持父亲和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的基础上,发现留守时长发挥了调节作用,父母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随留守时长的增加而增强,即童年父母外出的“时间效应”,假设8.3得到支持。

表8.4 童年留守类型、时段与时长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

就业质量	(1)	(2)	(3)	(4)	(5)	(6)	(7)
参照项：没有留守经历							
父亲外出	2.974*** (1.036)	2.839** (1.348)			2.643** (1.115)		
母亲外出	-2.074** (1.026)		-2.088** (1.035)			-1.854* (1.087)	
双亲外出	-1.078 (1.314)			-4.210 (3.408)			-1.295 (1.142)
留守时段：0—3岁		1.520*** (0.375)	1.438** (0.674)	1.491** (0.714)			
父亲外出 × 0—3岁留守		3.985** (2.012)					
母亲外出 × 0—3岁留守			2.374* (1.249)				
双亲外出 × 0—3岁留守				-2.581 (3.076)			
留守时长					-0.828** (0.407)	-0.862** (0.420)	-1.342** (0.580)
父亲外出 × 留守时长					9.919** (5.026)		
母亲外出 × 留守时长						3.073*** (1.076)	
双亲外出 × 留守时长							-10.617 (6.9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就业质量	(1)	(2)	(3)	(4)	(5)	(6)	(7)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01	1301	1301	1301	1301	1301	1301
调整的 R <sup>2</sup>	0.273	0.272	0.272	0.272	0.273	0.271	0.273

注：\* $p<0.1$ ，\*\* $p<0.05$ ，\*\*\* $p<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2)参照项是没有童年留守经历青年人。(3)留守时段分为0—3岁留守、4—12岁留守及0—3岁和4—12岁均留守，由于4—12岁留守和0—3岁与4—12岁两个阶段均留守不显著，为节省篇幅，我们仅展示了0—3岁留守的结果。(4)笔者对留守时长做了连续变量处理，将半年到一年、一年到两年、两年到三年、三年以上分别赋值1、2、3、4。

## 第四节 童年留守经历如何通过非认知能力影响青年就业质量？

在机制分析中，笔者先参考温忠麟等（2004）的做法采用三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然后采用基于IV（Independent Variable，自变量）的中介分析，来测算非认知能力的贡献率。

### 一 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

#### （一）尽责性与开放性对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

由于在基准回归中双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没有显著影响，故在机制探讨中笔者仅探讨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两种类型。

在大五人格其他三项指标上，童年留守经历对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为正向影响，对亲和性是负向影响，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侧面支持了父亲外出只是有利于某些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基准回归完成了三步法的第一步，表8.5报告了第二步的结果，即不同类型留守青年非认知能力的水平差异。<sup>①</sup>其中，在尽责性和开放性这两项指标上，童年时父亲外出的青年显著高于非留守青年，分别高出0.292个单位和0.139个单位，说明父亲

外出的青年在尽责性和开放性这两项非认知能力上略胜一筹。<sup>⑤</sup>可能的解释是，童年父亲外出一方面需要孩子帮助母亲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因而子女的尽责性更强；另一方面，父亲外出给了孩子足够的自由空间，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想象力丰富，开放性较强。

表8.5 童年留守经历对青年非认知能力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尽责性	外向性	亲和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父亲外出	0.292*** (0.095)	0.104 (0.106)	-0.108 (0.096)	0.139** (0.064)	0.014 (0.106)
母亲外出	-0.257 (0.301)	-0.471*** (0.174)	-0.116 (0.263)	0.383 (0.231)	-0.384*** (0.14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01	1301	1301	1301	1301
调整的 R <sup>2</sup>	0.046	0.065	0.018	0.038	0.052

注：(1) \*p<0.1, \*\*p<0.05, \*\*\*p<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2) 由于在基准回归中父母双亲外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故在机制分析中不展示结果。

此处只考察表8.6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四项非认知能力：父亲外出对尽责性和开放性的影响、母亲外出对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的影响。

本书将童年留守时长纳入模型中，进一步考察不同留守类型对非认知能力<sup>⑥</sup>的影响趋势。结果如图8.2所示，随着童年留守时长的增加，父亲外出对尽责性的影响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而父亲外出对开放性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趋势。意味着父亲外出对非认知能力水平的影响不是直线式的，随着留守时长的增加，尽责性越来越强，而开放性经历了一年两年留守的高峰增长期后，影响趋于平稳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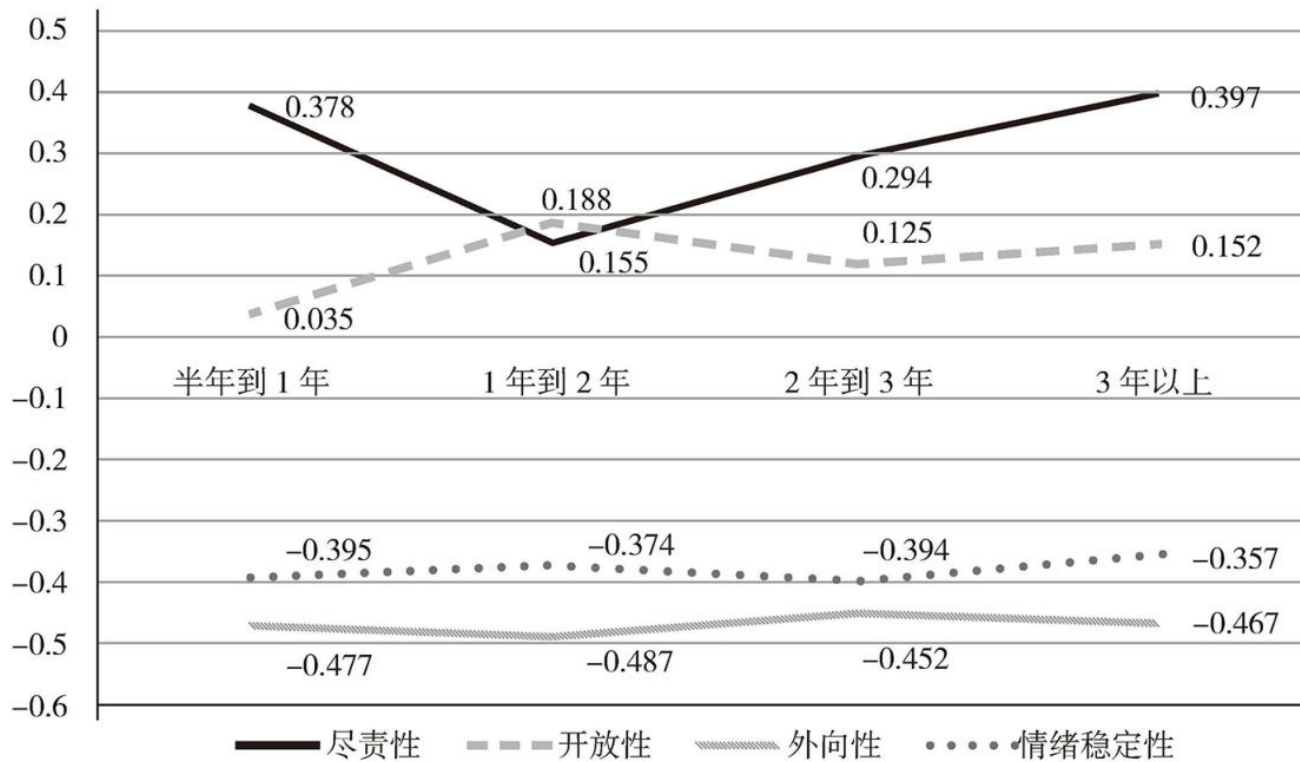


图8.2 童年留守经历时长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趋势

基准回归结果和上一部分水平差异结果已完成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因此，这里只需实施检验的第三步，即比较控制非认知能力后童年留守经历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见表8.6中第（1）、（4）列]。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变量的系数相对于控制非认知能力变量前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见表8.4中第（1）列的童年留守变量系数]的变化程度。

在控制了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后，表8.6第（1）列和第（4）列中父亲外出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显著性相比表8.4第（1）列第一步结果有明显下降，结合表8.5的结果，尽责性和开放性对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尽责性和开放性是父亲外出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机制之一。可能的解释是，尽责性体现为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高度的自律，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开放性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能促进人们在工作中创新，进而提升就业质量。

表8.6 控制非认知能力：童年留守经历对青年就业质量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父亲外出	1.607** (0.721)	1.749 (1.322)	1.746** (0.816)	1.724** (0.765)	1.726** (0.861)

续表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母亲外出	-0.974** (0.438)	-0.900* (0.525)	-1.370** (0.595)	-0.917** (0.441)	-0.978 (0.612)
尽责性	0.320* (0.189)				
外向性		0.100 (0.162)			
亲和性			0.171 (0.191)		
开放性				0.302** (0.137)	
情绪稳定性					0.357** (0.15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01	1301	1301	1301	1301
调整的 R <sup>2</sup>	0.343	0.342	0.343	0.343	0.344

注：\*p<0.1, \*\*p<0.05, \*\*\*p<0.01, 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二) 情绪稳定性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削弱效应

童年时母亲外出对青年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和情绪稳定性均为负向影响，其中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具体来看，与童年非留守的青年相比，母亲外出的青年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分别要低0.471个单位和0.384个单位（见表8.5）。可能的解释是，母亲的外出使得子女缺乏生活照料和情感依恋，容易让子女形成内向的性格，不善于社交。又由于幼年时缺乏母亲的情感支持，遇到问题时没有母亲耐心细致的疏导与陪伴，造成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情绪不稳定。如图8.2所示，母亲外出对子女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基本呈直线式，且系数的绝

对值相对较大，说明母亲外出对子女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的负向影响较大且相对稳定。

表8.6第(2)列中母亲外出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第(5)列中母亲外出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显著性和系数相比表8.4第(1)列第一步结果有明显下降，但表8.6第(2)列外向性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第(5)列情绪稳定性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情绪稳定性可能是母亲外出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机制之一。可能的解释是，童年时缺乏母亲的照料和情感支持，子女的情绪容易不稳定，而情绪稳定性能够帮助人们应对工作压力，更好地完成工作，从而提升就业质量。综合来看，母亲外出不利于情绪稳定性的发展，从而会降低青年就业质量。假设8.4得到支持。

## 二 非认知能力的贡献率

通过非认知能力机制分析，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中的尽责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是可能的中介。本部分进一步采用基于IV的中介分析来确定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从尽责性来看，父亲外出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总效应为13.384，其中直接效应为2.046，间接效应为11.640，这说明童年父亲外出的经历通过提升青年的尽责性解释了86.97%的总效应。从开放性来看，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15.809、1.770和13.353，童年仅父亲留守的经历通过增加青年的开放性解释了总效应的84.46%。从情绪稳定性来看，童年时母亲外出的经历通过降低青年情绪稳定性解释了总效应的43.12%。

表8.7 基于IV的非认知能力中介分析

被解释变量	尽责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总效应	13.384 <sup>***</sup> (3.376)	15.809 <sup>***</sup> (4.813)	-7.122 <sup>**</sup> (3.347)
直接效应	2.046 <sup>*</sup> (1.065)	1.770 <sup>***</sup> (0.535)	-3.482 <sup>**</sup> (1.643)
间接效应	11.640 <sup>*</sup> (6.079)	13.353 <sup>***</sup> (4.457)	-3.071 <sup>*</sup> (1.591)
间接百分比	86.97%	84.46%	43.12%

注：\*p<0.1，\*\*p<0.05，\*\*\*p<0.01，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 第九章 生活场域：童年父母外出、多维资本积累与成年幸福感

本章相关内容已公开发表，详见Yang, Z.,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Adult Happines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Vol. 12, No. 1, 2025, pp. 1-14。收入本书时更新了部分数据。

——来自多维资本的解释<sup>①</sup>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一个  
体心理学创始人、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习近平：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1月31日，[https://www.news.cn/mrdx/2022-01/31/c\\_1310448501.htm](https://www.news.cn/mrdx/2022-01/31/c_1310448501.htm)。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sup>②</sup>，幸福感由什么因素决定，以及如何提升幸福感？这一直是学界与社会关注的主题。Easterlin发现收入增加并不一定提升幸福感，人均收入的高低与平均幸福水平没有明显关系（Easterlin, 1974），由此开启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热潮。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生态环境状况、社会保障政策等因素（Kang et al., 2022; 马晓君等, 2019; Hu, et al., 2021; Tella et al., 2001; Tran et al., 2017）。微观层面又分为个人和家庭维度，个人因素涉及个体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及自尊、亲社会偏好、利他偏好等人格特征（Brodeur et al., 2021; Stieger et al., 2021; 陆彩霞等, 2018; 周欣然等, 2020）。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结构特征和家庭社会地位等（陆方文等, 2017; 龙斧、梁晓青, 2019）。值得注意的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因素往往是交织而不是单一地产生影响。童年经历既兼具了个体特征的微观元素，又能反映时代变迁，或许能更深入地解释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2013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童年留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关系着无数人的福祉。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带来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和从西部到东南部的人口流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大数量的人口迁移。这次迁移产生了6102.55万名留守儿童<sup>③</sup>，当前这一批留守儿童已成年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见证了时代变革的阵痛和突围，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社会整体主观福利状况和发展问题。截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流动人口有3.76亿人，伴随数量庞大的流动人群，可以预见留守儿童将长期存在并一批批步入成年。探讨童年留

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长期影响，对于进一步引起政府重视留守儿童问题并改进相关政策，从而增进整个社会的主观福利具有重要意义。

## 第一节 童年治愈一生还是一生治愈童年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源于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著作《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是后人在解读其思想时的一种创造性表达。核心在于强调童年经历对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幸福的童年可以为个体提供安全感、自信心和积极的人际交往模式，在成年后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对于经历不幸童年的个体，他们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面对和疗愈童年的创伤。同时，个体可以通过自我努力、社会支持和心理干预等方式实现自我超越。

### 一 幸福童年的积极影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童年经历对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性，指出童年阶段的情绪经验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他提出，幸福的童年经历有助于个体形成积极的性格特征，如自尊、自信和责任感。

耶鲁大学格赛尔儿童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8岁是孩子心理和行为发展的黄金时期，安全感主要来源于父母的陪伴和关注。

幸福的童年奠定人生的基石。幸福的童年经历有助于个体形成如自尊、自信、责任感和同情心等积极的性格特征。④这些特征将伴随个体一生，成为其应对生活挑战的重要资本。幸福的童年经历可以为个体积累安全感、自尊、自信和社会适应能力等丰富的心理资本。1—8岁是孩子心理和行为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安全感主要来源于父母的陪伴和关注。⑤美好的童年经历能够为个体未来的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使其在成年后更易获得心理满足和社会成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幸福的童年经历不仅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基石，更是社会资本积累的关键阶段。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情感的港湾，为孩子提供温暖、关爱与安全感，更是教育资源的重要来源，涵盖了知识传授、技能培养以及价值观塑造等多个方面。家庭所蕴含的丰富社会关系网络，如亲戚、朋友、邻里等，也为孩子提供了早期的社会交往平台，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人际交往的规则与技巧。这些资源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逐渐转化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幸福的童年经历不仅关乎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更在宏观层面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融入度和整体发展轨迹，成为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为个体未来在社会中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 二 不幸童年的消极影响

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童年逆境可以部分影响 DNA 甲基化特征，从而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DNA甲基化反映了将童年逆境与抑郁症联系起来的生物学途径以及恢复力的潜在机制。

ACE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将不良童年经历分为10个问题，每个问题得分为1分。例如，是否经历过家庭暴力、是否目睹过父母间的暴力、父母是否离异或入狱等。这些经历的数量（即ACE得分）越高，个体在成年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药物滥用、暴力行为以及慢性疾病的风险越高。

不幸的童年经历，如家庭暴力、父母离异或长期分离等，会对个体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产生长期的负向影响。童年逆境不仅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还会改变DNA甲基化特征，对青少年乃至成年后的抑郁症状产生影响。<sup>12</sup>此外，童年遭受虐待和忽视会损害个体的感恩能力，这种能力的缺失影响其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不良童年经历研究”（ACE Study）发现，童年时期遭受虐待、忽视、家庭暴力等不良经历与成年后的心理健康问题、药物滥用、暴力行为以及慢性疾病风险显著增加相关，ACE得分越高（即不良童年经历数量越多），个体成年后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越严重。<sup>13</sup>

不幸的童年经历会导致个体在成年后面临更高的社会适应风险（范兴华等，2023）。例如，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和情感支持，心理方面对幸福的感知力较弱，身体健康方面与非留守儿童相比较弱，且童年时期与父母较为疏离的相处方式、父母间相处模式会影响留守儿童成年后的亲子关系、伴侣关系以及其他亲密关系，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社会适应障碍。这些个体在成年后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修复心理创伤，提升社会适应能力。

## 三 幸福童年与幸福人生的关联

个体在面对逆境时能够保持积极适应的能力。

幸福的童年经历为个体未来幸福奠定了基础。家庭环境和社会支持网络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美好的童年经历能够积累丰富的心理和社会资本，使个体在成年后更易获得心理满足和社会成功，早期的亲子互动能够增强个体的自尊和自信，使其在社会交往中更具优势。此外，幸福的童年经历还能够增强个体的抗逆力<sup>14</sup>，个体在面对逆境时能够保持积极适应的能力，早期积极的家庭环境能够帮助个体在成年后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幸福的童年不仅是个体成长的基石，更是其未来幸福的重要保障。

## 第二节 童年留守、多维资本与幸福感的文献爬梳

### 一 童年留守的即期影响与长期影响

大量研究关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即期影响，包括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营养状况、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Lei et al., 2018; Zhu et al., 2014）。尽管相关结论并未达成一致，但多数研究支持了童年时期与父母的分离对于儿童的学业成绩和身心健康均产生了无法逆转的负向影响（陶然、周敏慧，2012）。虽然父母外出到城市务工会产生收入效应，降低留守儿童辍学率，并让其在生活条件、教育、营养等方面得到改善（杨菊华、段成荣，2008；梁在、李文利，2021；彭小辉等，2022）。但是，父母外出务工会导致部分孩子与父母分离，童年缺乏父母的照料与陪伴易形成孤独、自卑等性格特征，并且产生社交恐惧（陆继霞，2011；刘志军，2021），积极情感体验更低（袁书华、邢占军，2017），不利于留守儿童身心发展（刘靖，2008；范兴华等，2017；Gao et al., 2010）。同时，由于缺乏父母的指导和监督，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方面往往落后于非留守儿童（李云森，2013），也更容易产生逃学、网瘾等不良行为（吴霓，2004；Ye and Lu, 2011；Meng and Yamauchi, 2017），这些都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发展。

童年留守经历的消极影响将持续到成年早期。留守儿童更有可能中止高中学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吕利丹，2014）。童年留守经历会降低成年后的就业质量，父母同时外出务工的影响更大（唐宁、谢勇，2019；Liu et al., 2020）。留守类型的不同会对收入产生不同影响，父亲外出会提高留守子女成年后的收入，母亲外出则反之（韩保庆等，2021）。现有研究特别关注童年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和农民工的不利影响。童年留守经历不仅会降低大学生的学业成就（胡建国、鄢雨，2020），而且会让大学生感到自卑、缺乏安全感，从而产生更强的攻击性（张春阳、徐慰，2020），还会对大学生非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郭亚平，2020）。留守经历会让农民工形成自卑又自立的性格，造成社交困难（刘志军、徐芳，2020）。当他们意识到这段经历的痛处后，会改变育儿选择并追求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刘凌、吴蕾，2019）。留守经历还会对成年健康和认知能力产生消极影响，并存在代际传递现象（Zheng et al., 2022）。

无论是从即期影响还是长期影响来看，童年时期父母外出都会让留守儿童和成年人产生情感疏离。研究还发现，留守经历会影响主观幸福感，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并且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体验到父亲情感温暖显著低于体验到母亲情感温暖（周春燕等，2014）。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范式是将个体生命历程看成社会结构的产物，童年阶段是人生发展最重要的阶段，

童年时期的经历将对整个生命历程产生持续影响（Elder, 1994；埃尔德，2002）。大学阶段属于成年早期，童年留守事件属于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事件，对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将会从大学阶段延伸到整个成年阶段，由此提出假设9.1：

H9.1：与没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相比，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幸福感更低。

## 二 传统人力资本、新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幸福感

James Heckman于2019年6月18日在2019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中发表了题为“A Dynamic Model of Health, Addiction, Education, and Wealth”的主题演讲，指出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好的健康习惯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形式。

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首次将人作为一种资源和投资方式看待，认为“通过自身投资，人能够扩大他们得以进行选择的范围，这是自由人可以用来增进自身福利的一条道路”。他还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通过五种途径实现，即医疗和保健投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学习和劳动力迁移等（舒尔茨，1990）。后续研究认为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父母外出务工会影响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监督造成学业表现不佳（李云森，2013）。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体现在多个年龄阶段，随着青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邱红、张凌云，2021），高等教育能明显促进了主观幸福感（房敏、孙颖，2022）。老年人参与教育活动通过良好的教育氛围、教育体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孙立新、刘兰兰，2020）。

父母外出务工会影响留守儿童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生理上，父母外出务工减少其对儿童的照料与陪伴，易造成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状态不如非留守儿童，如营养不良（李强、臧文斌，2011）。在心理上，父母外出更容易导致留守儿童生活压力大和孤独感增强（范兴华等，2017），还会使其面临安全感缺失。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更容易遭遇“校园欺凌”（陈洁等，2021）。这将对留守儿童长期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儿童时期的逆境，比如虐待、家庭关系不和睦，会对其儿童时期、青年时期和成年期心理健康均产生影响（Crowne et al., 2011；Zheng et al., 2019），从而进一步影响成年后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

（Metzler et al., 2017）。现有研究表明，身心健康都有利于提升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徐仲安等，2013；李静、王月金，2015）。由此提出假设9.2a和9.2b。

H9.2a：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H9. 2b: 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赫克曼等提出了“新人力资本”, 将能力区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分别是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和新人力资本理论关注的范畴。新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能力的形成具有阶段性, 如果错过这一阶段, 后期补偿代价极大。儿童时期是形成和发展非认知能力的“关键期”和“敏感期”(周金燕, 2015), 非认知能力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和后期都具有投资价值(Cunha et al., 2010), 但在儿童后期的可塑性更强, 更容易得到培养(Heckman, 2000)。父母在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形成“关键期”和“敏感期”的外出务工和投资不足不利于留守儿童新人力资本的积累, 而且后期难以弥补。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分离效应会对留守儿童的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产生消极影响(崔颖、徐卓君, 2021), 特别是母亲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效应较小, 抵消不了分离效应的消极影响(Liu et al., 2021)。张瑞平和李庆安(2017)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通过调查得出亲和性、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均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 说明非认知能力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提出假设9. 2c。

H9. 2c: 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新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的发展, 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 三 社会资本的积累、亲密关系的代际传递与幸福感

由于数据限制, 本书只检验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 未来研究中再进一步验证家庭外部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

科尔曼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称为社会资本, 认为亲子间的互动、互惠和信任是影响子女资本发展的主要因素(Coleman, 1988), 并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和家庭内部社会资本, 两者都对儿童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家庭外部社会资本指父母与社区内其他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 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吴愈晓等, 2018)。科尔曼认为, 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培养了孩子的人际交往和一般信任水平, 而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是父母影响孩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父母外出务工减少了其与子女就学社区其他家长和学校老师的交流(赵延东、洪岩璧, 2012), 社会网络的缺乏不利于家庭外部社会资本的积累, 不利于儿童能力的发展。外出务工会造成父母与子女客观空间上的分离, 亲子共同生活经历的缺乏和生疏的亲子关系不利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 进而不利于儿童能力的形成, 这种能力的差异会持续到成年阶段。以往研究表明, 社会资本有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计小青、赵景艳, 2020; 张彤进、万广华, 2020)。因此, 提出假设9. 3a和假设9. 3b:

H9. 3a: 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子女成年后的父子关系, 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H9. 3b: 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子女成年后的母子关系, 从而对成年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鲍恩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由相互联系的元素(家庭成员)组成的系统, 系统整体上呈现其内部元素所不具备的特征, 家庭系统中某元素的残缺或变化会对其他元素甚至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在多代关系网络的家庭中, 个体面对未来的人际关系时会复制其在原生家庭中习得的交往模式。家庭的互动模式具有代际传递性, 个体在恋爱、择偶和亲密关系的处理中倾向于重复他们在原生家庭中学到的相处模式, 并传递给后代(易春丽等, 2004)。这种传递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 因而笔者将子女与配偶的亲密关系也视为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父母外出务工容易产生另一种家庭分离, 即夫妻分离。夫妻分离不利于家庭中配偶间亲密关系的培养, 造成夫妻关系的疏离, 这种亲密关系模式也可能传递给下一代, 造成未来子女与配偶间亲密关系的疏离。此外, 有童年留守经历的人从小与父母的亲密关系难以建立, 无法在平时的生活中学习父母的相处之道, 缺乏爱的教育与爱人能力的培养, 以及对亲密关系重要性的认识, 从而影响了成年后与配偶亲密关系的建立。而已有研究表明, 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和夫妻关系越融洽, 其家庭幸福感越高(宋健等, 2014), 由此提出假设9. 3c:

H9. 3c: 童年留守经历会降低其成年后与配偶的亲密度, 从而对成年后的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数据来源

本章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0年、2014年、2018年和2020年四期数据。本章主要探究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 因此使用2010年问卷中有关于童年时期父母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相关问题和2014年、2018年和2020年问卷中有关于幸福感的相关问题。本章的分析运用在2010年调查并在2014年、2018年和2020年追访成功的样本。

童年留守经历的范围是农村儿童, 因此本节只保留3岁时户籍为农业户口的样本。留守经历是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长期不能与子女共同居住的经历, 但父母去世或离异也会造成被访者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 因此本节排除由于父母去世或离异等原因造成的被访者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 即删除了2010年被访者父母去世或者父母婚姻

状况为非在婚的样本，以确保样本均为因父母外出而形成的留守状态。中国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因此本节保留1980年后出生的样本以排除1980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人口迁移的混杂影响（Zheng et al., 2022）。又因本节的主题是成年幸福感，研究只保留18周岁以上的样本。最终符合条件的样本共有4464个。

## 二 童年留守经历与幸福感

### （一）如何测度成年幸福感？

CFPS 2010问卷中幸福感的相关问题是用李克特量表测量的，和后续年份测量的标准不同，合并起来难以解释。CFPS 2012问卷中只在儿童问卷中测量了幸福感，并未测量成年幸福感。CFPS 2016问卷只测量了年龄小于23周岁的部分群体的幸福感。故这三期数据没有使用。

成年幸福感。根据问卷设计的问题“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分）”，0—10分代表从低到高。我们使用CFPS 2014、2018和2020三期数据<sup>①</sup>的幸福感。全样本成年幸福感均值为7.571，有童年留守经历样本和没有留守经历样本的幸福感均值分别为7.260和7.599，有留守经历样本幸福感的均值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样本的幸福感（ $p=0.000$ ）。

### （二）解释变量

童年留守经历。笔者根据CFPS 2010问卷中的四个问题“您3岁以前（含3岁时），您父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最长为几周”“您3岁以前（含3岁时），您母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最长为几周”“您4—12岁时，您父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最长为几周”“您4—12岁时，您母亲不与您一起居住的连续时间最长为几周”对童年留守经历进行界定。已有研究中对留守儿童的界定通常是父母进城务工，导致孩子与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分开六个月以上（Zhou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8）。据此定义，总样本中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样本占8.20%。

### （三）控制变量

采用CFPS中SIOPS职业声望测量。SIOPS是一种国际职业声望指标，它是提供一份职业清单，请受访者对职业清单上各职业的受欢迎或赞许程度打分来形成职业声望指标。

本书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个体特征，比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口、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家庭特征，如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父亲职业声

望、母亲职业声望、兄弟姐妹数以及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表9.1给出了具体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0.509岁，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相当。从婚姻状况来看，76.9%的成年人在婚（有配偶），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未婚，占20.2%。从户口来看，12.6%的成年人为非农户口，绝大部分（87.4%）被访者都是农业户口。从年收入来看，被访者年收入的对数为8.030；从相对收入来看，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自己的收入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父亲的受教育年限略高于母亲，分别为6.418年和4.341年，而母亲的职业声望略高于父亲，分别为39.470分和39.083分，兄弟姐妹数的均值为1.433个。

## （四）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界定

### 1. 人力资本

传统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和身体健康，其中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从受教育年限来看，被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43年，大致相当于高一水平。从身体健康状况看，选择比较健康、很健康和非常健康的占比较高，分别为43.2%、23.4%和19.4%。结合CFPS问卷，笔者使用CES-D8量表来测量被访者的心理健康（Turvey et al., 1999; van & Earleywine, 2011; Karim et al., 2015），被访者过去一周内以下8种感受或行为的发生频率：（1）我感到情绪低落；（2）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3）我的睡眠不好；（4）我感到愉快；（5）我感到孤独；（6）我生活快乐；（7）我感到悲伤难过；（8）我觉得生活无法继续。0、1、2到3依次表示大多数时候有（5—7天）、经常有（3—4天）、有些时候（1—2天）和几乎没有（不到一天）。问题（4）、问题（6）是其他六个问题的反向描述，我们对所有问题进行正向化处理，将被访者对8个问题的回答所对应的得分相加得到一个取值在0—24分的连续变量，分值越高说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被访者心理健康平均值为18.590，说明总体来看被访者心理较为健康。

对五个维度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选取了2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1%，然后对两个主成分进行加权求和，权数为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最终得到的值就是非认知能力的总指标。

新人力资本则更加关注非认知能力的作用。相关研究通常采用自尊量表（Rosenber et al., 1978）、内外控量表（Rotter et al., 1972）和大五人格量表（Costa & McCrae, 1992）来研究非认知能力。国内学者认为大五人格能够较好地阐释中国人的非认知能力（王孟成等，2010）。Costa和McCrae（1992）正式提出大五人格分类法，将非认知能力分为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参照CFPS 2018问卷的问题，构建5个维度的非认知能力，每个维度由3个问题组成，每个问题的回答对应1—5分，将被访者对该维度3个问题的回答所对应的得分相加得到一个取值在3—15分的连续变量，分值越高说明这个维度特征越明显。从被访者

的回答来看，大五人格中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的均值分别是11.247、9.866、11.306、9.609和9.087，其中尽责性和亲和性的均值明显高于其他。本书进一步用主成分分析合成非认知能力总指标<sup>①</sup>，以便探讨非认知能力在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中的中介效应。

## 2. 社会资本

基于CFPS问卷，笔者选取了“与父亲的关系”和“与母亲的关系”来衡量家庭内部社会资本。考虑到亲密关系的代际传递，再选用“配偶亲密度的重要性”。按照被访者的回答，1—5表示从很不亲近到很亲近，从很不重要到很重要，数值越大意味着越亲密、越重要，即社会资本越多。从被访者的回答来看，父子关系的均值为4.224，母子关系的均值为4.383，与配偶亲密的重要程度的均值为4.408。整体来看，被访者无论是与配偶，还是父母亲密度都较高。

## 三 研究方法

本章研究的目标是探索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考虑到样本为三期面板数据，且因变量幸福感为连续变量，笔者运用豪斯曼检验得出 $p=0.000$ ，故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式。在回归中，除了童年留守经历这一主要解释变量外，控制变量还包括被访者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口、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家庭特征，如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职业声望、兄弟姐妹数等变量，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回归方程如下：

$$happiness_{ijt} = a_0 + a_1 LBE_{ijt} + \gamma X_{ijt} + u_{prov} + \lambda_t + \varepsilon_{ijt} \quad (9.1)$$

其中， $happiness_{ijt}$ 为位于省份 $j$ 的居民 $i$ 在 $t$ 年的幸福感， $LBE_{ijt}$ 为位于省份 $j$ 的居民 $i$ 在 $t$ 年童年留守经历的情况， $X_{ijt}$ 为控制变量， $u_{prov}$ 和 $\lambda_t$ 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jt}$ 为随机误差项。

表9.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具体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全样本居民的幸福感	7.571	1.891	0	10	4464
幸福感	有童年留守经历居民的幸福感	7.260	1.840	0	10	366
	没有童年留守经历居民的幸福感	7.599	1.893	0	10	4098
童年留守经历	因父母进城务工导致孩子与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分开六个月以上	0.082	0.274	0	1	4464
年龄	按周岁算	30.509	4.936	19	40	4464

续表

变量名	具体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男性	男性 =1 ; 女性 =0	0.483	0.500	0	1	4464
婚姻状况: 未婚	未婚 =1 ; 其他 =0	0.202	0.401	0	1	4464
在婚 (有配偶)	在婚 (有配偶) =1 ; 其他 =0	0.769	0.421	0	1	4464
同居	同居 =1 ; 其他 =0	0.002	0.047	0	1	4464
离婚	离婚 =1 ; 其他 =0	0.024	0.154	0	1	4464
丧偶	丧偶 =1 ; 其他 =0	0.003	0.054	0	1	4464
户口	非农户口 =1 ; 农业户口 =0	0.126	0.332	0	1	4464
绝对收入	过去 12 个月所有工作收入 (对数)	8.030	3.804	0	13.641	4464
相对收入	您的收入在本地的位置	2.791	0.888	1	5	4464
父亲最高学历	父亲受教育年限 (年)	6.418	4.067	0	16	4464
母亲最高学历	母亲受教育年限 (年)	4.341	4.227	0	16	4464
父亲职业声望	父亲的职业声望得分	39.083	6.137	13	70	4464
母亲职业声望	母亲的职业声望得分	39.470	3.840	13	63	4464
兄弟姐妹数	个	1.433	1.068	0	7	4464
省份固定效应	省份虚拟变量	-	-	-	-	-
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 (年)	10.543	3.830	0	22	4464
身体健康: 不健康	不健康 =1 ; 其他 =0	0.085	0.278	0	1	4464
一般	一般 =1 ; 其他 =0	0.432	0.495	0	1	4464
比较健康	比较健康 =1 ; 其他 =0	0.234	0.423	0	1	4464
很健康	很健康 =1 ; 其他 =0	0.194	0.395	0	1	4464
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 =1 ; 其他 =0	10.543	3.830	0	22	4464
心理健康 *	心理健康, 从 0 到 24, 数值越大, 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18.590	3.490	0	24	2976
非认知能力 **	大五人格总指标	-0.131	0.675	-2.900	2.262	1415
尽责性	责任感、能力、自律等	11.247	1.836	4	15	1415
外向性	热情、乐群、需求刺激等	9.866	2.023	3	15	1415
亲和性	利他、同理心、谦逊等	11.306	1.755	3	15	1415
开放性	思辨、审美、想象力等	9.609	2.373	3	15	1415
情绪稳定性	心态平静、松弛感、抗压力等	9.087	2.132	3	15	1415
父子关系	“过去 6 个月, 与父亲关系”, 1—5 表示从很不亲近到很亲近	4.224	0.789	1	5	1332***

续表

变量名	具体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母子关系	“过去6个月，与母亲关系”， 1—5表示从很不亲近到很亲近	4.383	0.719	1	5	1375
配偶亲密度	“与配偶关系亲密”重要程度， 1—5表示从很不重要到很重要	4.408	0.887	1	5	1409

\*在对心理健康进行测量时，CFPS数据库中2014年数据使用的K6量表，2018年和2020年数据使用的是CES-CES-D8量表，本文在心理健康机制分析中仅使用CFPS 2018和CFPS 2020两期数据。

\*\*在CFPS数据库中2018年问卷有非常明确的大五人格的测量，2014年和2020年数据并没有涉及大五人格测量的问题，本书选用2018年数据测量大五人格。

\*\*\*在CFPS数据库中仅有2018年问卷同时涉及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配偶亲密度相关问题，因此在机制分析时我们仅用CFPS 2018一期数据。在本书4464个样本中，CFPS 2018样本数为1488，其中排除父亲已去世、母亲已去世、拒绝回答和不适用的样本后，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配偶亲密度的观测值分别为1332、1375和1409。

## 第四节 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 一 童年留守会降低成年幸福感

表9.2汇报了相应的结果。第(1) — (3)列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系数始终为负并显著。表9.2第(3)列显示，有童年留守经历会使成年后幸福感比没有童年留守经历的低0.194分，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童年留守作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将持续到成年，假设9.1得到支持。

表9.2 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名	(1)	(2)	(3)
是否留守	-0.240** (0.112)	-0.187** (0.095)	-0.194** (0.098)
个体特征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变量名	(1)	(2)	(3)
家庭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464	4464	4464
调整的 R <sup>2</sup>	0.016	0.109	0.110

注：\* p<0.1, \*\* p<0.05, \*\*\* p<0.01, 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

## 二 个体力量（人力资本）——身心健康与成年幸福感

### （一）传统人力资本的积累

本部分采用三步法来检验传统人力资本是否在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第一步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步结果如表9.3所示。第（1）列显示，童年留守经历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童年留守经历并未影响到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可能的解释是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汇款效应”能够增加留守儿童获得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吕利丹、王非，2017；彭小辉等，2022），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父母陪伴和监督，不利于学习成绩的提升，甚至因为缺乏父母监督，增加了辍学的概率（李强等，2020）。两种相反方向的影响叠加，造成整体影响并不显著。假设9.2a未得到支持。

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见表9.3第（2）列、第（3）列]，说明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两种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没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相比，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分别要低0.234个单位和0.864个单位，说明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在健康人力资本上相对欠缺。父母外出务工疏于对子女日常生活的照料，而童年时期是身体快速发育阶段，营养方面的缺乏会造成成年后身体素质不佳。外出务工使得父母无法陪伴子女，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有一种缺失感，也不利于其心理健康（范兴华等，2017）。无论其他照料者疏于管教、溺爱还是严格要求均无法替代父母，幼年时父母不在身边，在遭遇各种事件时无法获得家长支持，比如，留守儿童更容易遭遇校园欺凌等负面事件（陈洁等，2021），如果没有及时干预，会让孩子心理蒙上阴影。

表9.3 童年留守经历、传统人力资本与幸福感

变量名	(1)	(2)	(3)	(4)	(5)	(6)
童年是否留守	0.620 (0.402)	-0.234** (0.109)	-0.864** (0.421)	-0.132** (0.061)	-0.132** (0.061)	0.147* (0.081)
受教育年限				0.030 (0.023)		
身体健康					0.333*** (0.067)	
心理健康						0.129*** (0.0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464	4464	2976	4464	4464	2976
调整的 R <sup>2</sup>	0.364	0.207	0.085	0.104	0.104	0.149

注：为了分析方便，此处健康状况是定序变量，1—5依次表示很不健康到很健康，用有序 probit 回归，报告的系数是平均边际效应；受教育年限和心理健康为连续变量，用 OLS 回归。\* p<0.1, \*\* p<0.05, \*\*\* p<0.01, 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

最后，表9.3第（4）—（6）列汇报了第三步检验结果。一方面，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对成年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且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每增加一个单位，成年幸福感得分分别提高0.333分和0.129分。另一方面，在控制了传统人力资本的影响后，童年是否留守的回归系数均变小且统计显著性降低，说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可能是童年留守经历影响成年幸福感的机制。结合第二步检验结果，健康人力资本是影响机制之一。童年留守经历不利于身体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降低成年幸福感；同时也会影响心理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降低了其成年幸福感。例如，留守造成的性格孤僻、偏激、敌对等不良的心理状态都会对成年后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导致幸福感降低。假设9.2b得到支持。

## （二）新人力资本的积累

表9.4汇报了新人力资本机制的分析结果。第（2）列中，童年留守经历对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比没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的

非认知能力要低0.043个单位。第（3）列中，非认知能力对成年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综合第（2）、（3）列的结果，非认知能力不是童年留守经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之一，假设9.2c未得到支持。

表9.4 童年留守经历、非认知能力与幸福感

变量名	(1)	(2)	(3)
	幸福感	非认知能力	幸福感
童年是否留守	-0.157*** (0.069)	-0.043*** (0.018)	-0.220 (0.203)
非认知能力			0.407 (0.9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415	1415	1415
调整的 R <sup>2</sup>	0.102	0.064	0.125

注：\*\*\* p<0.01，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

### 三 家庭力量（社会资本）

笔者采用三步法来检验社会资本是否在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第一步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步结果如表9.5第（1）—（3）列所示，童年留守经历对成年人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及配偶亲密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童年时父母外出务工造成儿童与父母的分离，产生“分离效应”，由于从小缺乏父母陪伴与父母的亲密度较低，造成子女成年后与父母关系的疏离，成年后这种关系模式依然延续。表9.5第（1）列和第（2）列显示，与没有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相比，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亲近程度分别要低0.163个单位和0.112个单位。进一步说明了童年留守经历影响了家庭内部（亲子）社会资本的积累，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存在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欠缺。根据家庭系统理论，亲密关系存在代际传递，子女如何与配偶相处会受到父母相处模式的影响。第（3）列显示，与没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相比，有童年留守经历的成年人与配偶亲密度要降低0.229个单位，进一步说明了童年留守经历会通过亲密关系的代际传递影响家庭内部（夫妻）社会资本的积累。

表9.5 童年留守经历、社会资本与幸福感

变量名	(1)	(2)	(3)	(4)	(5)	(6)
童年是否留守	-0.163** (0.072)	-0.112* (0.061)	-0.229*** (0.064)	-0.149** (0.076)	-0.153* (0.081)	-0.155* (0.079)
父子关系				0.483*** (0.051)		
母子关系					0.489*** (0.056)	
配偶亲密度						0.625*** (0.0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32	1375	1409	1332	1375	1409
调整的 R <sup>2</sup>	0.049	0.035	0.065	0.143	0.135	0.157

注：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配偶亲密度都是定序变量，三个回归方程均用有序 probit 回归，报告的系数是平均边际效应。\*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

最后，表9.5第（4）—（6）列汇报了第三步检验结果。一方面，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及配偶亲密度均对成年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且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与配偶的亲密度每提高一个单位，成年后幸福感得分分别提高0.483分、0.489分和0.625分，由此可以看出，配偶亲密度的重要性对成年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说明家庭关系中的核心是夫妻关系，高于亲子关系。另一方面，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的影响后，第（4）—（6）列中童年是否留守对成年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变小，显著性下降。说明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配偶亲密度均可能是童年留守经历影响成年幸福感的机制，即童年留守经历通过削弱家庭内部社会资本从而降低其幸福感。假设9.3a、假设9.3b和假设9.3c得到支持。

#### 四 童年留守经历如何降低成年幸福感？

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机制分析，研究发现传统人力资本中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资本中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配偶亲密度都是可能的中介。笔者进一步采用基于IV的中介分析来确定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从人力资本中的身体健康资本来看，童年留守影响成年幸福感的总效应为-0.717，其中直接效应为-0.138，间接效应为-0.207，童年留守经历通过削弱身体健康资本解释了28.87%的总效应。从心理健康资本来看，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0.717、-1.152和-0.335，童年留守经历通过削弱心理健康资本解释了总效应的46.72%。从社会资本来看，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和配偶亲密度分别在5%、10%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分别解释了总效应的96.60%、70.83%和66.53%。

表9.6 基于IV的多维资本中介分析

被解释变量：幸福感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父子关系	母子关系	配偶亲密度
总效应	-0.717* (0.376)	-0.717* (0.376)	-0.588** (0.225)	-0.641* (0.334)	-0.750* (0.328)
直接效应	-0.138* (0.065)	-1.152** (0.425)	-0.037 (0.317)	-0.015 (0.399)	-0.067 (0.497)
间接效应	-0.207** (0.079)	-0.335** (0.129)	-0.568*** (0.165)	-0.454* (0.193)	-0.499** (0.188)
间接百分比	28.87%	46.72%	96.60%	70.83%	66.53%

\* p<0.1, \*\* p<0.05, \*\*\* p<0.01, 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

## 第十章 拥抱特殊童年

在共同富裕的推进过程中，农村儿童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父母监护缺失已成为影响农村儿童健康发展的突出挑战。本书从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两个维度出发，分析父母缺位对农村儿童成长的影响。短期而言，父母缺位不仅显著降低了儿童的人力资本质量，还导致情感支持系统的弱化，并增加其卷入校园欺凌的风险。从长期发展来看，父母缺位会对儿童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持续的消极影响。本章系统提出针对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的发展干预策略，旨在构建多维度的支持体系，通过改善成长环境和发展路径，帮助“特殊童年”的儿童获得更公平的发展机会。

### 第一节 优化家庭陪伴模式，减少亲子分离的负向影响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核心场域，父母的陪伴与情感支持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至关重要。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务工，亲子分离成为农村留守与寄宿儿童面临的首要困境。为最大限度减少这种分离带来的负向影响，需从多个维度优化家庭陪伴模式。

消除分离阻隔，推动亲子共融。鼓励务工父母携带子女共同流动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当前，流入地城市应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降低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例如，简化入学手续，消除户籍壁垒，将随迁子女纳入当地教育资源分配体系，确保他们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儿童同等质量的教育服务。同时，优化医疗保障制度，让随迁子女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医疗服务，解决父母的后顾之忧。

创造留乡条件，保障情感支持。若父母难以带子女同行，为农村母亲提供本地就业机会和经济补贴，也是保障儿童获得稳定情感支持的重要举措。农村地区应结合本地产业特色，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为农村母亲创造更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农村女性就业。同时，设立专项经济补贴，对选择留守陪伴子女的母亲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帮助她们兼顾家庭照料与个人发展，让子女在成长关键期能够时刻感受到母亲的关爱与支持。

借助数字技术，弥补物理距离。数字化工具的合理运用，能够有效强化家庭沟通与情感联结。利用视频通话、亲情留言本等方式，即使父母与子女相隔千里，也能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学校和社区可定期组织亲子视频活动，指导家长和孩子掌握视频沟通技巧，分享生活中的点滴，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时刻的关注。此外，还可开发专门的亲子互动App，设置趣味任务、成长记录等功能，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与了解，弥补物理距离带来的隔阂，营造温暖的氛围。

科学规划分离时机，降低成长风险。在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决策需更加注重子女的长期发展。若父母外出务工不可避免，需遵循两大原则：一是优先确保母亲留守，降低对儿童情绪稳定性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负向影响；二是依据儿童发展规律，避开幼儿关键期，尽量在子女具备基本自理能力后再选择外出。正如赫克曼、罗斯高（2019）指出，“没有一种干预比幼儿时期的干预有更高的回报”。

## 第二节 完善寄宿制学校管理，提升教育质量与心理健康支持

寄宿制学校作为农村寄宿儿童重要的成长环境，其管理水平与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儿童的全面发展。完善寄宿制学校管理，需从硬件设施、心理健康教育、非认知能力培养等多个方面入手。

优化基础设施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础。学校应加大投入，改善宿舍、食堂等生活条件。在宿舍建设方面，合理规划住宿空间，确保每个孩子拥有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如储物柜、洗漱设备等，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食堂管理方面，严格把控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等环节，确保营养均衡与卫生安全。制定科学的食谱，根据儿童生长发育需求，提供多样化的膳食，减少因环境不佳对儿童健康的负向影响。

心理健康教育是寄宿制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开设系统的情绪管理课程。心理教师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儿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缓解孤独感与焦虑情绪。建立同伴互助机制，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关心、相互帮助，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同时，利用心理咨询室、心理热线等渠道，为儿童提供及时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问题。

寄宿学校还需注重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将社交技能、情绪调节等内容融入日常教学。通过开展团队合作活动，如小组项目、户外拓展等，提升儿童的责任感、外向性和亲和性，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在课程设置上，增加实践

课程和兴趣活动，如手工制作、艺术表演、体育竞赛等，丰富儿童的课余生活，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其教育教学能力至关重要。学校应加强教师培训，将行为管理技巧和沟通能力提升课程纳入培训体系。通过专家讲座、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方式，帮助教师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更好地理解 and 满足儿童的心理需求。同时，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对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非认知能力培养方面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营造安全稳定的学习环境，学校能够有效降低偏差行为的发生率，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 第三节 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形成教育合力

留守儿童的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协同努力。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能够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为儿童创造更优质的成长环境。

家庭是儿童教育的第一课堂，家长应加强与学校的沟通。尤其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大多为祖辈，他们需要更新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养方式，避免过度溺爱或忽视。学校可通过定期家长会、家访活动等方式，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反馈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家长了解子女的成长需求，形成教育共识。同时，开展家长学校，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传授亲子沟通技巧、儿童心理发展知识等，提升家长的教育能力。

引入社会资源，联合公益组织、社区机构开展课外活动，能够为儿童提供多元化的成长支持。公益组织可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助学、助困等帮扶项目，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用品、生活物资等支持。社区机构可利用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等场所，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读书分享会、科普讲座、文艺演出等，丰富儿童的课余生活，拓宽他们的视野。此外，还可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组织志愿者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业辅导、心理陪伴等服务，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

建立动态监测体系是及时发现和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联合建立监测平台，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进行跟踪评估。通过定期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全面了解儿童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偏差行为或心理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例如，对于学习困难的儿童，组织专业教师进行一对一辅导；对于存在心理问题的儿童，安排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疏导。通过家校社三方联动，构建全方位的支持网络，为儿童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

## 第四节 推动政策创新与社会关注，实现长效保障

政策支持是解决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问题的根本保障。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政策体系。在资金投入方面，设立专项经费，用于改善寄宿学校的办学条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等。细化营养改善、心理健康等专项计划，确保政策能够精准覆盖到每一位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儿童。同时，促进教育公平，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分配，通过“互联网+教育”等手段，将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农村地区，弥补城乡教育差距，提升寄宿学校的教学质量。

推动政策创新还需结合时代发展和实际需求。例如，探索建立留守儿童家庭发展支持政策，鼓励企业为有留守儿童的家庭提供弹性工作制度，方便家长与孩子保持密切联系；完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政策，加大对侵害留守儿童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为儿童的成长保驾护航。

社会认知与参与同样不可或缺。通过媒体宣传、公益项目等途径，提高公众对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问题的关注。媒体可制作专题报道、纪录片等，展现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的生活现状和面临的困难，唤起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公益项目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募捐、志愿服务等活动，吸引更多企业、志愿者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的行动中。

童年经历对个体发展具有深远的长期影响。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应充分认识到留守儿童和寄宿儿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行动起来，从优化家庭陪伴模式、完善寄宿制学校管理、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推动政策创新等多个方面入手，为农村留守与寄宿儿童构建多元支持体系，让他们能够在温暖与关爱中拥抱特殊的童年，拥有美好的未来。

# 附录

附表1 寄宿儿童相关政策（1998—2023）

年份	文件名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2006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	国务院	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输入地政府对委托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要在办学经费、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提高办学质量。输出地政府要解决好农民工托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
2006	《关于大力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的意见》(妇字〔2006〕25号)	全国妇联	1. 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2. 采取措施,扎实有效推进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各项工作。一是开展调查研究。二是纳入家庭教育“十一五”规划。三是发展一批示范家长学校。四是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五是加强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宣传。六是为留守儿童办好事、实事。3. 加强领导,进一步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落到实处
20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国务院	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以确保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得到必要的关注和支持。优先满足留守儿童的教育需求。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调要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的住宿需求,改善其学习和生活条件。要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着力保证留守儿童能够入园,并通过多种形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 要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包括改扩建劳务输出大省和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学校的寄宿设施,改善留守儿童的寄宿条件

续表

年份	文件名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2012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	国务院	强调要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提出要构建由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关爱网络。要求实行留守儿童的普查登记制度和社会结对帮扶制度,建立留守儿童安全保护预警与应急机制
2014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0号)	国务院	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实施“共享蓝天”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继续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快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着力解决留守儿童入园需求。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寄宿需求,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政策。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开展心理关怀等活动,促进学校、家庭、社区有效衔接。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保障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安全,发挥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关爱留守人员功能
2016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	国务院	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救助保护机制,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落实政府兜底监护职责。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委托照护制度,强化政府兜底监护,提升教育帮扶能力,落实控辍保学长效机制。强调加强网络保护,预防网络沉迷,完善儿童福利机构建设,提升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规范化水平
2016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36号)	国务院	强调了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与保护,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建立健全关爱服务体系,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参与,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生活支持。监护干预、信息共享和精准帮扶机制,确保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和心理健康得到保障。同时,强调安全防护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提升关爱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以促进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
2021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	国务院	完善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体系,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提高监护能力,落实县、乡级政府属地责任。同时,常态化开展寒暑假特别关爱行动,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的作用,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情感、行为和安全自护的指导服务。强调积极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务工人员加强与留守未成年子女的联系沟通提供支持

附表2 农村寄宿制相关政策（2001—2020）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农村中小学教育收费专项检查情况报告的通知》(国办发〔2001〕10号)	要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收费的管理。严格控制收费项目,小学、初级中学、初级职业中学等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除收取杂费及按规定收取的借读费(有寄宿制的初中可合理收取住宿费)外,禁止收取其他任何费用。要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并保持相对稳定。严格控制代收费用,除必须由学校统一订购的课本费外,学校不准代收其他任何费用,各地规定的其他代收费项目一律取消。任何单位无权要求学校为其代收任何其他费用。禁止举办面向在校学生的各种收费补习班,禁止将捐资赞助办学与招生、入学和考试成绩挂钩,禁止学校及教职人员代办保险,禁止收取转学费,禁止任何单位通过中小学生学习入学搭车收费
200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13号)	实施“工程”之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财政、计划、人事、编制等部门,制定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规划应根据覆盖人口数、服务半径、经济水平、地理环境和教育中长期发展的需求及农村城镇化建设规划,周密测算。对农村分散的教学点,能够撤并的要尽可能撤并;有条件的可结合“工程”的实施建设一批寄宿制学校。不在学校布局规划内的危房应坚决拆除。凡未做好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中央不拨付“工程”专款。各地区要在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的基础上,对按规划需要改造的中小学危房进行一次彻底排查、核实,以此为依据制定中小学危房改造规划。列入“工程”的项目要落实到学校
200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涉农价格收费及农民负担情况调查报告的通知》(国办发〔2001〕62号)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有关中小学收费的规定,农村中小学只允许收取杂费、课本费、借读费(有寄宿制的初中可合理收取住宿费),但一些农村中小学违规收费现象比较普遍。如河南省淇县高村镇第二中学向学生收取模拟试卷费每套3元、自行车看管费每学期3元、补课费每天1元、体检费每次3元等;汤阴县韩庄乡庵上村小学向学生收绿化费1元,教研费1元。浙江等省的部分学校还向学生收取勤工俭学等社会实践费、搭伙费等。云南等省的部分学校向学生收取勤工俭学费、水电费等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02〕14号)	<p>加快“两基”步伐，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认真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突出“两基”重中之重的地位，加大投入，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推进“两基”进程，力争实现“十五”时期的奋斗目标。要特别重视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改善寄宿制中小学办学和生活条件。扶持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办好示范高中，发展高中教育。要努力办好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和民族高等学校，加快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专业结构调整、人事制度改革和后勤社会化改革步伐。要重视和加强幼儿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使各类教育协调发展。</p> <p>采取减免杂费、书本费、住宿费、生活费等特殊措施确保家庭困难学生就学；中央财政通过综合转移支付对农牧区、山区和边疆地区寄宿制中小学校学生生活费给予一定资助；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各级财政也要相应设立寄宿制中小学校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p>
2003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69号)	<p>严格学校特别是寄宿制学校的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学校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与规章，加强食堂卫生管理。坚持每天清洁扫除，保持食堂环境卫生清洁加强安全保卫，禁止非食堂工作人员随意进入食堂加工操作间及食品原料存放间，严防发生投毒事件；加强学校生活饮用水水源的管理，防止水源污染造成疫病传播加强厕所卫生管理，做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防止污染环境和水源；加强学生宿舍的卫生管理与安全保卫，改善学生宿舍卫生与通风条件。各学校要明确责任人，切实落实各项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措施</p>
2003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开展经常性助学活动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77号)	<p>经常性助学活动捐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受援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和寄宿学生的住宿费、伙食费以及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学费等开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的资助标准并向社会公布</p>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3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村教育 工作的决定》(国 发〔2003〕19号)	<p>要以加强中小学校舍和初中寄宿制学校建设、扩大初中学校招生规模、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推进现代远程教育、扶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重点,周密部署,狠抓落实。</p> <p>继续推进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努力改善办学条件重点加强农村初中和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改善学校卫生设施和学生食宿条件,提高实验仪器设备和图书的装备水平。</p> <p>目前,中国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迫切需要得到关心和资助。要在已有助学办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扶持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助学制度。到2007年,争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努力做到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p> <p>中央财政继续设立中小学助学金,重点扶持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逐步扩大免费发放教科书的范围。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逐步帮助学校免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p>
2004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的通知》(国办发〔2004〕20号)	<p>新建、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为主的寄宿制学校保障“两基”攻坚县扩大义务教育规模的需要,安排对西部地区新增130万初中生和20万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加大对西部地区现有学校的改造力度,使确需寄宿的山区、牧区、高原和边远地区学生能进入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寄宿制学校学习。</p> <p>建立较完善的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资助制度切实保障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中央和地方通过“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活费)等方式加大资助力度,到2007年,力争使中西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普遍得到资助</p>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4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04〕5 号)	建立健全助学制度,扶持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继续设立中小学助学金,重点放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逐步扩大免费发放教科书的范围,逐步免除杂费,为寄宿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通过给学校划拨少量土地或提供劳动实践场所,帮助学生勤工助学并改善生活;广泛动员和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捐资助学。到 2007 年,争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努力做到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004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扶助贫困残疾人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76 号)	资助贫困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中央财政继续为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并逐步扩大提供范围。到 2007 年年底,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都能优先享受“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有条件的地区可优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少年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2005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两免一补”实施步伐有关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7 号)	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免书本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并加大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实施步伐,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农村困难群体的亲切关怀。 各地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同时,确保地方政府负责的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资金的落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杂费资金由地方财政在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和自有资金中统筹安排,足额到位。2005 年年初预算已经安排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资金的地区,要优先用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尚未安排资金的,也要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确保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的落实。从 2005 年春季学期开始,凡享受中央免费教科书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地方政府必须同时免除杂费,免除杂费的标准要严格遵守“一费制”标准,并且不得再以任何名目向学生收取其他费用。各地要结合财力,逐步对贫困家庭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并在 2007 年年底以前落实,补助形式和补助标准由地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具体确定。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5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两免一补”实施步伐有关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7号)	各地要加强对“两免一补”工作的组织领导，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既要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又要合理分工、明确责任，确保“两免一补”工作的顺利实施。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分配管理中央免费教科书专项资金，筹集和管理地方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资金
2005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2005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发〔2005〕8号)	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和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加快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设，继续实施二期义务教育工程和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进一步做好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巩固提高工作。组织做好“两免一补”工作。认真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学的问题
2005	国务院	《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国令第435号)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大力支持民族自治地方有重点地办好寄宿制学校；在发达地区普通中学开设民族班或者开办民族中学，其办学条件、教学和管理水平要达到当地学校的办学标准和水平
2005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24号)	积极推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两免一补”(免课本费、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的实施，确保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加快中小学校人事制度改革，严格教师资格和准入制度，加大城乡教师交流力度，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农村学校建设要统筹规划，量力而行，严禁不切实际超标准建设。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大薄弱学校改造工作力度，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2005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实施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44号)	<p>一、严格按照规划和年度计划实施“寄宿制工程”确保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目标如期实现。</p> <p>二、出台优惠政策，尽量减免“寄宿制工程”建设收费</p> <p>三、切实加强项目前期工作，严格履行建设程序。</p> <p>四、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寄宿制学校管理。</p> <p>五、强化责任意识，严把工程质量关。</p> <p>六、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寄宿制工程”的检查和指导</p>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5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	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除直辖市外,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免费提供教科书资金,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承担,东部地区由地方自行承担。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资金由地方承担,补助对象、标准及方式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
2006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函〔2006〕13号)	关于“2006年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问题,由财政部牵头,会同教育部等部门提出实施意见
200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2006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发〔2006〕12号)	大力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在西部地区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的问题
2006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监察部和国务院纠风办关于2006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0号)	积极推进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认真落实西部地区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继续做好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工作。坚决查处并杜绝农村学校乱收费行为,绝不允许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仍实行“一费制”的地区要继续执行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费制”收费办法严格规范服务性收费
2006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6〕48号)	认真落实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四项制度”,各地要进一步落实和健全涉农税收、价格及收费“公示制”适时更新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除在乡镇政府所在地统一公示外,涉农收费单位要在收费现场进行公示认真落实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对实行免学杂费的地区,除按“一费制”规定的额度收取课本费、作业本费和寄宿学生住宿费外,学校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其他费用;对享受免费提供教科书的学生,不再收取课本费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主要目标和任务工作分工的通知》(国发〔2006〕29号)	教育发展重点工程：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改造工程，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等教育“211”和“985”工程
2006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的通知》(国发〔2006〕107号)	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2007年，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任务；到2010年，全国初中三年保留率达到95%。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对农村地区学生免收学杂费，并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寄宿生活补助。切实解决好适龄女童、残疾儿童、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2007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函〔2007〕22号)	关于“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有条件的地方可扩大免、补实施范围。加大对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类专业学生的助学力度”的问题，由财政部牵头，会同教育部研究提出实施意见
2007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7〕14号)	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提高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2007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2007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发〔2007〕8号)	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经费管理，强化监督检查，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启动实施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全面完成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继续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7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07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7〕32号)	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各项政策,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切实履行投入和监管责任,确保全部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确保向农村贫困家庭中小學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除按“一费制”标准收取课本费(不含按规定享受免费教科书的学生)、作业本费、寄宿生住宿费,以及向自愿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以外,严禁向学生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2007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对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对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国家助学金等,取得了良好成效
2007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国发〔2007〕14号)	在农村并逐步在城市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面落实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城市低保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也享受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
2007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7〕43号)	实施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国门学校建设工程。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水平。建设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示范区,培养合格的双语教师。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加强教育对口支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 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边境县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适当提高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建立健全边境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提高中小学办公经费的保障水平。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向边境乡镇倾斜
2008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2008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发〔2008〕15号)	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试点基础上,从秋季起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继续增加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提高保障水平。适当提高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认真落实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措施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8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2008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8〕13号)	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督促各级政府履行投入和监管责任,确保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费等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各项政策的落实。配合有关部门推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解决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收费问题。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与所在地学生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免收借读费
2008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8〕25号)	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
2008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通知》(国发〔2008〕31号)	高质量地恢复重建中小学校,扩大寄宿制学校规模和寄宿生比重,实施中小学骨干教师支教计划
2009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形成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支持重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城乡普通中小学和学前教育师资配置逐步达到统一标准,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发展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将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加快普及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
2009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9〕34号)	科学制定校舍安全工程实施规划和方案。根据排查鉴定结果,结合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和正在实施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等专项工程,科学制定校舍安全工作总体规划和具体的实施计划与方案。 健全工程资金管理制度,工程资金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不能顶替原有投入,更不得用于偿还过去拖欠的工程款和其他债务。资金拨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杜绝挤占、挪用、克扣、截留、套取工程专款。保证按工程进度拨款,不得拖欠工程款。校舍安全工程建设执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实施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44号)有关减免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等优惠政策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09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41号)	配齐配足教师,确保特殊教育学校正常教学和管理工作。省级有关部门要根据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少、班额小、寄宿生多、教师需求量大的特点,合理确定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并保障落实
2009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09〕55号)	优先发展教育。进一步普及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继续支持并尽快完成西部地区剩余42个县的“两基”攻坚任务。争取3年内基本解决农村“普九”债务问题。支持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继续实施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加大危房改造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基础能力建设,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
2009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2号)	积极推进教育扶贫工作,全面落实库区移民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免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政策,探索教育移民新模式
2010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0〕29号)	优先发展教育。巩固“两基”攻坚成果,全面完成“两基”攻坚任务。合理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办学条件,推进民汉合校,加强“双语”教育。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建设一批职业院校和公共实训基地,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除学费。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半工半读的培养模式,支持与东部地区合作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2010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做好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0〕14号)	优先安排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恢复重建,严格执行强制性建设标准规范,把学校、医院建成最安全、最牢固、群众最放心的建筑。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加强中小学寄宿制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幼儿园建设,改善“双语”教学条件
2010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17号)	以义务教育为重点,高质量地恢复重建中小学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原则上初中建在县城,完全小学建在乡镇。加强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和幼儿园建设。提高农牧区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能力。加快发展农牧区学前双语教育。办好特殊教育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0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若干意见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10〕143号)	巩固“两基”攻坚成果,全面完成“两基”攻坚任务,合理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2010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	完善寄宿制学校管理体制与机制,探索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模式(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市县,贵州省毕节市,甘肃省酒泉市,青海省海南州)
2010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38号)	重点建设寄宿制高中,将舟曲县高中教育调整至秦王川,同时建设部分转移安置居民住房及配套设施
2010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号)	落实孤儿教育保障政策。家庭经济困难的学龄前孤儿到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由当地政府予以资助,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孤儿寄宿生全面纳入生活补助范围
2010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国发〔2010〕40号)	增加对大中专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学生食堂补贴,各大中专院校要保持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基本稳定,切实安排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生活
201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发〔2011〕11号)	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支持力度,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改善农村教师工作生活条件,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201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17号)	大力发展牧区社会事业。巩固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推进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逐步提高牧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办发〔2011〕28号）	支持边境县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支持边境县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
201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21号）	加强民族教育，提高双语教学质量，对高中阶段教育和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给予生活费补助
201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国发〔2011〕24号）	<p>确保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制定实施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后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p> <p>建设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安全的友好型学校。建立尊师爱生的师生关系。保障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利。创造有利于学生身体健康的学习、生活条件，提供安全饮用水和卫生厕所，改善寄宿制学校学生食堂和住宿条件。</p> <p>扩大儿童福利范围。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分类施保提高贫困家庭儿童生活水平。探索对儿童实施营养干预和补助的方法，改善儿童营养状况。逐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准，扩大补助范围</p>
201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	加快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优化配置义务教育资源，基本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扩大边远艰苦地区学校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试点范围
201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	鼓励偏远少数民族村寨小学开展“双语”教育。积极稳妥推进农村中小学寄宿制，支持校舍建设，配齐管好必要的管理人员，到2015年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解决小学寄宿生住宿问题。积极稳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发〔2012〕13号)	农村中小学布局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们就近上学的关系。办好农村寄宿学校,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加强校车和校园安全管理,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2012	国务院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六17号)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学生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依法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减少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风险
201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1号)	支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到2013年全面完成赣州市校舍危房改造,到2015年基本解决小学、初中寄宿生住宿问题。逐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201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29号)	为适龄儿童、少年提供免费九年义务教育,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提供免费住宿,并为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 统筹规划学校布局,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保留必要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加强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标准。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孤儿寄宿生全面纳入生活补助范围
2012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12〕38号)	加快农牧区寄宿制学校建设,逐步提高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和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加大对民族地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支持力度
201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	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省级政府要依据国家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和本省(区、市)标准,为农村中小学配齐图书、教学实验仪器设备、音体美等器材着力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宿舍、食堂等生活设施妥善解决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服务人员配置问题。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和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积极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要采取学校扩建改造和学生合理分流等措施,解决县镇“大校额”“大班额”问题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48号)	<p>统筹协调留守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行留守学生的普查登记制度和社会结对帮扶制度。加强对留守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留守学生安全保护预警与应急机制。优先满足留守学生进入寄宿制学校的需求。</p> <p>关心扶助需要特别照顾的学生。加大省级统筹力度,落实好城市低保家庭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政策。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做好对孤儿的教育工作,建立政府主导,民政、教育、公安、妇联、共青团等多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保证城乡适龄孤儿进入寄宿生活设施完善的学校就读。加强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保障适龄流浪儿童重返校园。办好专门学校,教育和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少年。</p>
2012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办发〔2012〕48号)	<p>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程序。确因生源减少需要撤并学校的,县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履行撤并方案的制定、论证、公示、报批等程序。要统筹考虑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寄宿生学习生活设施等条件保障,并通过举行听证会等多种有效途径,广泛听取学生家长、学校师生、村民自治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意见,保障群众充分参与并监督决策过程。</p> <p>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和管理。学校撤并后学生需要寄宿的地方,要按照国家或省级标准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为寄宿制学校配备教室、学生宿舍、食堂、饮用水设备、厕所、澡堂等设施,并聘用必要的管理、服务、保安人员,寒冷地区要配备安全的取暖设施。有条件的地方应为学校配备心理健康教师。要科学管理学生作息时间,培养学生良好生活习惯,开展符合学生身心特点、有益于健康成长的校园活动,加强寄宿制学校安全管理和教育。</p>
2013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3〕86号)	<p>推动地方开展城乡教师交流活动并形成制度,鼓励免费师范生到片区从教。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国家和省级培训计划、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进一步向片区倾斜。合理配备寄宿制学校生活管理人员。</p> <p>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孤儿、残疾幼儿入园和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p>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4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的通知》（国办发〔2014〕1号）	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各省（区、市）要落实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正常教学和管理工作所需编制，配足配齐教职工。针对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少、班额小、寄宿生多、残疾差异大、康复类专业人员需求多、承担随班就读巡回指导任务等特点，可结合地方实际出台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全面落实国家规定的特殊教育津贴等特殊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倾斜政策
2014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0号）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寄宿需求，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政策
2014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4〕67号）	寄宿制学校或者600人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要设立卫生室（保健室），配备人员器材。县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2015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发〔2015〕14号）	加快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改善薄弱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政策，完善后续升学政策。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2015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15〕46号）	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针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农牧区和偏远地区实际，科学编制寄宿制学校建设规划，合理布局，改扩建、新建标准化寄宿制中小学校。按照国家规定标准配备图书、实验室、教学仪器设备。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配齐后勤管理服务人员，加强学校管理，强化安全教育，提高人防、物防、技防能力，确保学校安全。全面提高入学率，实现各民族学生学习在学校、生活在学校、成长在学校。对地处偏远又无条件寄宿的学校，因地制宜加强建设、改善条件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5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号)	<p>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两免一补”)。</p> <p>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并适当提高寄宿制学校规模较小学校和北方取暖地区学校补助水平。</p> <p>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改革。各地要结合人口流动的规律、趋势和城市发展规划,及时调整完善教育布局,将民办学校纳入本地区教育布局规划,科学合理布局义务教育学校。加快探索建立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机制和管理办法,建设并办好寄宿制学校,慎重稳妥撤并乡村学校,努力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保障当地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加强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管理。深化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城乡教师和校长交流机制,健全义务教育治理体系,加强留守儿童教育关爱</p>
201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	<p>帮助农村留守儿童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加强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和亲情交流。寄宿制学校要完善教职工值班制度,落实学生宿舍安全管理责任,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引导寄宿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艺术、社会实践等活动,增强学校教育吸引力。</p> <p>加强能力建设。统筹各方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逐步完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场所设施,满足临时监护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促进寄宿制学校合理分布,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入学需求。利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开辟儿童活动场所,提供必要的托管服务</p>
201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发〔2016〕20号)	<p>公共教育投入加大向中西部和边远、贫困地区倾斜力度。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薄弱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办好特殊教育。加快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率先免除普通高中学杂费。落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政策。加快推进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p>
2016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号)	<p>强化课外锻炼。健全学生体育锻炼制度,学校要将学生在校内开展的课外体育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列入作息时间安排,与体育课教学内容相衔接,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落到实处。幼儿园要遵循幼儿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小学校要组织学生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寄宿制学校要坚持每天出早操</p>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6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7号)	<p>标准化建设寄宿制学校。加快改扩建新建学生宿舍食堂,实现“一人一床位”,消除“大通铺”现象,满足室内就餐需求。改善寒冷地区学校冬季取暖条件,保证取暖经费。改善如厕环境,旱厕按学校专用无害化卫生厕所设置,有条件的地方设置水冲式厕所。改善浴室条件,除特别干旱地区外,寄宿制学校应设置淋浴设施。结合实际改善体育和艺术教育场地,配备音体美器材,建好图书馆(室)、广播站、活动室,满足教学和文化生活需要。配备必要的教职员工,有效开展生活指导、心理健康、卫生保健、后勤服务和安全保卫等工作。关爱乡村留守儿童,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探索建立寄宿制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机制,提高寄宿制学校运转保障能力</p>
201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号)	<p>提高教育质量,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合理规划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建设,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向乡村和城乡接合部倾斜,大力提高乡村教育质量,适度稳定乡村生源,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位和乡镇学校寄宿床位,推进城镇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着力解决“乡村弱”和“城镇挤”问题,巩固和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加快缩小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p> <p>科学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各地要逐县(市、区)逐校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台账,全面摸清情况完善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标准,科学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升乡村学校信息化水平,全面提高乡村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能力,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适当提高寄宿制学校、规模较小学校和北方取暖地区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水平,切实保障正常运转。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提高学校管理标准化水平。重点提高乡镇寄宿制学校管理服务水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乡镇寄宿制学校提供工勤和教学辅助服务。各地要在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础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市(地)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路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更大范围开展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试点,发挥引领示范作用</p>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号)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要按照班额、生源等情况,充分考虑乡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和城镇学校的实际需要,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并向同级机构编制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全面推进教师“县管校聘”改革,按照教师职业特点和岗位要求,完善教师招聘机制,统筹调配编内教师资源,着力解决乡村教师结构性缺员和城镇师资不足的问题。严禁在有合格教师来源的情况下“有编不补”、长期聘用编外教师,严禁挤占挪用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和各种形式“吃空饷”。积极鼓励和引导乡村志愿支教活动
201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大督查的通知》(国发明电〔2016〕4号)	督查改善薄弱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落实和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就学和升学考试政策等情况
201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4号)	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化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办好必要的小学和教学点,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革命老区贫困县等为重点,解决或缓解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大通铺”问题,逐步实现未达标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场所标准化
201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79号)	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提升中小学办学质量。加强对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管理和指导。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继续安排人口较少民族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少数民族预科班、高层次民族班对人口较少民族适当倾斜
2017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4号)	加强重点小城镇、城乡接合部、新建城区和城镇旧房改造区学校建设,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位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寄宿床位,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 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实现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全覆盖。 加强农村学校布局规划。在交通便利、公共服务反型的农村地区合理布局义务教育学校。针对地广人稀地区、山区、海岛等特殊困难地区人民群众就学需求,合理布局并办好一批寄宿制学校、边境地区学校,保留并办好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努力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接受有质量的教育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7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4号)	<p>各地要因地制宜建立完善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基本标准,科学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改善薄弱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p> <p>建立帮扶学习困难学生的责任制度,因地制宜促进农村初中普职教育融合,提供多种成长通道,妥善解决农村学生上学远和寄宿生家校往返交通问题。</p> <p>明确强化家庭和家长的法定教育责任,鼓励父母取得居住证的适龄儿童随父母在工作地入学。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进一步改善学习生活条件,创新关爱与教育形式,加强心理辅导、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p> <p>实行义务教育教师编制城乡、区域统筹和动态管理。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按照班额、生源等情况,充分考虑乡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和城镇学校的实际需要,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并报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着力解决乡村教师结构性缺员和城镇师资不足的问题。配齐特殊教育教师。</p> <p>实施中西部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遴选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优秀教师,组织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带动当地教师整体水平提升。建设乡村教师周转宿舍,保障农村特岗教师、支教交流教师、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教师等必要的住宿生活条件。</p>
2017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号)	<p>学校要与社区、家长合作,有条件的建立学校安全保卫志愿者队伍,在上下学时段维护学校及校门口秩序。寄宿制学校要根据需要配备宿舍管理人员。</p>
2017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17〕50号)	<p>推动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全面推进边境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改善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办学条件,加强边境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科学布局、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提升边境学校教育质量,切实保障守土固边边民家庭学龄儿童就近就便有学上、上好学。</p>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7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国办发〔2017〕72号)	<p>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各地要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保障学校布局与村镇建设、学龄人口居住分布相适应。在交通便利、公共服务成型的乡镇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在人口稀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应保留或设置教学点,切实保障学生就近上学的需要。完善不能到校学习的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制度。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及各地实际,切实处理好坚持就近入学为主与合理集中寄宿的关系。严格规范学校撤并程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避免因学校布局不合理和学生上下学交通不方便造成学生失学辍学。要因地制宜通过增加寄宿床位、增加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提供校车服务等多种方式,妥善解决农村学生上学远和寄宿学生家校往返交通问题。通过在城镇新建和改扩建学校,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全面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为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提供条件。</p> <p>各地要加强省级统筹,完善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标准,科学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p> <p>落实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适当提高寄宿制学校、小规模学校和北方取暖地区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水平,保障学校正常运转</p>
2018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号)	<p>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担支出责任,各地区均为5:5,对人口较少民族寄宿生增加安排生活补助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p>
2018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27号)	<p>农村学校布局既要有利于为学生提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又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方便学生就近入学;既要防止过急过快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过于集中,又要避免出现新的“空心校”。原则上小学1—3年级学生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路途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4—6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在住宿、生活、交通、安全等有保障的前提下可适当寄宿,具体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确定</p>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8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27号)	<p>县级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人口分布、地理特征、交通资源、城镇化进程和学龄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统筹县域教育资源,有序加强城镇学校建设,积极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在此基础上,要统筹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完全小学布局,修订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按程序公开征求意见,并按程序报省级人民政府备案。在人口较为集中、生源有保障的村单独或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完全小学;地处偏远、生源较少的地方,一般在村设置低年级学段的小规模学校,在乡镇设置寄宿制中心学校,满足本地学生寄宿学习需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合理布局,加大艰苦边远地区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力度,保障教师基本工作和生活条件;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应配建教师周转宿舍;交通较为便利、距离相对较近的地方,可在乡镇寄宿制学校内或周边集中建设教师周转宿舍。关心乡村教师生活,为教师走教提供交通帮助与支持</p>
2018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国办发〔2018〕82号)	<p>落实对农村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按100人拨付公用经费和对寄宿制学校按寄宿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政策,单独核定并落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公用经费,确保经费落实到学校(教学点),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提升乡村学校办学水平,振兴乡村教育。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控辍保学、“大班额”、随迁子女就学、家庭无法正常履行教育和监护责任的农村留守儿童入校寄宿等突出问题</p>
2019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p>各地要按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做好编制核定工作,并制定小规模学校编制核定标准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寄宿制学校提供生活服务的实施办法。</p> <p>实施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计划,整合建设国家中小学生学习平台。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重点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打造“乡村温馨校园”。</p> <p>各地要按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做好编制核定工作,并制定小规模学校编制核定标准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寄宿制学校提供生活服务的实施办法</p>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9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7号)	将国家制定分地区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调整头制定全国统一的基准定额,并按规定提高寄宿制学校等公用经费水平,单独核定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等公用经费标准
2020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国发〔2020〕6号)	有序组织中小学教育教学和中高考工作。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完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
2021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因地制宜合理配置特殊教育资源,鼓励在九年一贯制学校或寄宿制学校设立特教班。针对孤独症儿童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要合理布局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鼓励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保障儿童福利机构内具备接受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接受中小学教育并纳入学籍管理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在本地儿童福利机构设立特教班。健全送教上门制度,推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完善送教上门服务标准,科学认定服务对象,规范送教上门形式和内容,加强送教服务过程管理,提高送教服务工作质量,能够入校就读的残疾儿童不纳入送教上门范围
2021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多渠道增加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继续改善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保留并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县城和中心镇新建改扩建一批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
202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成果,完善办学标准,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加快城镇学校扩容增位,保障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改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条件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素质能力,完善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巩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成果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21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教财〔2021〕3号)	各地要以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薄弱环节为重点,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实用、够用、安全、节俭”的要求,优先规划、持续改善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和生活的基本办学条件,切实加强未达标学校建设。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学校教室、宿舍、食堂等设施建设,配齐洗浴、饮水等学生生活必需的设施设备,推动清洁取暖进校园和卫生厕所改造。改善学校寄宿条件,重点满足偏远地区学生和留守儿童的寄宿需求,根据需要建设心理咨询室、图书室等功能教室,打造乡村温馨校园。继续改善规划保留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条件,支持乡村学校因地制宜开好音体美等课程,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完善教育配套设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就近入学
202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控制使用时长,保护视力健康,防止网络沉迷。家长要积极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帮助其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寄宿制学校要统筹安排好课余学习生活
2023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教基〔2023〕4号)	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各省(区、市)要适应城镇化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制定优化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指导意见,着力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适当整合小、散、弱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同时保障必要的上下学交通条件,健全家校常态化沟通机制,切实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附表3 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的政策梳理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	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为试点地区学生每人每天补助3元（2014年提升至4元），覆盖中西部23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点保障寄宿制学校学生膳食营养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12	教育部、财政部等15部门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	明确供餐模式（食堂供餐、企业配餐等）资金管理、食品安全责任，要求建立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规范营养餐从采购到分发的全流程监管
2014	国务院	《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	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纳入贫困地区儿童健康干预重点，提出扩大覆盖范围、推动营养餐与本地农产品供应链结合加强儿童营养监测与评估
2016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扩大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方试点范围实现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覆盖的通知》	要求未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全部纳入试点，中央财政按每人每天4元标准给予奖补，重点支持寄宿制学校食堂建设
2019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健委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强化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确校长负责制，要求建立陪餐制度、公示食谱和营养参数，鼓励配备专（兼）职营养健康管理人員
2021	教育部等五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工作的通知》	提出动态调整补助标准（根据物价水平）严查挤占挪用资金行为，鼓励推广“4+X”模式（中央补助4元+家庭适当承担），要求东部省份自主开展地方试点
2021	国务院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	明确“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加强监测评估”，并纳入儿童与健康、儿童与教育发展目标，推动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儿童营养支持体系
2022	教育部、国家卫健委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工作方案（2022年修订）》	建立覆盖所有试点县的常态化监测机制重点评估寄宿儿童身高、体重、贫血率等指标，要求每学年形成省级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推动政策效果科学化评估
2023	教育部、国家或地区卫健委、财政部等	《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	提高补助标准，根据物价水平和学生营养需求，动态调整补助金额。强化营养健康教育将营养健康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健康饮食习惯。推广地方特色营养餐，结合各地饮食文化和农产品资源，开发符合学生营养需求的地方特色营养餐。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学生饮食安全

续表

年份	发布机构	政策文件	主要内容
2024	国务院	《国家或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30年）》	实现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确保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都能享受到营养餐。建立营养健康监测体系，定期对学生营养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及时调整营养餐方案。加强营养改善计划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确保政策有效落实。推动营养改善计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促进农村地区教育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 参考文献

### 中文文献

[美]埃尔德，2002，《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译林出版社。

[美]加里·S. 贝克尔，2016，《人力资本》，陈耿宣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西奥多·W. 舒尔茨，1990，《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美]詹姆斯·赫克曼、[美]罗斯高，2019，《世界经验对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的启示——罗斯高（Scott Rozelle）与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问答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7卷第3期。

曹亚杰，2008，《小学生同伴冲突与社会技能的培养》，《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期。

陈慧敏，2023，《家庭教育中父母缺位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探析——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心理学进展》第13卷第2期。

陈继文等，2015，《教师自主支持与初中生的学习投入：家庭社会阶层与学生自主动机的影响》，《心理发展与教育》第31卷第2期。

陈洁等，2021，《父母缺席对大城市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青年研究》第2期。

陈在余，2009，《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程虹、李唐，2017，《人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企业一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仇凤仙，2023，《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人民出版社。

褚卫中、张玉慧，2012，《农村义务教育“撤点并校”负面影响分析》，《教学与管理》第7期。

崔颖、徐卓君，2021，《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机制》，《浙江学刊》第5期。

邓宇泽等，2025，《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一项交叉滞后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第41卷第3期。

董磊明、李欣灿，2024，《从“家庭化”到“去家庭化”——生活实践变迁中的农村教育》，《青年研究》第3期。

董世华，2015，《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董世华，2015，《我国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范兴华、方晓义、赵纤等，2023，《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累积风险与社会适应：压力的中介作用与心理社会资源的调节作用》，《心理学报》第55卷第8期。

范兴华、余思、彭佳等，2017，《留守儿童生活压力与孤独感、幸福感的关系：心理资本的中介与调节作用》，《心理科学》第2期。

房彬，2014，《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变迁——基于文化接触理论视角的分析》，《兰州学刊》第7期。

房敏、孙颖，2022，《高等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净效应评估——基于多组倾向得分匹配的准实验研究》，《大学教育科学》第5期。

费孝通，1988，《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傅王倩、刘霏屿，2022，《我国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系统综述的证据》，《少年儿童研究》第9期。

甘红缨、苏焕，2011，《中小学生同辈群体压力的引导》，《教学与管理》第33期。

高凯，2024，《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表现、成因及对策》，《大连教育学院学报》第40卷第3期。

郭磊、曲进，2019，《赫克曼曲线与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学前公共投入的思想与借鉴》，《经济学动态》第1期。

郭亚平，2020，《留守经历及其开始阶段对大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青年研究》第1期。

- 韩保庆等, 2021, 《童年时期父母外出对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南方人口》第36卷第4期。
- 韩保庆等, 2023, 《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 《教育与经济》第39卷第2期。
- 郝明松, 2022, 《父母外出模式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基于两期CEPS数据的再探究》, 《人口学刊》第44卷第5期。
- 胡枫、李善同, 2009,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基于5城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第2期。
- 胡建国、鄢雨, 2020, 《留守经历与高等教育地位获得》, 《青年研究》第4期。
- 胡伶、万恒, 2012, 《农村寄宿制学生社会情感学习能力调查》, 《中国教育学刊》第9期。
- 黄超, 2018, 《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社会》第38卷第6期。
- 黄胜梅, 2008, 《学前儿童同伴冲突的观察研究——以武汉市某省级示范幼儿园为例》, 《教育导刊(幼儿教育)》第2期。
- 黄欣欣等, 2023, 《家庭结构对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影响: 情感忽视的中介作用》,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第25卷第1期。
- 吉玉芳, 2024, 《同伴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影响的研究进展》, 《社会科学前沿》第13卷第3期。
- 计小青、赵景艳, 2020, 《社会资本对女性主观幸福感的补偿机制分析——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西北人口》第41卷第6期。
- 贾丽凤等, 2009, 《寄宿制教育对农村中小生成长的影响问题研究》, 《继续教育研究》第8期。
- 贾勇宏、吴恩慈, 2022, 《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吗? ——基于1487份农村中小學生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教育与经济》第38卷第2期。
- 江涛, 2008,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启示》,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2卷第6期。

姜楠、续竞秦，2020，《在校寄宿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教育与经济》第36卷第4期。

姜欣悦，2004，《寄宿制教育对西部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生成的影响分析》，硕士学位论文，西安理工大学。

焦钰雅，2023，《新时代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对策研究》，《心理学进展》第13卷第12期。

井卫英等，2002，《幼儿的游戏行为及其与社会技能、学习行为的典型相关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第2期。

乐君杰、胡博文，2017，《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雷万鹏、李贞义，2021，《非认知能力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CEPS的实证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0卷第6期。

雷万鹏、徐璐，2011，《农村校车发展中的政府责任——以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为背景》，《中国教育学刊》第1期。

黎志华等，2014，《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特征的潜在类别分析：基于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心理科学》第37卷第2期。

李安，2002，《同伴冲突及其解决策略》，《幼儿教育》第11期。

李波、尹璐，2019，《亲子分离对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北京市流动儿童的调查证据》，《教育经济评论》第4卷第6期。

李春玲、郭亚平，2021，《大学校园里的竞争还要靠“拼爹”吗？——家庭背景在大学生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社会学研究》第36卷第2期。

李董平、周月月、赵力燕等，2016，《累积生态风险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心理需求满足和积极结果预期的中介作用》，《心理学报》第48卷第12期。

李钢，2007，《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理论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

李佳丽、胡咏梅，2021，《“望子成龙”何以实现？——基于父母与子女教育期望异同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36卷第3期。

李金娥，2012，《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投入、学习倦怠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2年。

李婧怡，2010，《国内外青少年同伴关系对社会化影响的研究综述》，《现代教育科学》第10期。

李静、王月金，2015，《健康与农民主观福祉的关系分析——基于全国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李乐敏等，2020，《父母陪伴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亲子共餐视角的准实验研究》，《人口与发展》第26卷第2期。

李丽等，2017，《家庭背景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第37卷第1期。

李梦楠，2016，《情绪调节与依恋》，《心理学进展》第6卷第4期。

李强、臧文斌，2011，《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经济学（季刊）》第10卷第1期。

李强等，2020，《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辍学的影响研究》，《农村经济》第450卷第4期。

李庆海等，2014，《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模式与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李守身、黄永强，2001，《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江淮论坛》第5期。

李晓曼、曾湘泉，2012，《新人力资本理论——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动态》，《经济学动态》第11期。

李燕平等，2023，《农村“完全代理型”隔代抚养青少年的发展风险》，《中国青年社会学》第42卷第1期。

李永鑫等，2008，《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8卷第1期。

李云森，2013，《自选择、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基于不发达地区调查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

梁超、王素素，2020，《教育公共品配置调整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基于撤点并校的研究》，《经济研究》第55卷第9期。

梁文艳、叶晓梅，2018，《寄宿制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与同伴效应的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6卷第6期。

梁在、李文利，2021，《从留守经历的视角分析农村儿童家庭教育投入》，《人口学刊》第43卷第1期。

凌辉等，2022，《留守初中生校园欺凌现状：基于人口学特征的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30卷第2期。

刘贝贝等，2019，《食物消费视角下祖辈隔代溺爱对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以湖北省为例》，《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刘浩，2023，《亲子分离与身心健康：家庭结构的长期影响》，《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

刘红艳等，2017，《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5卷第2期。

刘靖，2008，《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经济研究》第43卷第9期。

刘俊珍，2002，《农村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自卑心理的小组工作介入研究——以江西吉水S小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江西财经大学。

刘凌、吴蕾，2019，《“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育儿选择影响的研究》，《学习与探索》第3期。

刘录护、李春丽，2015，《校园“早恋”的中西比较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刘森林、李海灵，2022，《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

刘涛、王德政，2021，《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人口研究》第4期。

刘玄彦等，2025，《我国留守儿童抑郁症状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分析》，《医学与社会》第38卷第3期。

刘志军, 2019, 《留守经历与心理健康——基于80后外来工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刘志军, 2021, 《能力还是心理?——对留守经历长期影响的一项实证检验》, 《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

刘志军, 2025, 《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人民论坛》第2期。

刘志军、徐芳, 2020, 《留守经历与社交困难——基于新生代外来工的实证分析》, 《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刘志军等, 2022, 《时间之窗与时间之创: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 《社会》第42卷第6期。

龙斧、梁晓青, 2019, 《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核心消费压力对中国家庭幸福感的结构性影响——基于CSS2013的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第241卷第2期。

陆彩霞等, 2018, 《利他者更幸福吗?——提升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验研究》, 《中国教育学刊》第11期。

陆方文等, 2017, 《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 《经济研究》第52卷第10期。

陆继霞, 2011, 《留守儿童情感缺失: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之痛》,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陆伟等, 2017, 《农村寄宿制学校中的校园霸凌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罗仁福等, 2010, 《贫困农村儿童的能力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学前教育研究》第4期。

罗仁福等, 2016, 《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干预效果评估》,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4卷第3期。

吕利丹, 2014, 《从“留守儿童”到“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终止及影响研究》, 《人口研究》第38卷第1期。

吕利丹、王非, 2017, 《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基本事实与解释》, 《人口研究》第41卷第6期。

吕利丹等, 2024,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 2010~2020》, 《人口研究》第48卷第1期。

马晓君等, 2019, 《环境“二维化”视角下的居民幸福感量化研究: 来自中国CGSS数据的新证据》, 《统计研究》第36卷第9期。

孟亚男、张璨, 2022, 《父母情感陪伴缺位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留守表述的情感社会学分析》, 《少年儿童研究》第8期。

明娟、曾湘泉, 2015, 《工作转换与受雇农民工就业质量: 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 《经济学动态》第12期。

缪华灵、郭成、向光璨等, 2021,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类别特征及与心理素质的关系: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7卷第6期。

潘黎君, 2024, 《学业压力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家庭逆境的调节作用及脑结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第31页。

庞浩, 2023, 《健康人力资本视角下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大学, 第33页。

彭小辉等, 2022, 《农民工汇款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乔东平、文娜, 2018, 《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 概念、成因与干预》, 《社会建设》第5卷第3期。

乔东平、文娜, 2018, 《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综述: 概念、成因与干预》, 《社会建设》第5卷第3期。

秦英哲, 2022, 《寄宿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一项基于西北农村地区的小学调研》, 硕士学位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 第1页。

邱红、张凌云, 2021, 《中国青年人教育程度异质性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人口学刊》第43卷第6期。

阮海波, 2021, 《社会条件、政策支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分析》,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第20卷第5期。

邵锋, 2024, 《留守儿童学校心理教育伦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教育进展》第14卷第3期。

沈蓓绯等, 2012,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现状及路径研究》, 《学术论坛》第35卷第6期。

盛亦男, 2019, 《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 《人口与经济》第3期。

石智雷、宁桃丽, 2024, 《女性地位、家庭决策与农民工子女留守》, 《中国人口科学》第38卷第5期。

宋健、张洋、王璟峰, 2014, 《稳态与失稳: 家庭结构类型与家庭幸福的一项实证研究》, 《人口研究》第38卷第5期。

宋月萍, 2024,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留守儿童发展问题探析》, 《人民论坛》第21期。

宋月萍、张耀光, 2009, 《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以及卫生服务利用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人口研究》第33卷第6期。

苏华山等, 2017, 《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经济科学》第6期。

苏林雁, 2019, 《儿童情绪早期社会化发展》,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第27卷第9期。

孙贺群、王小英, 2009, 《儿童同伴合作学习的价值、机制与促进策略——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视角》, 《学前教育研究》第10期。

孙俊洁, 2023, 《央地财政分权对教育经费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第13页。

孙立新、刘兰兰, 2020, 《教育会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吗? ——基于教育回报率的实证研究》, 《开放教育研究》第26卷第5期。

孙敏, 《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特有烙印》, 《环球时报》2023年9月21日。

孙文凯、王乙杰, 2016,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再考察》, 《经济学(季刊)》第15卷第3期。

孙文凯、王乙杰, 2016,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探讨》, 《教育发展研究》第36卷第7期。

孙志军、郑磊，2021，《“撤点并校”是否减少了教育资源投入》，《教育研究》第42卷第11期。

唐宁、谢勇，2019，《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

陶然、周敏慧，2012，《父母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基于安徽、江西两省调查实证分析的新发现与政策含义》，《管理世界》第8期。

滕兵，2020，《农村校外寄宿小学生孤独感缓解的实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第22页。

滕洪昌、姚建龙，2018，《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全国10万余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教育科学研究》第3期。

滕洪昌、姚建龙，2018，《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全国10万余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教育科学研究》第3期。

王春超、林俊杰，2021，《父母陪伴与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教育研究》第42卷第1期。

王春超、孙曙涛，2023，《寄宿与留守儿童人力资本——来自学习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证据》，《经济科学》第3期。

王春超、张承莎，2019，《非认知能力与工资性收入》，《世界经济》第3期。

王道阳、殷欣，2015，《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研究进展》，《教育生物学杂志》第3卷第2期。

王慧敏等，2017，《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前教育与青少年的认知—非认知能力》，《青年研究》第6期。

王孟成等，2010，《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的初步编制 I：理论框架与信度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8卷第5期。

王妮妮，2023，《沙盘游戏在小学心理教育中的应用策略研究》，《成才》第5期。

王天宇、周晔馨，2023，《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基于四川省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王文惠等, 2023, 《国内外学校营养午餐立法及营养状况的进展》, 《上海预防医学》第35卷第11期。

王玉香、吴立忠, 2016, 《我国留守儿童政策的演进过程与特点研究》, 《青年探索》第5期。

王宗萍、段成荣, 2010, 《第二代农民工特征分析》, 《人口研究》第34卷第2期。

维果茨基, 余震球译, 2005, 《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魏东霞、谌新民, 2018, 《落户门槛、技能偏向与儿童留守——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17卷第2期。

温忠麟、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第22卷第5期。

温忠麟等, 2004,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心理学报》第5期。

吴帆、张林虢, 2018, 《父母参与在青少年行为发展中的作用——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吴方卫、卢文秀, 2024,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力重构及其内在逻辑》, 《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吴贾、吴莞生, 2024, 《农村留守儿童的同伴溢出效应: 基于非认知能力视角的研究》, 《世界经济》第47卷第8期。

吴霓, 2004,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 《教育研究》第10期。

吴培材, 2020,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 《南方经济》第1期。

吴晓刚、李欣, 2023, 《中国早期儿童发展与社会流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41卷第10期。

吴要武、侯海波, 2017, 《校园欺凌的影响与对策——来自农村寄宿制小学的证据》, 《劳动经济研究》第5卷第6期。

吴愈晓等, 2018, 《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协天紫光、张雪凯，2024，《择校学生能否影响非择校生的学业表现？——来自随机分班数据的经验证据》，《复旦教育论坛》第22卷第3期。

协天紫光、张雪凯，2024，《择校学生能否影响非择校生的学业表现？——来自随机分班数据的经验证据》，《复旦教育论坛》第22卷第3期。

谢爱磊等，2018，《“寒门贵子”：文化资本匮乏与精英场域适应——基于“985”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的追踪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6卷第4期。

谢贝妮、李岳云，2013，《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第4期。

谢桂华等，2022，《交友之道：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社会》第42卷第3期。

谢勇、赵晓倩，2022，《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教育与经济》第38卷第2期。

谢勇、赵晓倩，2022，《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教育与经济》第38卷第2期。

徐仲安等，2013，《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四川省震后灾区与非灾区的对比》，《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许多多，2017，《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学子命运：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社会》第4期。

许琪，2018，《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青年研究》第6期。

杨彩霞，2001，《班图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对儿童社会行为教育的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S2期。

杨菊华、段成荣，2008，《农村地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比较研究》，《人口研究》第1期。

杨朴、颜芷邑，2022，《寄宿如何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40卷第8期。

杨雨露，2019，《家庭教育中幼儿安全感的培育》，《社会科学前沿》第8卷第5期。

- 杨政怡、杨进, 2021,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青年研究》第2期。
- 姚嘉等, 2016, 《父母照料缺失对留守儿童教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教育发展研究》第36卷第8期。
- 姚松、高莉亚, 2018, 《大规模兴建寄宿学校能更好促进农村学生发展吗?》, 《教育与经济》第4期。
- 姚远、张顺, 2018, 《持久的“心灵烙印”: 留守时间如何影响青年早期的主观福祉》, 《青年研究》第3期。
- 姚志莉, 2024, 《阐释性再构理论下大班幼儿自主游戏中的同伴交往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石河子大学。
- 叶佳滢、曹晓君, 2019,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心理学进展》第9卷第5期。
- 叶敬忠, 2019, 《农村留守人口研究: 基本立场、认识误区与理论转向》, 《人口研究》第2期。
- 叶敬忠、[美]詹姆斯·莫瑞, 2005, 《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叶敬忠、[美]詹姆斯·莫瑞, 2005, 《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叶铭姗、刘颖, 2022, 《依恋类型对个体发展的重要影响》, 《心理学进展》第12卷第5期。
- 叶晓梅、曹晓婕, 2023, 《教师关怀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家校共育的机制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41卷第5期。
- 易春丽等, 2004, 《Bowen系统家庭的理论及治疗要点简介》,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1期。
- 余秀兰、韩燕, 2018, 《寒门如何出“贵子”——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阶层突破》, 《高等教育研究》第39卷第2期。
- 袁梦、郑筱婷, 2016, 《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 《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 袁书华、邢占军, 2017,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福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第9期。
- 张春阳、徐慰, 2020, 《大学生留守经历与攻击性: 安全感与自卑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28卷第1期。
- 张广胜、田洲宇, 2018,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 变迁、贡献与展望》, 《农业经济问题》第7期。
- 张广胜、王若男, 2023,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 张骞, 2023, 《遵从抑或濡染? 班级同伴网络视角下的心理健康研究》, 《社会》第43卷第1期。
- 张竞月、刘志发, 2024, 《父母情感支持和生活教育参与对西北青少年学习内在动机的影响——目标感的中介作用》, 《社会建设》第11卷第6期。
- 张李斌等, 2023, 《社会网络视角下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网络与欺凌相关行为的共同变化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第31卷第3期。
- 张瑞平、李庆安, 2017,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儒家心理资产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第40卷第3期。
- 张婷皮美、石智雷, 2021,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西北人口》第42卷第4期。
- 张彤进、万广华, 2020, 《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22卷第5期。
- 张威, 2018, 《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弱化现象以及现代社会工作的战略性应对》, 《社会工作》第6期。
- 张晓, 2021,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的现状与促进策略研究——以S乡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
- 张旭东等, 2017, 《从“90后”到“00后”: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 张瑶、陈伟, 2018, 《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 《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

张要要, 2023, 《体育锻炼能否减少青少年偏差行为——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教育学报》第19卷第4期。

张莹莹等, 2022, 《针对孤独症儿童早期依恋的干预研究进展》, 《心理学进展》第12卷第10期。

张云运、张其文、张李斌等, 2022, 《青少年友谊网络与受欺凌的共同变化关系: 一项纵向社会网络分析研究》, 《心理学报》第54卷第9期。

张云运、张其文、张李斌等, 2022, 《青少年友谊网络与受欺凌的共同变化关系: 一项纵向社会网络分析研究》, 《心理学报》第54卷第9期。

赵晨晓、董志勇, 2021, 《父母外出务工与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基于CFPS微观证据的考察》, 《湖北社会科学》第2期。

赵延东、洪岩璧, 2012, 《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第27卷第5期。

赵玉菡等, 2017, 《农村留守儿童学校教育问题研究——基于与非留守儿童的比照》, 《农村经济》第8期。

郑晓冬等, 2022, 《儿童期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社会学评论》第10卷第2期。

郑杨婧、方平, 2009, 《中学生情绪调节与同伴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S4期。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组, 2012, 《2011农村学校供餐与学生营养改善评估报告》, 北京: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组, 2012, 《2011农村学校供餐与学生营养改善评估报告》,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 《初中生营养知识问答》, 中国人口出版社。

周春芳等, 2023, 《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 《南方人口》第38卷第5期。

周春燕等, 2014, 《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父母情感温暖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22卷第5期。

周福林、段成荣，2006，《留守儿童研究综述》，《人口学刊》第3期。

周金燕，2015，《人力资本内涵的扩展：非认知能力的经济价值和投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3卷第1期。

周金燕、徐妮娜，2021，《寄宿式上学有利于初中生的发展吗？——基于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视角的实证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第5期。

周欣然等，2020，《初中生亲社会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三年交叉滞后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28卷第3期。

朱红、张文杰，2020，《精英大学生家庭特征及其对子女能力素质的影响——以北京大学2016—2018级新生为例》，《高等教育研究》第41卷第10期。

朱科蓉等，2002，《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教育科学》第4期。

朱颖，2024，《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成因及对策》，《心理学进展》第14卷第11期。

朱颖，2024，《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成因及对策》，《心理学进展》第14卷第11期。

朱志胜等，2019，《寄宿教育与儿童发展——来自贫困地区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经验证据》，《教育研究》第40卷第8期。

## 英文文献

Almlund, Mathilde, Angela Lee Duckworth, et al., 2011,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Vol. 4.

Alulis, Sarah, and Dan Grabowski, 2017,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forming family-based child and adolescent obesity interventions: A qualitative meta-synthesis”, *Obesity Research & Clinical Practice*, Vol. 11, No. 6, pp. 627–639.

Bandura, Albert, and Daniel Cervone, 1986, “Differential engagement of self-reactive influences in cognitive motiv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 38, No. 1, pp. 92–113.

Bandura, Albert, and Richard H. Walters,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Vol.1,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Batanova, Milena, Dorothy L. Espelage, and Mrinalini A. Rao, 2014, “Early Adolescents’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What Roles Do Attributions, Affect, Coping, and Self-Reported Victimization Play?” ,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Vol.52, No. 3, pp.279–293.

Becker, Gary S. , 1962,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ecker, Gary S. , 1962,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ehaghel, Luc, Clément de Chaisemartin, and Marc Gurgand, 2017, “Ready for Boarding? The Effects of a Boarding School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9, No.1, pp. 140–164.

Behrman, Jere R. , C.Simon Fan, Naijia Guo, Xiangdong Wei, et al. , 2024, “Tutoring Efficacy, Household Substitution,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n After-School Tutoring Program in Rural China”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65, No.1.

Bektas, Murat, Candan Ozturk, and Merry Armstrong, 2010, “An approach to children’ s smoking behaviors using social 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Vol.11, No.4, pp. 1143–1149.

Benson, Mark J. , and Cheryl Buehler, 2012, “Family process and peer deviance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aggression: Longitudinal effects across early and middle adolescence” , *Child Development*, Vol.83, No. 4, pp. 1213–1228.

Bonacich, Phillip, 1972, “Factoring and Weighting Approaches to Status Scores and Clique Identification” , *The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Vol.2, No.1, pp. 113–120.

- Borgatti, Stephen P., 2005, “Centrality and Network Flow” , *Social Networks*, Vol.27, No.1, pp.55–71.
- Bourdieu, P., 1983, *The Forms of Capital*,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owlby, John,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2, Separation. Anger and Anxiety*, London: Pimlico, New York: Basic Books Press.
- Bowlby, John, 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52, No.4, pp.664–678.
- Bowles, Samuel, Herbert Gintis, and Melissa Osborne, 2001, “The determinants of earnings: a behavioral approach”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9, No.4, pp.1137–1176.
- Brodeur, A., Clark, A.E., Fleche, S., and Powdthavee, N., 2021, “COVID–19, lockdowns and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Google Trends” ,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93.
- Bronfenbrenner, Urie,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nfenbrenner, Urie,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pigotto, Nicola, Rapallini, et al., 2022, “School friendship networks, homophily and multiculturalism: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35, No.4, pp.1687–1722.
- Coleman, Jame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pp.S95–S120.
- Coley, Rebekah Levine, Elizabeth Votruba-Drzal, et al., 2009, “Fathers’ and mothers’ parenting predicting and responding to adolescent sexual risk behaviors” , *Child Development*, Vol.80, No.3, pp.808–827.

- Copeland, William E., Wolke, Dieter, Angold, Adrian, et al., 2013, “Adult psychiatric outcomes of bullying and being bullied by pee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 *JAMA Psychiatry*, Vol.70, No.4, pp.419-426.
- Copeland, William E., Wolke, Dieter, Angold, Adrian, et al., 2013, “Adult psychiatric outcomes of bullying and being bullied by pee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 *JAMA Psychiatry*, Vol.70, No.4, pp.419-426.
- Costa Jr., Paul T., and Robert R. McCrae, 1992, “Four ways five factors are basic” ,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13, No.6, pp. 653-665.
- Crockett, Lisa J., Gustavo Carlo, and John E. Schulenberg, 2022, *APA Handbook of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 Crowne, Sarah Shea, 2011, “Concurrent and long-term impact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n employment stability” ,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Vol.26, No.6, pp.1282-1304.
- Cunha, Flavio, and James Heckman, 2007, “The Technology of Skill Formatio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7, No.2, pp.31-47.
- Cunha, Flavio, James J. Heckman, and Susanne M. Schennach, 2010,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 *Econometrica*, Vol.78, No.3, pp.883-931.
- Di Tella, Rafael, Robert J. MacCulloch, and Andrew J. Oswald, 2001,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 No.1, pp.335-341.
- Duckworth, A.L., Peterson, C., Matthews, M.D., & Kelly, D.R., 2007, “Grit: perseverance and passion for long-term goals”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92, No.6, pp.1087-1101.
- Easterlin, Richard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vidence” ,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pp.89-125.

- Elder, Glen H., 1994,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57, No.1, pp.4-15.
- Espelage, Dorothy L., Merrin Gabriel J., Hong Jun Sung, et al., 2018, "Applying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o explore relational aggression across early adolescence: A within-and between-person 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47, No.11, pp.2401-2413.
- Freeman, Linton C., 1977, "A Set of Measures of Centrality Based on Betweenness", *Sociometry*, Vol.40, No.1, p.35.
- Freeman, Linton C., 1978,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Social Networks*, Vol.1, No.3, pp.215-239.
- Friberg, Oddgeir, et al., 2020, "Do Childhood Boarding School Experiences Predict Health, Well-Being and Disability Pension in Adults? A SAMINOR Stud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51, No.10, pp.848-875.
- Gao, Yang, Li Li, Kim Jean, Congdon Nathan, Lau Joseph, and Griffiths Sian, 2010, "Th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behaviours among left behind adolescent school children in China", *BMC Public Health*, Vol.10, No.1, p.56.
- George, Linda K., 2014,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Call to Action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55, No.3, pp.251-264.
- George, Linda K., 2014,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Call to Action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55, No.3, pp.251-264.
- Giovanis, Eleftherios, 2018, "Are women happier when their spouse is teleworker?",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9, No.3, pp.719-754.
- Glewwe, Paul, Qiuqiong Huang, and Albert Park, 2017, "Cognitive Skills, Noncognitive Skills, and School-to-Work Transition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134, pp.141-164.

Goldberg, Lewis R. ,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rs for the big-five factor structure” ,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Vol.4, No.1, pp.26-42.

Guballa, Symon, A. , Angangan, Christhel, A. , and Raymundo, Maja, J. , et al. , 2025, “Parental Influence and Involve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Grade 12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Vol.39, No.2, pp.133-150.

Guballa, Symon, A. , Angangan, Christhel, A. , and Raymundo, Maja, J. , et al. , 2025, “Parental Influence and Involve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Grade 12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Vol.39, No.2, pp.133-150.

Hawkins, D.Lynn, Depler, Detra J. , and Craig, Wendy M. , 2001, “Naturalistic Observations of Peer Interventions in Bullying” , *Social Development*, Vol.10, No.4, pp.512-527.

Heckman, James J. , 2000, “Policies to foster human capital” , *Research in Economics*, Vol.54, No.1, pp.3-56.

Heckman, James J. , and Tim Kautz, 2014, “Fostering and measuring skills: Interventions that improve character and cognition” , *NBER Working Paper*, No.19656.

Heckman, James J. , Jora Stixrud, and Sergio Urzua, 2006,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24, No.3, pp.411-482.

Hirschi, Travis,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irschi, Travis,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lt, Melissa.K. , and Espelage, Dorothy L. , 2007,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bullies, victims, and bully-victims” ,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36, No.8, pp.984-994.

Hornsey, Matthew J., 2008,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A Historical Review” ,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Vol.2, No.1, pp.204-222.

Hu, Qingqing, Yanhong Feng, and Mark Xu, 2021, “Are there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air pollution on mental health?” ,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Vol.9, p.780022.

Huitsing, Gijs, Tom A.B.Snijders, Marijtje A.J.Van Duijn, et al., 2014, “Victims, Bullies, and Their Defender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Coevolu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Networks” ,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Vol.26, No.3, pp.645-65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1999,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Decent Work” ,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87th Session, Geneva.

Jentsch, Valerie L., Christian J.Merz, and Oliver T.Wolf, 2019, “Restoring Emotional Stability: Cortisol Effects on the Neural Network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Vol.374, p.111880.

Juvonen, Jaana, and Graham, Sandra, 2001, *Peer harassment in school: the plight of the vulnerable and victimize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Juvonen, Jaana, and Graham, Sandra, 2001, *Peer harassment in school: the plight of the vulnerable and victimize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Kandel, Denise B., 1978, “Homophily, Selec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Adolescent Friendship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4, No.2, pp.427-436.

Kang, Jihye, and Soyoung Kim, 2022, “Government spending news and surprise shock: It is the timing and persistence” ,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73, pp.2-7.

Kaplan, Bonnie J., et al., 2007, “Vitamins, Minerals, and Mood”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33, No.5, pp.747-760.

Karim, Jahanvash, Robert Weisz, Zainab Bibi, and Shafiq ur Rehman, 2015, “Validation of the eight-item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among older adults” , *Current Psychology*, Vol. 34, No. 4, pp. 681–692.

Kautz, Tim, James J. Heckman, Ron Diris, Bas ter Weel, and Lex Borghans, 2014, *Fostering and measuring skills: Improving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to promote lifetime success*.

Laursen, Brett, Todd D. Little, and Noel A. Card, 2012, *Handbook of Developmental Research Method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Lee, Jihyun, and Lazar Stankov, 2018, “Non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Evidence from TIMSS and PISA” ,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65, pp. 50–64.

Lee, Jihyun, and Valerie J. Shute, 2010, “Personal and Social-Contextual Factors in K-12 Academic Performance: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on Student Learning” ,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Vol. 45, No. 3, pp. 185–202.

Lei, Lei, and Youngjin Chae, 2024, “Parental Absence during Childhood and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dulthood in China”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86, No. 3, pp. 655–676.

Lei, Lianlian, Feng Liu, and Elaine Hill, 2018, “Labour migration and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54, No. 1, pp. 93–110.

Leschke, Janine, and Andrew Watt, 2014, “Challenges in constructing a multi-dimensional European job quality index”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18, No. 1, pp. 1–31.

Li Yuanfei, Cheng Cheng, Deane Glenn, et al., 2020, “Parental Migration and Chinese Adolescents’ Friendship Networks in School” ,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4, pp. 389–410.

Liu, Han, Fang Chang, Hannah Corn, et al., 2021, “Th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northwestern China” ,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72, 101261.

- Liu, Jianbo, Xiaodong Zheng, Marie Parker, et al., 2020, “Childhood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s in China” ,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Vol.39, No.4, pp.691-718.
- Liu, Min, and Karen M.Villa, 2020, “Solution or isolation: Is boarding school a good solu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61, p.101456.
- Liu, Zhiqiang, Li Yu, and Xiang Zheng, 2018, “No longer left-behind: The impact of return migrant parents on children’ s performance”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49, pp.184-196.
- Lodder, Gerine M.A. , Ron H.J.Scholte, Antonius H.N.Cillessen, et al. , 2015, “Bully Victimization: Selection and Influence within Adolescent Friendship Networks and Cliques” ,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45, No.1, pp.132-144.
- Lone, Ayooob, and Azzam Othman Albotuaiba, 2022, “Personality traits and family environment: Antecedents of child aggression” , *Brain Sciences*, Vol.12, No.11, p.1586.
- Ma, X-Y. , 2013, “Learning adaptability, mental health of pupils in boarding and nonboarding schools” ,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1, No.3, pp.497-499.
- Mander, David J. , and Lennie Lester, 2017, “A longitudinal study into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reported by boarding students as they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school to secondary boarding schools in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 *Journal of Psychologists and Counsellors in Schools*, Vol.27, No.2, pp.139-152.
- Martin, Andrew J. , Brad Papworth, Paul Ginns, et al. , 2014, “Boarding School, Academic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51, No.5, pp.1007-1049.
- McKenzie, David, and Hillel Rapoport, 2007, “Network effects and 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84, No.1, pp.1-24.

Meng, Xin, and Chikako Yamauchi, 2017, “Children of migrants: The cumulativ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in China” , *Demography*, Vol.54, No.5, pp.1677–1714.

Metzler, Marilyn, Melissa T.Merrick, et al., 2017,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life opportunities: Shifting the narrative” ,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Vol.72, pp.141–149.

Miller, Joshua D., and Donald Lynam, 2001, “Structural models of personality and their relation to antisocial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review” , *Criminology*, Vol.39, No.4, pp.765–798.

Monteoliva Sanchez, A., and Garcia Martinez, J.M.A., 2007,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reached by young people who have lived in tw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Family home or boarding school” , *Revista Mexicana de Psicología*, Vol.24, No.1, pp.139–148.

Monteoliva Sanchez, and Garcia Martinez, J.M.A., 2007,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reached by young people who have lived in tw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Family home or boarding school” , *Revista Mexicana de Psicología*, Vol.24, No.1, pp.139–148.

Montoya, R.Matthew, and Robert S.Horton, 2013,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 Similarity-Attraction Effect” ,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30, No.1, pp.64–94.

Ndugwa, Robert P., Caroline W.Kabiru, John Cleland, et al., 2011,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in Nairobi’s informal settlements: Applying problem behavior theory in Sub-Saharan Africa” ,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Vol.88, No.2, pp.298–317.

Nieuwenhuis, Jaap, Tom Kleinepier, Heleen Janssen, et al., 2021, “Neighbourhood deprivation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associations with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ur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36, No.3, pp.943–963.

- O' Connell, Paul, Debra Pepler, and Wendy Craig, 1999, "Peer Involvement in Bullying: Insights and Challenges for Intervention" , *Journal of Adolescence*, Vol.22, No.4, pp.437-452.
- Piaget, Jean, 1950, *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Pozzoli, Tiziana, and Gianluca Gini, 2010, "Active Defending and Passive Bystanding Behavior in Bullying: The Rol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ived Peer Pressure" ,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Vol.38, No.6, pp.815-827.
- Preacher, Kristopher J., and Andrew F.Hayes, 2008,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Vol.40, No.3, pp.879-891.
- Quick, Virginia, Colleen Delaney, Kaitlyn Eck, et al., 2021, "Family Social Capital: Links to Weight-Related and Parenting Behaviors of Mothers with Young Children" , *Nutrients*, Vol.13, No.5, p.1428.
- Rambaran, J.Ashwin, Jan Kornelis Dijkstra, and René Veenstra, 2020, "Bullying as a Group Process in Childhood: A Longitudina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Child Development*, Vol.91, No.4, pp.1336-1352.
- Resosudarmo, Budy P., and Daniel Suryadarma, 2011,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migration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urban migrants in Indonesia" , *Crawford School Research Paper*, No.2011/02.
- Rochat, Philippe, 2018, "The ontogeny of human self-consciousness" ,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27, No.5, pp.345-350.
- Roche, Erin, David Conner, Jane M.Kolodinsky, et al., 2012,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s a framework for considering farm to school programming" , *Childhood Obesity*, Vol.8, No.4, pp.357-363.
- Rosenberg, Florence R., Morris Rosenberg, and Joan McCord, 1978, "Self-esteem and delinquency" ,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7, No.3, pp.279-294.

Rotella, Katie N., Jennifer A. Richeson, Joan Y. Chiao, and Meghan G. Bean, 2012, "Blinding Trus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9, No. 1, pp. 115-127.

Rotter, Julian B., E. Jerry Phares, and June E. Chance, 1972, *Applications of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Salmivalli, C., Lagerspetz, K., Björkqvist, K., Österman, K., et al., 1996, "Bullying as a group process: Participant rol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social status within the group", *Aggressive Behavior*, Vol. 22, No. 1, pp. 1-15.

Salmivalli, Christina, 2010, "Bullying and the Peer Group: A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Vol. 15, No. 2, pp. 112-120.

Satici, Seydi Ahmet, Recep Uysal, et al., 2016, "Linking social connectedness to loneline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97, pp. 306-310.

Schaverien, Joy, 2011, "Boarding school syndrome: Broken attachments a hidden trauma",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Vol. 27, No. 2, pp. 138-155.

Schroeder, Frederic K., 2007, "Workplace Issues and Placement: What Is High Quality Employment?", *Work*, Vol. 29, No. 2, pp. 135-142.

Schultz, Theodore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1, pp. 1-17.

Schultz, Theodore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1, pp. 1-17.

Schultz, Theodore W., 197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chwartz, David, Kenneth A. Dodge, and John D. Coie, 1993, "The Emergence of Chronic Peer Victimization in Boys' Play Groups", *Child Development*, Vol. 64, No. 6, pp. 1755-1772.

Sentse, Miranda, Jan Kornelis Dijkstra, Christina Salmivalli, et al., 2013, “The Dynamics of Friendships and Victimization in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 *Aggressive Behavior*, Vol. 39, No. 3, pp. 229–238.

Shin, Huiyoung, 2019, “The Role of Perceived Bullying Norms in Friendship Dynamics: An Examination of Friendship Selection and Influence on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Vol. 46, No. 5, pp. 432–442.

Solon, Gary, 1992,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3, pp. 393–408.

Somerville, Leah H., Rebecca M. Jones, et al., 2013,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the Emergence of Self-Conscious Emotion in Adolescence” ,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4, No. 8, pp. 1554–1562.

Stieger, Stefan, David Lewetz, and Viren Swami, 2021, “Emotional well-being under conditions of lockdown: An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 in Austri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22, No. 6, pp. 1–18.

Tran, Ngan Lam Thi, Robert W. Wassmer, and Edward L. Lascher, 2017, “The health insura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connection”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 18, No. 2, pp. 409–426.

Turvey, Carolyn L., Robert B. Wallace, and Regula Herzog, 1999, “A revised CES-D measur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 DSM-based measure of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 in the elderly” ,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Vol. 11, No. 2, pp. 139–148.

Van Dam, Nicholas T., and Mitch Earleywine, 2011, “Validation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Revised (CESD-R): pragmatic depression assessment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 *Psychiatry Research*, Vol. 186, No. 1, pp. 128–132.

Veenstra, René, and Lydia Laninga-Wijnen, 2023, “The Prominence of Peer Interactions, Relationships, and Networks in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 *APA Handbook of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Development*, Vol. 14, pp. 225–241.

Veenstra, René, and Steglich, Christian, 2012, “*Actor-model analysis of peer influence*” , in B.Laursen, T.D.Little, and N.A.Card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al research method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Veenstra, René, and Steglich, Christian, 2012, “*Actor-model analysis of peer influence*” , in B.Laursen, T.D.Little, and N.A.Card,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al research method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Vygotsky, Lev,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Aiqin, Medina, Alexis, Luo Renfu, Shi Yaojiang, and Yue Ai, 2016, “To board or not to board: Evidence from nutrition, health and education outcomes of students in rural China” ,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24, pp.52–66.

Wang, Aiqin, Medina, Alexis, Luo Renfu, Shi Yaojiang, and Yue Ai, 2016, “To board or not to board: Evidence from nutrition, health and education outcomes of students in rural China” ,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24, pp.52–66.

Wang, Shutao, and Yaqing Mao, 2018, “The Effect of Boarding on Campus on Left-behind Children’ s Sense of School Belong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Chinese Evidence from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38, No.3, pp.378–393.

Watson, John B. ,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20, No.2, pp.158–177.

Wentzel, Kathryn R. , 2005, “Peer relationships,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t school” , *Handbook of Competence and Motivation*, pp.279–296.

White, Michael A. , 2004, *An Australian co-educational boarding school as a crucible for life: A humanistic sociological study of students’ attitudes from their own memoi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Wu, Chun-xia, Yan-mei Zhang, and Yi-zhen Yu, 2018,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rural left-behind school children” ,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34, No.7, pp.977-982.

Yang, Yang, Binting Deng, and Fan Yang, 2023,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parent involve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rural children in China” ,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Vol.33, No.2, pp.469-479.

Ye, Jingzhong, and Pan Lu, 2011, “Differentiated childhoods: Impact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38, No.2, pp.355-377.

Zefferino, Roberto, Sante Di Gioia, and Massimo Conese, 2021, “Molecular Links between Endocrine, Nervous and Immune System during Chronic Stress” , *Brain and Behavior*, Vol.11, No.2.

Zhang, D. , L.Cameron, and X.Meng, 2019, “Parental Absence in Childhood and Migrants’ Crime: Evidence from an Individual Prisoner Data in China” , Working Paper,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Zheng, Xiaodong, Xiangming Fang, Hope Ugboke, et al., 2019,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nd human capital in South Africa” ,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Vol.34, No.2, pp.139-151.

Zheng, Xiaodong, Zuyi Fang, Yajun Wang, et al., 2022, “When left-behind children become adults and parents: the long-term human capital consequences of parental absence in China”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74.

Zhou, Chengchao, Sean Sylvia, Linxiu Zhang, Renfu Luo, et al., 2015, “China’ s left-behind children: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health, nutrition,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 *Health Affairs*, Vol.34, No.11, pp.1964-1971.

Zhou, Yexin, Siwei Chen, Yefeng Chen, et al., 2022, “Does parental migration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preferences in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74, p.101826.

Zhu, Yu, Zhongming Wu, Liquan Peng, et al., 2014, “Where did all the remittances go?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rural China” , *Applied Economics*, Vol.46, No.12, pp.1312-1322.

## 后记

我将研究方向转向儿童领域，始于2022年儿子的降生。人生步入新阶段，初为人母的我，心中涌起诸多困惑。于是，我借此契机深入儿童研究，希望能更懂他，也因他而对儿童世界充满好奇。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立项，为我的儿童调研提供了坚实的经费支持，使我得以获取宝贵的一手数据。尽管我们生活在城市，但为了更好地兼顾育儿与工作，我和儿子曾经历过短暂的分离。那段时间，我的父母在老家帮我照料孩子，而我则每周末往返于工作地与故乡之间，仿佛成了一位“留守妈妈”。原以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特殊经历，却在与身边妈妈们的交流中发现，类似的情形并不少见。每当把他留在家中，自己专注工作时，心中总萦绕着一份难以释怀的“亏欠”。半年的候鸟生活之后，我决定与他共同生活，结束这样的分离。或许源于对农村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长期从事农村研究的路径依赖，我的目光逐渐转向成千上万的农村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他们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大迁移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缩影，也折射出农村教育资源集中化的现实。他们经历的，是一段特殊的童年，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在大众媒体或一般印象中，留守儿童与寄宿儿童常被贴上种种“标签”，与各类行为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也注意到许多曾为留守儿童的成年人，如今在各自岗位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拥有了幸福圆满的人生。本研究正是希望探寻这两类特殊又普遍的儿童，与其他儿童之间的异同，以期更辩证地看待他们，而非简单污名化。同时，这项研究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儿童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要感谢参与研究助理工作的同学们。龚小艺、周凤、晏冰洁、王芷怡、周运洋、徐奕、吴润凯、陈晴好等同学在资料整理、部分章节的初步撰写以及书稿校对工作中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本书的顺利出版，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曼曼女士的大力支持与专业工作，在此深表谢忱。同时，衷心感谢中南民族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彭庆军院长为本书出版提供的经费资助。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儿子。在我开启儿童研究之时，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如今，他已三岁八个月。每当我出门加班，他总会说：“妈妈不要加班。”年幼的他还不明白，妈妈的“班”里，有她的人生追求——就像他不明白爸爸为何总关着门对着电脑，也不知道那方屏幕之中，藏着爸爸的精神天地。感谢我的先生，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研究，在无数个伏案疾书的深夜，总有他的默默陪伴。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让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孩子，以至在我自己成为母亲之后，依然保有活成孩子的勇气。

杨政怡

2025年10月